马列毛主义者基础书单之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编

2023

声明

本 pdf 文件由志愿者制作，内容搜集自 telegram 频道“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其频道链接是 t.me/proletarianstruggles。

编者简介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机关报。我党主张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本报作为全国性质的政治报，通过建立代办员网络、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宣传革命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逐步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群众。

斗争报将力图对一切引起关注和争论的斗争事件按马列毛主义的精神进行评论，坚决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将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当中。

联系方式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是从民族主义者、自由派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等一切资本主义政党的敌人。因此，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客们必然会用尽各种办法攻击我们党，可以预见到阶级敌人的其中一种手段就是**表面上假扮成支持我党**的口吻，**事实上却肆意编造谣言来歪曲我党的主张**，甚至**冒充我党党员发表反动言论，把我们从未说过的话强行按在我们头上**，把我党抹黑成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赤匪或者极端“左”倾的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红卫兵，借此欺骗恐吓小资产阶级群众远离和仇视无产阶级革命派，迫使群众对我们党的纲领和主张保持一无所知的状态。有鉴于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预先发布下列联系方式和 GPG 公钥，以便广大群众能够直接联系我党和了解我们的立场，摆脱资产阶级的谎言。

我们的**公开群组**对所有进步群众开放，只要不发表反动言论都可以留在群内。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审查每一个加入群组的人的真实身份，不可能把警察、自由派、机会主义者等等绝对排除在公开群组以外，这些反革命分子必然潜藏在群众里伺机而动。因此，各平台的**公开群组**里鱼龙混杂，**群成员的言论仅能代表发言者个人，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立场**。不论在墙内还是墙外，只有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和《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上公布和验证过的宣传平台能够代表我们党的正式立场，除此之外，不要相信任何自称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骗子。

一、网站

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

jiashigrsyt1.github.io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proletarianstruggles.github.io

proletarianstruggles.wordpress.com

二、邮箱

佳士工人声援团联络邮箱

jiashigrsyt@protonmail.com

斗争报邮箱

douzhengbao@protonmail.com

三、Telegram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t.me/proletarianstruggles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t.me/JSshengyuan

管理员电报账号

https://t.me/jsgrsyt

https://t.me/zgmzdzygcd

四、Matrix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app.element.io/#/room/#proletarianstruggles:matrix.org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app.element.io/#/room/#JSshengyuan:matrix.org

管理员 Matrix 账号

https://app.element.io/#/user/@jiashigrsyt:matrix.org

https://app.element.io/#/user/@mcpc:matrix.org

五、Keybase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团队

https://keybase.io/team/douzhengbao

管理员 Keybase 账号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

六、XMPP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jsshengyuan@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管理员 XMPP 账号

jsgrsyt@conversations.im

mcpc@yax.im

七、GPG 公钥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pgp_keys.asc

https://proletarianstruggles.files.wordpress.com/2023/11/pgp_keys.asc

https://jiashigrsyt1.github.io/pgp_keys.asc

目录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1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16

注释：......19

1789 年式的革命还是 1848 年式的革命？......23

论临时革命政府[1]......25

第一篇文章 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考证......25

第二篇文章 仅仅从下面还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34

注释：......41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44

序言......44

注释：......47

1．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54

注释：......56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59

注释：......64

3．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64

注释：......70

4．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73

注释：......78

5．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78

6．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81

7．“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93
注释：......97
8．解放派和新火星派......99
注释：......107
9．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108
注释：......111
10．“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12
注释：......121
1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粗略比较......122
12．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126
注释：......134
13．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135
注释：......144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146
一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146
注释：......153
二　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154
注释：......161
三　庸俗的资产阶级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162
注释：......171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75
注释：......183

论革命的两条路线......186
注释：......191
关于 1905 年革命的报告[1]......193
注释：......209
远方来信[1]......211
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2]......211
注释：......221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1]......227
提纲......227
注释：......232
论策略书[1]......233
说明......233
第一封信 对形势的估计......234
注释：......244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246
这次革命的阶级性......246
新政府的对外政策......247
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和它的阶级意义......248
从上述情况中产生的策略特点......250
革命护国主义和它的阶级意义......252
怎样才能结束战争？......254
在我国革命中兴起的一种新的国家类型......255
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257
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的国有化......259

社会党国际的状况......260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破产——必须建立第三国际......266
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 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269
后记......273
注释：......275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286
饥荒逼近......286
政府不起任何作用......287
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289
银行国有化......291
辛迪加国有化......296
取消商业秘密......299
强迫参加联合组织......302
调节消费......305
政府破坏民主组织的工作......308
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311
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314
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318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321
注释：......323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

列宁（1897 年底）

90 年代后半期的特点，是在提出和解决俄国革命问题方面呈现异常活跃的气象。新的革命党民权党[2]的出现，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和成绩的增长，民意党内部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小组中以及秘密宣传中，引起了对纲领问题的热烈讨论。在秘密宣传中值得指出的有："民权党"的《迫切的问题》和《宣言》（1894 年），《"民意社"快报》[3]，"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4]在国外出版的《工作者》，在俄国国内出版主要供工人阅读的革命小册子的紧张活动，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 1896 年著名的彼得堡罢工时所进行的鼓动工作等等。

在我们看来，现在（1897 年底）最迫切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问题。我们着重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方面，是因为它的理论方面，看来已经渡过了最紧张的时期；当时，它根本不为对手们所了解，又有种种势力力图在新派别一出现时就把它压下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则热烈捍卫自己的基本原则。现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观点，在其主要的与基本的方面，已经充分阐明了。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方面，关于它的政治纲领，关于它的活动方法，它的策略，却还不能这样说。我们觉得，正是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多误会和隔阂，妨碍着某些革命者与社会民主党充分接近，这些革命者在理论上已经完全离开民意主义，而在实践上，或是由于客观力量所迫，到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甚至把自己在工人中间的活动放到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或者力图把民主主义任务当作全部纲领和全部革命活动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后一评语是适用于目前在俄国与社会民主党人同时活动的两个革命团体，即民意党和民权党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把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任务解释清楚，把我们下述看法的根据加以说明是特别适时的：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是现有三个纲领中最合理的纲领，反对意见多半是由于了解不够。

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活动方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的两种具体表现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5]）；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表现（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我们刚才说大家知道。的确，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自从作为一个特别的社会革命派别出现时起，就始终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这一活动任务，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两种表现与内容，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一联系在他们所采用的名称上就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了。然而直到现在，你们还往往看见，有些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抱着一种极端谬误的观念，责难社会民主党人忽略政治斗争等等。我们现在就来稍微谈谈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践活动的这两个方面。

我们从社会主义活动谈起。自从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在彼得堡工人中间活动时起，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活动的性质，看来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工作，就是在工人中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使工人正确了解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基础与发展，了解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了解这些阶级相互的斗争，了解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了解工人阶级对于正在没落的阶级和正在发展的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将来所应采取的态度，了解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同宣传工作紧密相联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的政治条件和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下，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

工人为工作日、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严重的舞弊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厂主提出的要求表述得更明确、更切实，提高工人对自身团结的认识，提高作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部分的全体俄国工人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的认识。在工人中间成立小组，使它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中心小组建立经常的秘密联系，印发工人书刊，组织各工人运动中心地点的通信工作，印发鼓动传单和宣言，训练有经验的鼓动员，——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大致就是这样。

我们的工作首先和主要是针对城市工厂工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力量在工业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因为工业无产阶级最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智力上和政治上最发展，并且按其数量以及在国内巨大政治中心的集中程度来说，又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建立坚固的革命组织，是社会民主党首要的迫切任务，现在放弃这个任务是极不恰当的。然而，我们虽然认为必须集中自己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反对分散力量，但我们丝毫无意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忽略俄国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其他阶层。根本不是这样。俄国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本身，使他们往往要同那些散布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条件更恶劣得多的厂外工业无产阶级即手工业者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俄国工厂工人同农村居民也有直接联系（工厂工人往往有家在农村），所以他们也不能不同农村无产阶级即千百万的雇农和日工，以及那些拘守一小块土地，从事工役和寻求各种偶然“外水”，即同样是从事雇佣劳动的破产农民接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现在把自己的力量派到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中间去工作，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们决不想忽视这些阶层，而要努力教育先进工人了解手工业者和农村工人的日常生活情形，使这些工人在同无产阶级中比

较落后的阶层接近时，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俄国民主派，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也带给这些阶层。当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还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的时候，派遣鼓动员到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中去是不实际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工人既然有很多机会不知不觉地接触这些人，那就应该善于利用这种机会并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任务。因此，那些责难俄国社会民主党狭隘，说他们因为只注重工厂工人而有意忽视广大劳动群众的人，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中间进行鼓动，是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唤醒起来（随着运动的扩大）的最可靠手段。在城市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的思想，就必然会使这些思想经过比较细小分散的渠道传播开来：为此必须使这些思想在较有锻炼的人们中间扎下较深的根，使俄国工人运动与俄国革命的这个先锋队完全领会。俄国社会民主党运用自己全部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活动，同时决定支持俄国那些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工作放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基地上来的革命者，但他们毫不隐讳，无论与其他革命派别订立什么样的实际联盟，都不能而且不应当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上实行妥协或让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深信，现在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是革命理论，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他们将用全力来传播这个学说，使它不受曲解，反对任何想把还年轻的俄国工人运动同那些不确定的学说联系起来的行为。理论的判断证明，而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则表明：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工作。我们再说一遍：这个工作与社会主义工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的时候，不能避开政治问题，并且认为，想避开政治问题或者把它们搁置一边的任何做法，都是极大的错误，都是背离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还要在工人群众中间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竭力使工人认识专制制度的一切活动表现，专制制度的阶级内

容，推翻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如果不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胜利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根据当前的经济要求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的时候，把这种鼓动与根据工人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政治困苦和政治要求进行的鼓动密切联系起来，例如进行鼓动反对那种在每次罢工、每次劳资冲突中都出现的警察压迫，反对对工人，作为俄国公民，特别是作为最受压迫最无权的阶级的工人所实施的权利限制，反对每一个与工人直接接触并使工人阶级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处于政治奴隶地位的专制制度的重要人物和走狗。在经济方面，没有一个工人生活问题不可以利用来进行经济鼓动，同样，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当作政治鼓动的对象。这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密切联系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因而也就使工人有可能在解决迫切问题和迫切需要方面试验自己的力量，使工人们有可能从敌人方面争得局部的让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资本家不能不考虑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扩大工人的权利和接受工人的要求，使政府在怀有敌对情绪并由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所领导的工人群众面前经常胆战心惊。

我们已经指明社会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指明革命工作在这两方面是完全并行的。然而这两种活动和斗争也有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完全是孤立的，要同时反对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这里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还有资产阶级、有教养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受专制制度迫害的民族或宗教和教派等等的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这里自然就发生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对于这些分子应该抱什么态度？其次，工人阶级是否应当与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共同斗争？既然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政治革命在俄国应当先于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岂不是应当与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联合起来进行反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暂时把社会主义搁置起来，这不是为加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所必需的吗？

我们来分析这两个问题。

工人阶级这个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对其他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社会阶级和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早已由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叙述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十分确切地规定出来了。［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02—505 页。——编者注］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进步的社会阶级去反对反动的社会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那些特权等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对官吏，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这种支持并不打算也不要求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这是支持同盟者去反对特定的敌人，而社会民主党人给予这种支持，是为了更快地推翻共同的敌人，但他们并不打算从这些暂时的同盟者那里为自己取得什么，也不会让与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任何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

在宣传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对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的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证明专制制度敌视工人事业时，将指明专制制度也敌视其他某些社会集团，将指明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任务上，工人阶级和这些集团是一致的，等等。在鼓动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将利用专制制度警察压迫的每一表现

向工人们指明，这种压迫如何落在一切俄国公民头上，尤其是落在特别受压迫的等级、民族、宗教和教派等等的头上，这种压迫如何特别影响到工人阶级。最后，在实践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决心同其他派别的革命者结成同盟，以便达到某些局部目的，而这种决心已用事实多次证明过了。

这里我们也就谈到第二个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指出某些反政府集团与工人之间的一致时，始终要把工人划分出来，始终要解释这种一致的暂时性与相对性，始终要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因为它可能在明天就成为今天同盟者的敌人。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指出这点，就会减弱现在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我们回答说：指出这点，只会加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只有那些立足于已被认识的一定阶级的实际利益的战士，才是强而有力的；凡是把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起着主要作用的阶级利益蒙蔽起来，都只会削弱战士的力量。这是第一。第二，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当使自己划分出来，因为只有它才是专制制度的彻底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它才不可能和专制制度妥协，只有工人阶级才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拥护民主主义。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敌视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顾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意识到专制制度阻碍工业与社会的发展，但它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完全民主化，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其本性来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会折服于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6]），为了巩固自己小私有者的地位而会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反对无产阶级。有教养的人，整个"知识界"，不能不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摧残思想和知识的野蛮的警察压迫，但是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至于被压迫民

族和受迫害宗教中间的民主分子，那么谁都知道，谁都看得见，这几类居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要比每一类中的各个阶级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制度的一致性深刻得多，强烈得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这个阶级的地位不可能有丝毫改变，它既没有接近最高当局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因此，把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活动与其他各个阶级和集团的民主主义溶合起来，就会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就会削弱政治斗争，就会使这一斗争不是那样坚决，不是那样彻底，而是比较容易妥协。反过来，把工人阶级作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划分出来，就会加强民主运动，加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将带动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和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将推动自由派去与政治激进派接近，将推动激进派去同当前社会整个政治社会制度坚决断绝关系。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现在还要补充说：俄国一切真正的和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我们的意思。我们就拿官僚这个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特殊阶层的机关来说，从专制的、半亚洲式的俄国起，到有文化的、自由的、文明的英国止，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不可或缺的官僚机关。与俄国的落后性及其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是人民在官吏面前完全无权，特权官僚完全不受监督。在英国，人民对行政机关实行强有力的监督，然而即使在那里，这种监督也远不是完全的，官僚仍然保持着不少特权，他们往往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即使在英国，我们也看到，有势力的社会集团

总是支持官僚特权地位，不让这个机关完全民主化。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由于这个机关的完全民主化仅仅有利于一个无产阶级；于是连资产阶级最先进的阶层，也维护官吏的某些特权，反对一切官吏由选举产生，反对完全废除资格限制，反对官吏对人民直接负责等等，因为他们感觉到，这种彻底的民主化将被无产阶级利用来反对资产阶级。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俄国人民中许多各不相同的阶层，都反对专权独断、不对任何人负责、贪赃受贿、野蛮昏愦、过着寄生生活的俄国官吏，可是，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一个阶层会容许官吏机构完全民主化，因为其他一切阶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整个“知识界”）都与官吏有联系，都与俄国官吏有亲属关系。谁不知道，在神圣的俄罗斯，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很容易变为帝国政府的官吏，他们以在官场范围内有所“裨益”而聊以自慰，他们以这种“裨益”来替自己的政治冷淡态度辩护，来替自己向刑棍和皮鞭的政府献媚辩护。只有无产阶级，才绝对敌视专制制度和俄国官吏；只有无产阶级，才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些机关没有任何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

我们证明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是俄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战士的时候，竟遇见一种十分流行而又十分奇怪的意见，似乎俄国社会民主党拖延政治任务和政治斗争。我们知道，这种意见与真实情况截然相反。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曾多次阐述过，而且早在最初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中，即“劳动解放社”[7]在国外出版的小册子和书籍中就已经阐述过，为什么有人竟如此惊人地不了解呢？我们觉得，这一奇怪事实是由于下面三个原因产生的：

第一，是因为旧的革命理论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他们拟定纲领和行动计划，总是根据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根据对各个在国内活动、而其相互关系已由历史决定的现实阶级的估计。正因为人们没有用这种现实主义

态度来讨论那些支持俄国民主运动的利益，才能发生这种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忽略俄国革命者的民主主义任务的意见。

第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与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把政治问题从“知识界的狭小书房”拿到街上去，拿到工人和劳动阶级中间去，把关于政治压迫的抽象观念，换成最使无产阶级痛苦的那些政治压迫的实际表现，而社会民主党就是根据这些表现来进行鼓动工作的。俄国激进派分子往往觉得，社会民主党人不直接号召先进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而提出了发展工人运动和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就是从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往后退，就是拖延政治斗争。可是，如果这里真有所谓后退，那就不过是法国俗语所说的那种后退：“为要远跳，必须后退！”

第三，误会所以发生，是因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概念本身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比旧的革命理论代表人物的理解广泛得多。1895 年 12 月 9 日《“民意社”快报》第 4 期，就具体证明了这个似乎不近情理的说法。我们衷心欢迎这个刊物，因为它表明在现代民意党人中间进行着一种很有成效的深刻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纲领问题》一文（第 19—22 页）显然表明老民意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注：在第 4 期上发表的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不过是彼·拉·拉甫罗夫预定在《资料》[8]上发表的那封长信中的“摘录”而已。我们听说，今年（1897 年）夏天，在国外发表了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全文以及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可是我们无法看到这封信，也无法看到这个回答。《“民意社”快报》编辑部曾答应在第 5 期上发表编辑部对于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评论（见第 4 期第 22 页第 1 栏附注），但我们也不知道该期是否已经出版。］。

彼·拉·拉甫罗夫谈到民意党人的纲领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关系时写道：“……这里有一点而且只有一点是重要的：在专制制度下面，离开组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是否有可能组织强大的工人党呢？”（第 21 页第 2 栏）；在稍前一点（第 1 栏）也同样说：“……在专制制度统治下，组织俄国工人党，而不同时组织反对这个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我们完全不懂彼·拉·拉甫罗夫认为十分重要的这些差别。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作“除了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之外的工人党”？？难道工人党本身不是革命党么？难道工人党不反对专制制度么？对于这个奇怪议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建立俄国工人党的组织，是要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同时组织政治密谋[注：黑体是我们用的。] 来反对专制制度及其搞这种密谋 [注：黑体是我们用的。] 的一切条件而能做到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的政治纲领当然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适当纲领，因为工人的解放将能用工人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然而这是很成问题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第 21 页第 1 栏）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民意党人原来认为政治斗争与政治密谋是一回事！必须承认，彼·拉·拉甫罗夫的这些话，真是十分明显地指出了民意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斗争策略方面的基本区别。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主义[9]，即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以致他们只能把政治斗争设想为政治密谋这种形式。社会民主党人却没有这种观点狭隘的毛病；他们不相信密谋，认为密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就是极大地缩小了政治斗争的范围，这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意味着选择了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谁都明白，彼·拉·拉甫罗夫所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西方的活动看成最好的榜样”（第 21 页第 1 栏），不过是辩论中的胡言乱语罢了。其实，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忘记俄国的政治条件，从来也没有梦想在俄国有可能公开建立工人党，从来也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与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分开。但他们始终认为，这种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党来进行。他

们认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不应当是组织密谋，而应当是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遵守纪律，组织无产阶级，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鼓动，痛斥专制制度的一切表现，把警察政府的勇士们统统钉上耻辱柱，迫使这个政府实行让步。难道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活动不正是这样么？难道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而没有组织任何密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彼得堡无产阶级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为其力量泉源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么？难道"协会"的活动——尽管它活动的时间很短——不是已经证明，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是政府不得不考虑并急于对它作出让步的巨大政治势力么？1897 年 6 月 2 日颁布的法令，无论按其匆忙施行或就其本身内容来说，都显然表明这是被迫对无产阶级实行的让步，这是从俄国人民的敌人手中夺得的阵地。虽然这个让步很小，虽然这个阵地不大，可是要知道，争得这个让步的工人阶级组织也并不大，并不坚固，成立不久，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经费：大家知道，"斗争协会"只是在 1895—1896 年间才成立的，它对工人们的号召，只是通过胶印的和石印的传单。如果这样的组织至少包括了俄国工人运动一些最大的中心（圣彼得堡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区，南俄以及各重要城市，如敖德萨，基辅，萨拉托夫等等），拥有革命机关报，在俄国工人中间享有象"斗争协会"在圣彼得堡工人中间所享有的那种威信，那么这个组织就会成为目前俄国最大的政治因素，成为政府在其全部内外政策中不能不考虑的因素，——这难道可以否认么？一个组织，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强工人的组织和纪律，帮助工人为自己的经济需要而斗争，又接二连三地从资本手里夺得阵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不断地和勇往直前地攻击专制制度，消灭每一个使无产阶级感觉到警察政府魔爪的沙皇强盗，这样的组织就会是既适合我国条件的工人党组织，又会是反对专制制度的强大的革命党。预先来谈论这个组织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将采用什么手段，例如，它将采取起义，还是群众性的政

治罢工，或者其他进攻手段，——预先来谈论这个问题，并且要在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是空洞的学理主义了。这就好象将领们尚未调集军队，动员军队去进攻敌军以前，就预先召集军事会议一样。当无产阶级军队在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下，勇往直前争取自身经济和政治解放的时候，这个军队自己就会给将领们指明行动的手段和方法。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对专制制度实行最后打击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决，正是取决于工人运动的状况，工人运动的广度，运动本身所造成的斗争手段，领导运动的革命组织的素质，其他各种社会分子对无产阶级和对专制制度的态度，国外国内的政治条件，——总而言之，取决于千百种条件，而要预先猜测这些条件，是既不可能又无益处的。

因此，彼·拉·拉甫罗夫的下面一段议论，也是十分不正确的：

“如果他们〈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一定要不仅部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而且还要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那么不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怎样称呼自己，他们事实上是要采纳他们对手即民意党人的纲领。在村社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以及经济唯物主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对实际事业不太重要的、促进或妨碍在准备主要之点时规定局部任务和局部手段的一些细节而已。”（第 21 页第 1 栏）

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值一驳，怎么能说在俄国生活和俄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在理解历史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只是牵涉到一些“细节”呢！早已有人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现在未必有再来证明这个真理的必要。阶级斗争的理论，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了解俄国历史，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估计俄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形，承认必须把革命斗争归结为一定阶级的一定利益，并分析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等，都是十分重大的革命问题，把这些问题叫作“细节”，是绝顶荒谬的。从革命理论的老手方面听到这种言论，真是出人意料，我们简直要说这是失言。至于上面所引那段话的

前半节，它的荒谬无理就更令人惊奇了。报刊上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是部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就是说，只进行经济斗争！），而不同时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说这种话，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也许彼·拉·拉甫罗夫不承认那些在社会民主党人队伍里进行实际工作的人是“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吧？！或者（这也许更正确些）他把反专制制度的“斗争”只了解为反专制制度的密谋吧？（参看第 21 页第 2 栏：“……问题是要……组织革命密谋”；黑体是我们用的）。也许彼·拉·拉甫罗夫认为谁不组织政治密谋，谁就是不进行政治斗争吧？我们再说一遍：这种观点完全合乎古老民意主义的古老传统，但它完全不合乎现代的政治斗争概念，也不合乎现代的实际情况。

关于民权党人，我们还要说几句话。在我们看来，彼·拉·拉甫罗夫说得完全对：社会民主党人“把民权党人当作比较直爽的人，并且决心支持他们，但是不与他们溶合起来”（第 19 页第 2 栏）；不过要补充一句：是当作比较直爽的民主主义者和只要民权党人以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可惜，这个条件与其说是真实的现在，不如说是所希望的将来。民权党人曾经表示愿意使民主主义任务摆脱民粹主义，并且根本摆脱与“俄国社会主义”的陈腐形式的联系，但他们自己还远未摆脱旧的偏见，远不彻底，因为他们竟把自己仅仅主张政治改革的党称呼为“社会〈？？!〉革命”党（见他们 1894 年 2 月 19 日发表的《宣言》）。《宣言》里说：“民权这一概念包括组织人民生产”（我们只能凭记忆引证），这就证明他们又在偷偷地运用那种民粹主义偏见。所以彼·拉·拉甫罗夫称他们为“戴假面具的政治家”（第 20 页第 2 栏），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可是，也许把民权主义看成一种过渡的学说会更正确些，它有不可否认的功劳，就是它以民粹派学说的独特性为耻而与民粹派中最可恶的反动分子公开进行争论，这些分子面对警察式的阶级专制制度竟然说什么人们期望的是经济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见“民

权”党出版的《迫切的问题》)。如果民权党内除了那些从策略考虑而藏起自己的社会主义旗帜，戴上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假面具的（如彼·拉·拉甫罗夫所假设的那样，第 20 页第 2 栏）旧时社会主义者而外，确实没有别的人，那么这个党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然而，如果在这个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个党努力去同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努力唤醒我国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等等这一阶级的政治自觉，它就会带来不少的好处。这个小资产阶级在西欧各处的民主运动中都起过相当的作用，它在我们俄国改革后的时代，已在文化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取得特别迅速的成就，它不能不感觉到警察政府进行压迫和恬不知耻地援助大工厂主、金融和工业垄断大王的事实。为此，民权党人必须力求和各个居民阶层接近，不要仍然局限于那个“知识界”，因为“知识界”由于脱离群众实际利益而软弱无力，这是连《迫切的问题》也承认了的。为此，民权党人就要抛弃那种想把各种社会分子融合起来并借口政治任务来排斥社会主义的企图，就要抛弃那种妨碍他们自己与人民中间资产阶级阶层接近的虚伪羞耻，就是说，不要仅仅谈论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的纲领，而且还要按照这个纲领去行动，唤醒并发展那些完全不需要社会主义，但日益感到专制制度的压迫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阶级自觉。

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很年经，刚刚在走出那个以理论问题占主要地位的萌芽状态。它才刚刚开始展开实践活动。其他派别的革命者，已经不得不放下对社会民主理论和纲领的批评，而来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必须承认，后面这种批评与理论批评大不相同，有可能造出这样可笑的谣言，说圣彼得堡“斗争协会”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出现这样的谣言本身，也就证明那种指斥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政治斗争的流行责难是不正确的。出现这样的谣言本身，也就证明未

被社会民主党人理论所说服的许多革命家已经开始被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说服了。

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有许许多多刚刚开始的工作要做。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它对知识、团结、社会主义、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自发追求，表现得日益明显、日益广阔。俄国资本主义在最近时期内达到的巨大进展，保证工人运动将会毫不停顿地扩大和深入。我们现在显然正处在资本主义周期的这样一个时期：工业“繁荣”，商业昌盛，工厂全部开工，无数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不可避免的破产（相当厉害）必定在这种工业“繁荣”以后接踵而来。这种破产将使大批小业主破落，把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队伍里去，从而在全体工人群众面前尖锐地提出早已摆在每个有觉悟有思想的工人面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民主主义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设法使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破产到来的时候更有觉悟，更加团结一致，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任务，能够回击现在赚得巨额利润而随时都想把亏损转嫁到工人身上的资本家阶级，能够领导俄国民主势力去进行决战，反对那束缚俄国工人和全体俄国人民手脚的警察专制制度。

总之，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满足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要组织工人运动，要巩固革命团体及其相互联系，要供给工人们宣传鼓动的书刊，要把散布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工人小组与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统一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工党！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彼得堡革命者正处在困难的时期。政府确实是动员了它的全部力量来镇压产生不久就显示了很大威力的工人运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监狱已有人满之患。乱抓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男是女；逮捕工人，成批地把他们放逐。几乎

每天都可以听到消息，说警察政府疯狂地迫害它的敌人，愈来愈多的人遭到牺牲。政府决心不让俄国革命运动的新潮流发展壮大起来。检察长和宪兵们已经在夸耀，说他们把“斗争协会”摧毁了。

这种夸耀完全是谎话。尽管迫害重重，“斗争协会”还是屹然不动。我们非常满意地指出，大规模的逮捕已经发生了自己的作用，它已成为向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进行鼓动的有力工具，一批革命者倒下去，另一犹新的人又带着新的力量站到为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俄国人民而战的战士队伍里。斗争不可能没有牺牲。对于沙皇强盗的野蛮迫害，我们镇静地回答说：革命者牺牲了，——但革命必将胜利！

直到目前为止，加紧迫害只不过使“斗争协会”的某些活动暂时削弱，使代办员和鼓动员的人数暂时有所不足。现在正是感到这种暂时的不足，所以我们向一切觉悟的工人和一切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发出号召。“斗争协会”需要代办员。一切愿意从事任何一种革命活动，哪怕是极小范围内的活动的小组和个人，请把自己的愿望告诉同“斗争协会”有联系的人。（如果有的小组找不到这样的人，可以通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代为转达。这种情形可能很少。）需要做各种各样工作的人，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的分工愈严格，他们对秘密活动的方法和隐蔽的方式考虑得愈周密，他们愈是忘我地埋头于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和局部性的工作，总的事业就愈可靠，宪兵和奸细就愈难发现革命者。政府预先就撒下了密探网，而且不仅对准真正的反政府分子的基地，连那些有可能的和有嫌疑的地方也不放过。政府豢养一批专事迫害革命者的奴仆，不断扩大和加强他们的活动，并且想出一些新办法，设置一批新的挑拨者，竭力用恫吓、伪造口供、假造签名和假文件等等手段来迫害被捕者。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而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系工作交给“斗争协会”的为数很

少的核心分子。革命工作的分工是十分繁杂的。需要有公开的鼓动员，他们善于向工人宣传，但是又不致因此受到法院的审判；他们要善于只说出甲的意思，使别的人说出乙和丙的意思。需要有散发书刊和传单的人。需要有工人小组的组织者。需要有散在各个工厂而能提供厂内各种情况的通讯员。需要有监视奸细和挑拨者的人。需要有设置秘密住所的人。需要有传递书刊、指示和进行各种联络的人。需要有筹集款项的人。需要在知识界和官吏中间有一批同工人、工厂生活和当局（警察、工厂视察机关等等）有接触的代办员。需要有同俄国和国外各城市进行联络的人。需要有能用各种方法翻印各种书刊的人。需要有保管书刊和其他物品的人，等等，等等。各个小组或个人担负的工作愈细小，就愈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工作，保证工作不致失败，研究各种秘密工作的细节，采取各种办法麻痹宪兵的警惕性，使他们迷茫混乱，这样，工作的成功就愈有希望，警察和宪兵就愈难追踪革命者以及他们同组织的联系，革命政党就比较容易用他人来代替牺牲的代办员和党员，而不致使整个事业遭到损害。我们知道，实行这种分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所以困难，是因为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眼的、单调的工作，它要求和同志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但是只有这样，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才有可能用多年的时间从事革命事业的全面准备工作，实现极其宏伟的事业。我们深信，社会民主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决不逊于前辈的革命者。我们也知道，按照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方式，许多献身革命工作的人都将经历一段非常艰苦的准备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斗争协会”要收集有关这些愿意效劳的个人或小组的必要材料，考验他们适于执行什么使命。不经过这种预先的考验，就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展开革命活动。

为了把这种活动方式推荐给我们的新同志，我们才把我们在长年经验中得出的一点体会介绍出来。我们深信，采取这种方式就能使革命工作的胜利获得最大的保证。

注释：

[1]《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是 1897 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1898 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首次出版，曾在俄国先进工人中广泛流传。小册子的手稿未找到，现只保存下来手稿的一个转抄本，抄录人不详。1902 年和 1905 年，小册子在日内瓦先后出了第 2 版和第 3 版，列宁为这两版写了序言（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和第 11 卷）。这本小册子还被编入 1907 年 11 月出版的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手稿转抄本和小册子第 1 版都收了传单《"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作为补充，但是 1902、1905、1907 年的版本没有收这份传单。——426。

[2]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 年夏成立。参加创建的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捷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的宗旨是联合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该党发表过两个纲领性文件：《宣言》和《迫切的问题》。1894 年春民权党的组织被沙皇政府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426。

[3]《"民意社"快报》（《Летучий Листок "Группы Народовольцев"》）是俄国革命民粹派组织民意社的刊物，1892—1895 年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 4 期。——426。

[4]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 1894 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 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

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 年 3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到 1898 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 年 11 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和列宁的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 1899 年 4 月起，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出版《工人事业》杂志。1900 年 4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 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放。——426。

[5]列宁在此处的用词原来不是"社会"，而是"生产"。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第 1 版（1898 年）中，"生产"被误排成了"政府"，可能是因为"生产"和"政府"这两个俄文词的缩写完全一样所致。在 1902 年的第 2 版中，列宁订正这个错误时，把"政府"改成了"社会"。——429。

[6]指 1881—1882 年内务大臣尼·巴·伊格纳季耶夫执行的政策。伊格纳季耶夫竭力愚弄自由派，用民主的把戏为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倒行逆施打掩护。他曾召集由大臣们所挑选的"有识之士"（贵族代表、地方自治局主席等）讨论关于降低赎金、调整移民和改革地方行政等问题。他还宣称，沙皇政府将召集全国的代表参与立法活动。所有这些骗人的把戏，都随伊格纳季耶夫的辞职而收场（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5 卷《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第 4 节）。1882 年 5 月，德·安·托尔斯泰接任内务大臣并兼宪兵司令，俄国从此开始了扼杀一切自由思想的反动时期。——436。

[7]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 1883 年 8 月

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 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 1885 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301 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 1903 年 8 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438。

[8]指老民意党人小组（彼·拉·拉甫罗夫、尼·谢·鲁萨诺夫等）于 1893—1896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资料》。这部文集原拟出 17 册，实际出了 4 编 5 册。——439。

[9]布朗基主义是 19 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列宁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同时坚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指出：

布朗基主义企图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是完全错误的。——440。

1789 年式的革命还是 1848 年式的革命？

列宁（1905 年 3—4 月）

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一、它是彻底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共和国，

二、还是只限于削减、限制沙皇的权力，实行君主立宪？

换句话说：我们注定要进行 1789 年式的革命还是 1848 年式的革命［注：注意：这里还可以加上“还是 1871 年式的革命”？应当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许多非社会民主党人可能向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我们说式，是为了消除这样一种荒唐的想法，即认为一去不复返的 1789 年和 1848 年的社会政治和国际形势可能再现。）

社会民主党人必然希望并争取实现第一种形式的革命，这未必会有人怀疑。

可是马尔丁诺夫对问题的提法完全是尾巴主义的，他希望革命尽量温和些。若是第二种形式，马尔丁诺夫们所害怕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的“危险性”就完全消除了。在第二种场合下，对社会民主党来说，甚至对革命也不可避免要采取“反对派”的态度，马尔丁诺夫就是想甚至对革命也要采取反对派的态度。

试问，哪一种形式可能性最大？

认为第一种形式可能性最大的人的看法是：（1）俄国下层阶级中积蓄的仇恨、革命性无疑比 1848 年的德国要多得多。在我国，转变更为急剧，我国的专制制度和政治自由之间不曾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中间阶梯（地方自治机关不算），我国的专制制度是纯粹亚洲式的。（2）在我国，不幸的战争更有可能造成急剧的崩溃，因为这个战争使沙皇政府彻底陷于困境。（3）在我国，国际局势更为有利，因为无产阶级的欧洲会使欧洲的君主们无法对俄国的君主制进行帮助。（4）在我国，觉悟的革命政党，它们的刊物和组织的发展要超过 1789 年、1848 年和 1871

年许多倍。（5）在我国，许多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如波兰人、芬兰人等等，特别坚决地攻击专制制度。（6）在我国，农民遭到严重破产，贫困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他们已经完全一无所有。

当然，所有这些看法远不是绝对的。还可以提出另外一些与此完全相反的看法：（1）我国封建制度的残余很少。（2）政府较有经验和拥有较多的辨认革命的危险性的手段。（3）战争产生了一些和革命不相干的任务，阻碍了革命的直接爆发。战争证明俄国革命阶级是软弱的，没有战争它们就不能行动起来（参看卡尔·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的观点）。（4）我国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革命推动力。（5）目的在于分割俄国的民族运动，能够使俄国大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脱离我国的革命。（6）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要比 1789 年、1848 年、1871 年深刻得多，所以资产阶级就更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宁愿投入反动派的怀抱。

当然，只有历史才能对所有这些肯定意见和否定意见作出估量。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尽量向前推动，同时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要工作：把无产阶级独立组织起来。

马尔丁诺夫正是在这方面糊涂起来了。彻底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可是这些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不能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夺取政权，起初是民主革命中的一个步骤，而迫于形势，它会违反参加者的意志（有时是意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必遭失败，那么我们（象马克思在 1871 年预见到巴黎起义必遭失败一样）就应当劝告无产阶级不要起义，要等待，要组织起来，后退是为了跳得更远。

马尔丁诺夫（和新《火星报》）的思想实际上就是这样，假如他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想到底的话。

论临时革命政府[1]

列宁（1905 年 5 月 21 日和 27 日〔6 月 3 日和 9 日〕）

第一篇文章 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考证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就临时革命政府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表明的正是我们在《前进报》上所采取的立场。现在，我们打算详细分析一下反对我们立场的所有不同意见，并全面阐明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真正原则含义和实际意义。我们先谈谈普列汉诺夫想从严格的原则立场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企图。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篇题为《论夺取政权问题》的文章。他批评“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规定的〈显然是指《前进报》所规定的〉策略”。事实上，任何一个读过《前进报》的人都明明知道，《前进报》从来没有提出过夺取政权的问题，也没有规定过任何“夺取政权的策略”。普列汉诺夫竭力用另一个臆造出来的问题来偷换真正讨论过的问题；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回忆一下争论的经过就够了。

马尔丁诺夫在他有名的《两种专政》中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断言：如果我们党以领导者的身分参加起义，那么一旦起义成功，我们党就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这种参加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并且只能导致灭亡和威信扫地的结局。《火星报》为这种立场辩护。《前进报》则反驳说：相反，这种结局是最理想的，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等于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是可以允许的，因为没有这种专政就无法捍卫共和国。可见，争论双方在回答马尔丁诺夫提出的问题时，都采用了两个假设，但在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上发生了分歧。双方都说：（1）无产阶级政党以领导者的身分参加起义；（2）起义获得胜利并彻底推翻专制制度；他们在评价由这两个假设所得出的策略结论时发生了分歧。这难道同“为夺取〈？？〉政权规定的〈!!〉策略”相似吗？普列汉诺夫竭力回避

《火星报》和《前进报》讨论过的马尔丁诺夫提出的问题，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过去我们争论的是：既然起义胜利了就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那么起义的胜利是否会带有危险性，是否会导致灭亡。普列汉诺夫希望争论的是：应当不应当规定夺取政权的策略。我们担心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希望（只有从掩盖马尔丁诺夫提出的问题的角度来看才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因为无论过去和现在，谁也没有争论这个问题。

至于普列汉诺夫在其全部论证中这样来偷换问题究竟起什么作用，这从“超级庸人”那件事来看是特别明显的。《前进报》所用的这句话使普列汉诺夫坐立不安。这句话普列汉诺夫反复提了六七次，他以气势汹汹的威胁口吻硬要自己的读者相信：《前进报》竟敢给马克思和恩格斯起了这么个不太雅的外号，《前进报》“批评”起马克思来了，等等，等等。我们很清楚，假如《前进报》讲过哪怕一句同普列汉诺夫强加给《前进报》的谬论相似的话，那么立意要替马尔丁诺夫恢复名誉和“申斥”《前进报》的普列汉诺夫是会非常高兴的。但是问题正好是，《前进报》连一句这样的话也没有讲过，并且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会轻而易举地识破普列汉诺夫，是他无聊已极，吹毛求疵，把一个有意思的原则问题搞乱了。

不管回敬吹毛求疵是多么枯燥无味，但是必须详细说明耸人听闻的“超级庸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进报》是这样说的：我们大家都在谈论争取共和国。要实际上争取到它，我们就必须“合击”专制制度，——我们就是指革命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但是这还不够。甚至“一起粉碎”专制制度，即完全推翻专制政府也是不够的。还必须“一起击退”将来必然会出现的种种恢复已被推翻的专制制度的孤注一掷的尝试。这种“一起击退”运用于革命时代，无非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政府。因此，用可能出现这种专政的前景来吓唬工人阶级的人们，也就是说，象新《火星报》的马尔丁诺夫和尔·马尔托夫这类人，便同他们自己的口号——为共和国而斗争和把革命进行

到底发生了矛盾。实质上，这些人是这样推论的：好象他们想限制、缩小自己争取自由的斗争，——想预先给自己划定一块最微薄的胜利果实，即不要共和国，而要一部残缺不全的宪法。《前进报》说：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 19（和 20）世纪革命的三种主要力量和三个基本阶段的著名原理用庸人的观点庸俗化了。这一原理就是：革命的第一阶段是限制专制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第二个阶段是争取共和国以满足“人民”，即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变革，只有这种变革才能满足无产阶级。《前进报》写道：“这幅图景一般说来是正确的。”我们的确要登上这三级不同的图式台阶，这些台阶之所以不同，取决于在最好的情况下有哪些阶级能够陪我们一起攀登。但是，假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三级台阶的正确图式理解为在任何一次攀登前，需要为自己预先量出短短的尺度，譬如不超过一级台阶，假若我们在任何一次攀登前，按照这个图式“为自己制定一个在革命时期的活动计划”，那么我们就是超级庸人了。

《前进报》第 14 号［注：见本卷第 23—25 页。——编者注］上说的就是这些。于是普列汉诺夫就动脑筋在最后几个加上了着重标记的字上挑毛病。他郑重地宣称：这样一来，《前进报》就在骂马克思是庸人了，因为马克思就是按照这个图式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革命时期的活动计划！

证据何在呢？证据就是：1850 年，当德国的革命人民在 1848—1849 年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未能粉碎专制制度的时候，当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残缺不全的宪法并转到反动派方面去的时候，——总之，当德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仅仅登上第一级台阶就停步不前，再也无力往上攀登的时候，正是在这时候……马克思说过，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将是攀登第二级台阶的时候。

读者们，你们发笑了吧？的确，普列汉诺夫的三段论法，是有点……怎么才说得客气一些呢？……“辩证”味道。因为登上第一级台阶以后接着便是攀登第二级台阶的这句话，是马克思在具体的民主革命中相应的具体关头说的，所以只

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才会把那些在攀登第一级台阶之前用一下子就跳（在特别成功地组织和举行起义的情况下）两级台阶的可怕前景来吓唬我们的人称为庸人。

一点不错，“批评”马克思是不好的事情……可是不恰当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也不是很好的事情。马尔丁诺夫不恰当地解释马克思的话。普列汉诺夫不恰当地替马尔丁诺夫辩护。

希望任何爱挑毛病的读者不要从我们的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仿佛我们不顾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宣传“规定”必须跳越台阶的“策略”。不，我们任何这样的策略也不会宣传。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那些高谈共和国和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同时又用参加民主专政的可能性来吓唬自己和别人的人们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在《前进报》第 14 号中我们已经指出，在目前的革命高潮之后，反动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现在争得的东西愈多，我们将来在可能的（和希望的）民主专政时期镇压和消灭反革命势力愈无情，那么反动势力夺走我们的自由的可能性就愈少。我们在《前进报》第 14 号中还指出，只有事态确实如此发展，即民主革命发展到彻底推翻专制制度，发展到建立共和国，而不是半途而废，这种专政的问题本身才有意义。

关于“超级庸人”这件事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来谈谈普列汉诺夫所引证的著名的《告同盟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盟员书，1850 年 3 月）的内容。在这个非常有意义和有教益的《告同盟书》（值得把它全部译成俄文）中，马克思考察了 1850 年德国的具体政治形势，指出新的政治爆发的可能性，断定一旦发生革命，政权不可避免地会转入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手中，并分析了无产阶级的策略。马克思对革命前、革命时期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胜利后的策略一一作了考察，坚持必须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全力反对“把这种工人政党组织降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强调指出

武装工人、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无产者严格监督背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重要性等。

在整个《告同盟书》中，既没有谈工人政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也没有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却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显然根本不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可以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共同致力于创建新的社会制度”。这个结论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没有提出工人政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而普列汉诺夫却作出结论说：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原则上持绝对否定态度。马克思谈的仅仅是具体形势，而普列汉诺夫对问题根本不作具体考察就得出一般结论。其实，只要看一看《告同盟书》中被普列汉诺夫删去的一些地方，就可以看出他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告同盟书》是根据 1848 和 1849 这两个革命年头的经验写成的。马克思把这个经验的结果表述如下：“正在这个时候〈即正是 1848—1849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从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削弱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单进行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Cemeinden）开始放松了自己跟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最后甚至渐渐地完全断绝了这种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的巩固的支柱，至多也只是在个别地方为了本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支配和领导的地位。”［注：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 年 3 月，卡·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 年版，附录 9，第 75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88—289 页。——编者注）。引文中的黑体全是我们用的。］在《告同盟书》的下一页上，马克思说：“目前即将爆发新的革命，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象 1848 年那样受资产阶级

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89 页。——编者注］

请你们好好想一想这些明确的论断的意义吧！在进行了两年的公开革命以后，在柏林人民起义胜利以后，在召开了革命议会以后，在国家的部分地区爆发了公开的起义和政权暂时转归革命政府掌握以后，马克思认定革命的人民遭到了失败，在党的组织方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取胜，工人政党失利。难道这不是最清楚不过地指出，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提出工人政党参加政府的问题就是无的放矢吗？在革命时期的两年中，马克思公开出版工人政党的最革命的报纸达 9 个月之久，在这以后不得不确认这个政党完全垮掉了，在一股洪流中根本看不出有一点无产阶级的支流（斯特凡·波尔恩的工人兄弟会[2]是微不足道的），无产阶级不仅落到了完全受资产阶级支配的地位，而且落到了完全受资产阶级领导的地位！显然，当时经济关系还很不发展，几乎没有大工业，没有任何稍具规模的独立工人运动，小资产阶级独占统治地位。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条件下，著作家在分析具体形势的时候，甚至不会去考虑工人政党参加临时政府的可能性。不言而喻，马克思当时必须在其《告同盟书》中向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们强行灌输（请原谅我这么说）现在我们看来是初步常识的真理。马克思当时必须证明，在选举时，工人务必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单独提出候选人。马克思当时必须驳斥民主派侈谈什么把工人单独分出来就是“分裂”（请注意这点！只有昨天还是统一的并且继续在思想上是统一的东西才可以分裂开！）民主政党的论调。马克思当时必须警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不要被这些论调迷惑住。马克思当时必须以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保证，只要一有可能，就召开工人政党代表大会把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而在 1848—1849 年的革命年代中，还不具备条件去考虑单独召开工人政党代表大会的可能性！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很清楚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告同盟书》中根本没有涉及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在原则上是否可以允许的问题。马克思只是考察了1850年德国的具体形势。马克思当时之所以只字不提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革命政府的问题，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甚至不可能产生用工人政党的名义参加革命政府以实现民主专政的思想。

马克思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1850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组织起来，我们在革命的第一时期遭到了失败，我们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我们应当独立地组织起来，一定要、绝对要，无论如何要独立地组织起来，——不然的话，甚至将来在加强了自己组织的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取得胜利时，我们还会当尾巴。

马尔丁诺夫的思想却是这样的：我们，190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组织成为独立的政党，现在我们想对沙皇制度的堡垒发起第一次进攻，想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众。但是，如果我们把进攻组织得很好，并且——上帝保佑别这样——胜利地完成了进攻，那么我们看来就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或者甚至参加民主专政。而这种参加是根本不能允许的。

普列汉诺夫还想煞有介事地使人相信援引马克思就能替马尔丁诺夫辩护吗？大概普列汉诺夫把《火星报》的读者当成小孩子了。而我们只想说：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马尔丁诺夫主义是另一回事。

为了结束关于《告同盟书》的讨论，还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下面的错误意见。他公正地指出，1850年3月，马克思在《告同盟书》写成的时候，相信资本主义已经衰老，而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全临近”。马克思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早在1850年9月15日他就和沙佩尔决裂了（沙佩尔和维利希成为同盟内的少数派，并退出同盟），因为沙佩尔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义或空想主义的驱使，竟然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马克思驳斥沙佩

尔悦，不能抛开实际条件，而仅仅把自己的意志看作革命的动力。“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无产阶级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465 页。——编者注］，无产阶级或许不得不再经历 15 年、20 年、50 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普列汉诺夫扼要地叙述了马克思观点的这种转变并推论说：

“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种“转变”之后〉已经根据民主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占统治地位这个设想，来确定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将会更加坚决地谴责社会主义者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火星报》第 96 号）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推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责备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混淆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主义专政，而这个推论正好混淆了这一点。在 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区分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或者更确切些说，根本就没有谈到民主主义专政，因为那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衰老，而社会主义已经临近。因此他们当时也没有把最低纲领跟最高纲领区分开来。如果要作这种区分（我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正在这样做，我们正在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义进行斗争，因为他们不懂得这种区分），那么就必须专门剖析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主义专政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没有这样做，缺乏贯彻始终的精神。他选择了一种含糊的说法，一般地提“社会主义者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从而恰好用社会主义专政问题悄悄代换了清楚明确地提出来的民主主义专政问题。他把米勒兰伙同加利费一起在社会主义变革前夜时期参加内阁和瓦尔兰伙同一向保卫共和制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参加革命政府混为一谈（用《前进报》的比喻［注：见本卷第 6 页。——编者注］）。

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临近了，因此对民主主义成果重视不够，当时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无疑会取得胜利，他们觉得这些成果是牢

靠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88—299 页。——编者注］。25 年后，即 1875 年，马克思指出德国不民主的制度是“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专制制度”［注：同上，第 19 卷第 32 页。——编者注］。35 年后，即 1885 年，恩格斯预言在即将来临的下一次欧洲震动中，德国政权会转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注：同上，第 21 卷第 257 页。——编者注］。由此得出的结论恰好与普列汉诺夫所要证明的相反：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地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统治地位，那么为了巩固共和国，为了彻底消灭专制制度的一切痕迹和彻底清扫为社会主义而战斗的场所，他们会赋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以更大的意义。他们会更加严厉地斥责那些在民主主义变革前夜用革命民主专政的可能性来恐吓无产阶级的尾巴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自己感觉到他这种歪曲《告同盟书》的立场有弱点。因此他预先谨慎地声明，他无意于以自己的考证来把问题彻底讲清楚，——虽然他除了作些与本题无关的考证，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别的东西，甚至也不想剖析《前进报》提出的具体问题，就作出“详尽无遗的”武断结论。普列汉诺夫硬说《前进报》既想“批评”马克思，又想持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观点。他的这种用心只能使我们付之一笑：既然普列汉诺夫不能从《前进报》的真正论断中给自己找到靶子，而必须从既与《前进报》毫不相干又与所考察的问题毫不相干的题目中捏造靶子，那么他的立场必定不对头。最后，普列汉诺夫又提出了一个他以为是“驳不倒的”证据，实际上，这个证据（1894 年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糟透了。

从普列汉诺夫对这封信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很遗憾，普列汉诺夫没有引用全信，也没有说明，这封信是否发表过和在哪里发表过）恩格斯那时必须给屠拉梯论证社会主义革命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普列汉诺夫同志，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屠拉梯是意大利的米勒兰，是伯恩施坦主义者，卓利蒂曾邀请他入阁。屠拉梯显然把阶级内容极不相同的两种变革混为一谈了。屠拉梯曾想象，他将实现

无产阶级统治的利益，而恩格斯则向他解释说，在 1894 年意大利那种形势下（即在意大利登上“第一级台阶”以后，在争取到使无产阶级能公开地、广泛地和独立地组织起来的政治自由以后又过了几十年！），他，即屠拉梯，在获得了胜利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内阁中实际上将要捍卫和实现的是异己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米勒兰主义的实例之一；《前进报》坚决反对把米勒兰主义同民主专政混为一谈，而普列汉诺夫对《前进报》的论据甚至只字不提。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陷入苦境的典型例子，恩格斯早就告诫极端派的领袖们不要陷入这种苦境，指的就是他们不了解变革的真正性质而不自觉地去实现“异己”阶级的利益。天哪，普列汉诺夫同志，难道这同马尔丁诺夫所挑起的和《前进报》所分析过的问题有一点关系吗？难道那些登上了第一级台阶的人把第二级台阶和第三级台阶混为一谈的这种危险，能够成为在攀登第一级台阶之前用一下子可能登两级台阶的前景来吓唬我们的理由吗？？

不，普列汉诺夫的这个“不大的历史考证”什么也证明不了。1850 年德国和 1894 年意大利的形势，与 1905 年 1 月和 5 月俄国的形势根本不同，援引这些情况丝毫也证实不了他的原则结论：“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起参加革命政府就是背叛无产阶级”。这些引证对于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如果普列汉诺夫想把自己的结论运用到这个问题上来，如果他认为无产阶级在为争取共和国而斗争的时候，即在进行民主主义变革的时候，参加革命政府的任何行动都是根本不能允许的，那么我们就要向他证明，这是恩格斯毫不含糊地斥责过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来证明。

第二篇文章 仅仅从下面还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考证后指出，普列汉诺夫根据马克思的话作出一般的原则性结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马克思的那些话完全是专

门针对 1850 年德国的具体形势讲的。这个具体形势充分说明，为什么马克思那时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是否可以允许参加这种政府这个一般的原则性问题。

首先必须准确地提出争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幸好可以利用我们的论敌们所提供的一种说法，这样可以消除由争论实质所引起的争吵。《火星报》第 93 号上说："进行这种组织工作〈即把无产阶级组成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反对党〉的最好途径，就是从下面〈黑体是《火星报》用的〉，通过无产阶级对执政的民主派施加压力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这条途径。"关于《前进报》，《火星报》接着说道："《前进报》想要无产阶级不仅'从下面'，不仅从大街上，而且还要从上面，从临时政府的宫殿里对革命施加压力。"

可见，问题提得很清楚。《火星报》要从下面施加压力，《前进报》则"不仅要从下面，而且还要从上面"施加压力。从下面施加压力是公民对革命政府施加压力。从上面施加压力是革命政府对公民施加压力。一些人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从下面施加压力。另一些人则不同意搞这种局限，要求从上面施加压力来补充从下面施加的压力。因此争论便正好归结到我们在本篇的小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仅仅从下面还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一些人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从上面，即"从临时政府的宫殿里"施加压力，对无产阶级说来是根本不能允许的。另一些人则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概拒绝从上面施加压力，即拒绝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对无产阶级说来是根本不能允许的。可见，这里所谈的并不是关于在一定局势下从上面施加压力是否可能，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从上面施加压力是否可行的问题。不是的，现在我们根本不是分析任何具体形势，鉴于有人一再企图用别的问题来偷换所争论的问题，我们急切请求读者注意这一点。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关于在民主革命时期，从下面施加压力转向从上面施加压力是否允许这个一般的原则性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策略观点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是否也有过由是否允许从上面施加压力这个一般问题所引起的争论呢？有过这样的争论。1873 年夏西班牙的起义就是这个争论的导因。恩格斯在他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里评价了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从这次起义中应当得出的教训。这篇文章载于 1873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3]，并在 1894 年《〈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中加以转载。我们来看一下恩格斯作的是什么样的一般结论。

1873 年 2 月 9 日西班牙国王阿马德奥退位，恩格斯开玩笑地说：这是“第一个举行罢工的国王”。2 月 12 日共和国宣告成立。巴斯克各省接着爆发了卡洛斯派起义。4 月 10 日选出了立宪议会，立宪议会于 6 月 8 日宣布联邦共和国成立。6 月 11 日皮－马尔加尔的新内阁组成了。当时极端共和派，即所谓“不妥协派”没有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于是在 7 月 3 日，当这个新宪法公布时，不妥协派举行了起义。从 7 月 5 日到 11 日，他们在塞维利亚、格拉纳达、阿尔科伊、巴伦西亚以及其他许多省份中获得了胜利。萨尔梅龙接替了下野的皮－马尔加尔，他的政府调动军队对付起义各省。起义或多或少经过一些抵抗后被镇压下去了：加的斯于 1873 年 7 月 26 日陷落，卡塔赫纳于 1874 年 1 月 11 日陷落。这就是恩格斯冠于论述前面的简要编年大事记。

恩格斯在评价事件的教训时，首先强调指出，西班牙争取共和国的斗争绝对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争取社会主义变革的斗争。恩格斯说：“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种预备发展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走过这些预备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预政治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

工人群众感觉到了这点；他们到处力求参与各种事件，力求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活动，而不象先前那样，让有产阶级有进行活动和施展阴谋的自由场所。”

因此，那时的问题是争取共和国，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工人干预事件的问题那时有两种说法：一方面，巴枯宁主义者（或“同盟分子”即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作斗争的“同盟”[4]的创始者们）否定政治活动，否定参加选举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反对参加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革命，反对任何参加革命政府的行动。从我们所争论的问题的角度来看，正是问题的后一方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同时，正是这一方面为表述两个策略口号之间的原则差别提供了根据。

恩格斯说：“巴枯宁主义者许多年来一直宣传说，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动都是有害的，一切都应当自下而上地组织和进行。”

因此，“仅从下面”的原则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

恩格斯正好指出这个原则在民主革命时代是极端荒谬的。根据这个原则自然和必定会得出这样一个实际结论：成立革命政府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而巴枯宁主义者所作出的正是这样的结论，所宣布的正是这样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

读者可以看见，这恰好也是新《火星报》所谈的那两个“原则”，即：（1）只有同“既从下面又从上面”的策略相对立的从下面采取的革命行动，才是可以允许的；（2）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新《火星报》的这两个原则都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西班牙争取共和国的斗争的实际进程正好表明，这两个原则是极端荒谬和极端反动的。

恩格斯用西班牙革命的若干事件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从阿尔科伊城爆发革命来看。阿尔科伊是一个有 3 万居民的较为新兴的工厂城市。工人起义尽管是由从原则上就怕同组织革命的思想沾边的巴枯宁主义者领导的，却仍然获得了胜利。

巴枯宁主义者事后吹嘘说，他们成了“局势的支配者”。而恩格斯问道：这些“支配者”利用自己的“局势”究竟做了些什么。首先，他们在阿尔科伊成立了一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即革命政府。然而这些同盟分子（巴枯宁主义者）于 1872 年 9 月 15 日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即在革命前十个月作出了如下的决定：“建立任何一种所谓临时的或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骗，都象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的。”恩格斯没有驳斥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谎言，只是讽刺性地指出：正是这个决议的拥护者不得不成为阿尔科伊的“这个临时的和革命的政权的参加者”。这些先生们掌权后暴露出“极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和没有毅力”，所以他们受到恩格斯的极度鄙视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也会以同样的鄙视来回答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所惯用的指责人家是“雅各宾主义”的伎俩。恩格斯指出，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例如，在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加的斯附近的一个拥有 26000 居民的港埠）“同盟分子也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而成立革命政府”。他斥责他们“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权”。恩格斯十分清楚，巴枯宁主义的工人领袖和不妥协派一起，就是说和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起参加了临时政府，但他并没有斥责巴枯宁主义者参加政府的行动（如果根据新《火星报》的“原则”就应当这样做），而是斥责他们缺乏组织性，缺乏参加的毅力，斥责他们服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先生们的领导。恩格斯曾斥责巴枯宁主义的工人领袖在参加革命政府以后，把“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让给了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先生们，而自己则以华丽的词句和“社会”改革的纸上空洞计划来哄骗工人，由此也可以看出，恩格斯会以多么辛辣的讽刺来痛斥那些在革命时代贬低“技术”领导和军事领导的意义的人。

恩格斯作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真正的雅各宾主义者，不仅能够重视从上面采取行动的重要性，不仅认为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一起参加革命政府是完全可以允

许的，而且还要求参加这种革命政府，要求革命政权要有坚毅的军事主动性。同时，恩格斯认为自己有责任提出军事上的实际指导性的建议。

他说："这次起义虽然是糊里糊涂开始的，但如果能领导得稍微恰当［注：Ware er nur mit einigem Verstand geleitet worden．不幸的恩格斯！可惜他同新《火星报》不熟！否则他会听到"雅各宾主义的"关于领导（geleitet werden）起义的思想的危险性、危害性、空想性、资产阶级性、技术上的片面性和阴谋的狭隘性！］，哪怕就象西班牙军事暴动的做法那样，胜利还是有很大把握的。在西班牙发生军事暴动时，一个城市的驻军发动起来，开到邻近一个城市去，把该城事先联络好的驻军争取过来，于是起义队伍就象滚雪球一样，愈来愈大，冲向首都，直到会战奏捷或被派来对付他们的军队实行倒戈而决定了胜利的结局时为止。这种方法尤其适合于这次起义。起义者到处早已组织成义勇大队；他们的纪律固然松弛，但是无论如何总不比那大部分已经瓦解了的西班牙旧军队的残部更坏。政府唯一可靠的军队是宪兵，但他们却分散在全国各地。任务首先在于阻止宪兵的集中，而这只有采取攻势和大胆地开到野外去作战。这种做法是不会有很大危险的，因为政府能用以对付义勇大队的军队也和这些义勇大队本身一样，是纪律松弛的。要想取得胜利，就只有这样，别的方法是没有的。"

请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谈到起义和直接斗争在革命爆发时期的任务时是怎样说的！尽管起义是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掀起的，尽管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既不存在社会主义变革的问题，也不存在起码必需的政治自由的问题，——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对于工人积极参加争取共和国的斗争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要求无产阶级领袖们做到：使自己的全部活动服从于必须使已开始的斗争取得胜利；同时，恩格斯本人作为无产阶级的领袖之一，甚至考虑到了军事组织的一切细节，恩格斯对武装暴动这种陈旧的斗争方法也并不轻视，只要这是胜利所需要的，恩格斯把采取攻势和集中革命力量放在首要地位。他极严厉地指责巴枯宁

主义者把“德国农民战争时代和 1849 年德国五月起义时期所难免的不幸事情——革命力量的分散和孤立，使同一批政府军队能够把各地起义一一镇压下去”——当作原则。恩格斯关于领导起义、组织革命、利用革命政权的观点同新《火星报》的尾巴主义观点真有天壤之别。

恩格斯在总结西班牙革命的教训时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这就是说，第一，他们不得不抛弃放弃政治活动、放弃参加选举的原则，抛弃“消灭国家”的原则。第二，“他们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则抛弃了，他们自己参加了显然是纯资产阶级的运动”。第三，——这个结论正好回答了我们所争论的问题——“他们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他们破坏了这个原则，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他们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们所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巴枯宁主义者没有领导起义的本事，他们不是集中革命力量，而是分散革命力量，把革命的领导工作让给了资产者先生们，解散了国际的坚强巩固的组织，因而“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

※　※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把革命行动完全局限于从下面施加压力，拒绝同时又从上面施加压力，这是无政府主义。

（2）谁不懂得革命时代的新任务，即从上面采取行动的任务，谁不善于确定这种行动的条件和纲领，谁就不懂得无产阶级在任何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任务。

（3）不允许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任何这种参加都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这个原则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

（4）任何“严重的革命形势”都向无产阶级的政党提出如下的任务：有意识地领导起义，组织革命，集中一切革命力量，大胆发动军事进攻，积极利用革命政权［注：手稿上“政权”一词之后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不懂得这些任务或一贯贬低这些任务，必定会被无产阶级无情地抛弃。”——俄文版编者注］。

（5）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会赞同并且任何时候也不会赞同新《火星报》在目前革命关头的策略的，因为这个策略正好重复着上述一切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把新《火星报》的这种原则立场称之为注视着无产阶级的“后背”和重复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注：手稿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庸俗观念”。——编者注］。

※ ※ ※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再来分析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

注释：

[1]《论临时革命政府》这一组文章是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为基础写成的。本卷《附录》收有关于这一著作的笔记（见第 375 页）。

列宁在这组文章的第二篇文章的末尾曾答应写第三篇文章来分析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但这篇文章未见问世。列宁在《临时革命政府图景》、《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见本卷第 338 页和第 316 页）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1 卷）等著作中，都阐述了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

《论临时革命政府》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雅罗斯拉夫尔委员会出版过单行本。——221。

[2]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排字工人斯•波尔恩于 1848 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他把工人兄弟会的活动限制在组织经济罢工和争取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质的措施（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的范围内。工人兄弟会的纲领是片断的被曲解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路易•勃朗及皮•约•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的混合物。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工人兄弟会站在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之外，但它的一些地方分会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 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在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1850 年，工人兄弟会被政府查禁，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227。

[3]《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 年 10 月 2 日—1876 年 9 月 29 日在莱比锡出版，最初每周出两次，1873 年起改为每周出 3 次。该报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是 19 世纪 70 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编辑部工作，奥•倍倍尔负责出版工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于 1870 年 12 月被捕后，该报由卡•希尔施和威•布洛斯相继主持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并经常帮助编辑部纠正工作中的错误。——234。

[4]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亚•巴枯宁于 1868 年 10 月在日内瓦创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其中包括了他早先创建的阴谋家的秘密联盟。同盟在意大

利、西班牙、瑞士等国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和法国南部设有支部。同盟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废除国家为自己的纲领，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在同盟申请加入第一国际遭到拒绝以后，巴枯宁主义者对国际总委员会的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表面上宣布解散这个组织，而实际上却继续保留它，并于 1869 年 3 月以国际日内瓦支部的名义把它弄进了国际。巴枯宁主义者利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在国际内部进行了大量的分裂和破坏活动，力图夺取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权，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揭露和批判。在 1872 年 9 月举行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同盟的头目巴枯宁和詹·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235。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

列宁（1905 年 6—7 月）

序言

在革命时期，人们很难跟上事变的发展，而这些事变为评价各革命政党的策略口号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新材料。这本小册子是在敖德萨事变［注：指“波将金公爵号”装甲舰的起义[2]。（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发生前写成的。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3]（第 9 号，《革命教导着人们》）［注：见本卷第 126—135 页。——编者注］上指出，这次事变甚至迫使那些编造出起义－过程论并且不同意宣传临时革命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事实上转到或开始转向自己的论敌方面。革命无疑是非常迅速、非常深刻地教导着人们，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特别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领导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

毫无疑义，革命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教给俄国的工人群众。革命会在事实上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它将揭示出各个社会阶级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我国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农民的真正趋向；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但潜藏在它内部的，并不是“社会化”的思想，而是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间的新的阶级斗争。旧民粹派的旧幻想，例如“社会革命党”[4]纲领草案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在我国“社会”的民主主义性质问题上、在农民起义完全胜利的意义问题上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的一切幻想，都将被革命的风暴无情地彻底吹散。革命将第一次使各个阶级受到真正的政治洗礼。通过革命，这些阶级将显示出它们的明确的政治面貌，它们不仅会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它们自己。

革命将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一个战斗着的政党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西？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把革命引导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不彻底性和叛卖性？

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需要我们对政治局面有正确的估计，需要我们有正确的策略口号；另一方面，需要工人群众用实际的战斗力量来支持这些口号。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会显得更加必要。在这种时期，工人阶级本能地要奋起进行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我们就必须善于正确提出这种发动的任务，然后尽量广泛地使人们熟悉这些任务，了解这些任务。不要忘记，在我们和群众的联系问题上流行的悲观主义，现在特别经常地掩盖着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念。毫无疑问，我们在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方面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但是现在全部问题却在于这种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工会和合法社团方面呢，还是放在武装起义，放在建立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政府方面？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可以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当然，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在，在当前的革命中，全部问题都归结为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重心将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前一方面呢，还是放在后一方面？

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中的自觉分子非常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因此，《解放》杂志[5]就赞扬阿基莫夫主义，即社会民主党内**现在**把工会和合法社团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主义”。因此，司徒卢

威先生就欢迎（《解放》杂志第 72 期）新火星派中阿基莫夫主义的原则趋向。因此，他就拼命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6]的决议中所表现的那种可憎的革命狭隘性。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贬低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危险不过了。例如，《火星报》第 104 号已在事实上转到它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论敌方面，但它同时又轻视走在实际生活前面的、为运动指出前进的（虽然也会遭到一些挫折，犯一些错误等等）道路的那些口号和策略决议的意义。恰恰相反，制定正确的策略决议，这对一个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来领导无产阶级而不仅是跟在事变后面做尾巴的政党来说，是有巨大意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代表会议的［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 年 5 月在伦敦举行）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会议”（同时在日内瓦举行）只有孟什维克参加[7]。在这本小册子里常常把孟什维克称为“新火星派”，因为他们虽然继续出版《火星报》，但他们以自己当时的同道者托洛茨基为代言人宣布过，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8]之间隔着一条鸿沟。（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决议，就最确切、最周到、最完全地表达了那些并非由个别著作家偶然说出、而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负责代表正式通过的策略观点。我们的党比其他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我们的党就是在严格对待自己的策略决议方面，也应当给其他政党做出榜样，以表明我们完全不同于《解放》杂志所表现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完全不同于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空谈，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革命时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要开始研究他们眼前发生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仔细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和代表会议的策略决议，判明其中

偏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地方，弄清楚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这本小册子就是专为这一工作而写的。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来检查我们的策略，这对那些不愿局限于口头的劝说，而想切实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将来的完全统一奠定基础的人来说，也是必要的。

注释：

[1]《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列宁从理论上论证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并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的重要著作。列宁曾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系统地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6 卷）。

这部著作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与这个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于 1905 年 6—7 月在日内瓦写的。书中的《补充说明》部分（见本卷第 98—124 页）写于 6 月 21 日（7 月 4 日）以后，而《序言》的写作时间则不早于 7 月 13 日（26 日）。在撰写过程中，列宁曾为它拟过这样的标题：《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的决议的看法和评论）》（见《列宁文稿》第 12 卷第 147 页）。在刊载于 1905 年 6 月 20 日（7 月 3 日）《无产者报》第 6 号的《倒退的第三步》一文中，列宁曾预告这本书不久便可与读者见面（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308 页）；几个星期以后，7 月 27 日（8 月 9 日）《无产者报》第 11 号发表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于 1905 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后，当年曾在俄国国内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分别翻印。这一著作曾在彼得堡、莫斯科、彼尔姆、喀山、梯弗利斯、巴库等城市秘密流传，许多地下的党小组和工人小组都学习过。1907 年

2 月，沙皇政府的彼得堡出版委员会下令查禁这本书。彼得堡高等法院于同年 3 月核准了这一禁令，并于 12 月进一步作出销毁列宁这部著作的决定。

列宁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编入了 1907 年 11 月中旬在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并加了一些新的脚注。《十二年来》文集出版后不久就被沙皇当局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了出来。

这本书的手稿没有完全保存下来。在《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11 卷中，这一著作是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版本刊印的，并依据保存下来的部分手稿和《十二年来》文集作了核对。

本卷《附录》中收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补充说明的提纲（见第 393—394 页）。——1。

[2] 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是在 1905 年 6 月 14 日（27 日）爆发的。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 1905 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在起义中，水兵们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但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 月 14 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 6 月 15 日（23 日）向市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 月 17 日（30 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 月 18 日（7 月 1 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 月 20 日（7 月 3 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

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 月 22 日（7 月 5 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 6 月 25 日（7 月 8 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1。

[3] 《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是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 年 5 月 14 日（27 日）—11 月 12 日（25 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26 号。根据 1905 年 4 月 27 日（5 月 10 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党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 90 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 1 万份。1905 年 11 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1。

[4]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是 1901 年底—1902 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

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 1906 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 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 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

[5] 《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 年 6 月 18 日（7 月 1 日）—1905 年 10 月 5 日（18 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 79 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 年到 1904 年 1 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 1905 年 10 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3。

[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 1905 年 4 月 12—27 日（4 月 25 日—5 月 10 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38 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 24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 14 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 21 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 1 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它用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战斗纲领武装了党和工人阶级。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207—213 页）中论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及其意义。——3。

[7] 指 1905 年 4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出席会议的只有 9 个委员会的代表），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除了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外，列宁还在《倒退的第三步》（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299—308 页）、《〈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本卷第 151—157 页）等著作中揭露了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的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4。

[8]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 1900 年 12 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 年 7 月起）和日内瓦（1903 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 年 4 月起由娜·康·克鲁

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 年 1 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 46—51 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 1903 年 10 月 19 日（11 月 1 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 52 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 年 11 月 13 日（26 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编辑。因此，从第 52 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将第 52 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

1905 年 5 月第 100 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于 1905 年 10 月停刊，最后一号是第 112 号。——4。

1．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在当前革命时期的日程上，摆着一个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意见是不一致的。现在有三种政治趋向。沙皇政府承认有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的必要，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让这个代表会议成为全民的和立宪的会议。按报纸所载关于布里根委员会[9]工作的消息来看，沙皇政府似乎同意在没有鼓动自由的条件下，按照有严格的资格限制或严格的等级限制的选举制选出一个咨议性会议。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则要求权力完全转归立宪会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仅要力争普选权，不仅要力争充分的鼓动自由，而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最后，通过所谓"立宪民主党"[10]领袖们之口来表达自己愿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并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的口号，不坚持切实保障选举的完全自由和公正，不坚持切实保障代表会议能成为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其实，作为"解放派"[11]唯一重要的社会支柱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正力求在沙皇和革命人民之间达成尽可能和平的交易，并且通过这种交易使它自己即资产阶级获得的权力最多，而使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获得的权力最少。

这就是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就是和现代俄国三种主要社会力量相适应的三种主要政治趋向。至于"解放派"怎样用假民主的词句来掩饰他们那种不彻底的政策，直截了当地说，那种背叛革命、出卖革命的政策，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在《无产者报》（第 3、4、5 号）［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245—253、258—264、277—283 页。——编者注］上谈过了。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怎样估计目前的任务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代表会议"最近分别通过的两个决议，便是这方面的最好的材料。这两个决议，究竟哪一个能正确地估计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正确地规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这个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履行他

所担负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义务，就应当十分细心地研究这个问题，而完全抛开那些和问题实质无关的考虑。

党的策略是指党的政治行为，或者说，是指党的政治活动的性质、方向和方法。党代表大会通过策略决议，就是要确切规定整个党在新的任务方面或者是针对新的政治形势所应采取的政治行为。这种新的形势是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也就是绝大多数人民同沙皇政府的彻底、坚决和公开的决裂造成的。新问题就在于采用什么实际方法来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在理论上，关于这个会议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早已在自己的党纲中先于其他一切政党正式解决了）。既然人民已经和政府决裂，而群众又认识到必须建立新制度，那么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党，就必须考虑用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将被推翻的旧政府。于是就产生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新问题。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圆满的答复，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党就应当阐明：第一，临时革命政府在当前发生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全部斗争中的**意义**；第二，自己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第三，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的明确的条件；第四，**从下面**，即在这个政府没有社会民主党参加的情况下对这个政府施加压力的条件。只有把这一切问题阐明后，党在这方面的政治行为才会是有原则的、明确的和坚定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以下就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

鉴于：

（1）无论是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都要求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要求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的管理形式，

（2）在俄国只有经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制，而成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保证充分的竞选鼓动自由，并且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来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宪会议，

（3）这个民主革命在俄国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不会削弱而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尽量夺取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

（一）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具体了解革命的最可能的进程，具体了解革命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将要求这个政府实现我们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所提出的当前的一切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

（二）根据力量对比和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我们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

（三）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因为社会民主党力求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说，它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

（四）不管社会民主党是否有可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须向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宣传这样一种思想，即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必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注释：

[9] 布里根委员会是根据沙皇 1905 年 2 月 18 日（3 月 3 日）诏令设立的特别会议，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参加会议的有大地主和反动贵族的代表。

会议的任务是拟订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而在沙皇的这个诏令和同诏令一起公布的沙皇诏书中都提出了完全保存现行法令和竭尽全力巩固沙皇专制制度的任务。布里根委员会拟订的法令经大臣会议审议后，由沙皇亲自主持的在彼得戈夫举行的会议最后批准。1905 年 8 月 6 日（19 日）公布了沙皇的诏书、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杜马选举条例。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本卷第 175 页）。

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大力宣传下列口号：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孟什维克则主张在杜马选举中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布里根杜马的选举没有进行。1905 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 10 月 17 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67—71 页；本卷第 160—167、172—180、188—199 页）等文。——5。

[10] 指筹建中的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 1905 年 10 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

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 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 1917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1 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 年 5 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5。

[11] 解放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解放社的成员。解放社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 1904 年 1 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 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解放社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 年 10 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5。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个决议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决议是完全和专门论述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里说的只是临时革命政府，而不是别的什么；因此，这里根本没有涉及“夺取政权”之类的问题。代表大会把后面这个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撇开不谈，是不是做得对呢？无疑是对的，因为俄国的政治局势根本没有把这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恰恰相反，全体人民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党代表大会应当提出来解决的，并不是某个著作家适时或不适时地涉及的问题，而是那些由于时局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而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

在现在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一般斗争中，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意义呢？代表大会的决议解释了这个问题，它一开头就指出，无论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都必须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而为了得到充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须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正如我们的党纲早已认定的那样。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民主共和制的口号，这在逻辑上和原则上都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的民主战士，他们力求争得的正是充分的自由；而且，强调这一点在现在尤其适当，因为在我国，正好是在现在，君主派即所谓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正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进行活动。为了建立共和制，就绝对要有人民代表的会议，并且必须是全民的（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的）和立宪的会议。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就肯定了的。可是，这个决议并不以此为限。为了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单是把代表会议叫作立宪会议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个会议拥有

"立"的权力和力量。考虑到这一点，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就不以"立宪会议"这个形式上的口号为限，而是补充了唯一能保证这个会议真正执行它的任务的物质条件。指出这种能使口头上的立宪会议变成事实上的立宪会议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以立宪君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故意歪曲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要把这个口号变成一句空话。

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说道：**只有**临时革命政府，而且是成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保证竞选鼓动有充分的自由，才能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会议。这个论点是不是正确呢？谁想驳倒这个论点，他就得断定，沙皇政府能够做到不去帮助反动势力，它能够在选举时保持中立，它能够为真正表达民意操心。这样的断言是非常荒谬的，谁也不会公开地替它辩护，但正是我们的解放派在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暗地里偷运这类东西。立宪会议必须有人来召集；选举的自由和公正必须有人来保证；这个会议必须有人赋予它全部力量和权力：只有成为起义机关的革命政府才会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也只有它才有力量采取一切办法来实现这一点。沙皇政府必然会反对这样做。和沙皇做交易而且完全不依靠人民起义的自由派政府，决不会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而且即使它极其真诚地愿意这样做，也不能实现这一点。可见，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提出来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和十分彻底的民主的口号。

但是，在估计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时，如果忽略了民主革命的阶级性质，那么这种估计就是不完全的和不正确的。所以决议补充说，革命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在目前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对多少享有一些政治自由的无产阶级的统治一加强起来，就必然会引起这两个阶级为争夺政权而进行拼死的斗争，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拼命"夺取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所以，无产阶级走在最前面领导所有的人为民主制而斗争时，一

分钟也不要忘记潜藏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新的斗争。

可见，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部分决议中是估计得很全面的：无论是就它和争取自由、争取共和制的斗争的关系来说，还是就它和立宪会议的关系来说，或者就它和为新的阶级斗争扫清基地的民主革命的关系来说，都完全估计到了。

下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一般应当怎样？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直截了当地建议党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确信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工人阶级应当认识到这种必要。“民主派”资产阶级不提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而我们却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并坚决主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此外，我们还应当给这个政府定出一个适合于当前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和无产阶级民主派的任务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我们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即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纲领。这些改革，一方面，在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又是为继续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这样，决议就完全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和目的。按其来源和基本性质来说，这个政府应当是人民起义的机关。按其正式的使命来说，它应当是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工具。按其活动内容来说，它应当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最低纲领，因为这是唯一能保障奋起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的利益的纲领。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临时政府是临时性的，不能实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批准的建设性的纲领。这样的反驳只不过是反动派和“专制者”的诡辩而已。不实行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就是容忍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的农奴制关系继续存在。能够容忍这种农奴制关系的，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人们的政府，而决不是成为人民起义机关的政府。如果有人以立宪会议可能还不承认集会自由为借口，而主张在立宪

会议承认这种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实上实现这种自由，那简直是开玩笑！反对临时革命政府立即实现最低纲领，正好就是开的这种玩笑。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决议为临时革命政府提出的任务是实现最低纲领，这就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当前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不大了解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同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持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反对意见的人说我们拖延社会主义革命，对此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谁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如果某些工人在某个时候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实现最高纲领，我们会回答他们说，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还格格不入，阶级矛盾还没有充分发展，无产者还没有组织起来。你们到全国各地去组织起几十万工人吧，你们去争取几百万群众同情我们的纲领吧！你们试着去做做看，而不要光说些听起来很响亮的无政府主义空话，你们马上就会看到，要实现这样的组织任务，要广泛进行这样的社会主义教育，就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各种民主改革。

我们再往下看。既然我们已经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和无产阶级对它的态度，于是就产生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这个政府（即从上面行动）？我们又应当怎样从下面行动？决议对这两个问题都作

了明确的答复。在决议中毫不含糊地声明说，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在民主革命时代，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时代），原则上是**容许的**。我们作出这样的声明，就坚定不移地既和那些对这一问题在原则上持否定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又和社会民主党内那些用我们势必要参加这个政府这样的前景来**恐吓**我们的尾巴主义者（如马尔丁诺夫和新火星派）划清了界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这样的声明，就坚决地驳斥了新《火星报》的意见：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变相的米勒兰主义[12]，是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尊崇，原则上是不容许的，等等。

但是，说原则上容许，当然还没有解决实际上是否适当的问题。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党代表大会所承认的这种新的斗争方式，即“从上面”斗争的方式，是适当的呢？当然，各种具体条件，如力量对比等等，现在还无从谈起，所以决议自然就不去预先规定这些条件。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在现在就对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作出任何预言。但是我们参加的性质和目的，却是可以而且应当确定的。决议也就是这样做的，它指出了我们参加的两个目的：（1）同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2）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自由派资产者正开始起劲地谈论反动派的心理（见司徒卢威先生发表于《解放》第 71 期的那封极有教益的《公开信》），力图吓倒革命的人民，并促使他们对专制制度让步，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政党提醒人们注意同反革命进行真正的战争的任务，是特别适当的。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靠实力来解决，而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组织这种力量，积极使用这种力量，不仅用它来防御，而且还用它来进攻。从巴黎公社时期以来几乎毫不间断地主宰着欧洲的漫长的政治反动时代，使我们过分习惯于只考虑“从下面”行动，使我们过分习惯于只注意防御性的斗争。我们现在无疑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动荡和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了。在俄国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决不可把自己束缚在陈规旧套当中。必须宣传从上面行

动的思想，必须准备采取最坚决的进攻性的行动，必须研究这种行动的条件和形式。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形式方面的（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另一个是关于这种参加的性质本身的（一分钟也不忽略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这样，决议既从各方面阐明了党采取“从上面”行动这个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新斗争方式时的政策，又估计到了我们将来无法从上面行动的那种场合。从下面影响临时革命政府，这是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必须做的。要实行这种从下面施加压力的办法，无产阶级就必须武装起来——因为在革命时期，事件会特别迅速地发展为直接的内战——并且必须由社会民主党来领导。无产阶级以武力为后盾来施加压力的目的，是要“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即从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看应当以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为内容的那些成果。

我们就此结束我们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的简要分析。读者可以看出，这个决议把新问题的意义、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党从临时革命政府里面和从该政府外面行动的政策都一一阐明了。

现在来看看“代表会议”的相应的决议吧。

注释：

[12] 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一种机会主义策略，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 1899 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13。

3．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代表会议”的决议是专门论述“**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问题的[注：读者把本书第 400、403—404、407、431、433—434 页上所引各段集中在一起，

便可得到这个决议的全文。（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见本卷第 16、21、26、61、65 页。——编者注）]。我们已经指出，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包含着一种糊涂观念。一方面，问题提得很狭窄：只谈我们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而不一般地谈党在对待临时革命政府方面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参加**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其实，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如果按这几个字的直接的和通常的含义来说，正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决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把这几个字理解为不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而是为民主革命夺取政权，那么，不仅谈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且还**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这有什么意思呢？显然，我们的“代表会议派”自己还不大清楚他们究竟应当说什么：是要说民主革命，还是要说社会主义革命。谁留心过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这种糊涂观念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在他那本有名的《两种专政》中开始提出来的，新火星派不乐意提起这一典型的尾巴主义著作中所提供的（早在 1 月 9 日事件[13]以前）这种问题的提法，但是这一著作对代表会议的思想影响是无可怀疑的。

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个决议的标题。这个决议的内容，暴露了更深刻得多、更严重得多的错误。下面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也可能表现为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的革命压力下决定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革命倡议。”

总之，他们是说，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既可能是胜利的起义，又可能是……代表机关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该怎么来理解呢？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而且这样的“胜利”又和“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相提并论！！代表会议竟没有觉察到，**胜利的**人

民起义和临时政府的**成立**是表示革命**在事实上**胜利，而“决定”召开立宪会议是表示革命仅仅**在口头上**胜利。

孟什维克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恰好犯了自由派即解放派经常犯的错误。解放派空谈“立宪”会议，羞答答地闭着眼睛不看力量和政权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实，忘记了要“立”就需要有**力量**来立的道理。代表会议也忘记了，从任何代表的“决定”到这个决定的实现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代表会议也忘记了，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任何代表的任何决定，都会和德国 1848 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兰克福议会[14]的“决定”一样，成为无聊而可怜的空话。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曾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15]上，非常尖刻地讥笑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民主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的武装力量。当法兰克福的解放派还在那里空谈时，国王却抓住了时机，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反革命便依靠实际的力量，把民主派连同他们的一切美妙的“决定”打得落花流水了。

代表会议把正好缺少胜利的决定性条件的局面拿来和彻底胜利等量齐观。承认我们党的共和纲领的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要了解这一奇怪现象，就必须看看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注：现在把这个决议的全文引述如下，“代表大会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从和‘经济主义’作斗争时起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一些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不同的方面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色彩，其特征就是一般趋向于降低觉悟成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意义而使其服从于自发成分。在组织问题方面，这些色彩的体现者在理论上提出一个和党的按计划规定的工作不相适应的组织－过程原则，在实践上多半是推行一套和党的纪律相违背的办法，要不然就向党内觉悟最低的一部分人鼓吹不顾俄国现实生活的客观条件而广泛应用选举的原则，企图以此破坏目前唯一可能存

在的党的联系的基础。在策略问题方面，他们力图缩小党的工作的规模，反对党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所采取的完全独立的策略，否认我们党可能和宜于担负起组织人民起义的使命，认为我们党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应当参加临时民主革命政府。

代表大会责成全体党员在任何地方都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反对这种局部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倾向，但是代表大会同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附和这种观点的人，在下面这个必要的条件下，即在他们承认党代表大会和党章并且完全服从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可以参加党的组织。"（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决议指出，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各种派别。我们的代表会议派（马尔丁诺夫对他们的思想领导确实没有白费）关于革命的论断，和"经济派"[16]关于政治斗争或八小时工作制的论断是一模一样的。"经济派"一开口就搬出"阶段论"：（1）为权利而斗争，（2）政治鼓动，（3）政治斗争；或是（1）十小时工作制，（2）九小时工作制，（3）八小时工作制。这个"策略－过程"引起的结果，是大家都十分了解的。现在，代表会议派建议我们把革命也预先好好地分成几个阶段：（1）沙皇召集代表机关，（2）这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压力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3）……关于第三阶段，孟什维克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忘记了：人民的革命压力将碰到沙皇制度的反革命压力，因而不是"决定"不能实现，便是问题又得由人民起义的胜利或失败来决定。代表会议的决议也和"经济派"的下面这种论断完全相同：工人的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也可能表现为恩赐十小时工作制和"决定"过渡到九小时工作制……真是一模一样。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决议的制定者并没有想把起义的胜利和沙皇所召集的代表机关的"决定"**等量齐观**，而只是想预先规定党在前后两种场合下的策略。对此我们的回答是：（1）决议的原文是直截了当地和毫不含糊地把代表机关的**决**

定叫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也许这是措辞疏忽的结果，也许可以根据记录来纠正它，可是在没有纠正以前，这种措辞只能包含一种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完全是**解放派的**。（2）决议的制定者所陷入的“解放派”的思维进程，在新火星派的其他著作中表现得更是鲜明无比。例如，在梯弗利斯委员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7]（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火星报》第 100 号曾经称赞过它）上登载的《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一文，竟说什么“选择国民代表会议为我们的活动中心”（我们补充一句，关于召集国民代表会议，我们还连半点确切的消息都不知道！）这一“策略”，比武装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策略”，“**对我们更有利**”。下面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这篇文章。（3）预先讨论党在革命胜利时和革命失败时、在起义成功时和起义不能发展成为重大力量时的策略，是一点也不应当反对的。也许沙皇政府能够召集一个代表会议来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做交易，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预见到这一点，所以直截了当地说到“虚伪的政策”，“假民主”，“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注：下面就是这个关于在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的决议的全文：

“鉴于：在当前的革命时期，政府为了保存自己，一面加强通常的、主要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觉悟分子的镇压手段，同时又（1）企图用让步和进行改良的诺言从政治上腐蚀工人阶级，从而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革命斗争；（2）为着同一目的，给自己的虚伪的让步政策披上假民主的外衣，从邀请工人选派代表参加各种委员会和各种咨议会起，一直到成立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3）组织所谓黑帮[18]，并煽动人民中一切反动的、不觉悟的或者被种族仇恨和宗教仇恨所迷惑的分子来反对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责成一切党组织：

（一）揭露政府让步的反动目的，同时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一方面要着重说明这些让步是出于不得已，另一方面又要着重说明专制政府绝对不可能实行可以满足无产阶级需要的改良；

（二）利用竞选鼓动向工人解释政府的这类措施的真实意义，并说明对无产阶级来说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召集立宪会议；

（三）组织无产阶级立刻用革命的方法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工人阶级的其他迫切要求；

（四）组织武装抵抗来反击黑帮以及一切由政府领导的反动分子的进攻。”

（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可是，问题在于这一点不是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说的，因为这和临时革命政府没有关系。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就会把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推迟，就会使问题变样，等等。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可能发生各种情况：既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既可能走直路，也可能走弯路，而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可以搅乱工人对真正革命道路的认识，决不可以象解放派那样把缺少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面叫作彻底胜利。也许我们连八小时工作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而只有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才能得到，但是，如果有人竟把无产阶级**不能**阻止拖延、耽搁、搞交易、叛变和反动这种软弱无力的表现叫作工人的胜利，那么你会怎样说这个人呢？也许俄国的革命将以“立宪流产”结束，如《前进报》[注：日内瓦《前进报》是我们党内布尔什维克部分的机关报，于 1905 年 1 月开始出版。从 1 月至 5 月，总共出版了 18 号。从 5 月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 5 月在伦敦举行；孟什维克没有参加，他们在日内瓦举行了自己的“代表会议”）的决定，《前进报》停刊，开始出版《无产者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有一次说过的那样，但是，这

难道可以为那些在决战前夜把这种流产叫作“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吗？也许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不仅争取不到共和制，就连宪法也将是一个虚幻的“希波夫式的”宪法[19]，但是，难道这就可以原谅社会民主党人抹杀我们的共和制口号吗？

当然，新火星派还没有走到抹杀这个口号的地步。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已经丧失到什么程度，毫无生气的说教已经把他们和当前的战斗任务隔离到什么程度，这从他们在自己的决议中恰巧忘记谈到共和制这一点看得特别清楚！这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口号都在代表会议的各种决议中得到承认、重申、解释和详细说明，甚至由工人按企业选举工长和代表的事情也没有忘记，只是没有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提及共和制。说到人民起义的“胜利”，说到临时政府的成立，而不指出这些“步骤”和行动同争取共和制的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制定决议并不是为了要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是为了跟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后面蹒跚而行。

总起来说，决议的第一部分：（1）完全没有从争取共和制和保证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方面阐明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2）把正好还缺少真正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面拿来和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等量齐观，这就直接搅乱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意识。

注释：

[13] 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于 1905 年 1 月 9 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 1000 多人被打死，2000 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 月 9 日成了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15。

[14] 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1849年3月27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1849年5月30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月18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16。

[15]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6卷。——16。

[16] 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17。

[17]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报纸，1905年4月7日（20日）—11月13日（26日）在梯弗利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共出了6号。该报创刊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机关报出版的，后来该报自称为“高加索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机关报”。该报由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首领诺·尼·饶尔

丹尼亚领导。该报创刊号上刊登的《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一文是饶尔丹尼亚写的。——18。

[18] 黑帮是指 1905—1907 年沙皇俄国警察当局和一些君主派团体为镇压革命运动、杀害进步人士和制造反犹太人暴行而建立的武装暴徒组织。黑帮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店铺老板、无业游民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等等。为了同黑帮作斗争，革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战斗队、自卫队等。

在 1905—1917 年间，黑帮一词也泛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以及极右的党派和组织。——19。

[19] “希波夫式的”宪法是指温和自由派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右翼领袖德·尼·希波夫制定的国家制度方案。希波夫力图既限制革命规模，又从沙皇政府方面取得某些有利于地方自治机关的让步，因而建议建立附属于沙皇的咨议性代表机关。温和自由派想通过这笔交易蒙骗人民群众，保存君主制度，并使自己获得某些政治权利。——20。

4．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决议的下一部分：

“……无论在哪一种场合下，这样的胜利都将是革命时代的新阶段的开端。

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自发地提到这个新阶段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各种成分为实现自身的社会利益和直接占有政权而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彻底铲除整个等级君主制度。

因此，临时政府既要负起责任来完成这个按历史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必须调节争取解放的民族内各个对立阶级的相互斗争，就必须不仅推进革命的发展，而且极力反对革命发展中那些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因素。”

我们把构成决议的一个独立篇章的这一部分分析一下。我们所摘引的这几段论述的基本内容相当于代表大会决议的第三点所叙述的内容。可是，如果把两个决议中的这一部分拿来对照一下，立刻就会明显地看出这两个决议有如下的根本区别。代表大会的决议简略地说明了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后，便把全部注意力转到各阶级为争夺一定的成果而进行的非常确定的斗争上，并且把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提到第一位。代表会议的决议则冗长地、模糊地、混乱地描写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非常含糊地谈到为一定的成果而进行的斗争，并且根本不提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代表会议的决议说，在社会内各种成分相互斗争的过程中铲除旧制度。而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党应当铲除旧制度，只有建立起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铲除旧制度，我们应当争取这个共和制，我们为这个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斗争，不仅要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当资产阶级企图（他们一定会这样做）从我们手中夺取我们的成果时，还要反对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决议号召一定的阶级为明确的最近目的而斗争。代表会议的决议则谈论各种力量的相互斗争。一个决议表现出积极斗争的心理，另一个决议则表现出消极观望的心理；一个决议里响彻了生气勃勃地行动起来的号召，另一个决议里则充满了死气沉沉的说教。两个决议都说，现在发生的革命对我们说来只是第一步，随后还有第二步。但是一个决议由此作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尽快地走完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粉碎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另一个决议则可以说是淹没在对第一步的冗长的描写中，而且（恕我说句粗话）一味吮吸着关于第一步的思想。代表大会的决议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思想（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把它当作引言或首要的前提来作出既为民主

革命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先进阶级负有先进任务的结论。代表会议的决议则始终只是停留在引言上，咀嚼着这个引言，并在这个引言上面卖弄聪明。

正是这种区别一直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分为两派：在合法马克思主义[20]流行的那些年代分为说教派和战斗派，在群众运动兴起的时代分为经济派和政治派。“经济派”根据一般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有很深的经济根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前提，作出了奇特的结论：必须转过身去背向政治斗争，阻止它的发展，缩小它的规模，降低它的任务。反之，政治派根据同样的前提作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现在我们的斗争的根源愈深，我们就应当愈广泛、愈大胆、愈坚决、愈主动地进行这个斗争。现在在另一种环境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是那场争论。民主革命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决不是只有穷人才“关心”，民主革命的最深的根源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切身的需要和要求，——我们根据这些前提作出结论说，先进的阶级必须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民主主义任务，必须更明白地彻底说清这些任务，提出直接的共和制的口号，宣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必须无情地粉碎反革命的思想。而我们的论敌新火星派根据同样的前提却作出这样的结论：不应当彻底说清民主主义的结论，在实践的口号中可以不提共和制，可以不宣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可以把召集立宪会议的决定叫作彻底胜利，可以不把同反革命斗争的任务提出来作为我们的行动任务，而是把它淹没在模糊不清的（并且是措辞不当的，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相互斗争的过程”这一说法中。这不是政治家的语言，而是档案学家的语言？

你愈是仔细地研究新火星派决议中的各个说法，就会愈加明显地看出它的这些基本特点。例如，他们说什么“政治上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各种成分……相互斗争的过程”。我们记起决议所论述的题目（临时革命政府），就要疑惑地问道：既然已经说到相互斗争的过程，怎么又可以绝口不提那些在政治上**奴役**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分呢？代表会议派是不是以为只要他们假定革命取得胜利，这些成

分也就消失了呢？这种想法一般说来是荒谬可笑的，具体说来是政治上的极端幼稚，政治上的极端近视。在革命战胜反革命以后，反革命并不会消失，反而必然会更加不顾死活地进行新的斗争。既然我们的决议是分析革命胜利时的任务的，我们就必须特别注意击退反革命进攻的任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这样做的），而不是把一个战斗的政党的这些当前的、紧迫的、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淹没在一般的谈论中，说当前的革命时代过去以后会怎样，在将来有了“政治上**获得解放的**社会”时会怎样。“经济派”曾经引用政治服从于经济的一般真理，来掩饰自己对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的不了解，现在新火星派也和他们一样，引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社会内部将发生斗争的一般真理，来掩饰自己对从政治上**解放**这个社会的刻不容缓的革命任务的不了解。

就拿“彻底铲除整个等级君主制度”这句话来说吧。说得明白些，彻底铲除君主制度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制。但是我们的好心的马尔丁诺夫和他的信徒们认为这样说太简单明了了。他们一定要“加深”一下，一定要说得“聪明一些”。结果，一方面是枉费心机，令人可笑；另一方面，所得到的又不是口号而是描写，不是雄壮的前进的号召而是一种忧郁的向后回顾。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恰恰不是现在马上就要为共和制奋斗的活人，而是一种站在永恒的立场上用早已过时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的僵硬的木乃伊。

再往下看：“……临时政府既要负起责任来完成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从这里立刻就可看出，我们的代表会议派忽略了摆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者面前的具体问题。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具体问题，在他们的视野里竟被将来有许多政府会完成一般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问题所遮蔽了。如果你们想“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问题，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例子都会向你们表明，正是许多根本不是“临时性质的”政府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甚至那些战胜了革命的政府都毕竟不得不去完成这个被打败了的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被叫作

“临时革命政府”的，决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政府，这样的政府是革命时代的政府，它直接代替被推翻了的政府，它所依靠的是人民起义，而不是什么从人民中产生的代表机关。临时革命政府是争取革命立刻胜利、争取立刻粉碎反革命企图的机关，而决不是完成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任务的机关。先生们，让将来的历史学家在将来的《俄国旧事》[21]上去确定究竟资产阶级革命的哪些任务是由我们和你们或者由某个政府完成的吧！——这种事就是过 30 年再去做也还来得及，而现在我们必须拿出为共和制而斗争并促使无产阶级最积极地参加这个斗争的口号和实际指示来。

我们上面所摘录的那部分决议中的最后几个论点，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临时政府必须“调节”各个对立阶级的相互斗争一语，是极不妥当的，至少是笨拙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使用这种自由主义解放派式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会使人们以为可能有这样的政府，它们不是阶级斗争的机关，而是阶级斗争的“调节者”……政府必须“不仅推进革命的发展，而且极力反对革命发展中那些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因素”。这个决议借其名义说话的那个无产阶级恰恰就是这样的“因素”！这个决议不是指明无产阶级目前究竟应当怎样“推进革命的发展”（把它推得比立宪派资产阶级想走的更远），不是劝告无产阶级准备好一定的办法，等到资产阶级掉转头来反对革命的成果时，就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一般地描写过程，丝毫不谈**我们**活动的具体任务。新火星派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所采取的方式，使人联想到马克思（在他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缺乏辩证法思想的旧唯物主义的评语。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6 页。——编者注] 新火星派也能差强人意地描写和解释眼前的斗争过程，但是完全不能够提出进行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他们操练很有劲，但是指挥很糟糕，他们忽

视那些认识了革命的物质条件并领导着先进阶级的政党在历史上所能起到和应当起到的积极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因而降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注释：

[20]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 19 世纪 90 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敏锐地看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22。

[21] 《俄国旧事》杂志（《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是俄国历史刊物（月刊），由米·伊·谢美夫斯基创办，1870—1918 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主要登载俄国国务活动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回忆录、日记、札记、函件等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它是俄国第一家长期刊登俄国革命运动史料的杂志。——25。

5．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我们把这个决议的下一部分引录出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应当竭力保持这样的地位：使自己最有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不致在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政策作斗争时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不致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

因此，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的，而应当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劝告我们占据最有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地位，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不过除了这个好心的劝告以外，我们还想得到直接的指示，就是在现在，在当前的

政治形势下，在关于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的传说、猜测、议论和计划层出不穷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不懂得主张人民和沙皇“妥协”这种解放派理论的危险性，把仅仅“决定”召集立宪会议就叫作胜利而不积极宣传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人，是不是能在现在把革命推向前进呢？不提民主共和制的口号的人，是不是能在现在把革命推向前进呢？这样的人事实上是**把革命拉向后退**，因为他们在**政治实践**方面停留在**解放派**立场的水平上。他们既然在规定党在革命时期的当前的和最近的任务的策略决议中，不提为共和制而斗争的口号，那么他们承认要求用共和制代替专制制度的纲领，这又有什么用呢？其实，解放派的立场，即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立场现在的特征，就是把决定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看作彻底的胜利，而对临时革命政府和对共和制则小心谨慎地保持沉默！要把革命推向**前进**，也就是说，要使革命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所能把它推到的那个限度，就必须积极提出一些**排除**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的口号，强调这些口号，把这些口号提到首要地位。这样的口号现在**只有两个**：（1）临时革命政府，（2）共和制，因为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是君主派资产阶级已经**接受了的**（见“解放社”的纲领），它所以接受这个口号，正是为了阉割革命，为了不让革命完全胜利，为了使大资产阶级能和沙皇政府做交易。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两个唯一能够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口号中，代表会议把共和制口号完全忘掉了，又把临时革命政府口号直截了当地拿来和解放派的全民立宪会议口号等量齐观，把两者都叫作“革命的彻底胜利”！！

是的，这是一件无可怀疑的事实，我们相信这件事实会成为将来的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历史学家的路标。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 1905 年 5 月通过了决议，决议说了一些必须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的漂亮话，而事实上却把这个革命拉向后退，事实上并没有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

新火星派喜欢责难我们，说我们忽视无产阶级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的危险。我们倒很想看看，谁能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原文把这个责难证实一下。我们给我们的论敌的回答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行动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时而在这种场合，时而在那种场合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并肩**行进，就不能参加政治。在这方面，我们和你们的差别就是：我们和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但不和它打成一片；而你们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也不和它打成一片。**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你们以代表会议的名义提出的策略口号和“立宪民主”党即**君主派资产阶级政党**的口号**相吻合**，可是你们没有觉察到、没有意识到这种吻合，这样，你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解放派的尾巴**。

我们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名义提出的策略口号和民主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口号相吻合。这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人民政党［注：“社会革命党”与其说是这样一个政党的萌芽，不如说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知识分子集团，虽然这个集团所进行的活动的客观意义正好是要实现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任务。］。可是，只有完全不了解俄国现在的实际情况的人，才会怀疑这样一个党的成分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在伟大的俄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情形下）不仅打算领导已由社会民主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而且打算领导这个能够同我们并肩行进的小资产阶级。

代表会议的决议表明代表会议不自觉地**把自己降低**到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却表明代表大会自觉地要把那些能够进行斗争而不会做经纪人的革命民主派分子**提高**到代表大会的水平。

这种分子在农民中最多。在按政治倾向来划分大的社会集团时，我们可以把革命共和民主派和农民群众看作同一个东西，这是不会有什么大错误的，当然，就象可以把工人阶级同社会民主党看作同一个东西一样，这要加上一些限定语和

不言而喻的条件。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结论表述如下：代表会议在革命时期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注：我们不谈那些用单独的决议说明的只和农民有关的口号。］**政治**口号，表明代表会议不自觉地**把自己降低到地主群众的水平**。党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政治口号，却表明代表大会要**把农民群众提高到革命的水平**。如果有人因为我们作出这种结论而责备我们爱发表怪论，那我们就向他挑战，要他去推翻下面这个论点：如果我们没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如果革命以解放派式的“彻底胜利”，即仅仅以沙皇所召集的、只是在开玩笑时才可以叫作立宪会议的代表会议来**结束**，那么，这就是一个以**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反之，如果我们注定要经历一场真正伟大的革命，如果历史在这一次不容许“流产”，如果我们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彻底的胜利——不是解放派也不是新火星派所说的那种彻底胜利，那么，这就是一个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假定革命将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就是不相信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在《火星报》滥用这个概念的情况下，这种看法是很可能产生的。因此，把这个问题拿来分析一下，就完全不是多此一举了。

6．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社会革命党人不可能了解这个思想，因为他们不懂得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规律的基

本常识，他们看不出，即使农民起义完全成功，即使为着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地（“土地平分”或其他类似办法），也丝毫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加速农民本身的阶级分化。社会革命党人不了解这个真理，这就使他们成为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坚持这个真理，对社会民主党说来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政治实践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目前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

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不能以既主要有利于大资本家、金融巨头和“开明”地主又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形式来实现。

新火星派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内容和意义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他们的议论中经常透露出一种见解，以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的革命。其实，这种见解是再错误不过的了。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因此，这个革命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资产阶级革命与其说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想法。这种荒谬想法不是归结为陈旧的民粹主义理论，就是归结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前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矛盾的，因此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后者认为无产阶级绝对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政治，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

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坚决屏弃了他们的这种荒诞言论。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得到十分详细的证明和反复说明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象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时代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仅有专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正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

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当得出下面的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正是从下面这样一种意义上说这个原理是无可怀疑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时代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时代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不坚

决无情。这个思想，社会民主党人时常用稍微不同的说法来表示，这就是资产阶级自己背叛自己，资产阶级出卖自由事业，资产阶级不能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要这些改革对“尊贵的”农奴制设施（如君主制度）尽可能谨慎些；要这些改革尽可能少发扬小百姓即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主动性、首创精神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把枪从一个肩膀移到另一个肩膀”，就是说，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

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条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的腐烂部分慢慢坏死而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感到最大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小的道路，是直接切除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

因此，我们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刊物，就不仅仅是由于考虑到书报检查制度，不仅仅是由于畏惧当局，才对可能有革命道路感到悲哀，才害怕革命，拿革命来恐吓沙皇，设法避免革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地乞求实行小得可怜的改良来为改良主义道路打下基础。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不仅有《俄罗斯新闻》、《祖国之子报》、《我们的生活报》、《现代报》[22]，并且还有秘密的、不受检查的《解放》杂志。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却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壮大起来的民主进步。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

度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04 页。——编者注］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在实行民主改革方面愈彻底，这个革命就愈少局限于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拥护参议院、"请求"施行普选制、同时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就残缺不全的宪法和沙皇政府搞交易的君主派地方自治人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拿着武器反对地主和官吏、带着"幼稚的共和主义情绪"提议"驱逐沙皇"［注：见《解放》杂志第 71 期第 337 页注 2。］的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德国那样的，也有英国那样的；有奥地利那样的，也有美国或瑞士那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代竟没有看到民主主义的这种程度上的差别，没有看到民主主义各种形式的性质上的区别，却专门"卖弄聪明"，说什么这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可真是了不起。

我们的新火星派正好就是这样一些目光短浅但还以此自诩的聪明人。正是在必须善于区别共和主义革命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和君主主义自由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时候和地方，他们却仅仅局限于谈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至于区别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就更谈不上了。当问题是要在当前的革命中进行**民主主义的领导**，要强调**先进的民主的**口号，以区别于司徒卢

威先生之流的叛卖性的口号，要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真正革命斗争的当前任务，以区别于地主和厂主的自由主义经纪人行为的时候，他们却满足于忧郁地谈论“各对立阶级相互斗争的过程”，——他们好象真的变成了“套中人”[23]。现在，问题的实质，你们诸位先生所没有看到的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我国的革命是以真正的伟大胜利来结束呢，还是仅仅以一种可怜的交易来结束；是要达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呢，还是“倾注全力”去求得一纸自由派希波夫式的宪法！

初看起来，也许会觉得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离开了我们所讨论的题目。但是仅仅是初看起来才会觉得这样。事实上，这个问题正好就是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主义策略和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所规定的策略之间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的原则分歧的根源。现在，新火星派在解决对工人政党说来是更复杂、更重要和更迫切得多的问题即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的策略问题的时候，重新犯了“经济主义”的错误，结果就不是退两步而是退三步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十分用心地分析上面所提出的问题。

在我们所摘录的新火星派的那部分决议中，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在和资产阶级不彻底的政策作斗争时有束缚住自己手脚的危险，指出了社会民主党有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的危险。害怕这种危险发生的思想贯穿在一切典型的新火星派著作中，这个思想就是表现在我们党的分裂中的全部原则立场的真正关键（从这个分裂中的无谓争吵成分完全让位于向“经济主义”转变的成分时起）。我们坦率地承认：这种危险确实存在，而且正是在现在，在俄国革命处于最高潮的时候，这种危险特别严重。我们大家，即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或——我宁愿这样称呼自己——政论家，担负着一个刻不容缓的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弄清这种危险实际上**来自哪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分歧的根源并不是争论有没有这种危险存在，而

是争论这种危险是产生于“少数派”的所谓尾巴主义呢，还是产生于“多数派”的所谓革命主义。

为避免曲解和误会起见，我们首先指出，我们所说的危险不在主观方面，而在客观方面，不在社会民主党在斗争中所采取的形式上的立场方面，而在现在的整个革命斗争的物质结局方面。问题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愿意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不在于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溶化，——现在谈不到这个问题。我们不相信有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怀着这种愿望，而且问题决不在于愿望。问题也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能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独特性、不依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自主的地位。他们可以不仅宣布这种“独立”，而且还在形式上保持这种“独立”，可是**结局还可能是**他们在和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革命的政治上的最终结局可能是这样：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组织上的、即党的完全的独特性，但是它在事实上并不独立，并没有力量对事变的进程刻上自己的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而且非常软弱，以致总的说来，归根到底，最后，它“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终将成为一个历史事实。

这才是真正危险的所在。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危险会来自哪一方面：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来自以新《火星报》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右倾呢，还是如新火星派所想的那样来自以“多数派”、《前进报》等等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左倾。

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行动客观上是怎样配合的。这些力量的性质在理论上已由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现实的分析所确定，而现在在实践上又由各个集团和各个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行动所确定。马克思主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很久就作出的全部理论分析，以及对革命事态的发展所进行的一切实际观察，都向我们表明，从客观条件看来，俄国革命可能有两种进程和结局。俄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改革是

不可避免和不可排除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止这种改革。但是，从实现这种改革的现有各种力量的行动的配合中，可能得出这种改革的两种结果或两种形式。二者必居其一：（1）或者结果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2）或者是要取得彻底胜利力量不够，结果是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中最“不彻底的”、最“自私自利的”分子搞交易。具体的细节和配合情况多种多样，谁也无法预见；但是总的说来，结局不外乎上述两种中的一种。

现在我们把这两种结局考察一下，首先从这两种结局的社会意义方面来考察，其次从社会民主党在前一种结局和后一种结局中的状况（社会民主党“溶化”或被“束缚住手脚”）来考察。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呢？我们已经看到，新火星派使用这个概念时，连这个概念的最直接的政治意义都不了解。至于这个概念的阶级内容他们就更不了解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都不应当象现在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加邦之类）那样，让自己迷恋于“革命”或“俄国大革命”之类的**字眼**。我们应当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反对“沙皇制度”（这是一种完全实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并且能够对它取得“彻底胜利”。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愿意彻底胜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不，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来说的，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了这两种力量中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

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早已由《前进报》指出过的结论，是我们的新火星派怎么也无法避开的。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未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

至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决不对此抱盲目乐观的态度，我们决不忘记这个任务的莫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既然去斗争，就应当希望获得胜利，应当善于指出达到这种胜利的真正的道路。能够获得这种胜利的趋势是肯定存在的。的确，我们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还非常非常地不够；农民群众所受到的革命影响还微乎其微；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还非常散漫，非常不开展，非常愚昧无知。但是革命能迅速地把人们团结起来，能迅速地使人们受到启发。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都能够唤醒群众，并且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群

众吸引到革命的纲领方面来，因为这是唯一能彻底而完全地代表群众真正的切身利益的纲领。

力学的定律告诉我们：作用和反作用相等。在历史上，革命的破坏力量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自由的趋向所受到的压迫如何厉害和如何长久为转移，以过时的“上层建筑”和现代的新生力量的矛盾如何深刻为转移。国际政治形势也在许多方面变得对俄国革命最为有利。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已经爆发，它是零散的、自发的、软弱的，但是它无可争辩地、毫无疑义地证明存在着能作坚决斗争并能达到彻底胜利的力量。

如果这种力量不够，那么沙皇政府就来得及做成现在已经由布里根先生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们两方面准备着的交易。那时，结果就会是一纸残缺不全的宪法，在最坏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是对宪法的拙劣可笑的模仿。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流产，是早产儿，是发育不全的低能儿罢了。社会民主党不抱任何幻想，它知道资产阶级有变节的天性，它就是在最暗淡无光的日子，即在“希波夫式的”资产阶级宪法行时的日子，也不会灰心丧气，也不会抛弃自己在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教育方面所做的顽强的耐心的坚定不移的工作。这样的结局就会同 19 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几乎一切民主革命的结局多少有些相似，那时，我们党就会循着困难、艰苦、漫长、但已为我们所熟悉、已为人们所踏平的道路向前发展。

现在要问：在这两种可能的结局中的哪一种结局下，社会民主党在反对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时会真正被束缚住手脚，会真正“溶化”或者几乎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呢？

这个问题只要明确地提出来，就不难马上给以回答。

如果资产阶级竟能通过与沙皇政府搞交易来破坏俄国革命，那时社会民主党在反对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时就会真正被束缚住手脚，那时社会民主党就会“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将不能对革命刻上自己的显著的标

记，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方式，或者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用平民方式”来消灭沙皇制度。

如果革命能取得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就能用雅各宾派[24]的方式，或者说，用平民的方式来消灭沙皇制度。马克思于 1848 年在有名的《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马克思遗著》梅林版第 3 卷第 211 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125 页。——编者注］那些在民主革命时代用“雅各宾主义”这种吓人的字眼来吓唬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人，是否在什么时候思索过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呢？

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即新火星派，并没有和解放派打成一片，但是由于他们的口号的性质，他们已经在实际上成了解放派的尾巴。而解放派，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想用柔和的、改良的办法来消灭专制制度：能让步就让步，不得罪贵族和宫廷；小心谨慎，不打碎任何东西；殷勤周到，彬彬有礼，象绅士们一样戴上洁白的手套（如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血腥的尼古拉接见“人民代表”（？）时戴上的那副从刽子手手上脱下来的手套[25]，见《无产者报》第 5 号）。

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即布尔什维克、前进派、代表大会派或者无产者派——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想要用自己的口号，把革命共和派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把农民提高到完全保持着自己的阶级独特性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彻底民主主义的水平。他们要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用平民方式”来消灭君主制度和贵族，无情地消灭自由的敌人，用强力镇压敌人的反抗，决不对农奴制度、亚洲式暴政和对人肆意凌辱的万恶余孽作丝毫让步。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仿效 1793 年的雅各宾派，套用他们的观点、纲领、口号和行动方式。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纲领不是旧的，而是新的纲领，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我们有新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如果我们达到革命的真正的胜利，我们还会有新的行动方式，同力求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目的相适应的行动方式。我们打这样一个比喻只是想说明，20 世纪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即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分成两派（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就象 18 世纪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分成两派，即分成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一样。

只有在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才不会被束缚住手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才不致“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而会对整个革命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时不致被束缚住手脚，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从而独立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新火星派解决得极不妥当的所谓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有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的问题就是如此。资产阶级永远是不彻底的。企图拟订一些条件或条款［注：斯塔罗韦尔在他那个被第三次代表大会取消了的决议[26]中就试图这样做；代表会议在同样不妥当的决议中也试图这样做。]，以为履行了这些条件或条款，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能被当作并非虚伪的人民之友，那是再幼稚和再白费力气不过的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战士。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做不到这一点，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于是我们就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结论，即新火星派的策略客观上正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效劳的**。鼓吹组织界限模糊，以至于主张实行“全民投票制”，实行协

商的原则，使党的出版物脱离党；贬低武装起义的任务；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全民政治口号和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全民政治口号混淆起来；曲解“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条件，——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正好构成了革命时期的尾巴主义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不指出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不仅不把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共和派分子吸引到无产阶级口号下面来，反而把无产阶级引入迷途，瓦解它的队伍，扰乱它的意识，贬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为了证实我们在分析决议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个结论，我们再从其他方面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不大聪明但说话坦率的孟什维克是如何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解释新火星派的策略的。其次，我们再看看事实上究竟是谁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利用新《火星报》的口号。

7.“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孟什维克梯弗利斯“委员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 号）上的那篇论文，叫作《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该文作者还没有完全忘记我们的纲领，他提出了共和制的口号，但是他谈到策略问题时却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和制），可以指出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毫不理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拿着武器去打倒政府，组织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另一条道路是宣布国民代表会议为我们活动的中心，拿着武器来影响它的成分和它的活动，并用强力迫使它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或通过它来召集立宪会议。这两种策略是极不相同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究竟哪一种策略对我们更有利。”

看吧，俄国的新火星派分子就是这样叙述后来体现在我们所分析过的那个决议中的思想的。请注意，这是在对马事件[27]以前写的，当时布里根“草案”还根本没有出世。当时，甚至连自由派都已失去耐心，并且在合法的刊物上表示不信

任的态度，但这位社会民主党新火星派分子却比自由派表现得更为轻信。他宣布国民代表会议“正在召集”，并且非常相信沙皇，竟主张把这个还不存在的国民代表会议（也许是“国家杜马”或“立法咨议会”吧？）当作我们活动的中心。我们的这位梯弗利斯人比代表会议上通过的那个决议的起草人坦白直率，他不是把（他叙述得无比幼稚的）两种“策略”等量齐观，而是宣布第二种策略“更有利”。请听吧：

“第一种策略。大家知道，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说，它的目标是要把现存制度改变得不仅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且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一切阶级，甚至连资本家自己，都对政府持反对态度。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和战斗着的资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一起行进，一起从不同的方面攻击专制制度的。政府在这里已经完全孤立，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因此，要消灭［注：列宁在手稿上加在“消灭”一词后面的“（？？）”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它是很容易的。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还不高，因而还不能单独实现革命。如果它能够这样做，它就不会去实现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去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所以，我们的利益就是要使政府找不到同盟者，使它不能把反对派分开，不能把资产阶级拉过去而使无产阶级陷于孤立地位……”

总之，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要使沙皇政府不能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开！这个格鲁吉亚机关报竟然不叫作《解放》而叫作《社会民主党人报》，这莫非是弄错了？看吧，这简直是民主革命的举世无双的哲学！在这里我们难道不是亲眼看到这位可怜的梯弗利斯人已被“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说教式的尾巴主义解释彻底弄糊涂了吗？他讨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于孤立的问题，可是**忘记了**……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农民！在无产阶级的可能的同盟者中间，他知道并且看中了地方自治人士一地主，却不知道有农民。而这是在高加索啊！

那么，我们说新《火星报》的议论表明它不是把革命的农民提高到自己的同盟者的地位，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这难道说得不对吗？

“……否则无产阶级的失败和政府的胜利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专制政府努力争取的。它在国民代表会议中毫无疑问会把贵族、地方自治机关、城市和大学等等资产阶级设施［注：手稿上接着有一段已被勾掉的列宁的话：“贵族、大学等等资产阶级设施！应当再来读读《工人思想报》，好看到这样幼稚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俄文版编者注］的代表们拉过去。它会设法用一些微小的让步来笼络他们，从而使他们和自己和解。它用这样的手段把自己巩固起来之后，就会把它的全部力量用来打击已经陷于孤立的工人大众。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防止这种不幸的结局。但是，难道这是通过第一条道路可以做到的吗？假定我们丝毫不理会国民代表会议而独自着手准备起义，并且有那么一天拿起武器跑到街上去斗争。那时，我们碰到的敌人就会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政府和国民代表会议。当我们还在作准备的时候，它们已经协商好了［注：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好个雅各宾主义！竟‘准备’起义！！”——俄文版编者注］，彼此达成了协议，制定了有利于它们的宪法，并且把政权瓜分掉了。这是直接有利于政府的策略，我们应当最坚决地拒绝……”

说得多么坦白啊！必须坚决拒绝准备起义的“策略”，因为政府会“在这个时候”和资产阶级做交易！恐怕就是在最顽固的“经济主义”的旧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近似于这种玷污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论调的东西。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发生的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和风潮已经是事实。国民代表会议只是布里根的诺言。而梯弗利斯市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却下定决心拒绝准备起义的策略，等候着“影响的中心”，即国民代表会议……

“……反之，第二种策略是要把国民代表会议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不让它按自己的意志行动［注：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哎呀！真是太太太革

命了！”——俄文版编者注］，不让它和政府妥协［注：用什么办法去剥夺国民代表会议成员们的意志呢？是用特制的石蕊试纸[28]吗？］。

我们支持国民代表会议，是因为它和专制政府作斗争，而当它和专制政府和解的时候，我们就和它作斗争。我们要用强硬的干涉和强力把代表们彼此分开［注：天啊！这是多么“深奥的”策略！没有力量在街上斗争，却可以“用强力”“把代表们分开”。梯弗利斯的同志，请你听着，胡扯也要有个限度……］，把激进派拉过来［注：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可怜的司徒卢威！他可是一个有名的激进派！什么样的命运啊——竟被用强力拉入新火星派……”——俄文版编者注］，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从而使整个［注：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请听啊！请听啊！”——俄文版编者注］国民代表会议走上革命的道路。由于采用这样一种策略，政府就会经常陷于孤立，反对派［注：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不包括‘遭到排斥的’保守派吗？”——俄文版编者注］就会强大，这样，民主制度就容易建立起来。”

好了，好了！现在让人们去说我们夸大新火星派转向最庸俗的“经济主义”方面的事实吧。这和驰名的杀蝇药粉简直毫无二致：先把苍蝇捉住，然后把药粉撒在它身上，于是苍蝇就杀死了。用**强力**把国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分开，“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于是**整个**国民代表会议就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根本用不着“雅各宾式的”武装起义，而只要随随便便地、温文尔雅地、用近乎议会的方式来“影响”**国民代表会议的成员**就行了。

可怜的俄国啊！人们说它总是戴着欧洲早已抛弃了的旧式帽子。我们这里还没有议会，甚至布里根也没有答应设立议会，但议会迷[29]却已经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这种干涉应当怎样实现呢？首先，我们要求国民代表会议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召集。在公布［注：是在《火星报》上公布吗？］

这种选举手续时，必须以法律规定［注：是由尼古拉来规定吗？］竞选鼓动的充分自由，即集会、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规定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不受侵犯，规定释放一切政治犯。选举日期应当尽可能规定得晚一些，好使我们有充分时间来让人民了解情况和进行准备。既然关于召集国民代表会议的条例是委托内务大臣布里根的委员会去制定，我们就应当去影响这个委员会和它的委员［注："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布里根委员会拒绝满足我们的要求［注：我们既有如此正确而深奥的策略，是决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而只赋予有产者以代表选举权，我们就应当干涉这种选举，用革命的手段强迫选举人选举先进的候选人，并且在国民代表会议中要求召集立宪会议[30]。最后，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如示威、罢工以及在必要时举行起义，迫使国民代表会议召集立宪会议或者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保卫者应当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而它们二者是会一同［注：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被排斥于政府之外的"保守派吗？］走向民主共和制的。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也只有这个策略才能保证我们获得胜利。"

读者不要以为这一大篇不可思议的谬论只是某个不重要的和没有威望的新火星派分子的习作。不是的，这是在新火星派的一个委员会即梯弗利斯委员会的**机关报**上说出来的。不仅如此，这篇谬论还受到**《火星报》的直接称赞**，《火星报》第 100 号对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有如下一段评论：

"第 1 号编得生动而有才气。显然可以看出编者兼作家很有经验和才能……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报纸一定会出色地完成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是呀！如果这个任务是要向一切人具体表明新火星派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腐化，那么这个任务真是"出色地"完成了。谁也不能更加"生动、有才气和有才能地"表现出新火星派已经堕落到自由派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地步。

注释：

[27] 指日俄战争期间于 1905 年 5 月 14—15 日（27—28 日）在对马岛附近进行的一次大海战。这次海战的结果是俄国第 2 和第 3 太平洋舰队被歼灭，俄国在整个战争中的失败完全成为定局。——44。

[28] 石蕊试纸是用石蕊溶液浸过的纸条，可以根据它置入某种溶液后颜色的改变来鉴定该溶液的酸碱性。列宁在这里指的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斯塔罗韦尔）的所谓石蕊试纸理论。波特列索夫在发表于 1904 年 11 月 20 日（12 月 3 日）《火星报》第 78 号的《我们的厄运》一文中把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比喻为石蕊试纸，认为可以用它来鉴定某个反对派集团是否属于无产阶级应予支持的民主派。列宁对他的这一观点多次进行了批评。列宁在《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中说："司徒卢威先生大笔一挥，在'解放社'的纲领中写上普选权，就使斯塔罗韦尔的有效试剂失了效。就是这位司徒卢威已经不止一次在实际上向我们证明，这些纲领对于自由派只不过是一张纸，不是石蕊试纸，而是一张普通的纸，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可以毫不在乎地今天这样写，明天那样写。"（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9 卷第 172 页）列宁指出："这种理论幼稚已极，只会在无产阶级中间造成混乱，腐蚀无产阶级。"（见本卷第 195 页）——46。

[29] "议会迷"是列宁著作中多次出现过的一个词。列宁用它来形容那种认为议会制度是万能的、议会活动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政治斗争的唯一的主要的形式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已使用过这个词。例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写道："1848 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187 页）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里写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

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同上，第94页）。——47。

[30] 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编者注：在列宁的手稿上，下面还有一句被勾掉的话：“‘强迫选举’——‘用革命手段’！竟有这样的革命的列彼季洛夫精神！”

列彼季洛夫精神意为空口说白话。列彼季洛夫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一个丑角。他经常胡说八道，夸夸其谈，尽说些不着边际的空话。——47。

8．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具体证实新火星派的政治作用的事实。

司徒卢威先生在《怎样认识自己的使命》这篇卓越的、超群出众的、极有教益的论文（《解放》杂志第71期）中，猛烈地攻击我国各极端党派的“纲领的革命主义”。司徒卢威先生对我个人更是特别不满。[注：“和列宁先生及其各位同志先生的革命主义比较起来，倍倍尔以至考茨基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主义就成为机会主义了，但是就连这个已经变得温和了的革命主义的基础也已经受到历史冲刷并被彻底摧毁了。”好厉害的攻击。不过司徒卢威先生以为可以把我当作死人来随便诬赖，是徒劳无益的。我只要向司徒卢威先生提出下面这个挑战就够了，这个挑战是他永远不能接受的。试问：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把“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革命主义”叫作机会主义的？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派别**不相同**的特别派别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即使是就严重性来说和倍倍尔同考茨基例如在布雷斯劳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31]稍微有点近似的分歧呢？让司徒卢威先生试着来回答这三个问题吧。而我们要告诉读者：自由派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在运用的手法就是说服他们的本国

同道者相信本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最缺乏理性，而邻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好孩子”。德国资产阶级曾经**几百次地**把法国社会党人说成“好孩子”以训诫倍倍尔们和考茨基们。法国资产阶级在不久以前也把倍倍尔说成“好孩子”以训诫法国社会党人。司徒卢威先生，这是老一套的手法！只有小孩和不学无术的人才会上你的圈套。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完全一致，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事实。]至于我自己，那我对司徒卢威先生是再满意不过了，因为在我同新火星派中日渐复活的“经济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那种毫无原则的立场进行斗争时，司徒卢威先生是我的最好的同盟者。司徒卢威先生和《解放》杂志怎样在实际上证明了社会革命党人纲领草案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种种“修正”的全部反动性，我们下次有机会时再说。关于司徒卢威先生每次**在原则上**称赞新火星派时总是给我一种诚实、可靠和真正的帮助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多次［注：请读者回想一下，《不该这么办》这篇论文（《火星报》第 52 号）曾受到《解放》杂志的十分热闹的欢迎，被认为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一个“重大的转变”。新火星派的原则趋向，《解放》杂志在一篇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裂问题的短评中特别加以赞扬。关于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解放》杂志指出，该书作者的思想同工人事业派分子克里切夫斯基、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曾经写过和说过的东西是一致的（见《前进报》出版的传单《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9 卷第 55—58 页。——编者注）。马尔丁诺夫论两种专政的小册子受到了《解放》杂志的欢迎（见《前进报》第 9 号的短评。同上，第 289—290 页。——编者注）。最后，斯塔罗韦尔事后对旧《火星报》的旧口号“先划清界限，然后统一”的抱怨得到了《解放》杂志的特别的同情。]，而现在我们还要再说一次。

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篇论文中有许多极有趣的声明，我们在这里只能顺便指出一下。他打算“不依靠阶级斗争而依靠阶级合作来创立一个俄国民主党”，而“处

于社会特权地位的知识界”（如司徒卢威先生用真正上流社会的……奴仆的必恭必敬姿态加以恭维的“文化贵族”之类）就会把“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重量”（钱包的重量）带到这个“非阶级的”党里面来。司徒卢威先生表示愿意让青年知道，“资产阶级惊慌起来而叛卖了无产阶级和自由事业这种激进主义的滥调”是毫无价值的。（我们衷心欢迎这种愿望。司徒卢威先生攻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滥调”，只会再好不过地证实这个“滥调”的正确。司徒卢威先生，请不要把你这个出色的计划束之高阁吧！）

我们认为，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来说，重要的是指出这个政治上很敏感的和极其善于随机应变的俄国资产阶级代表目前所攻击的究竟是哪些**实践**口号。第一，是共和主义的口号。司徒卢威先生坚信，这个口号“对人民群众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和格格不入的。”（他忘记补充一句：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它是不利的！）。我们很想看看，司徒卢威先生从那些参加我们的小组和我们的群众大会的工人方面会得到什么样的答复！或许工人不算人民？那农民呢？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说，农民有一种“幼稚的共和主义”思想（“驱逐沙皇”），但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相信，将来代替**幼稚的**共和主义的不是自觉的共和主义，而是自觉的君主主义！司徒卢威先生，这要看情况，这还要以情况为转移。无论沙皇政府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不反对用剥夺地主土地的办法来根本改善农民状况，而工人阶级却不能不在这方面帮助农民。

第二，司徒卢威先生断言，“在国内战争中，进攻的一方总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思想和上面所指出的新火星派的倾向非常相近。我们当然不会说，在国内战争中进攻**总是**有利的；不，有时候防御的策略**暂时**也是必要的。但是，把司徒卢威先生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论点应用于1905年的俄国，恰好就证实了那一点儿“激进主义的滥调”（“资产阶级惊慌起来而叛卖自由事业”）。现在，谁不愿向专制制

度、向反动势力进攻，不准备这种进攻，不宣传这种进攻，他就是徒具革命拥护者的虚名。

司徒卢威先生斥责“秘密活动”和“骚乱”（说这是“小型的起义”）这两个口号。司徒卢威先生对前后两者都表示鄙弃——是从“接近群众”的观点来加以鄙弃的！我们倒要问问司徒卢威先生，他能不能在他认为是一个极端革命主义者的人所写的例如《怎么办？》[注：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1—183 页。——编者注]这样的著作中指出鼓吹骚乱的言论来？至于说到“秘密活动”，那么象我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之间的区别难道是很大的吗？我们双方不是都办着“不合法的”报纸，并且“秘密地”运到俄国去供给“解放社”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团体吗？我们的工人群众集会经常是“秘密”举行的，——确实是这样。而解放派先生们的会议又是怎样的呢？司徒卢威先生，你在这种可鄙的秘密活动的可鄙的拥护者面前有什么可骄傲自大的呢？

当然，运送武器给工人是需要严守秘密的。司徒卢威先生在这里已经说得比较直率了。请听吧：“至于武装起义或者革命的技术问题[注：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开始抄袭新《火星报》了。”——俄文版编者注]，那只有广泛宣传民主纲领，才能造成全面武装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这样，甚至从我不赞同的观点，即武装起义是当前解放斗争**必不可免的**结局这样一个观点看来，把民主改革的思想灌输给群众，也是最基本、最必需的事情。”

司徒卢威先生力图回避问题。他说起义必不可免，而不说起义对保证革命的胜利是必要的。无准备的、自发的、零散的起义已经开始了。谁也不能绝对担保它会发展为统一而完整的人民武装起义，因为这取决于革命力量的情况（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完全衡量出来），取决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行为，以及其他许多无法准确估计的情况。关于必不可免的问题，即司徒卢威先生避开正题而加以赘述的绝对相信具体事变必然到来的问题，根本用不着去谈论。如果你愿意成为革命的

拥护者，那就应当谈谈起义是否**为保证**革命**胜利所必需**，是否必须积极提出起义，进行宣传，并且立刻大力加以准备。司徒卢威先生不会不了解这种区别，例如，他并不用在当前革命过程中必不可免地会获得普选制的问题来掩盖必须实行普选制的问题，前者在政治家看来是一个可以争论但并不迫切的问题，后者在民主派看来却是个无可争论的问题。司徒卢威先生避开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这就表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的真相。第一，资产阶级宁愿和专制政府搞交易，而不愿把它粉碎；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想把武装斗争的重担推给工人（这是第二）。这就是司徒卢威先生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真实**意义。这就是他从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倒退**到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的问题，**倒退**到预先“宣传”的问题上的原因。1848 年法兰克福议会里的资产阶级空谈家在必须给政府的武装力量以反击的时候，在运动使武装斗争“已成为必要”的时候，在纯粹口头说服的办法（在准备时期万分需要的办法）已经变成卑鄙的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怯懦表现的时候，竟埋头于起草决议、宣言和决定，埋头于“广泛的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同样，现在司徒卢威先生也是用**空话**做护身符来回避起义问题。司徒卢威先生向我们具体表明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顽固地闭眼不看的事实，即革命时期和历史上普通的寻常的准备时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群众的情绪、激愤和信念应当表现于**行动**，而且确实表现于**行动**。

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历史时代，而群众的这种发动不是任何盲动所能替代的，也不是能够人为地造成的。革命家的尾巴主义不了解：当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旧的“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替自己创造着新的上层建筑的阶级和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已经成为事实，国内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照旧**局限于“言”而不提出“行”的**直接口号**，借口“心理条件”和一般“宣传”而不肯行动起来，就是毫无生机，就是死气沉沉，就是说教，或者说，就是出卖革

命和背叛革命。法兰克福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空谈家，就是这种背叛行为或这种愚蠢说教的遗臭万年的历史实例。

你们要我们根据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来说明庸俗的革命主义和革命家的尾巴主义之间的这个区别吗？我们就来向你们作这样的说明吧。请你们回忆一下 1901—1902 年这个刚刚过去不久但现在对我们来说似乎已成为一种遥远传说的年代吧。游行示威开始了。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工人事业》[32]），分发“血的传单”（我记得仿佛是从柏林发出的），攻击主张通过报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是“文人清谈”和书生习气（纳杰日丁）[33]。反之，革命家的尾巴主义当时却鼓吹“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好的**手段”。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抱什么态度呢？它抨击了这两个流派。它斥责了轻举妄动的行为和冲锋的喊叫，因为当时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或者应当看到，公开的群众发动还是明天的事情。它斥责了尾巴主义，并直接提出了**甚至**全民武装起义的口号，但不是作为直接的号召（司徒卢威先生当时从我们的言论中是找不到关于“骚乱”的号召的），而是作为一种**必要的**结论，作为一种“宣传”（关于这种“宣传”，司徒卢威先生只是在现在才想起来，——我们的可敬的司徒卢威先生，他总是要迟误几年），是为了准备那些由惊慌失措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正“愁眉苦脸地和不合时宜地”叨念着的“社会心理条件”。**当时**，宣传和鼓动，鼓动和宣传，确实是由客观情况提到了首要地位。**当时**，可以提出（而且已经在《怎么办？》里面提出来了）出版全俄政治报纸作为起义的准备工作的试金石，而这种报纸每周出版一次也是很理想的。**当时，不要**实行直接的武装发动，而要进行群众性的鼓动，**不要**轻举妄动，而要准备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等口号，是革命社会民主派唯一正确的口号。**现在**，这些口号已经落在事变后面，运动已经前进了，这些口号已成为废物，成为只适于掩盖解放派的伪善和新火星派的尾巴主义的破衣烂衫了！

也许是我弄错了？也许革命还没有开始？各个阶级的公开的政治发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国内战争还没有发生，因而武器的批判还不应当立刻成为批判的武器的**必需的**和责无旁贷的后继者、继承者、遗志执行者、未竟事业的完成者？

向自己的周围看看，把头伸出书房向街上看看，就能回答这些问题。难道政府自己不是正在到处大批枪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公民，从而已经开始了国内战争吗？难道全副武装的黑帮不是作为专制制度的“凭据”而活动的么？难道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不是已感觉到有成立民兵的必要吗？难道司徒卢威先生，这位极其温和谨慎的司徒卢威先生，不是在说（唉，不过是为了推托而说说罢了！）“革命行动的公开性质〈看我们现在怎么样！〉现在是对人民群众产生教育作用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吗？

一个有眼可看的人，他就不会不相信革命的拥护者现在应当提出武装起义的问题。请看那些对**群众**多少有点影响的自由报刊所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三种**提法吧。

第一种提法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注：下面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鉴于：

（1）无产阶级，就其本身的地位而言，是最先进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而担负着在俄国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

（2）目前这个运动已经发展到必须举行武装起义，

（3）无产阶级必然会最积极地参加这一起义，这将决定俄国革命的命运，

（4）社会民主工党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中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团结成统一的和独立的政治力量，才能在这个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5）只有实现这一作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俄国的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因此代表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

（一）通过宣传和鼓动给无产阶级不仅讲清楚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讲清楚这一起义的组织实践方面的问题；

（二）在宣传鼓动时要说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作用，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要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以及制定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计划，必要时应设立由党的工作者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这项工作。”

（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中的提法。它认定并且大声宣称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已使**武装起义**成为必要**。组织无产阶级举行起义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党的极重要的、主要的和**必要的**任务之一。要求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和保证有可能直接领导起义。

第二种提法是“俄国立宪党人的领袖”（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法兰克福报》[34]不久前给予司徒卢威先生的称号）或俄国进步资产阶级的领袖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原则性的论文中的提法。他不赞同起义必不可免的意见。秘密活动和骚乱是缺乏理性的革命主义的特殊手段。共和主义是用来吓唬人的。武装起义其实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最基本、最必需的事情”是广泛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

第三种提法是新火星派代表会议的决议中的提法。我们的任务是准备起义。举行有计划的起义是不可能的，起义的有利条件，是由政府的紊乱、我们的鼓动、

我们的组织工作造成的。只有在那时，“技术上的战斗准备工作才能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就只是这样吗？就只是这样。无产阶级的新火星派领导者还不知道起义是否已成为必要，他们还不清楚组织无产阶级去进行直接斗争的任务是否已经刻不容缓。没有必要号召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更重要得多的（在 1905 年，而不是在 1902 年），是大体上说清楚这些措施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新火星派的同志们，你们现在是否知道你们向马尔丁诺夫主义的转变已把你们引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是否明白你们的政治哲学原来是解放派哲学的旧调重弹？你们是否明白你们已经成了（尽管你们不愿意，尽管你们没有意识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你们现在是否清楚，当你们重弹旧调和提高说教水平的时候，你们竟没有看到——用彼得·司徒卢威那篇令人难忘的论文中的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革命**行动**的公开性质现在是对人民群众产生教育作用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这样一个事实？

注释：

[31] 指 1895 年 10 月 6—12 日在布雷斯劳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讨论该党土地纲领草案时发生的意见分歧。土地纲领草案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其中有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的倾向。除机会主义分子外，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也拥护这个草案。在代表大会上，土地纲领草案受到卡·考茨基、克·蔡特金和其他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的严厉批判。代表大会以 158 票对 63 票否决了委员会提出的土地纲领草案。——48。

[32] 《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机关刊物，1899 年 4 月—1902 年 2 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12 期（9 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

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事业》杂志的观点（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1—183 页）。

列宁在这里说的“庸俗的革命主义者叫喊‘冲击’”是指 1901 年 6 月《〈工人事业〉附刊》第 6 期上刊登的《历史性的转变》一文。——53。

[33] 指 1901 年出版的尔·纳杰日丁（叶·奥·捷连斯基的笔名）的小册子《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这本小册子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146、149、152—170 页）。——53。

[34]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55。

9．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考察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我们已经指出，新火星派的策略并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虽然他们也许是想用自己的决议来保证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把它拉向后退。我们已经指出，正是这种策略**使**社会民主党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并且不能预防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的危险。从决议的不正确的前提中，自然就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因此，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的，而应当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请看看这个结论的前一半即提出目的的这一半吧。新火星派是否提出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作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目的呢？是提出来了。他们不善于正确表述彻底胜利的条件而错误地用了“解放派”的说法，但是他们毕竟提出了上面那个目的。其次，他们是不是把临时政府和起义联系了起来呢？是的，他们直接把这两件事情联系了起来，说临时政府是

“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最后，他们是否提出领导起义作为自己的目的呢？是的，他们虽然也象司徒卢威先生一样躲躲闪闪，不肯承认起义是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但是又和司徒卢威先生不同，他们同时还说“社会民主党力求使它（起义）**服从于**自己的影响和**领导**，并利用它来为工人阶级谋利益”。

这岂不是说得头头是道么？我们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的起义服从于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领导，并利用它来为我们自己谋利益。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在起义时既领导无产阶级，又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的集团”），就是说，由社会民主党和革命资产阶级“**分掌**”起义的领导权。我们的目的是使起义**胜利**，以便成立临时政府（“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因此**……因此我们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革命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的！！

我们的朋友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他们动摇于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之间，司徒卢威先生托辞拒绝起义，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则号召着手实现这个刻不容缓的任务。他们动摇于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无政府主义在原则上把任何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行为都斥责为背叛无产阶级，而马克思主义则要求在社会民主党对起义能起领导作用的条件下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注：见《无产者报》第 3 号《论临时革命政府》第二篇文章。（《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232—240 页。——编者注）］。他们没有任何独立的立场：既不采取司徒卢威先生那种要和沙皇政府搞交易因而必然在起义问题上躲躲闪闪、支吾搪塞的立场，又不采取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斥责任何“从上面”行动和任何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行为的立场。新火星派把同沙皇政府搞交易和对沙皇制度的胜利混为一谈。他们想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他们比马尔丁诺夫的《两种专政》稍稍前进了一点。他们甚至同意领导人民的起义，但是主张起义胜利后（也许是在起义

就要胜利时？）马上放弃领导，即**主张不享受胜利的果实**，而要把一切果实**统统**奉送给**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利用起义来为工人阶级谋利益”……

用不着再继续分析这个糊涂观念了。倒不如来考察一下用“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这句话表述出来的这个糊涂观念的**起源**吧。

这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原理之一。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原理。它已经成了议会制国家中一切反对修正主义或反对机会主义的人的口头禅。它是大家公认的对“议会迷”，对米勒兰主义，对伯恩施坦主义[35]，对屠拉梯式的意大利改良主义的一种正当而必要的回击。我们的好心的新火星派把这个很好的原理背得烂熟，并且热心地把它运用得……**十分地不恰当**。在针对不存在任何议会的情况而写的决议中，竟提出了议会斗争的范畴。“反对派”这个概念是谁也不会认真地谈到**起义**的那种政治形势的反映和表现，现在却不恰当地搬到起义**已经开始**而且一切拥护革命的人都想着并说着要领导起义这样的形势中来。**正是在**革命已经提出必须在起义胜利时**从上面**行动的问题**的时候**，竟郑重其事地、大叫大嚷地表示要**“始终如一地”**象从前那样行动，即仅仅“从下面”行动。

我们的新火星派真是倒霉极了！他们甚至在表述出正确的社会民主主义原理时，也不会正确地运用这个原理。他们没有想到，在革命已经开始的时期，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在国内战争正进行的时候，在起义正爆发的时候，议会斗争的种种概念和术语都会变成自己的反面。他们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条件下，修正案是通过游行示威提出的，质询是通过武装起来的公民的进攻行动提出的，反对政府是通过暴力推翻政府来实现的。

正象我国民间故事里那个出名的人物[36]总是恰巧在不适当的场合重复他的吉利话一样，我们的马尔丁诺夫的信徒也是恰巧在他们自己都认为直接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的时候，重复着和平的议会主义的说教。在一开头就提到“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人民起义”的决议中，竟煞有介事地提出“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

口号，这真是再可笑不过了！诸位先生，请你们想想吧：在起义时期“持极端反对派态度”，这是什么意思？是揭露政府呢，还是推翻政府？是投票反对政府呢，还是在公开的战斗中击败政府的武装力量？是拒绝为政府补充它的国库呢，还是用革命手段来夺取这个国库，以供起义、武装工人和农民以及召集立宪会议之用？诸位先生，你们是否已经开始了解“持极端反对派态度”这个概念所表现的只是消极的行动，即进行揭露，投票反对，表示拒绝？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个概念仅仅和议会斗争有关，而且是在谁也不把“彻底胜利”当作斗争的直接目的提出的时代才使用的。你们是否已经开始了解：从政治上被压迫的人民为了拼命争取胜利而开始全线坚决进攻的时候起，这方面的情形就根本改变了？

工人们现在问我们，是否要努力进行刻不容缓的起义工作？怎样使已经开始的起义获得胜利？怎样利用这个胜利？胜利的时候可以而且应当实现什么纲领？正在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新火星派回答说：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那么，我们把这些骑士叫做头等庸人，难道不对吗？

注释：

[35] 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 年）一书是对恩伯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59。

[36] 指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中的主人公傻瓜伊万努什卡。这个傻瓜经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有一天，伊万努什卡看到农民在脱粒，就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他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你应该说，但愿你们打也打不完，运也运不完！”第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59。

10．“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没有保持住新《火星报》所采取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立场（仅仅“从下面”行动，而不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行动）。容许起义而不容许胜利和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未免荒谬得太显眼了。因此，决议就给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对问题的解答加上一些附带条件和限制。我们来看看决议在下一段中叙述的这些附带条件：

“实行这种策略（“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当然决不是说，专门为了促使起义扩大和政府瓦解，也不宜于在某一个城市，在某一个地区局部地、暂时地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公社。”

既然这样，那就是说，在原则上不仅容许从下面行动，而且容许从上面行动了。那就是说，尔·马尔托夫发表在《火星报》上（第 93 号）的那篇有名的杂文中所提出的论点被推翻了，而《前进报》的策略，即不仅要“从下面”行动、而且要“从上面”行动的策略，却被承认为正确的了。

其次，夺取政权（哪怕是局部地、暂时地等等）显然不仅要有社会民主党参加，不仅要有无产阶级参加。这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只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积极参加这个革命的也不只是无产阶级。这是因为，如该决议一开头所说的那样，起义是“人民的”起义，参加起义的也有“非无产阶级的集团”（这是代表会议派关于起义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即也有资产阶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

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背叛工人阶级这一原则，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37]，**被代表会议抛弃了**。“背叛”并不会因为构成背叛的行为是局部的、暂时的、地区性的等等而不成其为背叛。这就是说，把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和庸俗的饶勒斯主义等量齐观的观点[38]，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被代表会议**抛弃了**。政府并不因为它的权力达不到许多城市而只及于一个城市，达不到许多地区而只及于一个地区，而不成其为政府；同样，也不会因为它称作什么而不成其为政府。这样，新《火星报》所企图提供的**问题的原则提法，就被代表会议抛弃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代表会议对它现在已在原则上容许的成立革命政府和参加革命政府的主张所提出的那些限制是否合理。“暂时”（“Эпизодический”）这个概念和“临时”（“временный”）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我们不知道。恐怕这里只是在用一个外来的和“新的”词来掩盖缺乏明确的思想这一事实而已。这**看起来**是说得“深奥一点”，其实只是更加暧昧和糊涂罢了。“宜于”在某个城市或某个地区局部地“夺取政权”，这和参加全国的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呢？难道象彼得堡这样发生过 1 月 9 日事件的地方不是一个“城市”吗？难道象高加索这样比许多国家都大的地方不是一个地区吗？关于如何对待监狱、警察和国库等等等等的问题（这些曾使新《火星报》为难的问题），甚至在一个城市里，更不用说在一个地区内，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不是也会摆在我们面前吗？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在起义不能完全成功的时候，在起义得不到彻底胜利的时候，是可能有局部的、城市等等的临时革命政府的。但是，先生们，这和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自己不是在决议一开头就谈到“革命的彻底胜利”和“胜利的人民起义”吗？？从什么时候起社会民主党人竟把无政府主义者的事情揽到自己身上，竟分散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和目标，引导它解决“局部的”问题，而不解决普遍、统一、完整和全面的问题呢？在设想在一个城市“夺取政权”时你们

自己谈到“使起义扩大”，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是扩大到另一个城市中去呢？是否可以希望扩大到一切城市中去呢？先生们，你们的结论和你们的前提一样地靠不住，一样地偶然，一样地矛盾，一样地混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整个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作出了详尽而清楚的回答。这个回答是把一切局部的临时政府也包括在内的。代表会议的回答则人为地随意把问题的**一部分**划分出来，结果只是**回避**（但没有成功）整个问题而且造成混乱。

“革命公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和“临时革命政府”有区别吗？如果有，那么区别在哪里呢？代表会议派先生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革命思想是混乱不清的，结果就象常见的那样，尽说**革命的空话**。的确，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决议中使用“革命公社”这样的字眼，不过是说革命的空话而已。马克思屡次斥责过这种用**早已过时的**“动听的”名词来遮盖未来的任务的空话。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动听的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空洞而有害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变成装饰品。我们必须向工人和全体人民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在将来，在已经开始的人民起义得到胜利的结局而我们对政权有了决定性的影响时，我们要实现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改革**？这就是摆在政治领导者面前的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提出了关于这些改革的完备的纲领，即我们党的最低纲领。而“公社”这个字眼却没有给予任何回答，只是用一种远处的钟声……或空洞的高调来搅乱人们的头脑罢了。我们愈是珍视例如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就愈加不容许只引用它而不分析它的种种错误和特殊条件。这样做就是重复恩格斯所讥笑过的布朗基派的荒谬做法，布朗基派（在他们的 1874 年的“宣言”[39]中）对公社的每个行动都备加崇拜。如果有工人向代表会议派问到决议中提到的**这个**“革命公社”，代表会议派将怎样回答呢？他们只能说，历史上有个工人政府就是这样称呼的，它不善于分清并且当

时也不能分清民主革命成分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分，把争取共和制的任务和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混淆起来，未能解决向凡尔赛实行坚决的军事进攻的任务，犯了不占领法兰西银行的错误，等等。总之，不管你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援引巴黎公社还是援引其他什么公社，你们总会回答说：**我们的政府不应当成为**这样的政府。不用说，这是个很好的回答！然而这样毫不提及党的实践纲领，不适当地在决议中讲授起历史来，难道这不是说明书呆子的说教和革命者的软弱无能吗？难道这不恰好表露出你们枉费心机要归之于我们的那种错误，即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任何一个“公社”都没有把两者辨别清楚）的错误吗？

临时政府（即不适当地被称为公社的临时政府）的目的被宣布为“专门”扩大起义和瓦解政府。“专门”这个字眼，按其本意说来，就是排除其他一切任务，是主张“只从下面”行动的荒谬理论的复活。这样排除其他任务，仍然是目光短浅和考虑欠周。“革命公社”，即革命政权，即使是在一个城市建立的，也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闭眼不看这个问题，就是愚蠢到极点。这个政权要用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人监督工厂的制度，举办免费的普及教育，实行法官选举制，成立农民委员会，等等，——总而言之，它一定要实行许多改革。把这些改革归结为“促使起义扩大”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玩弄字眼，把需要完全弄清楚的问题故意弄得更不清楚。

新火星派决议的结尾部分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新材料来批判我们党内复活了的“经济主义”的原则趋向，但是它从某些不同的角度证实了上面所说的话。下面就是决议的这一部分：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就是说，只有在革命蔓延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相当〈？〉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应当主动地努力夺取政

权，并且尽可能长久地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种情形下，俄国革命有限的历史范围就能大大扩大，那时就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既以自己在整个革命时期对革命进程中一切轮流更换的政府都保持极端革命反对派的态度，作为自己的策略基础，也就能够作好最充分的准备去利用政府权力，如果政府权力落〈？？〉到它手里来的话。”

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进报》屡次表述过的那种思想。《前进报》说过，我们不应当害怕（象马尔丁诺夫那样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请你们看看，这个思想经过新火星派的叙述竟被糟蹋成什么样子。我们不准备谈细节问题，不谈所谓政权可能“落”到一个把夺取政权看作有害策略的自觉的政党手里来的荒唐设想，不谈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而是已经完全成熟，也不谈我们的党纲不提任何社会主义改革，而只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现在谈谈《前进报》的思想和代表会议决议的思想之间所存在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前进报》向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指出了积极的任务：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且利用这个胜利来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决议却不懂得我们的“彻底胜利”（不是新火星派所谓的“彻底胜利”）和欧洲革命之间的这种联系，因而就不提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提**无产阶级**胜利的前途，而是谈一般可能中的一种可能：“在革命蔓延……的时候”。《前进报》直接而明确地指出（而且这些意见已经载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可以怎样和应当怎样“利用政府权力”来谋取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考虑到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可以立刻实现什么，必须首先实现什么，以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民主前提。决议在这里也不可救药地做了事变的尾巴，说“能够作好准备去利用”，但是说不出**怎样**能够，**怎样**作好准备，**怎样**去利用。譬如

说，我们不怀疑新火星派“能够作好准备去利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对这种利用的尝试和他们的准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希望……

《前进报》确切地指出了“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的”现实“可能性”究竟在哪里：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能够压倒一切反革命力量，在于他们二者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利益必然一致。代表会议的决议在这方面也没有提供任何积极的东西，而只是逃避问题。在俄国，保持政权的可能性要取决于俄国本国社会力量的成分，取决于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条件。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而革命传布到欧洲和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二者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定会引起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拼命抵抗，——新火星派的决议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反革命势力，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则估计了这个反革命势力的意义。如果我们除无产阶级以外，不能同时依靠农民来争取共和制和民主制，那么“保持政权”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如果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希望，如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会造成这种可能，那我们就应当指出这种可能，积极地号召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提出实践的口号，不仅用来**应付**革命传布到欧洲的局面，而且**为了**要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去。社会民主党中的尾巴主义者提到“俄国革命有限的历史范围”，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这个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先进作用了解得很有限而已！

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见之一，就是认为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火星报》第 95 号），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个反对意见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是以“统一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为根据的。意志在某一方面统一，而在另一方面不统一，这是常有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意志的

统一，并不排除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的意志的统一。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区别。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的**全民**性质：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统一”，这正是就这个革命是实现全民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间的意志的统一。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这个斗争将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注：资本主义在自由条件下的更广泛、更迅速的发展，必然使意志的统一很快归于结束，而且反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被粉碎得愈快，这种统一就结束得愈快。] 在这里，我们所面临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走向共和制，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走向社会主义。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未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就已经萌芽。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要去最终完成吗？

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这样，我们和资产阶级“合击”的行动就带有暂时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对同盟者，犹如对敌人一样”进行严格的监视，如此等等。对所有这些也是丝毫不能怀疑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忽略或轻视那些对现在来说是迫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和临时的任务，那就是可笑的而且是反动的。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暂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为反动势力效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

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在纲领中提出共和制的要求。那里的形势使这个问题在实践上很难和社会主义问题分开（虽然在德国问题上，恩格斯在评论 1891 年的爱尔福特纲领[40]草案时，曾警告过不要轻视共和制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的意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把共和制的要求从纲领和宣传工作中取消的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谈不到共和制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1898 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专门把共和制的问题当作首要问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会使人惊异，也不会引起非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在 1848 年不提共和制问题，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到一定的时候，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就会结束，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就会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就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

会更详细地谈论这个专政。现在呢，先进阶级的政党却不能不极力设法取得民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而彻底胜利也就不外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附注[41]

（1）请读者回想一下，《火星报》和《前进报》论战时，《火星报》还援引过恩格斯给屠拉梯的一封信。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警告这位意大利改良主义者的（后来的）领袖不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恩格斯在谈到 1894 年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时写道，意大利当前的革命将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14—518 页。——编者注］《火星报》责难《前进报》离开了恩格斯所规定的原则。这种责难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整个说来，《前进报》（第 14 号）［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1—17 页。——编者注］完全承认马克思把 19 世纪革命中三种主要力量区别开来的理论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论，反对旧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的，有（1）自由派大资产阶级，（2）激进派小资产阶级，（3）无产阶级。自由派大资产阶级不过是为立宪君主制而斗争，激进派小资产阶级是为民主共和制而斗争，无产阶级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反之，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能完全保证不犯这个错误。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

注释：

[37] 指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第 13 号和第 14 号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1—17 页和第 18—28 页）。——61。

[38] 这是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他在 1905 年 3 月 17 日（30 日）《火星报》第 93 号登载的《当务之急。工人政党和作为我们当前任务的“夺取政权”》一文里说，“夺取政权”的任务只有两种可以想象的形式：或者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去掌握国家，那就走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极限，那就是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任务的整个分析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从根本上修改我们的纲领；或者是社会民主党参加革命民主政府，那就不妨现在就同我们将与之一道实现“专政”的社会力量建立政治“联盟”，那就需要马上修改我们的策略原则。因此，“或者是最庸俗的饶勒斯主义，或者是否认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让·饶勒斯是法国社会党改良派领袖，他主张社会党人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参加政权。——61。

[39] 指在伦敦的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于 1874 年发表的纲领。参看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一文第 2 节：《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579—587 页）。

布朗基派是 19 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由杰出的革命家路·奥·布朗基领导的一个派别。布朗基派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63。

[40] 爱尔福特纲领是指 1891 年 10 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 1875 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

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63—280 页）。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69。

[41]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第 10 章的附注是列宁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写在另外的纸上的。列宁在附注的手稿中注明："加在第 10 章中"。但该书第一次出版时和 1907 年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都没有加进这个附注。1926 年这个附注第一次发表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5 卷。《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和第 5 版按照上述列宁意见把这个附注收入了该书的正文，放在第 10 章的后面。——69。

1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粗略比较

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是当前社会民主党策略问题的中心。十分详细地分析代表会议其余各项决议，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仅限于简略地指出几点，来证实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代表会议决议在策略方针上的原则区别。

就拿革命前夕对待政府的策略问题来说吧。你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仍然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完整的答案。这个决议估计到特殊时期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和任务：要揭露政府让步的虚伪性，要利用各种"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以八小时工作制为首要要求），以及要反击黑帮。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这个问题是分散在几个地方叙述的："反击黑暗反动势力"，只是在关于对其他政党的态度的决议的引言部分提了一下。参加代表机关选举的问题，是和沙皇政府同资产阶级"妥协"的

问题分开考察的。冠有《关于经济斗争》这个响亮标题的专门决议不是号召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只是重复（在说了一堆关于“工人问题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占有的中心位置”的响亮而很不聪明的话以后）旧的鼓动口号，即所谓“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这个口号现在已经不够和落后了，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用不着再来证明。

关于公开的政治活动的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估计到我们的活动即将**根本**改变的情况。秘密活动和发展秘密机关的工作决不能放弃，放弃这些，就是为警察效劳而且极端有利于政府。但是现在已经不能不考虑公开行动的问题。必须立刻为这种行动**准备好**适当的形式，因而也就必须为此目的**准备好**特别的机关——秘密程度较少的机关。必须利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社团，使它们尽可能变成俄国未来的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基地。

代表会议在这里也把问题弄得很分散，没有提出任何完整的口号。特别令人感到突然的，是十分可笑地委托组织委员会注意“安置”合法的著作家。关于“使那些以协助工人运动为目的的民主报纸服从自己的影响”的决定是十分荒谬的。我国一切合法的自由派报纸按倾向来说几乎全是“解放派”的报纸，都是以此为目的的。为什么《火星报》编辑部自己不首先执行自己的这个建议，给我们作出一个使《解放》杂志服从于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榜样呢？他们没有向我们提出利用合法的社团来建立**党的**基地的口号，而是提出：第一，仅仅涉及“职业”工会的局部性的建议（党员必须参加这些工会），第二，对“革命的工人组织”＝“无定形的组织”＝“革命的工人俱乐部”进行领导的建议。“俱乐部”怎样成了无定形的组织，这些“俱乐部”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有真主才知道。这不是党的最高机关的明确的指令，而是著作家们的一些思想札记和笔记草稿。关于党应当怎样开始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转到全新的基础上的问题，根本没有任何完整的说明。

关于“农民问题”，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代表大会制定了《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会议制定了《关于在农民中的工作》的决议。在前一个决议中，提出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反沙皇制度斗争的全民利益而领导整个广泛的革命民主运动。在后一个决议中，问题仅仅归结为在一个特别的阶层中“工作”。在前一个决议中，提出的鼓动工作的中心实践口号是立刻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来实行一切民主改革。在后一个决议中却说“成立委员会的要求”应当向立宪会议提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待这个立宪会议呢？它真的会成为立宪的会议吗？如果不预先和同时建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立宪会议是否会巩固呢？——所有这些问题，代表会议都忽略过去了。它的一切决议都反映出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一个总的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只应进行自己的专门的工作，而不要希图领导和独立进行整个民主运动。正如“经济派”总是要社会民主党人只进行经济斗争，而让自由派去进行政治斗争一样，新火星派在他们的整个推论过程中也是要我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尽量靠边站，而让资产阶级去积极进行这个革命。

最后，不能不说说双方关于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的是要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切局限性和不充分性，而并不那样幼稚地想列举每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局限性的各种可能的表现并且在好资产者和坏资产者之间划一条分界线。代表会议却重复着斯塔罗韦尔的错误，硬要找出这样一条分界线，发挥其有名的“石蕊试纸”论。斯塔罗韦尔是从一个很好的思想出发：要向资产阶级提出比较严格的条件。他只是忘记了，任何一种想预先把值得赞许、值得与之取得协议等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不值得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分开来的企图，都只能得出一种立刻就会被事变的发展所抛弃并且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起来的“公式”。结果就把重心从斗争中的真正一致转移到声明、诺言和口号上去了。斯塔罗韦尔认为“普遍、平等、

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就是这种根本性的口号。为时还不到两年，“石蕊试纸”已经证明自己毫不中用，普选制的口号已经被解放派接受过来，但是解放派不仅没有因此而接近社会民主党，反而企图利用这个口号来迷惑工人，引诱工人离开社会主义。

现在，新火星派提出了更“严格的”“条件”，“要求”沙皇制度的敌人“坚韧不拔地和毫不含糊地〈！？〉支持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坚决行动”等等，一直到“积极参加人民自我武装的事业”。分界线是划得更远得多了，但是这条分界线**又已经陈旧了**，一下子就证明了自己毫不中用。比方说，为什么不提出共和制的口号呢？社会民主党人为着“用无情的革命战争来反对等级君主制度的一切基础”，“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派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唯独不要求他们为共和制而斗争，这是怎么回事呢？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有意挑剔，新火星派的错误确实具有最实际的政治意义，“俄国解放联盟”就是证明（见《无产者报》第 4 号）[注：在 1905 年 6 月 4 日出版的《无产者报》第 4 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的长篇论文（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265—276 页。——编者注）。这篇论文转述了这个联盟所发表的宣言的内容，这个联盟采用了“俄国解放联盟”的名称，并且说它的宗旨是通过武装起义来召集立宪会议。其次，在这篇论文中确定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这种非党的联盟的态度。至于这个联盟的实际情形如何，它在革命中的命运怎样，我们就全不知道了。（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这些“沙皇制度的敌人”完全能适应新火星派的一切“要求”。可是我们已经指出，这个“俄国解放联盟”的纲领中（或者在其无纲领的立场中）充满了解放派的精神，解放派是能够很容易地牵着它走的。而代表会议在决议的末尾一段中声称，“社会民主党将照旧象反对**虚伪的人民之友**一样，反对所有一切打着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旗帜、但是拒绝真正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政党”。“俄

国解放联盟”不仅不拒绝，而且热心地表示愿意给予这种支持。这是否就能担保它的领袖们即使是解放派但却不是“虚伪的人民之友”呢？

由此可见，新火星派预先臆造出一些“条件”，提出一些虚张声势的滑稽可笑的“要求”，这就立刻使他们自己陷于可笑的地位。他们的条件和要求一下子就显得不能适合活生生的现实。他们那种追逐公式的狂热是徒劳的，因为任何公式都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伪、不彻底以及局限性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包罗无遗。问题并不在于“石蕊试纸”，并不在于公式，并不在于写印成文的要求，并不在于预先区分开虚伪的“人民之友”和非虚伪的“人民之友”，而是在于斗争中的真正一致，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每一个“不坚定的”步骤都进行坚持不懈的批评。为了“真正团结一切关心民主改造的社会力量”并不需要象代表会议那样勤勤恳恳、那样白费力气地规定种种“条款”，而是要善于提出真正革命的口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把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的口号，而不是把无产阶级任务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水平的口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参加起义，而不是用说教的方式来推脱刻不容缓的武装起义的任务。

12．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上面各节写好以后，我们收到了《火星报》出版的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会议的决议。对于写出一个好的结尾（pour la bonne bouche），我们真是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材料了。

《火星报》编辑部很公正地指出：“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高加索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和全俄代表会议（即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相似的**（老实话！）决议。”“在社会民主党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问题上，高加索的同志所通过的决

议，坚决反对《前进报》集团以及附和它的所谓代表大会代表们所宣传的新方法。”“应该承认代表会议**非常恰当地**表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

真的，的确如此。对于新火星派的根本错误，真是谁也不能够比这表述得更“恰当”了。我们现在把这段表述全部抄录下来，先在括弧中指出花朵，然后再指出末尾结出的果实。

下面就是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会议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

*“代表会议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革命时机来加深〈当然啦！不过还要加上一句：用马尔丁诺夫精神来加深！〉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是用来加深意识，而不是用来争取共和制吗？这是对革命的多么“深刻的”见解啊！〉，而为了保证党对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有最充分的批评自由〈保证共和制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只是保证批评自由。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产生无政府主义的语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代表会议反对成立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并反对参加这个政府〈请回想一下恩格斯所引证的、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革命之前10个月作出的决议，见《无产者报》第3号[42]〉，而认为最适宜的是从外面〈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使国家制度达到尽可能的〈？！〉民主化。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临时政府或加入这个政府，一方面会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对社会民主党失望而离开这个党，因为社会民主党虽然夺得政权，但是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直到包括实现社会主义〈共和制不是迫切需要！决议起草人竟天真得没有觉察到他们是在用纯粹无政府主义的语言说话，仿佛他们对参加资产阶级革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

这就是症结所在。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十足的机会主义思想交错（如同在西欧的伯恩施坦派中常见的一样）的地方。请看：不要加入临时政府，因为加入临时政府就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完全是纯粹而

彻底的新火星派哲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应当崇敬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给这种思想让路。如果我们按照——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钟——我们参加临时政府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这样一种想法行事，那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让给资产阶级。我们会因此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虽然还保留了充分的“批评自由”!!），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温和柔顺的态度。我们会阉割掉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需要，即经济派及其仿效者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了解的政治需要，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阉割这些需要。我们会完全离开在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范围内为实现民主制而进行革命斗争的立场，而转到和资产阶级搞交易的立场，以背叛原则、背叛革命来换取资产阶级的欣然同意（“不致退出”）。

高加索的新火星派在短短的几行文字中就把叛卖革命、变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可怜走卒的策略的全部实质表明了。我们在上面从新火星派的错误中看到的倾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明确的原则：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因为实现共和制会迫使（而且已经迫使——司徒卢威先生就是一例）资产阶级退出，所以要取消争取共和制的斗争。因为无产阶级的任何一个坚决而彻底的民主要求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所以工人同志们啊，还是躲在你们的窝里吧，只要从外面行动，可别想为了革命去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种种工具和手段，给自己保留着“批评自由”就行了。

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的根本性的错误理解在这里已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马尔丁诺夫或新火星派对这个名词的“理解”会直接造成把无产阶级事业出卖给资产阶级的结果。

谁忘记了旧时的“经济主义”，谁不去研究它，不去回想它，谁就很难了解现在复活起来的“经济主义”。请回想一下伯恩施坦主义的《信条》[43]吧。当时人们从“纯粹无产阶级的”观点和纲领中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要经济，

只管真正的工人事业，只要批评任何政客手腕的自由，只管真正加深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政治还是让他们自由派去干吧。愿上帝保佑我们别陷入"革命主义"，因为这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谁要是全文读了《信条》或《工人思想报》第 9 号增刊[44]（1899 年 9 月），谁就可以看出这一整个的推论过程。

现在还是这一套，只是范围很大，被用来估计整个"伟大的"俄国革命——唉，这个革命事先就已经被正统庸俗主义的理论家们给庸俗化和降低到滑稽可笑的地步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需要批评自由，加深意识，从外面行动。他们资产阶级却要有行动的自由、从事革命领导（应读作：自由主义领导）的自由和从上面实行"改良"的自由。

这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从来没有思索过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的话［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 460 页。——编者注］。他们盗用马克思的名义，其实，他们在草拟策略决议的时候完全是在模仿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空谈家，这些空谈家自由地批评专制制度，加深民主意识，但是不懂得革命时期是行动的时期，是既从上面又从下面行动的时期。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空洞的说教，于是就把最坚定、最积极的先进革命阶级的思想变成了这个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的思想，即那些逃避困难的革命民主主义任务而把这些任务交给司徒卢威先生们去执行的最落后阶层的思想。

资产阶级一旦因社会民主党加入革命政府而退出革命，那就会"缩小革命的规模"。

俄国工人们，听吧：如果革命是由那些不想战胜沙皇制度而只想和它搞交易的、没有被社会民主党人吓退的司徒卢威先生们来进行，革命的规模就会更大。如果我们前面所概述的俄国革命两种可能结局中的前一种结局得以实现，就是说，如果君主派资产阶级和专制政府能在希波夫式的"宪法"上做成交易，革命的规模就会更大！

在指导全党的决议中写出这样可耻的东西或者赞扬这些“恰当的”决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被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精神全部腐蚀掉的空洞说教弄得头昏眼花，竟看不出这些决议怎样把他们的其他一切好话都变成了空谈。翻开他们在《火星报》上写的任何一篇文章，甚至翻开我们的鼎鼎大名的马尔丁诺夫所写的那本臭名远扬的小册子，都可以看到关于举行**人民**起义，把革命进行**到底**，力求依靠**人民下层**来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斗争一类的言论。但是，当你们接受或者赞扬关于“革命的规模”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的思想时，所有这些好的东西就立刻变成可怜的空谈了。先生们，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应当和人民一起去努力实现革命，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完全胜利，而**不考虑**那个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或者是我们不容许这种“不考虑”，而惟恐资产阶级“退出”，那我们就是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出卖给资产阶级，出卖给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和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

请不要曲解我的话。请不要叫喊什么有人指责你们自觉地出卖。不，你们向来都是不自觉地爬往泥潭，而且现在已经爬进了泥潭，正象旧时的“经济派”那样沿着“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斜坡不可遏止地、不可逆转地滑到专门从事反对革命的、没有灵魂和没有生气的“卖弄聪明”的地步。

先生们，“革命的规模”取决于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不谈国外政治即国际配合方面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现在发展得很有利于我们，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去考察它们，而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俄国内部力量的问题。请看看这些内部的社会力量吧。反对革命的是专制政府、宫廷、警察、官吏、军队和一小撮显贵人物。人民中的义愤愈深，军队就愈不可靠，官吏中的动摇就愈大。其次，资产阶级现在整个说来是赞成革命的，他们热心地谈论自由，愈来愈频繁地以人民的名义、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发表意见。[注：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司徒卢威先生给饶勒斯的公开信。这封信不久以前由饶勒斯刊登

在《人道报》[45]上，由司徒卢威先生刊登在《解放》杂志第 72 期］但是，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从理论中知道，并且每日每时都从我国的自由派即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的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只要资产阶级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要走的路程远远超过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就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别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愚蠢意见。农民中有大批的半无产者，同时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使得它也不稳定，因而迫使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的阶级性的党。但是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不同，因为农民现在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无条件地保护私有制，不如说是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农民虽然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而不再成为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能够成为完全而又极其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给农民以教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因资产阶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过早地中断，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在上述条件下，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因为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这里所说的必需，（并不象“社会革命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从半农奴制的泥潭中，从被压抑、被奴役的黑暗的深渊中跳出来，为了在商品经济可能的限度内尽量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此外，不仅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经常的一切利益，都使农民趋向于革命。农民甚至在和无产阶级作斗争时也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体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以群众资格，以多数资格取得优势。农

民受到的教育愈多（而从对日战争以来，他们迅速地受到教育，其迅速程度是许多惯于只用学校尺度来衡量教育程度的人所想象不到的），他们就会愈彻底、愈坚决地拥护完全的民主革命，因为他们并不象资产阶级那样害怕人民的统治，相反，人民的统治对他们是有利的。农民一开始摆脱幼稚的君主主义，民主共和制就会立刻成为他们的理想，因为惯于做经纪人的资产阶级那种自觉的君主主义（连同参议院等等），对农民来说是要他们照旧处于没有权利、备受压抑和愚昧无知的地位，只不过把这种地位用欧洲宪制的油漆来稍稍涂饰一下而已。

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就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自由主义君主派的保护，而农民群众却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革命共和派的领导。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农民却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帮助农民这样做。

有人会反驳我说：这用不着证明，这是起码的常识，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非常了解的。不，这是那些居然说革命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规模”的人所不了解的。这样的人重复着我们土地纲领中被他们背得烂熟的话，但是不懂得这些话的含义，否则他们就不会害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必然要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我们的纲领中产生出来的概念了，否则他们就不会用资产阶级的规模来限制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规模了。这样的人是在用自己的具体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的决议来推翻自己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词句。

谁真正了解农民在胜利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谁就不会说革命的规模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姿态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开始具有真正的规模；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我们的民主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那些能够麻痹资产阶级的必不可免的不

彻底性的力量（也就是那些恰恰能够“迫使它退出”的力量，《火星报》的高加索信徒们因为认识肤浅而对此感到害怕）。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

不过不要忘记在谈论革命的“规模”时往往被忽略的一种情况。不要忘记，这里谈的并不是任务方面的困难，而是通过什么道路去求得任务的解决。这里谈的并不是使革命具有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规模是否容易做到，而是应当怎样设法扩大革命的规模。意见分歧所涉及的恰恰是行动的根本性质，是行动的方针。我们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不细心或不诚实的人往往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一个是关于道路的方向的问题，即从两条不同的道路中选择一条的问题；另一个是在选定的道路上目的是否容易达到或是否能很快达到的问题。

我们在上面完全没有涉及这后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没有引起争论和分歧。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值得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给予极大的注意。忘记不仅吸引工人阶级群众，而且吸引农民群众加入运动这件事情会遇到种种困难，这是一种不可容许的乐观主义。正是这种困难不止一次地断送了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努力，而使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获得最大的胜利：既“获得”一笔借君主制来抵御人民的“资本”，又“保持了”自由主义……或“解放派”的“清白”。但是有困难并不等于无法实现。重要的是相信道路选择得正确，这种信心能百倍地加强革命毅力和革命热情，有了这样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热情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至于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选择道路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严重到什么程度，只要把高加索新火星派的决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比较一下就马上可以看出来。代表大会的决议说：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它一定会竭力把我们手里的革命成果抢走。因此，工人同志们，要更加努力地准备斗争，要武装起来，要把农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我们决不会不经过战斗而把我们的革命成果让给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高加索新火星派的决议说：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它可能退出革命。因此，工人同志们，请不要考虑参加临时政府，否则资产阶级一定会退出，革命的规模会因此而缩小！

一些人说：你们要把革命推向前进，进行到底，而不要去考虑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起来反抗或采取消极态度。

另一些人说：你们不要去考虑独立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否则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

这难道不是两条根本相反的道路吗？这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策略，前一种策略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后一种策略实质上纯粹是解放派的策略，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注释：

[42] 《无产者报》第 3 号发表了列宁的《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的第二篇（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232—240 页）。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 1873 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521—540 页）。——77。

[43] 《信条》是经济派于 1899 年写的一个文件。它极其明显地表明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信条》的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成员。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收到他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条》之后，于 1899 年 8 月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经济派的这个文件和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4—156 页）。与会者 17 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所以也称 17 人抗议书。《抗议书》引用了《信条》的全文。——78。

[44] 《〈工人思想报〉增刊》是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于 1899 年 9 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特别是其中署名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公开散布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等著作中（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209—238 页和第 6 卷第 1—183 页）对这本小册子进行了批判。——78。

[45] 《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 1904 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 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 1920 年 12 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81。

13．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很肤浅的人，或者不知道我们党内从“经济主义”时期以来的全部斗争历史而从旁判断的人，还往往只是简单地援引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中都有两种自然而然的、必不可免的、彼此完全可以调和的倾向，来说明现在（特别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明朗化的策略分歧。据说，一方面是特别强调寻常的、目前的、日常的工作，强调必须展开宣传和鼓动，必须准备力量，加深运动等等；另一方面是强调运动的战斗的、一般

政治的、革命的任务，指出武装起义的必要，提出革命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无论对哪一方面都不应当夸大，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地方），都不宜走极端，如此等等。

这类议论中无疑含有一些处世（以及带引号的“政治”）秘诀的廉价真理，但是这种真理往往掩盖着人们对党的迫切紧急需要的无知。就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现在的策略分歧来说吧。新火星派谈论策略问题时特别强调日常的普通工作，这件事本身当然还不会造成任何危险，也不会引起策略口号方面的任何分歧。但是，只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代表会议的决议比较一下，这种分歧就一目了然了。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第一，仅仅笼统地、抽象地指出运动中的两个潮流和各走极端的害处，是不够的。必须具体地弄清，当前的运动在当前的时期有什么弱点，对党来说，现在实际的政治危险究竟在哪里。第二，必须弄清，这些或那些策略口号（也许是缺乏这些或那些口号），对哪些实在的政治力量有利。你们假如听信新火星派的话，就会得出一种结论，以为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危险是抛弃宣传鼓动工作，抛弃经济斗争和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批评，而过分迷恋于军事训练、武装进攻、夺取政权等等。实际上，党所面临的实际危险完全是来自另一方面。凡是稍微熟悉一些运动的情况、仔细地和用心地观察运动的人，都不能不看到新火星派这种恐惧心理的可笑之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工作已经完全纳入了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这个范围绝对能保证把工作重心集中于宣传和鼓动，集中于飞行集会和群众集会，集中于散发传单和小册子，集中于促进经济斗争和支持经济斗争的口号。没有一个党委员会，没有一个区委员会，没有一个中心会议，没有一个工厂小组不是经常不断地用百分之九十九的心思、力量和时间，去执行所有这些早在 90 年代后半期就已经确定的职能。只有完全不了解运

动情况的人才不知道这一点。只有很幼稚的人或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真正相信新火星派特别郑重其事地重弹的老调。

事实是我们不但没有过分迷恋于起义的任务、一般政治口号、对整个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反而正好是在这方面落后得特别显眼，这是最大的弱点，是能使运动由真正的革命运动蜕化（并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蜕化）为口头的革命运动的实际危险。在完成党的工作的成百成千的组织、团体和小组中，没有一个不是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从事于被新《火星报》中的聪明人当作新发现的真理而大谈特谈的那种日常工作。相反，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团体和小组已经认识到武装起义的任务，已经着手执行这些任务，已经明白必须领导整个反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已经明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提出正是这样的而不是别的先进口号。

我们已经令人难于置信地落在先进的和真正革命的任务后面，在许多场合下，我们甚至还没有认清这些任务，我们往往没有觉察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落后而加强起来的事实。但是新《火星报》的作家们完全不顾事变的进程和时势的要求，固执地一再重复说：对旧的不要忘记！对新的不要迷恋！这是代表会议所有一切重要决议中的一个始终不变的基调，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却始终贯穿着这样的思想：确认旧的东西（但是不翻来复去地说它，因为它是已经由出版物、决议和经验解决了和确定了的旧东西），同时又提出新的任务，注意这个新任务，提出新的口号，要求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立刻为实现这个新口号而工作。

社会民主党在策略方面分成两派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如此。革命的时代提出了只有十足的瞎子才看不见的新的任务。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坚决承认这些任务，并把这些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武装起义刻不容缓，要立刻努力地准备它，要记住它是彻底胜利所必需的，要提出共和制、临时政府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等口号。另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却往后退缩，踏步不前，不是提出口号而是

一味论述引言，不是在确认旧的东西的同时还指出新的东西，而是长篇大论、枯燥无味地翻来复去谈论这种旧东西，制造借口来拒绝新东西，不能确定彻底胜利的条件，不能提出唯一符合于达到完全胜利的愿望的口号。

在我们这里，这种尾巴主义的政治上的结果已经表现出来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的流言，始终只是流言而已，因为没有一件政治事实，没有一个权威的“布尔什维克”决议，没有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可以证实这种流言。然而，以《解放》杂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却老早就在**欢迎**新火星派的“原则”趋向，现在更直接利用他们的水来推动自己磨，采纳他们的一切字眼和“思想”来反对“秘密活动”和“骚乱”，反对夸大革命的“技术”方面，反对直接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反对提出极端要求的“革命主义”，如此等等。高加索“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整个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以及新《火星报》编辑部赞同这个决议的事实，对这一切作了一个毫不含糊的政治总结：不要让资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民主专政而退出啊！这就道破了一切。这就最终确定了把无产阶级变为君主派资产阶级走卒的方针。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了——不是由某一个人的偶然的声明，而是由整个派别特别赞同的决议证明了新火星派尾巴主义的**政治意义**。

谁要是好好地想想这些事实，他就会懂得社会民主运动有两个方面和两种趋向这一流行说法的真正意义。试以伯恩施坦派为例在更大范围内来研究一下这两种趋向。伯恩施坦派就是一直在一字不改地硬说，只有他们才了解无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了解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加深全部工作、准备新社会的因素以及进行宣传和鼓动等任务。我们要求公开承认现有的东西！——伯恩施坦这样说，因而也就是推崇**没有**“最终目的”的“运动”，推崇单一的防御策略，鼓吹“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恐惧策略。伯恩施坦派也曾大喊大叫，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推行“雅各宾主义”，说“著作家”不懂“工人的主动性”，如此等等。其实任何人

都知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抛弃日常的细小的工作、准备力量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们仅仅要求清楚地了解最终目的，明确地提出革命任务；他们是想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者阶层提高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上来，而不是想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降低为“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这种机会主义的考虑。最突出地表现党内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这一分歧的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问题：dürfen wir siegen？“我们敢不敢胜利？”[46]我们取得胜利是不是容许的？我们取得胜利有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争取胜利？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很奇怪，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必定会提出来，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胜利，恐吓无产阶级，不让它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会引起种种不幸，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

我们这里也是基本上可以划分为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趋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趋向，不过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这里所谈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革命。我们这里也提出了这个初看起来似乎很荒谬的问题：“我们敢不敢胜利？”这个问题是马尔丁诺夫在他的《两种专政》中提出的，他在那本书里预言：如果我们很好地准备起义，并且十分顺利地实现起义，那就会遭到种种不幸。这个问题在新火星派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一切文献中都提出过，而且他们总是极力企图把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府和瓦尔兰参加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府[47]混为一谈，虽然这种企图并没有成功。这个问题由主张“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决议确定下来了。尽管考茨基现在冷嘲热讽，说我们在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的争论，就象还没有把熊打死就要分熊皮一样，但是这种讥讽只是表明，如果就道听途说的事情发表意见，甚至聪明的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会陷入窘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不能很快就打死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关于“敢不敢”打死这只熊的争论已经具有巨大的原则意义和政治实践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不能很快就“打死自己的熊”（实现民主革命），但是我们“敢

不敢”打死这只熊的问题，对于俄国的整个未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没有我们“敢于”胜利的信心，就根本谈不到努力而成功地去聚集军队，领导军队。

就拿我们的旧“经济派”来说吧。他们也曾大喊大叫，说他们的论敌是密谋家，是雅各宾派（见《工人事业》，特别是第 10 期，以及马尔丁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48]讨论党纲时的发言），说这些人因投身于政治而脱离群众，说这些人忘记了工人运动的基础，无视工人的主动性，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些拥护“工人的主动性”的人，都是些把自己对无产阶级任务的狭隘而庸俗的见解强加于工人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实际上，谁都可以从旧《火星报》上看到，反对“经济主义”的人并没有放弃或者轻视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任何一个方面，丝毫没有忘记经济斗争，同时又善于尽可能广泛地提出当前的紧急的政治任务，反对把工人政党变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经济”附属品。

经济派背熟了政治以经济为基础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政治斗争降低为经济斗争。新火星派背熟了民主革命按其经济基础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降低到资产阶级温和立场的水平，降低到不使“资产阶级退出”的限度。“经济派”打着加深工作的幌子，打着工人的主动性和纯粹的阶级政策的幌子，事实上把工人阶级交给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政治家去支配，即把党引上一条正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现在新火星派也打着同样的幌子，事实上是要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出卖给资产阶级，即要把党引上一条正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经济派”认为领导政治斗争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自由派份内的事情。新火星派认为积极实现民主革命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民主派资产阶级份内的事情，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起最重要作用的参与会使革命的“规模缩小”。

总而言之，新火星派不仅就他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起源来说是“经济主义”的后裔，而且就他们现在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任务的提法来说也是“经济主义”的后裔。他们也是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在组织方面，他们从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开始，以“破坏－过程”而告终，他们在代表会议所通过的“章程”[49]中，明文规定了党的出版物脱离党组织的制度，规定了几乎是四级的间接选举制，规定了波拿巴主义的全民投票制以代替民主的代表制，最后还规定了部分和整体实行“协商”的原则。在党的策略方面，他们也是沿着同样的斜坡滚下去的。他们在“地方自治运动的计划”中，把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发表讲话叫作“高级形式的示威”，认为政治舞台上只有两种积极力量（是在 1 月 9 日事件前夜！）即政府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加深了”武装起来的迫切任务，把这个直接的实践的口号换成所谓用自我武装的热望武装起来的号召。对武装起义、临时政府、革命民主专政等任务，他们现在都在自己的正式决议中加以曲解和磨掉锋芒。“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决议的结语，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们那条道路要把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仅仅重复这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够的。要善于理解它，要善于把它应用在政治口号上。总的说来，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全部政治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自由这一要求首先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最先提出了这个要求。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到处都以主人的资格来利用所得到的自由，把它局限在温和谨慎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在和平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最精巧的手段配合起来，在风暴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手段配合起来。

但是，只有骚乱派－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和“经济派”才能因此否定或贬低争取自由的斗争。强迫无产阶级接受这种知识分子庸俗学说的企图，往往只能

得逞于一时，而且要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总是本能地觉察到，政治自由虽然会直接把资产阶级加强起来和组织起来，然而它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最需要的东西。无产阶级拯救自己的道路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是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定性。谁贬低政治斗争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代言人变为工联书记。谁贬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革命的领袖变为自由工会的头目。

是的，是**人民**革命。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滥用人民一语。它要求人们不要利用这个字眼来掩盖自己对人民内部的阶级对抗的无知。它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的党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但是它把“人民”分为各个“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考虑不让世界的经济主人退出而阉割自己的活动，而是要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奋斗。

这就是现在的新火星派常常不理解的道理，他们不是提出民主革命中的积极的政治口号，而只是说教式地重复“阶级的”这个词，把这个词的用法变来变去！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土地平分或土地与自由的口号，这个在备受压抑、愚昧无知、但渴望光明和幸福的农民群众中流行最广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作为先进的和唯一革命的阶级的代表，作为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的革命阶级的代表，我们应当尽可能广泛、尽可能大胆、尽可能主动地向全体人民提出民主革命

的任务。贬低这些任务，就是在理论上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的歪曲，而在政治实践上是让一定会避开彻底实现革命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去支配革命事业。在到达革命完全胜利的道路上，困难是很大的。如果无产阶级的代表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而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因反动势力的抵抗、资产阶级的背叛和群众的愚昧无知而失败，那谁也不能谴责他们。可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因害怕胜利，因考虑不让资产阶级退出而削弱民主革命的革命力量，削弱革命热情，那所有的人，首先是觉悟的无产阶级，都是要谴责它的。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99 页。——编者注］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政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主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让“解放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们因害怕革命、害怕走直路而去臆造迂回曲折的妥协道路吧。如果我们将被迫沿着这样的道路慢慢地拖着步子走，那我们也能在细小的日常工作中尽自己的责任。但是，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吧。如果我们不利用群众这种盛大节日的活力及其革命热情来为直接而坚决的道路无情地奋不顾身地斗争，我们就会成为背叛革命和出卖革命的人。让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们心惊胆战地去考虑将来的反动吧。工人既不会为反动势力要实行恐怖手段的思想所吓倒，也不会为资产阶级要退出的思想所吓倒。工人并不期待做交易，并不乞求小恩小惠，他们力求无情地粉碎反动势力，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不用说，在风暴时期，比起自由主义缓慢进步的风平浪静的“航行”时期，即工人阶级忍着痛苦让剥削者们慢慢榨取自己的血汗的时期，我们的党的航船遇到的危险会更多。不用说，革命民主专政的任务要比“持极端反对派态度”和单纯议会斗争的任务困难千倍，复杂千倍。但是，谁要在当前的革命时期故意选择平稳的航行和安全的“反对派”的道路，那最好是请他暂时放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请他去等待革命结束，等待盛大节日过去，等待寻常的生活重新开始，那时，他那种寻常的狭小的尺度就不会显得这样令人作呕地不协调，就不会这样丑恶地歪曲先进阶级的任务。

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来为充分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奋斗！领导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来为社会主义奋斗！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应当是这样；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应当用来贯彻和决定每一个策略问题和每一个实际步骤的阶级口号就是这样。

注释：

[46] 《我们敢不敢胜利？》是卡·考茨基于 1899 年 9 月发表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第 3 章第 3 节的标题。列宁曾把考茨基的这一著作翻译成俄文。1905 年，李沃维奇出版社用《考茨基论文集》为名，出版了它的部分章节，没有署译者的名字。1906 年该书再版时标明为列宁译。——91。

[47] 指法国工人运动和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路易·欧仁·瓦尔兰于 1871 年参加巴黎公社委员会一事。——92。

[4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03 年 7 月 17 日（30 日）—8 月 10 日（23 日）召开。7 月 24 日（8 月 6 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 13 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 24 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订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1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

托夫派 9 票，“泥潭派”10 票，反火星派 1 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 20 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 24 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 1903 年开始的。”（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9 卷第 4 页）——92。

[49] 指 1905 年孟什维克的日内瓦代表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和《〈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229—308 页和本卷第 151—157 页）中也批判了这个章程。——93。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解放》杂志第 71—72 期和《火星报》第 102—103 号，给我们在本书第 8 节中所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新材料。我们在这里决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丰富的材料都利用起来，我们只谈谈最主要的：第一，《解放》杂志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哪一种“现实主义”，它为什么要称赞这种“现实主义”；第二，革命和专政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

一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和《理智的胜利》这两篇文章（《解放》杂志第 72 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社会民主党作的判断，这个判断对觉悟

的无产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应当向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大力推荐这两篇文章，让他们从头到尾读一遍，并且**仔细考虑**其中的每一句话［注：手稿上下面的话已被勾掉：“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现代敌人中的）最可恶的、最强大的（在现代社会中）和最机智的敌人作出的判断，是使社会民主党人本身受到政治教育的最宝贵的材料。”——俄文版编者注］。我们先把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论点转抄如下：

“对局外人来说，——《解放》杂志说道，——要弄清使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两派的意见分歧的真实政治意义是相当困难的。说‘多数派’是更激进的和直线式的，而‘少数派’则为了事业的利益容许作某些妥协，这并不完全确切，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全面的评语。至少，少数派也许比列宁派更热心地遵守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传统教条。我们觉得下面这样的评语更加确切。‘多数派’的基本政治情绪是抽象的革命主义，骚乱主义，趋向于不择手段地在人民群众中发动起义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来立刻夺取政权；这就使‘列宁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起来，用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排挤掉他们意识中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列宁派’虽然在实践上屏弃了社会民主党学说中的许多狭隘成分，但是同时又浸透了革命主义的狭隘性，除了准备立刻起义以外，他们拒绝进行任何其他实际工作，原则上蔑视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鼓动工作，蔑视一切实际有益的同其他反对派别的妥协。与此相反，少数虽然固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同时也保存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这一派的基本思想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又能以现实态度清醒地——当然是在社会民主党不可动摇的教条所要求的一定限度内——考虑无产阶级的斗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斗争的一切具体条件和任务。两派都不是充分彻底地贯彻自己的基本观点，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思想政治创作活动中受到社会民主党教义问答的严格公式的拘束，这些公式妨碍‘列宁派’成为至少象某些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直线式的骚乱派，同时这些公式又妨碍‘火星派’成为工人阶级现实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解放》杂志的著作家接着引述了几个主要决议的内容，同时就这些决议发表了几点具体意见来说明他的总的“思想”。他说，和第三次代表大会比较起来，“少数派代表会议是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武装起义的”。“由于对武装起义的态度不同”，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也就互不相同。“同样的意见分歧在对工会的态度上也暴露出来了。‘列宁派’在他们的决议中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和组织工人阶级的这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反之，少数派却制定了很郑重的决议。”在对自由派的态度方面，据说两派意见一致，但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普列汉诺夫提案通过的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的决议，并否决了同一个代表大会根据斯塔罗韦尔提案通过的对自由派比较友善的决议”。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双方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虽然大体相同，“但是‘多数派’更强调用革命手段没收地主等人的土地的思想，而‘少数派’却想把要求实行国家和行政方面的民主改良当作鼓动工作的基础”。

最后，《解放》杂志从《火星报》第100号上引证了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其主要条文是：“鉴于现在单靠地下工作已不能保证群众充分地参加党的生活，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使群众和党这个秘密组织对立起来，所以党必须对工人在合法基础上进行的工会斗争加以领导，并且把这个斗争和社会民主主义任务紧紧地联系起来。”《解放》杂志在评论这个决议时喊道：“我们热烈欢迎这个决议，它是理智的胜利，是社会民主党内一部分人有了策略上的省悟的表现。”

现在读者已经看到了《解放》杂志的一切重要判断。如果以为这些判断符合客观真理，那当然是极端错误的。从这些判断中，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不难随时发现错误。如果忘记所有这些判断都浸透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忘记这些判断从头到尾充满了这种性质的偏袒和成见，那就是幼稚。这些判断反映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正如凹镜或凸镜反映物体一样。但是，如果忘记，这些资产阶级的歪曲的判断归根到底反映资产阶级的真正利益，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

级无疑能够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哪些趋向对它——资产阶级——有利，和它亲近，和它有血缘关系，为它所喜爱，哪些趋向对它有害，和它疏远，和它不相容，为它所嫌恶，——如果忘记这一点，那就更加错误了。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或资产阶级的政论家，永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多少明白一些事理的政论家，那么他的阶级本能就不会欺骗他，他总是能够从实质上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或那个派别对资产阶级的意义，尽管他会作出歪曲的说明。因此，我们的敌人的阶级本能，他所作的阶级判断，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每一个觉悟的无产者予以极大的注意。

那么，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借解放派之口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呢？

它十分明确地表示它对新火星派的趋向满意，称赞新火星派的现实主义、头脑清醒、理智的胜利、决议的郑重、策略上的省悟、讲求实际等等，同时它又十分明确地表示它对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趋向不满意，斥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狭隘性、革命主义、骚乱主义、否定实际有益的妥协等等。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恰巧使它觉察到我们的书刊中用最准确的材料再三证明过的事情，即新火星派是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而他们的反对者是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自由派不能不同情前者的趋向，也不能不斥责后者的趋向。自由派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非常了解，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工人阶级的“讲求实际、头脑清醒和态度郑重”，即事实上把它的活动场所限制在资本主义、改良和工会斗争等等的范围内。对资产阶级危险而可怕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的狭隘性”，是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任务而努力争当俄国全民革命的领导者。

“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解放派心目中的含义确实是这样的，这从《解放》杂志和司徒卢威先生过去对这个名词的用法中也可以看出来。《火星报》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解放派的“现实主义”有**这样的**含义。例如，请回想一下《火星报》

第 73—74 号附刊上那篇题为《是时候了!》的文章吧。该文作者（他一贯地体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泥潭派”[50]的观点）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阿基莫夫在代表大会上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机会主义真正代表者的作用，不如说是机会主义幽灵的作用”。《火星报》编辑部不得不立刻来纠正《是时候了!》一文作者的说法，它在附注中宣称：

“我们不能同意这个意见。阿基莫夫同志在纲领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标记，这是《解放》杂志的批评家也承认的。这位批评家在该杂志最近一期上说，阿基莫夫同志归附于‘现实主义的’——应读作：修正主义的——派别。”［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说明：“(参看《前进报》出版的传单《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9 卷第 55—58 页。——编者注)。——俄文版编者注］

可见，《火星报》自己十分清楚，解放派的“现实主义”就是机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火星报》现在在攻击“自由派的现实主义”(《火星报》第 102 号）时，丝毫不提**自由派称赞过它的**现实主义的事实，这是因为这种称赞比任何斥责都要辛辣。这种称赞（《解放》杂志的这种称赞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实际上证明了自由派的现实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现实主义”(应读作：机会主义）趋向，即新火星派因其整个策略立场的错误而在他们的每一个决议中显示出来的那种趋向，是有血缘关系的。

其实，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暴露了它在“全民”革命中的不彻底和自私自利——既暴露于司徒卢威先生的议论中，又暴露于大批自由派报纸的全部论调和内容中，还暴露于大批地方自治人士、大批知识分子以及所有一切站在特鲁别茨科伊、彼特龙凯维奇、罗季切夫等等先生们一边的人们的政治言论的性质上。资产阶级当然并不总是清楚地了解，但是总的说来，凭着自己的阶级嗅觉却能很好地领悟到：一方面，无产阶级和“人民”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有用的，就是说，

可以把他们当作炮灰，当作摧毁专制制度的攻城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并且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对它又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尽一切力量来使无产阶级满足于在革命中起“微弱的”作用，使无产阶级清醒些、实际些、现实些，使无产阶级的活动以“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原则为标准。

有学识的资产者非常清楚，工人运动是他们摆脱不了的。因此，他们绝不反对工人运动，绝不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他们甚至极力赞美罢工自由，赞美文明的阶级斗争，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解为布伦坦诺式或希尔施—敦克尔式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完全愿意把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事实上是工人自己差不多已经争得的自由）“奉送给”工人，只要工人抛弃“骚乱主义”，抛弃“狭隘的革命主义”，不再仇视“实际有益的妥协”，不再追求和渴望给“俄国全民革命”刻上**自己的**阶级斗争的标记，刻上无产阶级彻底性、无产阶级坚决性、“平民雅各宾主义”的标记。因此，有学识的资产者在全国各地千方百计通过书籍［注：参看**普罗柯波维奇**《俄国工人问题》一书。］、报告、演说、谈话等等拼命劝导工人要有（资产阶级的）清醒头脑，要（象自由派那样）讲求实际，要抱（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要进行（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51]，要办（希尔施—敦克尔式的）工会[52]，如此等等。后两个口号对“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的资产者们特别方便，因为它们在表面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致的，因为只要稍加省略，稍加曲解，就很容易把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混淆起来，有时甚至很容易用它们来冒充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例如，合法的自由派报纸《黎明报》[53]（关于它，我们以后还要和《无产者报》的读者们详细谈谈）往往说出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可能被资产阶级欺骗、工人运动、无产阶级主动性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大胆的”话，使那些漫不经心的读者和觉悟不高的工人很容易把该报的

“社会民主主义”当作真货看待。实际上，这是按资产阶级精神伪造社会民主主义的把戏，是用机会主义来歪曲和曲解阶级斗争概念的伎俩。

这一整套规模巨大的（按其影响群众的广度来说）偷天换日的资产阶级把戏，归根到底是企图把工人运动化为主要是工会运动，使工人运动远远地离开独立的（即革命的、以实现民主专政为目标的）政策，“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排挤掉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把《解放》杂志的公式颠倒过来了。这是个绝妙的公式，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的两种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另一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资产阶级想叫无产阶级只进行工会运动，从而“用（**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排挤掉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这和伯恩施坦派《信条》起草人用“纯粹工人”运动的思想来排挤掉工人意识中的政治斗争的思想完全相同。反之，社会民主党想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为无产阶级以领导者身分参加俄国全民革命，即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个特殊的阶级，就应当只限于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就应当为了“理智”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工会和使工会合法化上面，就应当恰好是把这些工会看作“在政治上教育和组织你们自己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就应当在革命时期制定一些多半是象新火星派的决议那样的“郑重的”决议，就应当爱惜那些“对自由派比较友善的”决议，就应当选择那些想要成为“工人阶级现实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的人来领导，就应当“保存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如果你们不幸已被这种“不科学的”教义问答的“严格公式”所沾染的话）。

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就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求

领导这个革命，因此你们不应当局限在被狭隘地了解为主要是工会运动的那种阶级斗争的范围内，相反，应当竭力扩大你们的阶级斗争的范围和内容，**一直到**不仅**包括**俄国当前的全民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包括**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因此，在不忽视工会运动，不拒绝利用任何一点合法活动的机会的同时，你们应当在革命时期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把这当作取得人民对沙皇制度的完全胜利、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

至于新火星派的决议因“路线”错误而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多么不彻底的、不一贯的、因而自然是资产阶级所喜爱的立场，就不用多说了。

注释：

[50] 泥潭派原来是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们给国民公会里的中派集团取的绰号，又译沼泽派，也称平原派，因他们的席位处在会场中较低的地方，故有此称。泥潭派在国民公会中占多数，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者的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纲领，在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依违于左派和右派之间，而总是站到当时力量较强者的一边。泥潭派一词后来成了那些动摇不定、企图回避斗争的派别的通称。——101。

[51] 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是指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重要代表人物路·布伦坦诺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鼓吹可以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平等，解决工人的问题。列宁指出，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229—230 页）。——103。

[52] 希尔施—敦克尔工会是德国改良主义工会组织，1868 年由进步党活动家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建立。该工会的组织者们鼓吹劳资利益“和谐”论，认为

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工会，否定罢工斗争的合理性。他们声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国家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帮助就能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与企业主之间起媒介作用和积累资金。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主要从事组织互助储金会和建立文化教育团体的活动。它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从来不是一支主要力量，直到 1897 年它的会员不过 75000 人，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会员已达 419000 人。1933 年，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的机会主义活动家加入了法西斯的“劳动战线”。——103。

[53] 《黎明报》(《Рассвет》)是俄国自由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 年 3 月 1 日（14 日）—11 月 29 日（12 月 12 日）在彼得堡出版。——103。

二　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尔丁诺夫发表在《火星报》第 102 号和第 103 号上的文章。马尔丁诺夫企图证明我们把许多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中摘引出来的话解释得不正确而他却解释得正确，对于这种企图，不用说，我们是不会去反驳的。这种企图是很不严肃的，马尔丁诺夫的遁词是一望而知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如果再加以分析，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任何一个用心的读者，都会很容易识破马尔丁诺夫的这个不很巧妙的全线退却的诡计，何况《无产者报》一部分撰稿人准备的恩格斯所著《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和马克思所著《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通告》(1850 年 3 月）的全译本，很快就要出版了[54]。只要从马尔丁诺夫的文章中引证一段话，就足以使读者看清马尔丁诺夫的退却。

马尔丁诺夫在《火星报》第 103 号上说，《火星报》“承认成立临时政府是发展革命的可能而适当的途径之一，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适当的，正是为了要在将来完全占有国家机器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换句话说，《火星报》现在已经承认，它的一切恐惧——怕革命政府必须对国库和银行负责，

怕把“监狱”拿到自己手里来会有危险而且还怕拿不到自己手里来等等，都是荒诞不经的。《火星报》只是照旧糊里糊涂，把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为了掩护退却，糊涂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新《火星报》的糊涂虫中间，马尔丁诺夫表现最为突出，他是个头号的糊涂虫，甚至可以说是个才能出众的糊涂虫。他每次大卖气力“加深”问题而把问题弄糊涂时，几乎总是同时“想出”一些新的公式，把他所采取的立场的全部虚伪性暴露无遗。请回想一下，他在“经济主义”时代是如何“加深”普列汉诺夫，如何独出心裁地创造了“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公式的。在经济派的全部著作中，很难找到能比这个公式更恰当地表明这一派的全部虚伪性的说法。现在也是如此。马尔丁诺夫很热心地替新《火星报》效劳，并且几乎是一说话就为我们评价新火星派的虚伪立场提供一些出色的新材料。他在第 102 号上说列宁“悄悄地调换了革命和专政的概念”（第 3 版第 2 栏）。

实际上，新火星派加给我们的一切罪名都可以归结为这个罪名。而我们是多么感谢马尔丁诺夫加给我们这样一个罪名啊！他提出这样一个罪名，就在我们和新火星派的斗争中给了我们一种十分宝贵的帮助！我们真要请求《火星报》编辑部更多地让马尔丁诺夫出来反对我们，“加深”他们对《无产者报》的攻击，并且“真正有原则地”表述这些攻击。因为马尔丁诺夫愈是努力要说得有原则些，就愈是说得糟糕，就愈加清楚地暴露出新火星派的破绽，就愈加成功地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作个有教益的解剖，使人们看到新《火星报》的原则如何被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reductio ad absurdum）。

《前进报》和《无产者报》“调换了”革命和专政的概念。《火星报》不愿这样“调换”。最可敬的马尔丁诺夫同志，事情正是这样！您无意中说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您用**新的**说法证实了我们的论点：《火星报》是在做革命的尾巴，它

竟象解放派那样表述革命的任务，而《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则提出了要把民主革命引向前进的口号。

马尔丁诺夫同志，您不懂得这一点吗？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不妨费点气力来给您作一番详尽的解释。

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完全以承认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为立足点而不能越出这个范围的社会阶级、集团和阶层，都迫于形势而不得不承认专制制度和整个农奴制度已不适用，都附和要求自由的呼声。而为“社会”所要求、为地主和资本家滔滔不绝的言词（仅仅是言词！）所维护的**这种**自由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性质，却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与此同时，工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和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之间、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自由派的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愈来愈清楚了。工人阶级和它的觉悟的代表勇往直前，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不仅不怕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力求远远地越过民主革命所能达到的最终点。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它只是不完全地和虚伪地接受自由的口号。无论怎样企图用特别的线条，用特别拟订的“条款”（如斯塔罗韦尔决议或代表会议派决议中的那些条款）来定出一个界限，借以鉴定资产阶级的自由之友的这种虚伪态度，或者说资产阶级的自由之友的这种出卖自由的行为，都必然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处在两堆火（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中间的资产阶级能千方百计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口号，能看风使舵，时而稍微偏左，时而稍微偏右，经常讨价还价，施展经纪人的本领。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不是臆造这种僵死的“条款”，而是不倦地评价不断发展的政治局势，揭露资产阶级不断表现出来的、难以预料的不彻底性和叛变。

请回想一下司徒卢威先生在秘密报刊上发表政治言论的历史，回想一下社会民主党和他交战的历史，这样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为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社会民主党是怎样实现这些任务的。司徒卢威先生开始是提出纯粹希波夫式的

口号："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见我发表在《曙光》杂志[55]上的文章：《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编者注]）。社会民主党揭露了他，并且推动他提出明确的立宪主义纲领。当这种"推动"因革命事变进展特别迅速而发生了作用时，斗争就指向民主主义的下一个问题：不仅要有宪法，而且一定要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当我们从"敌军"那里"占领了"这个新阵地的时候（即"解放社"已接受普选制的时候），我们就更向前逼进，指明两院制的伪善和虚假，指明解放派没有完全承认普选制，并且以他们的**君主主义**立场为例证来揭露他们的民主主义所具有的经纪人的性质，或者换句话说，揭露这些解放派钱袋英雄**廉价出卖**伟大俄国革命的利益的企图。

最后，专制政府冥顽不化，国内战争大踏步前进，君主派使俄国陷入绝境，这些已开始使最保守的脑袋开窍了。革命已成为**事实**。现在已经不是只有革命家才承认革命的时候了。专制政府事实上已经在腐烂，而且就在大家的眼前腐烂下去。正如一个自由派（格列杰斯库尔先生）在合法刊物上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已经形成了事实上不服从这个政府的局面。专制制度虽然表面上还很强大，但是它实际上已软弱无力；日益发展的革命事变已经开始把这个活生生腐烂着的寄生机体干脆推到一边去。自由派资产者不得不以事实上正在形成的现有关系为立足点来进行活动（或者更正确些说，进行政治投机），**开始觉得必须承认革命。**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革命家，而尽管他们不是革命家，他们也得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的，他们愤怒地看着革命取得进展，而责怪专制政府太革命，因为这个专制政府不愿妥协，而想作殊死斗争。他们是天生的买卖人，仇恨斗争，仇恨革命，但是客观形势迫使他们站到革命的基地上来，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立足之地。

我们在观看一场很有教益而又非常滑稽可笑的演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娼妓企图穿上革命的外衣。解放派，——且慢发笑，先生们！——解放派开始代表革命说话了！解放派开始要我们相信他们“不怕革命”（司徒卢威先生语，见《解放》杂志第 72 期）!!! 解放派已表示要“领导革命”!!!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进步，而且更标志着革命运动的实际成就方面的进步：这个革命运动已经**迫使**人们对它表示承认。甚至资产阶级也开始感到站在革命的基地上是比较有利的，可见专制制度已被动摇到什么程度了。可是，另一方面，这个证明整个运动已上升到新的更高阶段的现象，又向我们提出一些也是新的、也是更高的任务。不管资产阶级某个思想家个人是否诚实，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承认不可能是真心诚意的。资产阶级不会不把自私自利和不彻底性、小商人习气和卑鄙的反动诡计，随身带到运动的这个更高的阶段中来。现在，为了贯彻我们的纲领和发展我们的纲领，我们应当**另行**规定革命的当前的**具体**任务。昨天足够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够了**。昨天，把要求承认革命作为先进的民主口号也许是足够的。现在，它已经不够了。革命甚至已经迫使司徒卢威先生对它表示承认。现在，要求于先进阶级的，是确切规定这个革命的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的**内容本身**。司徒卢威先生们虽然承认革命，但是立刻就一次又一次地露出马脚，又唱起陈词滥调，说什么可能达到和平的结局，说**尼古拉**将召请解放派先生们上台执政，如此等等。解放派先生们承认革命，目的是要比较安全地阉割这个革命，出卖这个革命。现在，我们应当向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指出，只提革命这个口号是不够的，必须清楚而毫不含糊地、彻底而坚决地把革命的**内容本身**确定下来。而能够这样确定革命内容的就是那个唯一能够正确表明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滥用字眼是政治方面最普通的现象。例如，一再地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就有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哈科特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We

all are socialists now”)，还有俾斯麦的信徒和教皇莱奥十三世的朋友。“革命”一语也完全可以被人们滥用，而当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种滥用是不可避免的。当司徒卢威先生以革命的名义说起话来的时候，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梯也尔。在二月革命前几天，这个侏儒怪物，这个资产阶级政治叛变行为的理想代表人物，就嗅到了人民风暴即将来临的气息。于是他在议会讲台上宣称他**属于革命党**！（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331—389 页。——编者注］）解放派转到革命党方面来的政治意义和梯也尔的这种“转变”**是完全相同的**。当俄国的梯也尔们开始说他们属于革命党的时候，这就表明革命这一口号已经不够了，已经什么也不能说明，任何任务都不能确定了，因为革命已经成为事实，而各色各样的人都纷纷拥向革命方面来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现在，专制制度同资本主义俄国的整个结构的矛盾，同资本主义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发展的一切需要的矛盾，愈是长久地勉强被保持下去，它就愈加强烈地促使专制制度瓦解。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经受不住强攻，日益削弱下去了。人民不得不通过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的代表自己来为自己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旧的上层建筑的毫无用处就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革命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了。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应该**由哪些**阶级来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要不确定这一点，革命这一口号在目前就是一个空洞的毫无内容的口号，因为专制制度的虚弱无力使得大公们和《莫斯科新闻》[56]也变成“革命者”了！要不确定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这个口号既能确定新上层建筑的新“建筑者”可能而且应当依靠哪些阶级，又能确定这一上层建筑是什么性质（和社会主义专政不同的“民主”专政）

和采取什么建筑方式（实行专政，即用暴力镇压暴力的抵抗，武装人民中的革命阶级）。现在，谁不承认这个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不承认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政府和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口号，那他不是根本不了解革命的任务，没有能力确定当前形势所提出的新的和更高的革命任务，就是滥用“革命”这一口号来欺骗人民，出卖革命。

马尔丁诺夫同志和他的那班朋友属于前一种情况。司徒卢威先生和整个“立宪民主”地方自治派属于后一种情况。

马尔丁诺夫同志真是又机灵又精明，正好是在革命的发展要求人们用专政的口号来确定革命任务的时候，他却责备别人“调换”革命和专政的概念！马尔丁诺夫同志事实上又不幸做了尾巴，在上上阶段上搁了浅，**结果竟停留在解放派的水平上**，因为目前适合于解放派的政治立场，即适合于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正是承认“革命”（口头上的革命），而不愿承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即事实上的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现在通过司徒卢威先生表示赞成革命。觉悟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时，新《火星报》的一位聪明人又来介入这场争论，喊道：可别“调换”革命和专政的概念呀！看，新火星派的虚伪立场注定要使他们永远做解放派的尾巴，难道不是这样吗？[57]

我们已经指出，解放派在承认民主主义方面是一步一步上升的（这里有社会民主党的鼓励推动作用）。起初，我们和他们争论的问题是：希波夫主义（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呢，还是立宪主义？后来是：有限制的选举呢，还是普选制？再后来是：承认革命呢，还是去和专制政府做经纪人的交易？最后，现在是：承认革命而不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呢，还是承认这两个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专政要求？很可能解放派先生们（无论是现在的解放派或者是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中的继承者，反正都是一样）还会上升一步，就是说，很可能过

一些时候（也许是在马尔丁诺夫同志也上升一步的时候）也承认专政的口号。如果俄国的革命顺利地前进并且获得彻底的胜利，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时，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又将怎样呢？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就会开展得愈迅速，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民主”专政这个口号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的局限性，表明在新制度的基地上为争取工人阶级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而进行新斗争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当民主派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再上升一步的时候，当不仅革命成为事实，而且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口号，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调换”（也许是在将来的新的马尔丁诺夫们的恐怖的号叫声中）民主专政的口号。

注释：

[54] 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 1873 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521—540 页）的俄译文经列宁校订后，于 1905 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1906 年在彼得堡翻印。

正文中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通告》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88—299 页）。《告同盟书》经恩格斯校订，于 1885 年作为附录收入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德文版。1906 年，彼得堡铁锤出版社出版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包括《告同盟书》这篇附录）的俄译本。——106。

[55] 《曙光》杂志（《Э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 4 期（第 2、3 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 4 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08。

[56] 《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 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 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从 1859 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 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 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9 日）被查封。——112。

[57] 以上 4 段正文（即从开头是“滥用字眼是政治方面最普通的现象”那一段起）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 1905 年版本中和在收入该著作的 1907 年《十二年来》文集中都没有刊载。1940 年 4 月 22 日《真理报》第 112 号第一次发表了这几段文字。在《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和第 5 版中，这几段正文是按手稿刊印的。——113。

三　庸俗的资产阶级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

梅林出版了 1848 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集，他在论文集的说明中说，资产阶级书刊还对《新莱茵报》提出过如下指责，说它要求“立刻实行专政，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手段”（《马克思遗著》第 3 卷第 53 页）[58]。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认为

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实质上，我们的马尔丁诺夫正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他在新《火星报》上的那篇“新讨伐”文章的结语中说，《前进报》和《无产者报》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碰碰运气”（《火星报》第 103 号第 3 版第 2 栏）。这个绝妙的解释完全可以和资产阶级指责《新莱茵报》鼓吹专政的说法相媲美。可见，马克思也被揭发为调换革命和专政的概念，——不过不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所揭发，而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揭发！为了向马尔丁诺夫说清阶级专政的概念和个人专政的区别，以及民主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的任务的区别，谈一谈《新莱茵报》的观点也许不是无益的。

1848 年 9 月 14 日的《新莱茵报》写道：“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1848 年 3 月 18 以后的内阁首脑〉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即反动的政党〉却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475 页。——编者注］

梅林说得很对：这段话把《新莱茵报》在几篇长篇论文中所作的关于康普豪森内阁的详细论述归纳成扼要的几点。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专政（规避专政口号的《火星报》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它告诉我们，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反革命斗争的决议中所清楚地指出的，而且是代表会议的决议所忽略的）。最后，第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迷恋于“立宪的幻想”而痛斥了他们。从 1848 年 6 月 6 日《新莱茵报》的论文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段话的含义。马克思写道：“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的

积极的议会。而法兰克福议会却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对各邦政府的行动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475 页。——编者注]

专政这个口号的含义就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会怎样对待那些把“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叫作彻底胜利或者号召“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决议！

各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制度就这样做过，而且从 1 月 9 日起在全国各地还继续不断地这样做。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义已经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立宪幻想和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

关于这个专政的任务的问题，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还写道：“国民议会本来应该以专政的办法反对腐朽政府的反动企图，这样它就能在人民的舆论中取得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所有的刺刀……都会碰得粉碎。……这个议会不是引导德国人民或者接受德国人民的引导，而是废话连篇，使人民感到厌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46 页。——编者注] 按马克思的意见，国民议会应当“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然后“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主权不受任何侵犯”[注：同上，第 14 页。——编者注]。

可见，马克思在 1848 年向革命政府或专政提出的任务，按内容来说，首先就是实行**民主**革命：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消除一切和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这正好就是革命民主专政。

还有，按马克思的意见，当时有哪些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实现这个任务（把人民专制的原则真正贯彻到底，并打退反革命的袭击）呢？马克思说的是“人民”。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

在柏林无产阶级 3 月 18 日的胜利以后，——《新莱茵报》写道，——革命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制，成立了康普森森—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争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去组阁，而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向旧普鲁士的贵族和官僚建议结盟，立即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加入内阁的有阿尔宁、卡尼茨和施韦林。

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黑体是我们用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72—73 页。——编者注］

总之，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很不够，甚至真正召集立宪会议也还是很不够！甚至在武装斗争中得到局部的胜利（柏林工人 1848 年 3 月 18 日对军队的胜利）以后，革命也还可能“没有完成”，“没有进行到底”。革命是否进行到底，究竟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直接统治权究竟转到谁

的手里：是转到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之流，即转到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之流的手里，还是转到**人民**，即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手里。在前一种场合下，资产阶级拥有政权，而无产阶级有“批评的自由”，有“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自由。革命一胜利，资产阶级立刻就会和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譬如说，如果彼得堡的工人在和军队进行的巷战中仅仅获得局部的胜利，而让彼特龙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去成立政府，那么这种情形在俄国也是免不了要发生的）。在后一种场合下就有可能实现革命民主专政，即革命的完全胜利。

现在还需要更确切地断定，马克思拿来和工人合在一起统称为人民而与大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那个“民主派资产阶级”（demo-kratische Bürgerschaft）究竟是指的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1848 年 7 月 29 日《新莱茵报》一篇文章中的下面的话给了明白的回答：“……1848 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 1789 年法国革命的讽刺。

1789 年 8 月 4 日，攻占巴士底狱后三个星期，法国人民在一天之内就战胜了一切封建义务。

1848 年 7 月 11 日，三月街垒战后四个月，封建义务战胜了德国人民。Teste Gierke cum Hansemanno。[注：“见证人就是吉尔克先生和汉泽曼先生。”汉泽曼是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阁员（相当于俄国的特鲁别茨科伊或罗季切夫等等）。吉尔克是汉泽曼内阁中的农业大臣，他拟订了一个“大胆的”草案，表面上似乎是要“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实际上只是废除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的义务，而把较重大的义务保存下来，或实行赎买。吉尔克先生很象俄国的卡布鲁柯夫、曼努伊洛夫、赫尔岑施坦一类与农夫为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先生们，他们愿意“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但是不愿意得罪地主。]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一分钟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

1848 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

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 1848 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331 页。——编者注］

这是些很有教益的话，这些话告诉我们四个重要的原理：（1）没有完成的德国革命和已经完成的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德国资产阶级不仅是背叛了民主主义，而且特别是背叛了农民。（2）完全实现民主革命的基础是建立自由的农民阶级。（3）建立这样一个阶级，就是废除封建义务，消灭封建制度，但这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4）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者，资产阶级就"无力"反对反动势力。

只要根据具体的民族特点作相应的改变，只要把封建制度改成农奴制度，所有这些原理就完全适用于 1905 年的俄国了。毫无疑问，当我们从马克思所阐明的德国经验中吸取教训时，我们所能得出的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就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毫无疑问，马克思在 1848 年拿来和那些进行反抗的反动势力及叛变的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人民"，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解放派先生们也在背叛农民，而且将来还会背叛农民，就是说，他们会用假的改良来敷衍了事，会在地主和农民决战的时候站到地主方面去。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在这个斗争中彻底支持农民。最后，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农民斗争的成功，即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也将意味着完全的民主革命，也是进行到底的革命的社会支柱，但决不是社会主

义革命，也决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即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社会化”。农民起义的成功，民主革命的胜利，只会为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真正而坚决地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清道路。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也会象资产阶级现在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

为了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在 1848 年的观点，必须指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如果用当时的话说）和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听听梅林是怎样说的：

“《新莱茵报》是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不能不看到贯穿在它的一切文章中的那条基本线索。但是它的直接目标，与其说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该报的各栏很少有专门讨论革命时期工人运动问题的材料，虽然不应当忘记，和它同时并存的还有每星期出版两次的莫尔和沙佩尔两人编辑的一个专门的科隆工人联合会机关报[59]。无论如何，很使当代读者注意的，是《新莱茵报》很少注意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位最能干的活动家斯特凡·波尔恩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过，而且 1848 年还在柏林为他们的报纸写通讯。波尔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向他说过一句话，表示他们不赞同他在工人中进行的鼓动工作。可是，根据恩格斯后来的声明，可以推想，他们至少是不满意这种鼓动工作的方法。他们的不满是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曾经不得不对德国大多数地区中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了许多让步，作了许多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看来完全经不起批驳的让步。他们的不满又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毕竟还是把他领导的鼓动工作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利益首先是尽量推进资产阶级革命，这从历史上看、从政治

上看都是正确的……虽然如此，但是有一件事实卓越地证明了工人运动的起码的本能能够纠正最天才的思想家的观念，这就是他们在 1849 年 4 月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并且决定参加特别是由易北河以东（东普鲁士）的无产阶级准备召集的工人代表大会。”［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509、697、698、703—704 页。——编者注］

可见，只是在 1849 年 4 月，在革命报纸出版了几乎一年以后（《新莱茵报》是从 1848 年 6 月 1 日开始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在此以前，他们只办了一个和独立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的“民主派的机关报”！这件事实，这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和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民主革命中所显露出来的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和无产阶级潮流要少得多（因为德国 1848 年在经济方面和在政治方面还落后——国家没有统一）。这在评价马克思当时和不久以后关于必须独立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多次声明时，是不应当忘记的（例如普列汉诺夫就忘记了这一点［注：括号中的话在以前各版中都被略去了。——俄文版编者注］）。马克思只是根据民主革命的经验，几乎经过了一年才实际作出这个结论来，可见德国当时的整个气氛充满了多么浓厚的市侩性、小资产阶级性。对我们来说，这个结论是早就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半世纪的经验中得到的坚固的成果，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成果**开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例如，在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报纸会站在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之外，根本谈不上这种报纸哪怕有片刻会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

可是，在马克思和斯特凡·波尔恩之间刚刚开始显露出来的那种对立，在我们这里却以成熟得多的形式存在着，而且我国革命民主巨流中的无产阶级潮流愈是强大，这种对立就愈厉害。梅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斯特凡·波尔恩的鼓动工作可

能不满时，话说得太缓和，太闪烁其词了。请看恩格斯在 1885 年写的评论波尔恩的一段话（引自《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 年苏黎世版序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60]员到处领导极端民主运动，这就证明同盟是革命活动的最好的学校。“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特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Arbeiterverbrüderung）[61]，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 1850 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太急于作为政治活动家出来活动。他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Kreti und Plethi）‘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Allen alles sein）。**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牢固地、可靠地实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场所**〈黑体是我们用的〉。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落后群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 1849 年 5 月德累斯顿的起义[62]，侥幸得免于死。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纸上存在，它的作用小到极点，所以直到 1850 年反动派才觉得必须取缔它，而它的分会则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被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注：我在本书第 1 版中翻译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时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把 Butter－milch（酸牛奶。——编者注）一字看作专有名词，而是把它看成了普通名词。这个错误当然使孟什维克们极为高兴。柯尔佐夫写文章说我“加深了恩格斯”（该文曾转载在《两年来》文集中），普列汉诺夫现在还在《同志报》[63]上提起这个错误，总而言之，他们找到一种**绝**

妙的借口来抹煞 1848 年德国的**工人运动中有两种趋向存在的问题**，一种是波尔恩（我们的“经济派”的亲属）的趋向，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趋向。利用论敌的错误——即使是关于波尔恩的姓氏问题的错误，本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利用纠正译文的手段来抹煞有两种策略存在这一问题的本质，这就是害怕涉及争论的实质。（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波尔恩没有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译成甜腻的德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55－256 页。——编者注］

恩格斯就是这样评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

我们的新火星派也是狂热地追求“经济主义”，甚至因为自己“省悟”而博得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赞扬。他们也是把各色各样的人纠合在自己周围，奉承“经济派”，用“主动性”、“民主主义”和“自治”等等口号来拉拢落后群众。他们的工会也是往往只存在于他们那个赫列斯塔科夫[64]式的新《火星报》上。他们的口号和决议暴露出他们同样不了解“无产阶级伟大政治运动”的任务。

注释：

[58] 列宁引自弗·梅林编《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遗著选》第 3 卷引言（见该书 1902 年斯图加特版第 53 页）。这本书的俄文版于 1926 年出版，书名是：《弗·梅林收集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 1848—1850 年德国革命时代所写的随笔和论文》。

下面在本卷第 120—121 页上，列宁引用了梅林的同一篇引言（同上，第 81—82 页）。——114。

[59] 指《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

《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zu Koln》）报头下标有“自由、博爱、劳动”字样，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报道科

隆工人联合会和莱茵省其他工人联合会的活动，1848 年 4—10 月出版，共出了 40 号。7 月以前由安·哥特沙克主编，7 月以后由约·莫尔主编，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停刊后，科隆工人联合会从 1848 年 10 月 26 日起以《自由、博爱、劳动》的名称重新在科隆出版报纸。这个报纸出版到 1849 年 6 月 24 日（中间于 1848 年年底停刊，1849 年 2 月 8 日复刊），共出了 32 号。—120。

[60]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 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 1836 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 1847 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 年 6 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 1 条件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 1848 年 2 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 年 9 月 15 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改为

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 1852 年 11 月 17 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122。

[61] 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排字工人斯·波尔恩于 1848 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他把工人兄弟会的活动限制在组织经济罢工和争取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质的措施（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的范围内。工人兄弟会的纲领是片断的被曲解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路易·勃朗及皮·约·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的混合物。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工人兄弟会站在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之外，但它的一些地方分会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 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在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1850 年，工人兄弟会被政府查禁，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122。

[62] 德累斯顿起义于 1849 年 5 月 3 日开始。爆发这次起义的原因是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并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这次起义的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则几乎没有参加斗争。起义于 5 月 8 日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德累斯顿起义是保卫帝国宪法斗争的开端。这一斗争于 1849 年 5—7 月期间在德国南部和西部进行，以民主力量的失败告终。——123。

[63]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这可能吗？》一文。该文刊载于 1907 年 9 月 26 日（10 月 9 日）《同志报》第 381 号。

《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 年 3 月 15 日（28 日）—1907 年 12 月 30 日（1908 年 1 月 12 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

“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123。

[64] 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手。——124。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列宁（1907 年 2 月 5 日〔18 日〕）

现在我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周刊上发表的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全部汇集成册出版，目的是想使俄国读者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通信中对他自己的私事谈得很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写传记的人来说，这些材料都是异常宝贵的。但是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对于俄国工人阶级来说，这些书信内包含着理论和政治材料的那些地方，却更加重要得多。正是在我国，在目前的革命时代，细心研究马克思对工人运动和世界政治的各种问题的直接评论材料，是特别富有教益的。《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说得完全对："认识那些在大变革时代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物的面貌，就能提高我们自己。"在 1907 年，俄国社会党人更是加倍需要有这种认识，因为他们从这种认识中间可以得到许多极宝贵的指示，从而了解他们在本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中的直接任务。俄国现在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在相当动荡的 19 世纪 60 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目前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政策的直接榜样。

因此，我们现在只是简单地提一下马克思书信中理论上特别重要的地方，而比较详细地谈谈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所采取的革命政策。

从更全面和更深刻地弄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 1868 年 7 月 11 日写的一封信（第 42 页及以下各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540—542 页。——编者注]。马克思在这封信里通过反驳庸俗经济学家的方式，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自己对所谓"劳动"价值论的见解。马克思把素养较差的《资本论》读者会很自然产生、因而被庸俗的"教授式的"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人物百般利用的那些反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意见，作了一个简单扼要而又异常透彻的分析。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他怎样说明和应当怎样说明价值规律。

他以最通常的反对意见为例，说明了他自己所运用的方法。他阐明了价值论这样一个（似乎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同那些要求“把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的“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我希望，凡是开始研究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的人，在钻研《资本论》最难懂的头几章的时候，能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反复地读一读。

书信中另外一些在理论上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马克思的这些评论写得非常生动，充满热情，可以看到他对一切重大思潮都全神贯注地进行考察分析。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聆听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除了那些顺便谈到的对于狄慈根的评论以外，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他对蒲鲁东派[1]的评论（第 17 页）。只是轻轻几笔就把那些在社会大动荡时期投靠“无产阶级”，但不能领会工人阶级的观点，不能刻苦认真地在无产阶级组织“行列中间”进行工作的资产阶级的“优秀的”知识青年描绘得惟妙惟肖。［注：同上，第 31 卷第 530—534 页。——编者注］

对杜林的评论（第 35 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525—526 页。——编者注］好象是预示了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在 9 年以后所写的有名的《反杜林论》一书的内容。这本书有策杰尔包姆的俄译本，可惜这个译本翻译得很糟，不仅有许多遗漏，而且有不少错误。信里还有对杜能的一段评论，其中也牵涉到李嘉图的地租论。［注：同上。——编者注］马克思早在 1868 年就坚决驳斥了“李嘉图的错误”，而在 1894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 3 卷中则已把这些错误彻底驳倒了。但是，直到现在，从我国十足资产阶级的、甚至是“黑帮”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起，直到“准正统派”马斯洛夫，所有这些修正主义者都仍然在重复这些错误。

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毕希纳的评论，其中谈到他的庸俗唯物主义和从朗格著作（“教授式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正常的依据!）中抄来的“肤浅的废话”（第 48 页）［注：同上，第 567 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克思的革命政策。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居然流行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市侩观念，以为具有特殊斗争方式和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的革命时期是变态，而“宪制”和“极端反对派”却是常规。当今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象俄国那样发生这样深刻的革命危机，同时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对革命采取这样怀疑和庸俗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降低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这里的人总是从革命内容是资产阶级的这一事实得出肤浅的结论，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则负担次要的、附属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马克思在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是多么有力地揭穿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肤浅看法呀！拿 1866 年 4 月 6 日写的一封信来说吧。马克思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在他写这封信的 14 年前，他已经最后作出了对于德国 1848 年革命的估价。[2]1850 年，他自己否定了自己在 1848 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幻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12—514 页。——编者注］。在 1866 年，他刚开始看见新的政治危机在日益增长的时候，便写道：

“我们的庸人〈指德国自由派资产者〉终究会了解到，如果没有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的革命，结果又会引起一场三十年战争……”（第 13—14 页）［注：同上，第 31 卷第 518 页。——编者注］

这里丝毫也没有幻想即将到来的革命（这次革命是从上面发生的，而不是象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从下面发生的）会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个革命只是推翻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主制度。而他对这个资产阶级革

命具有多么大的信心啊！这位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巨大作用的无产阶级战士充满着多么强烈的革命热情啊！

过了三年，在拿破仑帝国崩溃的前夜，马克思指出法国发生了“非常有趣的”社会运动，他非常高兴地说道，“巴黎人为了准备去从事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斗争，又在细心研究他们不久前的革命历史经验了”。马克思描写了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揭示出来的阶级斗争以后，得出结论说（第 56 页）：“整个历史的魔女之锅就沸腾起来了！什么时候我们那里〈德国〉也会这样呢！”［注：同上，第 32 卷第 584—585 页。——编者注］

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马克思学习的地方。他们因怀疑论而软弱无能，因书呆子气而麻木不仁，他们惯于念忏悔词，很快就厌倦革命，象盼望节日似的盼望葬送革命，渴望用宪法条文来代替革命。他们应该向无产者的这位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学究们以为这全是伦理的空谈，全是浪漫主义，缺乏现实主义！不，先生们，这是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的结合，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布伦坦诺主义[3]、司徒卢威主义[4]和桑巴特主义[5]。马克思的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谁把冷静地肯定客观情况的理论曲解为替现状辩护，以至于尽快地使自己去适应每次革命的暂时低潮，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的”小事，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如他所形容的“田园诗般的”时期，或如《新时代》杂志编者所说的“死水一潭的沉闷”时期，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即将临近，而启发无产阶级去认识他们所担负的先进的革命任务。而我们俄国那些把马克思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却在最革命的时期教导无产阶级采取消极的政策，采取“随波逐流”、悄悄支持时髦的自由主义政党的最不稳定分子的政策！

马克思对公社的评价是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拿这种评价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所采用的手段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的。普列汉诺夫在 1905 年 12 月以后，灰心丧气地喊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6]他居然还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 1870 年也曾阻止过革命。

是的，马克思也曾阻止过革命。但请看看，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这种比拟，正好表明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有天渊之别。

在 1905 年 11 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高潮的一个月以前，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7]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就马上扮作一个悔罪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1870 年 9 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8]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蠢举。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 1792 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用不着拿起武器"。

当他自己在九月声明中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 1871 年 3 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象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件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对手，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训导员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主义，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

不。马克思在 1871 年 4 月 12 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206—208 页。——编者注］，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

马克思在 1870 年 9 月把起义说成是蠢举，但到了 1871 年 4 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他讴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第 88 页）……“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 1905 年 10 月和 12 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方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对待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批评那些“奋不顾身的”、“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

现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那些在 1906—1907 年大骂革命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聪明才子们，在当时不知会怎样讥笑马克思！他们看到这位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这位空想的敌人赞扬冲天的“尝试”时，不知会怎样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9]看到这种所谓暴动意图和空想主义等等，看到对冲天的运动所作的这种估价时，不知会怎样掉泪、冷笑或表示怜悯！

而马克思丝毫没有象绝顶聪明的鮈鱼那样害怕讨论革命斗争最高形式的技术问题。他讨论的正是起义的技术问题。是防御，还是进攻呢？——他写道。好

象军事行动就在伦敦附近发生似的。接着他自己解答说：一定要进攻，“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这是在 1871 年 4 月，在伟大的流血的五月的几个星期前写的……

一个是当起义者开始了冲天的“蠢举”（这话是 1870 年 9 月说的）时说，“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另一个是当在 1905 年 12 月必须用武力来抵抗敌人夺取我们已经赢得的自由的初次侵犯时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马克思继续从技术上提出批评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请注意，这是军事指挥机关，是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马克思善于警告领导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冲天的无产阶级，却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因为群众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终究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他当时写道：“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

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讳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错误，他为这一业绩而写的一部著作，至今还是“冲天的”斗争的最好的指南，同时也是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瘟猪”最害怕的东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331—389 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为十二月事件写的一部“著作”，却几乎成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福音书。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库格曼在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怀疑，认为事情没有希望，说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要采取浪漫主义态度，——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义同巴黎 1849 年 6 月 13 日的和平示威相比较。

马克思立刻（1871 年 4 月 17 日）对库格曼作了严厉的驳斥。

他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马克思在 1870 年 9 月把起义叫作蠢举。但一旦群众举行了起义，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打官腔，教训他们。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成功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者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气。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马克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成功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见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同时，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殊死的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我们现在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滥引马克思的话，只愿仿效他估计已往而不愿仿效他创造未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普列汉诺夫在 1905 年 12 月后开始"阻止……"时，根本就没有想到问题的这种提法。

而马克思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在 1870 年 9 月认为起义是蠢举这一事实。

他写道："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210 页。——编者注］

我们对于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教给我们的真正无产阶级政策的教训的简短介绍就到此结束。

俄国工人阶级已一度证明，并且还将不断证明，它有"冲天的"本领。

注释：

[1]蒲鲁东派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蒲鲁东主义的拥护者。蒲鲁东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它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374。

[2]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一些最重大问题的观点，是在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3—115 页）中阐述的。这部著作以一组文章的形式发表于 1851 年 10 月 25 日—1852 年 10 月 23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署名卡·马克思，因此当时人们把它作为马克思的著作。直到 1913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发表之后，才知道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写的。列宁在这里说的就是这部著作。——376。

[3]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之一。他鼓吹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377。

[4]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 19 世纪 90 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377。

[5]桑巴特主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流派，因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威·桑巴特得名。桑巴特在其活动初期是个涂上了薄薄一层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活动家，后来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列宁曾指出，桑巴特之流“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从而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了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2 卷第 303 页）。——377。

[6]这句话出自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再论我们的处境（给X．同志的信）》一文（载于 1905 年 12 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 4 期）。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不合时宜地发动起来的政治罢工导致了莫斯科、索尔莫沃、巴赫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表现得强大、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的力量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因此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 年俄文版第 15 卷第 12 页）——377。

[7]1905 年 11 月，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处境》一文中写道：“只是得到左轮手枪或匕首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会使用它们。70 年代的革命家们在这方面是行家，我们的同志们还远不及他们。我们必须尽快填补自己革命教育中的这一空白。善于使用武器应成为我们中间拥有武器者理所当然地自豪的事情和尚未得到武器者羡慕的事情。”（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 年俄文版第 13 卷第 352 页）——378。

[8]指马克思在 1870 年 9 月 6—9 日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285—294 页）。——378。

[9]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79。

论革命的两条路线

列宁（1915 年 11 月 7 日〔20 日〕）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号召报》[1]第 3 号上试图提出关于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他引证了马克思的一段话，这段话说，法国 1789 年的革命是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的，而 1848 年的革命则是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145 页。——编者注] 在第一种情况下，政权由较温和的政党逐渐转归较左的政党，即从立宪派到吉伦特派，再到雅各宾派。后一种情况恰巧相反（从无产阶级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后到拿破仑第三手中）。我们的作者由此推论说，“最好能使俄国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也就是说，使政权先转归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然后转归劳动派，然后再转归社会党人。从这种推论中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左派不愿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并过早地败坏他们的声誉是不明智的。

普列汉诺夫先生的这个“理论性”论断是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实例。普列汉诺夫先生把事情归结为先进分子的“战略概念”“正确”还是不正确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不是这样论断的。他指出革命在前后两种情况下发展路线不同这一事实，然而他没有到“战略概念”中去寻找这种差别的原因。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到概念中去寻找这种差别是可笑的。应当到阶级关系对比的差异中去寻找。同一个马克思还曾经写道，在 1789 年，法国的资产阶级同农民结成了联盟，而在 1848 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背叛了无产阶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331 页、第 7 卷第 27 页、第 8 卷第 145—146 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这个意见普列汉诺夫先生是知道的，但是他闭口不谈，其目的是要把马克思伪造成“司徒卢威的模样”。在 1789 年的法国，是推翻专制制度和贵族的问题。在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上，资产阶级相信利益的一致，不担

心自己统治的巩固性，而同农民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保证了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在 1848 年，已经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问题。无产阶级当时未能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小资产阶级的叛变招致了革命的失败。1789 年的上升路线是人民群众战胜专制制度的一种革命形式。1848 年的下降路线则是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背叛招致革命失败的一种革命形式。

普列汉诺夫先生把问题归结为“战略概念”，而不是阶级关系对比，从而用庸俗的唯心主义偷换了马克思主义。

俄国 1905 年革命及其以后的反革命时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我国有两条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都在争取对群众施加指导性影响。无产阶级采取了革命行动，带领民主主义的农民去推翻君主制和地主。1905—1906 年的农民起义，同一时期的军人骚动，1905 年的“农民协会”[2]，以及头两届杜马中劳动派农民的表现不仅“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左些”，而且比社会革命党人知识分子和劳动派知识分子还要革命些——所有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在广泛的范围内证明，农民表现出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可惜，人们时常忘记这一点，但这是事实。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中，劳动派农民尽管有软弱性，但是仍然表明了农村群众是具有反对地主的情绪的。

从事实而不是从“战略”空谈中得出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条路线，就是无产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民则犹疑不定地跟着它走。这两个阶级都反对君主制和地主。由于力量不足和决心不够，这两个阶级遭到了失败（虽然他们已在专制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为构成了第二条路线。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说（尤其自 1906 年春季以来），代表这条路线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这支统一的力量。1905—1915 年这十年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在斗争的紧要关头，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一道背叛民主派而“跑去”帮助沙皇和地主。俄国革命中的“自由派”路

线就在于为了资产阶级同君主制的和解而“安抚”和分裂群众斗争。俄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都使得自由派的行为必然如此。

布尔什维克自觉地帮助无产阶级走第一条路线，英勇忘我地进行斗争并带领农民前进。孟什维克则总是滚到第二条路线上去，他们把无产阶级引入歧途，使无产阶级运动顺应自由派的需要，——从邀请参加布里根杜马（1905 年 8 月），直到 1906 年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和 1907 年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反对民主派的联盟。（这里顺便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那些在普列汉诺夫先生看来是“正确的战略概念”在当时就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呢？为什么群众不听从英明的普列汉诺夫先生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劝告呢——他们的劝告不是散布得比布尔什维克的广泛百倍吗？）

1904—1908 年以及后来 1908—1914 年期间，在群众的政治活动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显露了头角。为什么呢？因为唯有这两个派别有坚实的阶级根基：布尔什维克派的阶级根基是无产阶级，孟什维克派的阶级根基是自由派资产阶级。

现在我们又重新走向革命。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连赫沃斯托夫本人也说，农民当前的情绪使人联想起 1905—1906 年。现在我们面前又有同样的两条革命路线，同样的阶级关系对比，只是由于国际局势的改变而略有不同罢了。1905 年，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都支持沙皇政府——有的给它亿万金钱（如法国人），有的帮它训练反革命军队（如德国人）。1914 年爆发了欧洲大战；资产阶级在各个地方都暂时地战胜了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卷入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浊流。在俄国，占人口多数的仍旧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农民。他们受到的首先是地主的压迫。在政治上，他们有的人还处于沉睡状态，有的人则动摇于沙文主义（“战胜德国”、“保卫祖国”）和革命之间。这些群众——和这种动摇——在政治上的代表，一方面是民粹主义者（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机

会主义者（《我们的事业》杂志、普列汉诺夫、齐赫泽党团、组织委员会），这些机会主义者从 1910 年起就下定决心沿着自由派工人政策的道路滑下去，到了 1915 年更堕落到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列维茨基、马斯洛夫等先生们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地步，或者说堕落到要求同这些人讲“统一”的地步。

这种实际情况明确无误地规定了无产阶级的任务。对君主制进行英勇忘我的革命斗争（1912 年一月代表会议[3]的口号，即“三条鲸鱼”），也就是把一切民主派群众主要是农民争取过来的斗争。同时还要与沙文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同欧洲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进行争取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由它的阶级地位产生的。军事危机加强了促使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左倾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就是俄国民主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客观基础。至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这是无须我们在这里加以证明的；早在大战以前，各先进国家的一切有影响的社会党人就承认了这一点。

弄清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阶级关系对比，是革命政党的主要任务。然而组织委员会对这一任务采取回避态度，它在国内依然充当《我们的事业》杂志的忠实盟友，在国外则大谈其毫无意义的“左的”空话。这个任务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解决得不正确，他只是重复他那 1905 年的“独创性”理论，而不肯想一想，整整十年来生活并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原因究竟何在。

托洛茨基的独创性理论从布尔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据他说，农民已经分化了，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了，他们能起的革命作用愈来愈小了；在俄国不可能进行“民族”革命，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玩弄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有趣的例子！如果说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说俄国已经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说“没收地主土地”这个口号（托洛茨基继 1912 年一月代表会议之后在 1915 年又加以重复的口号）是不正确的，那就是说不应该讲“革命工人”政府，而应该讲“工人社会主义”政府！！托洛茨基又说，无产阶级的坚决性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也带动起来（第 217 号）。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混乱到何等程度！！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如果无产阶级能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那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905—1915 年这整整十年，这伟大的十年，证明了在俄国革命中有两条而且只有两条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唤醒了很多在政治上沉睡未醒的农民，推动了农村无产阶级向城市无产阶级靠拢（布尔什维克从 1906 年以来就坚决主张农村无产阶级要单独组织起来，并把这个要求列入孟什维克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4]的决议）。但是“农民”同马尔柯夫们—罗曼诺夫们—赫沃斯托夫们的对抗加强了，增长了，尖锐化了。这个真实情况是如此明显，甚至连托洛茨基在巴黎写的洋洋万言的几十篇文章也“推翻”不了。托洛茨基行动上是在帮俄国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的忙，他们认识到“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

而这就是现在问题的症结。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都要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而英勇忘我地斗争，也就是说，为争取农民、为尽量发挥农民的革命力量、为吸引“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而无产阶级立即利用这个使资产阶级俄国从沙皇制度下、从地主的土地和政权下获得解放的运动，不是为了帮

助富裕农民去反对农业工人，而是为了与欧洲各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注释：

[1]《号召报》(《Призыв》)是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周报)，1915 年 10 月—1917 年 3 月在巴黎出版。

这里提到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题为《革命的两条路线》，载于 1915 年 10 月 17 日《号召报》第 3 号。——93。

[2]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 1905 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 1905 年 7 月 31 日—8 月 1 日（8 月 13—14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 1905 年 10—12 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 470 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 20 万人。根据该协会成立大会和 1905 年 11 月 6—10 日（19—23 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 年初被解散。——94。

[3]一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 1912 年 1 月 5—17 日（18—30 日）在布拉格举行，也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代表 20 多个党组织，即几乎所有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组织，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列宁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起草了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会议肯定俄国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的所作所为已使他们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他们清除出党。代表会

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草案。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这次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巩固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一月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1 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97。

[4]指 1906 年 4 月 10—25 日（4 月 23 日—5 月 8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3 卷第 1—65 页）这本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

列宁所说的农村无产阶级单独组织起来的这个要求，列入了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策略决议。这个决议说："同时，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一切场合下和任何情况下，党的任务都是：始终不渝地争取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警告他们不要受在商品生产下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的小经济制度的引诱，最后，指出必须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消灭一切贫困和剥削的唯一手段。"（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分册第 151 页）——98。

关于 1905 年革命的报告[1]

列宁（1917 年 1 月 9 日〔22 日〕）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纪念“流血星期日”十二周年，我们有充分理由把这一天看作俄国革命的开端。

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信仰上帝、忠于皇上的人——在加邦神父的率领下，从城内各个地方前往首都中心区，前往冬宫前的广场，以便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工人们举着圣象前进，而他们当时的领袖加邦已经上书沙皇，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请求他出来接见人民。

军队调来了。轻骑兵和哥萨克挥舞军刀扑向人群，开枪扫射跪下来央求哥萨克放他们过去谒见沙皇的手无寸铁的工人。根据警察局的报告，当场死了 1000 多人，伤了 2000 多人。工人的愤怒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这就是 1905 年 1 月 22 日流血星期日的大致情况。

为了使你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我不妨把工人的请愿书念几段给你们听听。请愿书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住在彼得堡的工人，特来求见陛下。我们是些不幸的、受到侮辱的奴隶，我们备受专横暴政的欺压。当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停止了工作，请求我们的厂主哪怕是给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厂主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合法的。我们这里成千上万的工人也象全俄国的人民一样，没有一点人权。由于陛下的官吏之故，我们已变成了奴隶。”

请愿书列举了下面的要求：实行大赦，实现舆论自由，发给正常的工资，逐步把土地转交给人民，根据普遍的、平等的选举召开立宪会议。请愿书最后写道：

“陛下！请不要拒绝帮助您的人民！请消除陛下和人民之间的隔阂吧！请陛下降旨，并宣誓实现我们的请求，那时陛下将使俄国变成一个幸福的俄国！否则，我们就准备死在这里。我们只有两条道路：不是自由和幸福，就是坟墓。”

现在人们读这份由神父领导的没有文化教养的工人的请愿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人们不禁会感到，这份天真的请愿书同那些想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清谈家的社会和平主义者目前作出的各种和平决议，颇为相似。革命前俄国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不知道：沙皇是一个统治阶级即大地主阶级的首脑，这些大地主已经同大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准备用一切暴力手段来维护他们的垄断、特权和利润。今天的社会和平主义者总想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自居——可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期待正在进行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资产阶级政府来实现“民主的”和平，正如以为通过和平请愿能推动血腥的沙皇实行民主改革的想法一样，是非常愚蠢的。

尽管这样，他们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区别：今天的社会和平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伪君子，他们企图通过心平气和的劝说使人民脱离革命斗争；而革命前俄国没有受过教育的俄国工人，却用事实证明了他们是正直的人，他们第一次觉醒过来，开始具有政治觉悟。

而 1905 年 1 月 22 日的历史意义，恰恰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觉醒：他们开始具有政治觉悟并且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当时俄国自由派的领袖彼得·司徒卢威先生在“流血星期日”前两天这样写道，他那时在国外办了一个自由的、秘密的刊物。在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傲自大的和愚蠢透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领袖看来，认为没有文化的农民国家能够产生革命的人民，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当时的改良主义者正如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深信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

1905年1月22日（俄历9日）以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组成的，而当时的改良主义者（也正象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骂我们是“宗派”。几百名革命组织者，几千名地方组织的成员，每月最多不过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报（这些小报主要是在国外出版，经过重重困难，付出重大代价，辗转寄到俄国），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以前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俄国各革命党派的情况。这种情况就给既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理由，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

但是，在几个月之内，情况就大变了！几百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增加到了几千名，这几千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成了两三百万无产者的领袖。无产阶级的斗争在5000—10000万农民群众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风潮，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得到了军队的响应，又引起了军人的起义，并且使得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于是这个拥有13000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必须研究这次转变，了解它的可能性，它的所谓方法和道路。

这次转变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群众性的罢工。俄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它直接追求的而且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能够直接达到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大量的贵族大地产，即1792年和1793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大部分已经实现了的一些措施。

俄国革命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因为无产阶级是运动的领导力量和先锋队，而且还因为无产阶级特有的斗争手段即罢工，是发动群众的主要方法，是种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波浪式前进中的最突出的现象。

俄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起了非常巨大作用的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伟大的革命。是的，如果不根据罢工的统计材料来研究俄国革命的种种事件以及革命的政治形式更换的基础，那就永远也不能了解这些事件以及政治形式的更换。

我很清楚地知道，干巴巴的统计数字是非常不适合作口头报告的，是会把听众吓跑的。但是为了使你们能够估价整个运动的真正客观基础，我还是不能不引证几个化成整数的数字。俄国在革命前10年内，罢工者的人数平均每年为43000。所以在革命前整整10年里，罢工者的总数为43万。1905年1月，即革命的第一个月内，罢工者的人数为44万。这就是说，在仅仅1个月之内就比在过去整整10年中还多！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最先进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和德国，都没有发生过象1905年俄国那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罢工者的总数为280万，比工厂工人总数多一倍！这当然不是说，俄国城市工厂工人比他们的西欧弟兄教育程度更高、更有力量或斗争能力更强。其实恰好相反。

但是，这表明无产阶级的潜力是多么巨大。这表明，在革命时期——根据俄国历史上的最确切的材料，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肯定说——无产阶级能够发挥比平时大一百倍的斗争力量。这表明，人类直到1905年还不知道，当要真正为了伟大目标而斗争、真正革命地进行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力量可以并且一定会增加到多么令人吃惊、多么了不起的程度！

俄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最英勇不屈、最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的，正是雇佣工人的先锋队，雇佣工人的精华。工厂的规模愈大，罢工就进行得愈顽强，在同一年内罢工的次数就愈多。城市愈大，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作用也就愈大。在工人觉悟程度最高和人数最多的三个大城市——彼得堡、里加和华沙，罢工的人

数，按工人总数的比例来说，要比其他一切城市的罢工人数多得多，更不用提农村了。[注：手稿上这一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俄国的五金工人——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概也一样——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富有教益的事实：在 1905 年，俄国全国每 100 个工厂工人当中，罢工者有 160 人次。而在同年，每 100 个五金工人当中，罢工者有 320 人次！据统计，在 1905 年，每一个俄国工厂工人因为罢工平均要损失 10 个卢布（按战前汇率，约合 26 个法郎），可以说这是为了斗争而作出的牺牲。如果我们只拿五金工人来说，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数目就要比这大两倍！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分子走在前面，吸引动摇者，唤醒沉眠者，鼓励软弱者。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革命时期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交织在一起。毫无疑问，只有把这两种罢工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运动具有强大的威力。如果被剥削的广大群众不是每天都直接看到一些例子，说明各个工业部门的雇佣工人怎样迫使资本家立即直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那么要把这些群众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是不可能的。这个斗争使全俄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只是到这个时候，农奴制的、沉睡不醒的、宗法制的、虔信宗教的、恭顺的俄国，才真正从自己身上抛掉了旧亚当[2]；只是到这个时候，俄国人民才受到了真正民主的、真正革命的教育。

如果说资产阶级先生们以及他们的俯首贴耳的应声虫，即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也装模作样地谈论“教育”群众，那么他们所谓的教育通常是指摆出一副老师架子，搞学究式的东西，腐蚀群众，向群众灌输资产阶级偏见。

离开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之外，永远不可能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它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扩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启迪它的智力，锻炼

它的意志。因此，甚至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1905 年这个斗争的一年，这个“疯狂的一年”，把宗法制的俄国最终埋葬了。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 1905 年罢工斗争时俄国五金工人和纺织工人的对比情况。五金工人是工资最高、最有觉悟、最有文化的无产者。1905 年，俄国纺织工人的人数，比五金工人多一倍半以上，他们是最落后的、工资最低的群众，他们往往还没有同自己在乡间的农民家庭完全割断联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非常重要的事实。

在整个 1905 年当中，特别是在年底，五金工人的罢工表明，政治罢工超过了经济罢工。反之，我们看到，在纺织工人当中，1905 年初，经济罢工占压倒优势，只是到年底才转变为政治罢工占优势。因此，显而易见，只有经济斗争，只有为争取立即直接改善其生活状况的斗争，才能唤醒被剥削群众最落后的部分，才能给他们真正的教育，并且——在革命时代——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把他们组成政治战士的军队。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使工人的先锋队不要把阶级斗争理解成为少数上层分子谋利益的斗争，如同改良主义者经常蒙骗工人的那样，而要使无产者真正成为大多数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引导这大多数人本身参加斗争，如同在 1905 年的俄国曾经发生的情形那样，如同在即将到来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中无疑应当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的情形那样。［注：手稿上以上四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1905 年初，在全国出现了第一次罢工运动的巨大浪潮。同年春天，我们看到第一次大规模的，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农民运动已在俄国兴起。这个转折具有什么样的划时代的意义，只有记得如下情况的人才能了解，这种情况就是：俄国的农民只是在 1861 年才摆脱了最恶劣的农奴制度，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文盲，

生活极其贫困，受地主压迫，被神父愚弄，由于相隔很远，交通几乎完全闭塞，他们互相不通往来。

1825年俄国第一次发生了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几乎全是贵族。[3]从那时候起，到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恐怖分子刺死时止，站在运动前列的都是中间等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发扬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且以自己英勇的、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震惊了全世界。毫无疑问，这些牺牲并不是枉然的，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以后俄国人民的革命教育。但是他们的直接目的，即唤起人民革命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且也不可能达到。

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达到了这个目的。只有蔓延全国的群众性罢工浪潮，加上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痛教训，才把广大的农民群众从沉睡中唤醒。“罢工者”这个词在农民中间获得了新的意义：它的含义同叛逆者、革命者之类的词相近，而这以前是由“大学生”这个词表达的。但是“大学生”属于中等阶层，属于“有学问的人”，属于“绅士”，所以他们对于人民是异己的。相反，“罢工者”却来自民间，本身也是被剥削者；他们被赶出彼得堡之后，常常回到农村，向自己的农村同志们讲述那已经烧遍了城市的、既反对资本家也反对贵族的烈火。在俄国农村中出现了新型的人——青年农民，即所谓“有觉悟的人”。他们同“罢工者”联系，他们读报纸，向农民讲述城里发生的事件，向农村的同志们解释政治要求的意义，并且号召他们去进行反对贵族大地主、反对神父和官吏的斗争。

农民成群地聚集起来，讨论自己的处境，逐渐地加入了斗争：他们成群结队地起来反对大地主，烧毁他们的邸宅和庄园，或者抢劫他们的财物，夺取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的生活用品，打死警察，要求把贵族的土地即大地产转交给人民。

1905年春天，农民运动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它所波及的县份还只是少数，即1/7左右。

但是，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罢工和农村农民运动的结合，已足以动摇沙皇政府最“牢固的”和最后的支柱。我指的是军队。

海军和陆军中的军人起义开始了。在革命时期，每次罢工运动和农民运动浪潮的高涨，都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军人起义。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起义就是黑海舰队“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的起义。“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落入起义者手中之后，参加了敖德萨的革命，这次革命失败后，曾企图占领其他港口（如克里木的费奥多西亚），也没有成功，终于在康斯坦察投降了罗马尼亚当局。

现在我来跟你们详细谈谈黑海舰队这次起义中的一段小插曲，使你们能够具体了解事件发展到高潮时的情况：

“革命的工人和水兵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日益频繁起来。因为不准军人参加工人的群众大会，所以工人就成群结队地开始来参加士兵的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共同起事的主张获得了热烈的响应。在一些进步的连队里选出了代表。

于是军事当局决定采取措施。有些军官企图在群众大会上发表‘爱国的’演说，可是结果很惨：那些善于争论的水兵迫使自己的长官抱头鼠窜。由于这种办法不灵，便决定完全禁止召开群众大会。1905 年 11 月 24 日早晨，把一个全副武装的战斗连布置在海军营房的大门口。海军少将皮萨列夫斯基厉声命令说：‘不准任何人走出营房！违者枪毙！’水兵彼得罗夫从接受命令的这个连里走出来，当众把子弹上了膛，第一枪打死了比亚韦斯托克团里的上尉施泰因，第二枪打伤了海军少将皮萨列夫斯基。一个军官指挥说：‘逮捕他！’可是大家一动也没有动。彼得罗夫把自己的枪丢在地上说：‘你们干吗站着不动？把我抓起来吧！’彼得罗夫被逮捕了。水兵们马上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激烈地要求释放彼得罗夫，并且表示他们愿意给他担保。激愤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彼得罗夫，开枪是因为走火，对吗？——为了打开僵局，一个军官这样问道。

——怎么是走火呢？我走了出来，装上子弹，瞄准开枪，难道这是走火吗？

——他们都要求释放你……

彼得罗夫终于被释放了。但是水兵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于是逮捕了所有的值勤军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且把他们押送到办公室……约有 40 人的水兵代表商讨了一个通宵。决定释放这些军官，但是不准他们再到营房里来……”

这段不长的描述形象地告诉你们，多数军人起义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人民中间的革命风潮不能不影响到军队。值得注意的是，运动的领袖都是海军和陆军中的那样一些分子，他们主要是从产业工人中征募来的，他们有高度的技术素养，例如工兵。但是广大的群众都还太幼稚，太温和，太宽大，太富有基督教徒式的情绪。他们很容易激动，只要有一点不平，或者长官态度粗暴，伙食不好等等，都能引起他们的愤怒。但是缺乏坚毅的精神，对任务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们不了解，只有坚决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战胜一切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推翻政府和夺取全国政权，才是革命成功的唯一保证。

广大的海陆军士兵群众很容易哗变。但是他们也很容易做出象释放被捕军官这样幼稚的蠢事；他们轻信当局的诺言和劝说；这样当局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获得了援兵，瓦解了起义者的力量，最后就实行极其残酷的镇压，并且把领导者处死。

把 1905 年俄国的军人起义和 1825 年十二月党人的军人起义对比一下是特别有趣的。在 1825 年，领导政治运动的几乎全是军官，即由于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接触到欧洲的民主思想而受了感染的一些贵族军官。当时还是由农奴组成的士兵群众抱消极态度。

1905 年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当时的军官，除少数人外，不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情绪，就是具有直接反革命的情绪。而身穿军装的工人和农民则是起义的灵魂：运动成了人民性的运动，它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席卷了大多数被剥削者。当时所缺少的东西，一方面是群众缺乏刚毅果断的精神，极容易犯轻信的毛病，另一方面是身穿军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工人还缺乏组织，他们不懂得要掌握领导权，要领导革命的军队并且向政府的权力发动进攻。

顺便说一说，这两个缺点不仅会被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而且会被目前的战争所消除，——这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慢一些，但那是确定无疑的……［注：手稿上以上三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无论如何，俄国革命的历史，同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历史一样，使我们得到了一次无可争辩的教训：除非通过人民的军队的这一部分反对其另一部分的胜利斗争，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下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方法，都不可能战胜和消灭军国主义。光靠指责、咒骂、“否定”军国主义，批评和证明它的危害性是不够的，和平地拒绝服兵役是愚蠢的，我们的任务在于牢牢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并且不仅一般地而且具体地培养它的优秀分子，使他们在人民中一旦发生大风潮的时候能领导革命的军队。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每天的经验，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这些国家所经历的每个“小”危机，都小规模地向我们显示战斗的因素和萌芽，而这些战斗在大危机中不可避免地要大规模地反复 进行。比如，任何一次罢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危机又是什么呢？普鲁士内务大臣冯·普特卡默先生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在每一次罢工中都潜伏着革命这条九头蛇[4]。”他说得难道不对吗？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所谓最和平、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发生罢工就调动军队，这不是向我们表明，在真正的大危机中，事情会是怎样的吗？

现在我必须回头谈俄国革命的历史。

我已经向你们说明，无产阶级的罢工怎样震撼了全国，震撼了最广大、最落后的被剥削者阶层，农民运动是怎样开始的，它怎样得到军人起义的配合。

1905 年秋天，整个运动达到了最高点。8 月 19 日（6 日），沙皇颁布了成立帝国代表机关的诏书。所谓布里根杜马应当根据选举法建立，可是这个选举法规定只有少得可笑的人数有选举权并且没有赋予这个特殊的“议会”任何立法权，而只是给它以咨议协商的权力！

资产阶级、自由派、机会主义者都准备用双手来接受吓得魂不附体的沙皇的这份“礼物”。同所有的改良主义者一样，1905 年俄国的改良主义者也同样不能了解：在某种历史情况下，改良特别是关于改良的诺言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平息人民的风潮，迫使革命的阶级停止斗争，或者至少是要放松斗争。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非常清楚地了解 1905 年 8 月钦赐、施舍假宪法这种做法的真正性质。因此它及时地提出了口号：不要“咨议性”杜马！抵制杜马！打倒沙皇政府！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以便推翻沙皇政府！在俄国召集第一个真正人民代表会议的不应当是沙皇，而应当是临时革命政府！

历史证明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是正确的，因为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它还没有召集就被革命的风暴扫除了；革命的风暴迫使沙皇颁布新的选举法，这个选举法大大增加了选举者的人数，并且承认了杜马具有立法的性质。[注：手稿上以上四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1905 年的 10 月和 12 月，标志着俄国革命上升线的最高点。人民的革命力量的一切源泉比从前更广泛地涌现出来了。参加罢工的人数，正象我已经告诉你们的，在 1905 年 1 月是 44 万，1905 年 10 月超过了 50 万，请注意，这仅仅是一个月的数字！并且这只是工厂工人的罢工人数，几十万铁路工人、邮电职员等尚未计算在内。

俄国的铁路总罢工使铁路运输中断了，使政府权力严重地陷于瘫痪。大学的大门被打开了，讲堂在平时是专门用教授的哲理麻醉青年人的头脑、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忠实奴仆的地方，现在却变成千千万万的工人、手工业者、职员公开地、自由地讨论政治问题的集会场所了。

出版自由争到了。书报检查干脆被取消了。任何一个出版者都不敢向当局呈送审查样本，而当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干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报纸。仅仅在彼得堡就有社会民主党的三种日报，印数在 5 万份到 10 万份之间。

无产阶级走在运动的前列。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用革命手段争取八小时工作制。那时彼得堡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八小时工作制和武器！" 愈来愈多的工人认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决定而且将决定革命的命运。

在斗争的烈火中一个特殊的群众组织——著名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即各工厂代表的会议建立起来了。在俄国若干城市中，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日益起着临时革命政府的作用，起着起义的机关和领导者的作用。当时曾经试图建立士兵和水兵代表苏维埃，并且把它们和工人代表苏维埃联合起来。

在这些日子里，俄国某些城市经历了一段各种地方性的小"共和国"的时期，在这些地方，政府的权力被推翻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真正发挥了新的国家政权的职能。遗憾的是，这段时期太短了，"胜利" 太脆弱、太孤立了。

1905 年秋天，农民运动发展到更大的规模。当时，所谓的"农民骚动" 和真正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农民放火烧毁了约 2000 个庄园，分掉了贵族强盗从人民那里抢走的生活资料。

可惜这件事情干得很不彻底！可惜农民当时只消灭了全部贵族庄园的十五分之一左右，只消灭了要从俄国土地上彻底洗刷掉封建大地产的污点就应当全部予

以消灭的东西的十五分之一。可惜农民的行动太分散、太无组织、太缺乏攻势，而这也是革命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民族解放运动在俄国各被压迫民族中如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了。在俄国，半数以上，几乎五分之三（确切地说：57%）的居民遭受着民族压迫，他们甚至没有使用母语的自由，他们被强制实行“俄罗斯化”。例如，占俄国几千万居民的穆斯林，当时以惊人的速度——一般说来，那正是各种组织大发展的时代——组成了穆斯林同盟。

为了向到会的人，特别是向青年说明当时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怎样随着工人运动高涨起来，我不妨给你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1905 年 12 月，在几百个学校里，波兰学生烧毁了所有的俄文书籍、图片和沙皇的肖像，殴打了俄国教员和俄国同学，把他们赶出了学校，并且喊道：“滚回俄国去！”各中学的波兰学生还提出了如下的要求：“（1）所有的中等学校必须归工人代表苏维埃领导；（2）在各学校召开学生和工人联席会议；（3）准许在各中学穿红色短衫，作为学校属于未来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标志”，等等。

运动的浪潮愈高，反动派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就武装得愈卖力、愈坚决。1905 年的俄国革命，证实了卡·考茨基于 1902 年在他的《社会革命》一书中所写的东西（顺便说一下，他当时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作辩护）。他写道：

“……今后的革命……恐怕不会是突如其来的反对政府的起义，而多半是持久的国内战争……”

事情果真如此！在今后的欧洲革命中，事情也必将如此！

沙皇政府对犹太人特别仇视。一方面，在革命运动的领袖当中犹太人占的百分比（同犹太居民总人数相比较）特别大。顺便说一下，即使现在犹太人还有这样的功劳：在国际主义派的代表中他们所占的百分比比其他民族大得多。另一方

面，沙皇政府很善于利用最无知的居民阶层对犹太人的最卑劣的偏见。于是发生了多半受到警察支持的、甚至由警察直接领导反犹暴行——在这个时期，100 个城市里有 4000 多人被打死，10000 多人被打成残废——这种对犹太平民以及对他们的妻子儿女所进行的骇人听闻的摧残，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对血腥的沙皇政府的强烈的反感。我所指的当然是文明世界真正的民主分子的反感，这样的分子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即无产者。

资产阶级，即使是西欧最自由的共和国里的资产阶级，也善于巧妙地把反对“俄国的野蛮行为”的虚伪词句同最无耻的现金交易结合起来，特别是同在财政上支持沙皇政府以及通过资本输出对俄国进行帝国主义的剥削等结合起来。

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是 1905 年革命的顶点。一批人数不多的起义者，即一批已经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工人——他们总共不超过 8000 人——同沙皇政府进行了 9 天的战斗，沙皇政府非但不能信赖莫斯科的卫戍部队，反而必须把他们禁锢起来，只是由于从彼得堡调来了谢苗诺夫团，才算把起义镇压下去。

资产阶级喜欢把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叫作什么“人为的东西”而加以嘲笑。例如在德国的所谓“科学”界麦克斯·维贝尔教授先生就在一部论俄国政治发展的巨著中称莫斯科起义为“盲动”。这位“博学的”教授先生写道：“……列宁集团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早就准备了这次愚蠢的起义……”

要估价这位胆小的资产阶级教授的智慧，回忆一下枯燥的罢工统计数字也就够了。1905 年 1 月，在俄国参加纯政治罢工的人数只有 123000，在 10 月份有 33 万，在 12 月份达到了最高点，就是说，参加纯政治罢工的人数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有 37 万！回忆一下革命的增长，回忆一下农民和军人的起义，我们马上可以断定：资产阶级“科学界”对十二月起义的评价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胆小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无可奈何的遁词，因为资产阶级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看作是自己最危险的阶级敌人。

实际上，俄国革命的整个发展，必然导致沙皇政府同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武装决战。

我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指出了俄国革命遭到暂时失败的弱点在哪里。

从十二月起义被镇压时起，革命就开始走下坡路。在这段时期中也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况，特别是工人阶级中最有战斗精神的分子曾经两次企图中止革命的总退却，并且把这种退却变为新的进攻。

我作报告的时间快要完了，我不想多耽搁听众的时间。对于了解俄国革命最重要的东西，如革命的阶级性质、革命的动力和它的斗争手段这样的大题目，我认为，在一个简短的报告中一般所能谈到的，我都谈了。[注：手稿中，本段从“对于”起至末尾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关于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我还想作几点简单的说明。

俄国在地理上、经济上和历史上不仅属于欧洲，而且还属于亚洲。因此我们看到，俄国革命不仅彻底地把欧洲最大最落后的国家从睡梦中唤醒过来，造就了由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人民。

不仅如此。俄国革命使整个亚洲动起来了。土耳其、波斯、中国的革命证明，1905 年的强大起义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它在数以亿万计的人们的前进运动中发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俄国革命也间接地影响了西方各国。不应忘记，当关于沙皇的立宪诏书的电报于 1905 年 10 月 30 日到达维也纳的时候，这个消息对普选权在奥地利的最终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上，当埃伦博根同志——那时他还不是社会爱国主义者，而是一位同志——在作关于政治罢工的报告的时候，有人把这份电报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讨论立刻就停止了。我们到街上去！这个呼声响彻奥

地利社会党代表集会的大厅。于是接连几天，在维也纳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街头游行示威，在布拉格出现了街垒。普选权在奥地利的胜利被决定了。

经常可以听到西欧人这样评价俄国革命：似乎这个落后国家中的事变、过程和斗争方法很难同西欧的条件相比较，因此未必会有什么实际意义。

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

毫无疑问，在未来的欧洲革命中，未来的斗争形式和导火线，在很多方面都会与俄国革命中的不同。

但是，尽管这样，俄国革命——正因为具有我说过的那种特殊意义的无产阶级性质——仍然是未来欧洲革命的序幕。毫无疑问，未来的这次革命，也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并且是在更深刻得多的意义上，即按其内容来说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未来的这次革命将在更大得多的范围内表明：一方面，只有严酷的斗争，即国内战争，才能把人类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只有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才能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绝大多数被剥削者的领袖。

我们不要为欧洲目前死气沉沉的静寂所欺骗。欧洲孕育着革命。帝国主义战争的奇灾大祸，物价飞涨的痛苦使得到处都在产生革命情绪，而各国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及其代办即各国政府愈来愈陷入绝境，如果没有极大的震动，它们是决不能找到出路的。

如同 1905 年在俄国兴起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沙皇政府、争取民主共和制的人民起义一样，在最近几年内，正是由于这次强盗战争，欧洲也会发生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金融资本权力、反对大银行、反对资本家的人民起义，而这些震动只能以剥夺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

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会有幸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

注释：

[1]这个报告是 1917 年 1 月 9 日（22 日）列宁在苏黎世民众文化馆用德语向瑞士青年工人作的。为准备这个报告，列宁曾于 1916 年 12 月 7 日（20 日）写信给当时住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向他索取所需要的参考书（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7 卷）。本卷《附录》中载有这个报告的提纲（见第 395—399 页）。报告的其他准备材料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26 卷。——[313]。

[2]旧亚当意为旧的人。《旧约全书·创世记》说，亚当是上帝造的第一个人。——[320]。

[3]指 1825 年 12 月 14 日（26 日）俄国贵族革命家领导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十二月党人即由此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团体：1821 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1823 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团体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25 年 12 月 14 日（26 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当天上午，北方协会成员率领约 3000 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利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 70 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 1825 年 12 月 29 日

（1826 年 1 月 10 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 1826 年 1 月 3 日（15 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 1826 年 7 月 13 日（25 日）被绞死，121 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 4000 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1 卷第 261—268 页）中评价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322]。

[4]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326]。

远方来信[1]

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2]

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所引起的第一次革命已经爆发了。这第一次革命想必不会是最后一次革命。

这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即 1917 年 3 月 1 日**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根据在瑞士得到的有限的材料来看，已经结束了。这第一阶段想必不会是我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

一个已经维持了许多世纪并且在 1905—1907 年这三年极其伟大的全民的阶级搏斗中依然保持了下来的君主制度，竟在短短 8 天之内（这个天数是米留可夫先生在拍给俄国一切驻外代表的大吹大擂的电报中说的）就土崩瓦解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呢？

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仿佛是奇迹。

为了使沙皇君主制在几天之内就土崩瓦解，当时需要有许多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条件的配合。现在把其中的主要条件列举如下。

没有俄国无产阶级在 1905—1907 年三年间所进行的极其伟大的阶级搏斗和所表现出的革命毅力，第二次革命的进展就不会这样迅速，也就是说，这次革命的**开始阶段**就不会在几天之内完成。第一次（1905 年）革命深深地翻松了土壤，根除了世代相传的偏见，唤醒了数百万工人和数千万农民去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使俄国社会中**一切**阶级（以及一切主要政党）彼此表明了并且向全世界表明了它们的真正的本质，表现了它们的利益、它们的力量、它们的行动方式以及

它们的当前的目的和未来的目的的真正相互关系。第一次革命以及接着到来的反革命时期（1907—1914 年），暴露了沙皇君主制的全部实质，使它达到了“极限”，揭露了它的全部腐败和丑恶，揭露了以穷凶极恶的拉斯普廷为首的沙皇匪帮的极端厚颜无耻和放荡淫逸，揭露了罗曼诺夫家族的全部兽行，正是这些大暴行制造者使犹太人、工人和革命者的鲜血洒遍了俄国，正是这些**占有几百万**俄亩土地的“头号”**地主**为了保全自己**和本阶级的**“神圣的私有制”而无恶不作，无罪不犯，任意摧残和扼杀国民。

如果没有 1905—1907 年的革命，如果没有 1907—1914 年的反革命，俄罗斯民族和俄国境内其他民族中一切阶级的“自决”，这些阶级相互间以及它们对沙皇君主制的态度的决定，就不可能象在 1917 年二、三月革命的 8 天内表现得那样明确。这 8 天的革命就象是——如果可以这样譬喻的话——经过十来次主要的及次要的预演后所作的一次“表演”；“演员们”对于彼此的面貌、自己所扮的角色、自己所站的位置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都极为熟悉，连各种政治倾向和行动手段上稍微有点意义的细微差别也都揣摩得非常透彻。

但是，如果说被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及其走狗斥之为“大叛乱”的 1905 年第一次大革命，在 12 年之后引起了 1917 年“灿烂的”“光荣的”革命（它之所以被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宣告为“光荣的”革命，是因为它（**暂时**）给了他们政权），那还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强有力的、万能的“导演”，他一方面能大大加速世界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则能引起空前严重的世界危机，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危机。这里除了需要异常加速全世界历史的进展以外，还需要全世界历史的特别急剧的转折，才能让沾满血污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车子在这样一次转折中**一下子**倾覆。

这个万能的“导演”，这个强有力的加速者，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

说这次战争是全世界的战争，这在目前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因为合众国和中国今天已经有一半卷入了这场战争，明天就会完全卷进去。

说这次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在目前也是无可争辩的了。只有资本家及其走狗，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用一般批评性的形容语，而用大家熟悉的俄国政界的人名来表示），只有古契柯夫们和李沃夫们，米留可夫们和盛加略夫们，只有格沃兹杰夫们、波特列索夫们、契恒凯里们、克伦斯基们和齐赫泽们，才能否认或抹杀这个事实。**无论**德国资产阶级**或**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进行这次战争都是为了掠夺别的国家，为了扼杀小民族，为了确立对于世界的金融统治，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为了用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的手段来挽救濒于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

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

这一**转变过程**已由 1917 年的二、三月革命**开始了**，这次革命的第一阶段首先向我们表明，当时有两种力量共同打击沙皇制度：一方面是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和地主连同他们所有不自觉的追随者，再加上他们所有自觉的领导者，即英法两国的大使和资本家；另一方面是已经开始在吸收士兵和农民代表参加的**工人代表苏维埃**[3]。

有三个政治阵营，三种基本政治力量：（1）沙皇君主制政府——农奴主－地主的首脑，旧官吏和旧将军的首脑；（2）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十月党－立宪民主党，跟着他们跑的小资产阶级（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克伦斯基和齐赫泽）；（3）在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体贫苦居民群众中间寻找同盟者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三种**基本**政治力量甚至在“第一阶段”的 8 天之内就把自己的面貌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这甚至对于笔者这样一个远离事变发生地点，只能看到外国报纸上一点简略电讯的观察者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在详细说明这点以前，我应该先回头说一说我这封信中论述头等重大因素即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那一部分。

战争的**铁链**已经把各个交战的国家，各个交战的资本家集团，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们”，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奴隶主们连在一起了。**一团血污**——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关头的社会政治生活情景。

在战争开始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如德国的大卫之流和谢德曼之流，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等等，老早就痛骂革命家的“幻想”，痛骂巴塞尔宣言[4]的“幻想”，痛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种“梦幻般的滑稽剧”了。他们百般颂扬似乎是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生命力和适应性，——正是**他们**这批人曾经帮助资本家在各国工人阶级中间培养“适应性”和驯服性，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阶级。

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资产阶级并没有能长期推延战争所引起的革命危机的到来。这一危机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一切国家日益发展，从正遭遇着“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用一位不久前访问过德国的观察家的话来说）的德国起，直至**饥荒**也已逼来而组织得远不及德国那样“高明”的英法两国止。

在无组织现象最严重而无产阶级最革命（其所以最革命，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的品质，而是因为有“1905 年”的富于活力的传统）的沙皇俄国，革命危机自然就**最先**爆发了。这一危机因俄国及其盟国遭到多次最严重的失败而加速到来。这种失败动摇了全部旧的政府机构和全部旧制度，引起了全国**所有**阶级对它的仇恨，激起了军队的愤怒，大批地清除了那些带有因循守旧的贵族习气和腐败透顶的官僚性质的旧军事指挥人员，而代之以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多半是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军事指挥人员。那些公然对资产阶级摇尾乞怜或者简直是毫无气节的人，曾经大吵大闹地反对“失败主义”，他们现在面

临一个事实，这就是最落后最野蛮的沙皇君主制的失败同革命大火的**燃起**有历史的联系。

但是，如果说战争初期的失败起过加速爆发的消极因素的作用，那么英法两国金融资本，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同俄国十月党及立宪民主党的资本的**联系**，则是通过直接**策划**反尼古拉·罗曼诺夫的**阴谋**而加速这一危机到来的因素。

对于事情的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英法报刊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而保持缄默，德国报刊则幸灾乐祸地大肆渲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冷静地面对现实，交战的前一个帝国主义者集团的那些外交官和部长们的假仁假义的官场外交谎言也好，交战的后一个集团的那些在金融和军事方面同前者竞争的人的嬉皮笑脸和挤眉弄眼也好，都不能使我们困惑。二、三月革命的整个事变进程清楚地表明，英法两国大使馆以及它们的代理人和“内线”，为了阻止尼古拉二世（我们希望并且要设法使他成为末世）同威廉二世“单独”妥协和单独媾和，早就在作疯狂的努力了，他们联合十月党人[5]和立宪民主党人[6]，联合一部分将军以及军队中特别是彼得堡卫戍部队中的一部分军官，直接策划了以**废黜**尼古拉·罗曼诺夫为目的的阴谋。

我们决不给自己制造幻想。我们决不陷入某些人所犯的错误：象动摇于格沃兹杰夫—波特列索夫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之间、动不动就陷入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的“组委会分子”[7]或“孟什维克”那样，现在就准备歌颂工人党同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对立宪民主党的“支持”等等。这些人为了替自己那套陈旧的、背熟了的（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辩护，公然掩盖英法帝国主义者同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一起进行的阴谋活动，而这一阴谋活动的目的是要使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个“主要打手”下台，起用几个比较有活力的、有生气的、能干的**打手**来代替他。

革命胜利所以那样迅速，而且从表面上乍一看是那样彻底，只是因为在当时那种异常奇特的历史形势下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潮流**，两种**完全异样的**阶级利益，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倾向**汇合起来**了，并且是十分“和谐地”汇合起来了。其中一个方面是英法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他们曾经推动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一伙人去夺取政权，**以求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以求更疯狂更顽强地进行这场战争，以求**再屠杀数百万**俄国工农，好使古契柯夫之流获得君士坦丁堡……好使法国资本家获得叙利亚……好使英国资本家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等等；另一个方面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全体城乡贫苦居民）争取**面包**、争取**和平**、争取**真正自由**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深刻的运动。

谁要是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支持”用英国钞票“堆成的”、和沙皇帝国主义一样丑恶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帝国主义，那简直是愚蠢的。革命工人一直在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坏、今后还将彻底破坏可恶的沙皇**君主制**，至于在一个短暂的情况特殊的历史关头，布坎南、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一伙人**图谋另换**君主、最好**换成另一个**罗曼诺夫，这就**帮助了革命工人**，但革命工人并不因此而感到欢喜，也不感到不安！

事情就是如此，而且也只能如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不害怕真理，善于冷静地权衡革命中社会力量的对比，善于在估计任何“当前形势”时不只看到它今天的、现有的特性，而且还看到它更深的动因，看到俄国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更深刻的相互关系，他就会这样看问题，也只能这样看问题。

彼得格勒工人和全俄国其他地方的工人，为反对沙皇君主制，为争取自由，为农民争取土地，**为争取和平**，为反对帝国主义大厮杀，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英法帝国主义资本势力，为了继续进行和加强这场大厮杀，竟制造了宫廷倾轧，勾结近卫军军官策划阴谋，怂恿、鼓励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并暗中安

排了一个**已经完全拼凑好的新政府**，这个政府在沙皇制度遭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最初一些打击时就**夺得了政权**。

在这个新政府里，**真正重要的**岗位，战斗的岗位，决定性的岗位，即军队和官吏，都掌握在昨天还充当绞刑手斯托雷平的帮凶的十月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8]的手里，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手里，而米留可夫及其他立宪民主党人坐在那里则更多是为了装饰门面，为了充当招牌，为了发表甜蜜的教授式的演说，“劳动派分子”克伦斯基在这个政府里不过是当一个专用空话欺骗工农的丑角。这个新政府并不是偶然凑合起来的一群人。

这是已经上升到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早已**统治着**我国，并且在 1905—1907 年革命时期，在 1907—1914 年反革命时期，最后——而且是用特别快的速度——在 1914—1917 年战争时期，已经在政治上非常迅速地组织起来，已经把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9]等等抓在自己的手里。到 1917 年，这个新阶级已经“几乎完全”执掌了政权；所以沙皇制度一遭到打击就立即倾覆，为资产阶级扫清了地盘。帝国主义战争要求各种力量极度紧张化，大大地加速了落后的俄国的发展进程，使我们“一下子”（**仿佛**是一下子）就**赶上了**意大利和英国，并且几乎赶上了法国，获得了所谓“联合的”、“民族的”（即适合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和愚弄人民的）、“议会制的”政府。

除了这个政府（从**这次**战争看来，实际上不过是拥有亿万资本的“英法”“公司”的伙计），同时还产生了一个主要的、非正式的、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比较弱的**工人政府**，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城乡全体贫苦居民的利益。这就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它正在努力联系士兵和农民以及农业工人，当然，特别是农业工人，首先是农业工人，同他们的联系要甚于农民。

实际的政治形势就是如此，我们首先应该力求尽量客观准确地判明这一形势，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牢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沙皇君主制被打垮了，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摧毁。

想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府，其实是“英法”金融公司的一个伙计，它**不得不许诺**给人民一些自由和小恩小惠，而这些自由和小恩小惠是以不妨碍这个政府保持其统治人民的权力和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为限度的。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是工人政府的萌芽，是全体**贫苦**居民群众即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它正在努力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

这三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决定着目前的形势，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形势。

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是**不**深刻的，暂时的，是**仅仅**由一时的特殊情况引起的，即由帝国主义战争中事态的急剧转折引起的。**整个**新政府都是君主派，因为克伦斯基**口头上的**共和主义实在是不庄重的，是政治家所不齿的，**客观上**是玩弄政治手腕。新政府还没有彻底摧毁沙皇君主制，就已经**开始**同罗曼诺夫地主王朝**勾搭上了**。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需要**君主制政府作为官僚和军队的首脑，以便保护资本对于劳动者的特权。

说工人为了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势力就应该支持新政府（这样说的显然有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和契恒凯里之流以及说话**吞吞吐吐**的**齐赫泽之流**），这种人就是工人的叛徒，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和平和自由事业的叛徒。因为实际上**正是**这个新政府**已经**被帝国主义资本，被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掠夺政策束缚住了手脚，**已经**开始勾结（并没有征求过人民的意见！）王朝，**已经在为复辟沙皇君主制而工作**，已经在迎请新的沙皇接位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极，已经在设法

为他巩固宝座，废除正统的（合法的、靠旧法律维持的）君主制而代之以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式的（靠弄虚作假的人民投票维持的）君主制。

不，为了真正同沙皇君主制进行斗争，为了真正保证自由，不只是在口头上保证，不是靠花言巧语的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空口许诺，那就**不是**工人应该支持新政府，而是这个政府应该“支持”工人！因为获取自由和彻底摧毁沙皇制度的唯一的**保证**，就是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加强、扩大和发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意义和力量。

除此以外，一切都是空话和谎言，都是自由派和激进派阵营中的政客们的自欺欺人的把戏。

要帮助工人武装起来或至少要对这件事不加阻挠，——这样，俄国的自由就将不可战胜，君主制就不可能恢复，共和制就会得到保证。

不然，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就会恢复君主制，**丝毫**也不会实现、确确实实丝毫也不会实现他们所许诺的任何“自由”。**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贯都用诺言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

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府，即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即使真心诚意想给人民**和平、面包和自由**（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古契柯夫和李沃夫有诚意），那也**不可能**办到。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因为它是主战的政府，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政府，是从事**掠夺**的政府，它想掠夺亚美尼亚、加里西亚和土耳其，夺取

君士坦丁堡，重新侵占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边疆区等等。这个政府被英法帝国主义资本束缚住了手脚。俄国资本只是那个掌握着**数千亿**卢布名叫“英法”环球“公司”的分公司。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面包，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它**最多**只能象德国那样给予人民“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可是人民是不愿意忍饥挨饿的。人民会知道，而且大概很快会知道，面包是有的，而且也是可以取得的，但是只有采取**不崇拜资本与地产的神圣性**的手段才能取得。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自由，因为它是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它**畏惧**人民，并且已经开始勾结罗曼诺夫王朝了。

关于我们最近对待这个政府的策略任务问题，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里来阐述。那里我们将指出，当前形势即从革命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其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口号，即“当前任务”应该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第二阶段的胜利作好准备。**

现在，当我们只限于分析革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有哪些**同盟者**？

它有**两个**同盟者：第一个同盟者就是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千百万计的、广大的半无产者以及一部分小农群众。这批群众**需要**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这批群众必然会受资产阶级、特别是受就生活条件来说同他们最为接近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定影响，他们会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战争的残酷教训，因古契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这伙人愈坚决地进行战争而显得**愈**残酷的教训，**必然**会把这批群众推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迫使他们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新制度下的相对自由，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首先用最大的努力来**启发**和**组织**这批群众。成立农民代表苏维埃，成立农业工人苏维埃，这是最重大的任务之

一。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农业工人单独成立自己的苏维埃，而且要使贫穷困苦的农民离开富裕农民**单独**组织起来。关于现在所急需的这种组织工作的特殊任务和特殊形式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封信里谈。

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二个同盟者就是一切交战国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目前他们在颇大程度上受着战争的压制，而代表他们说话的往往是那些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格沃兹杰夫和波特列索夫一样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欧洲社会沙文主义者。可是，随着帝国主义战争一个月一个月地进行，无产阶级已经逐渐在摆脱他们的影响，而俄国革命又**必然**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

拥有这两个同盟者的无产阶级，**利用**目前过渡时期的**特点**，就能够而且一定能够首先争得民主共和国，争得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以取代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半君主制，然后再争得唯一能给备受战争折磨的各族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

注释：

[1]《远方来信》是列宁在瑞士为《真理报》写的一组文章。列宁获悉俄国发生革命的确实消息以及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组成情况以后，就开始写这些文章。第一封信至第四封信写于 1917 年 3 月 7—12 日（20—25 日），第五封信于 3 月 26 日（4 月 8 日）即离开瑞士回俄国的前一天动笔，没有写完。第一封信经《真理报》编辑部作了删改后，发表于 1917 年 3 月 21 日和 22 日（4 月 3 日和 4 日）该报第 14 号和第 15 号（这封信第一次全文发表于 1949 年《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23 卷）。第二、第三、第四封信当时没有发表。第五封信的思想后来在《论策略书》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两篇著作中得到了发挥。列宁回国前曾采取措施在侨居法国和瑞士的布尔什维克中间散发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9。

[2]《远方来信。第一封信》在《真理报》发表时被编辑部删去了约五分之一，主要删去了列宁对妥协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首领们趋奉资产阶级并试图掩盖英法政府代表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一起参与推翻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一事实的评述，以及对临时政府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君主主义和帝国主义意图的揭露。——9。

[3]指 1917 年 2 月 27 日（3 月 12 日）成立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

俄国二月革命中，彼得格勒各工厂企业先后选举了苏维埃代表。2 月 27 日（3 月 12 日）白天，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库·安·格沃兹杰夫、波·奥·波格丹诺夫和国家杜马孟什维克代表尼·谢·齐赫泽、马·伊·斯柯别列夫等人为了取得苏维埃的领导权，组织了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当天晚上，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了由 15 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杜马党团的领导人齐赫泽当选为主席，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委员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彼·安·扎卢茨基。社会革命党最初反对组织苏维埃，后来向苏维埃派出自己的代表弗·亚·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弗·米·晋季诺夫。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它是工人和士兵代表的机关。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17 年 6 月）以前，它实际上是全俄的中心。3 月 1 日（14 日），有 10 名士兵和水兵代表被选进执行委员会，其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亚·尼·帕杰林和安·德·萨多夫斯基，工人代表苏维埃从此改称工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齐赫泽、尤·米·斯切克洛夫、波格丹诺夫、彼·伊·斯图契卡、彼·阿·克拉西科夫、格沃兹杰夫等。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于 2 月 28 日（3 月 13 日）发表了《告彼得格勒和全国居民书》，号召人民团结在苏维埃周围，把管理全部地方事务的权力掌握在

自己手中。它派遣特派员到全市各区建立人民政权机关。3 月 3 日（16 日），苏维埃成立了粮食、军事、城防、书刊等专门委员会。

尽管苏维埃的领导权掌握在妥协派手中，但是在革命工人和士兵的压力下它还是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如逮捕旧政权的代表，释放政治犯等。苏维埃还着手组织民兵，每 1000 名工人中有 100 人参加民兵。3 月 1 日，苏维埃发布了《给彼得格勒军区卫戍部队的第 1 号命令》，规定军队在政治行动中服从苏维埃，各种武器转交给选举产生的连委员会和营委员会支配和控制，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命令只有在不和苏维埃的命令相抵触的情况下才予以执行等。

当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苏维埃手里。但是在关键时刻，3 月 1 日夜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妥协派领导人却自愿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同意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临时政府。这种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行为，列宁在国外无法得知。他是在回到俄国后才获悉这一情况的（见本卷第 236 页）。——12。

[4]巴塞尔宣言即 1912 年 11 月 24—25 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 1907 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3。

[5]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右翼。该党于 1905 年 11 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 1905 年 10 月 17 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

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4。

[6]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 1905 年 10 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 1917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1 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 年 5 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4。

[7]“组委会分子”是指由组织委员会统一的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 1912 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孟什维克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我们的事业》、《事业》、《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 年 8 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

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 年 2 月—1917 年 3 月在日内瓦出版。——14。

[8]和平革新党人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和平革新党的成员。和平革新党是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织的，1906 年 6 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1907 年选出）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 1912 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16。

[9]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 1915 年 5 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 年 7 月，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除讨论经济问题外，还提出了建立得到国家杜马信任的政府等政治问题。大会选出十月党人亚·伊·古契柯夫（任主席）和进步党人亚·伊·柯诺瓦洛夫为首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企图操纵全国的经济，然而沙皇政府几乎在军事工业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就采取对策，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即国防、运输、燃料和粮食等“特别会议”。这就使军事工业委员会实际上只充当了国家和私营工业之间的中介人。1915 年 7 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 244 个地方军事工业委

员会中，只有76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58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年7月24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16。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1]

列宁（1917 年 4 月 4 日和 5 日〔17 日和 18 日〕）

4 月 3 日夜里我才回到彼得格勒，所以我在 4 月 4 日的会议上作关于革命无产阶级任务的报告时，当然只能用我个人的名义，并且预先声明没有充分准备。

为了使我自己和**诚实的**反对者便于工作，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准备了**书面**提纲。我宣读了这份提纲，并把它交给了策列铁里同志。当时我读得非常慢，而且读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后来一次是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上。

现在我把我的这份提纲交去付印，只加了一些极其简短的注释，而在报告的当时，这些注释要发挥得详尽多了。

提纲

1. 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我们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上，决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

觉悟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同意进行真正能够证明革命护国主义是正确的革命战争：（1）政权转到无产阶级以及跟随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2）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放弃一切兼并；（3）真正同资本的一切利益完全断绝关系。

拥护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的群众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认为只是出于不得已才进行战争，而不是为了侵略去进行战争；他们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因此，我们必须特别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说明

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反复证明，要缔结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

要在作战部队中广泛宣传这种观点。

举行联欢。

2．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这个过渡的特点是：一方面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另一方面没有用暴力压迫群众的现象，而且群众对这个资本家政府，对这个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

这种特点要求我们，在刚刚觉醒过来参加政治生活的极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党的工作时必须善于适应这种**特殊**条件。

3．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是“要求”**这个**政府即资本家政府**不再是**帝国主义政府，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容许的。

4．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比起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一切**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盟**——从人民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起直到组织委员会（齐赫泽、策列铁里等）、斯切克洛夫等等止——暂时还处于较弱的少数地位。

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当**这个**政府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

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宣传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5. 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注：即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6．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点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

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

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单独组织贫苦农民代表苏维埃。把各个大田庄（其面积约 100 俄亩至 300 俄亩，根据当地条件和其他条件由地方机关决定）建成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

7．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

8．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9．党的任务：

（1）立刻召开党代表大会；

（2）修改党纲，主要是：

（ａ）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ｂ）对国家的态度以及**我们**关于"公社国家"[注：即由巴黎公社提供了原型的那种国家。] 的要求；

（ｃ）修改已经陈旧的最低纲领；

（3）更改党的名称［注：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在世界**各地**都背叛社会主义，投奔资产阶级了（如“护国派”和动摇的“考茨基派”），所以我们不应再叫“社会民主党”，而应改称**共产党**。］。

10．革新国际。

发起建立革命的国际，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注：所谓“中派”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摇摆于沙文主义者（＝“护国派”）和国际主义者之间的那个派别，即德国的考茨基之流，法国的龙格之流，俄国的齐赫泽之流，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英国的麦克唐纳之流等等。］相对立的国际。

为了使读者了解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诚实的反对者（这样的“事例”是罕见的例外），我请读者把下面戈尔登贝格先生的反对意见同这个提纲比较一下，他说：列宁“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竖起了内战的旗帜”（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先生的《统一报》[2]第 5 号）。

这岂不是奇谈吗？

我写的、宣读的和反复说明的是：“拥护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的**群众**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因此，我们必须**特别**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

而资产阶级中那班既**不**属于拥护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也**不**属于护国主义**群众的**、自称社会民主党人的先生们，竟然聪明地把我的观点转述成这样：“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竖起了〈!〉内战〈无论在提纲或报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内战!〉的旗帜〈!〉……”

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呢？这同鼓吹大暴行有什么区别呢？这同《俄罗斯意志报》[3]有什么区别呢？

我写的、宣读的和反复说明的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

而某些反对者却把我的观点说成是号召"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进行内战"!!

我抨击临时政府，是因为它不但**没有**确定近期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甚至根本没有确定召开的日期，只是用些诺言来搪塞。我曾一再说明，**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宪会议的召开是没有保证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有人硬把一个观点加在我的头上，说我反对尽快召开立宪会议!!!

如果不是几十年的政治斗争教会我把反对者的诚实看作罕见的例外，那我也许要把这种话叫作"梦话"了。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报纸上把我的讲话叫作"梦话"。真是好极了，普列汉诺夫先生！但是请看看，你自己在论战中是多么愚蠢、笨拙和迟钝。假使我讲了两个钟点的"梦话"，为什么几百个听众会听得下去呢？其次，为什么你的报纸竟用整栏篇幅来叙述这些"梦话"呢？这是你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

当然，喊叫、谩骂、哀号，比起试着叙述、解释和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1872年和1875年**怎样**谈论巴黎公社的经验［注：参看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和卡·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和17日给路·库格曼的信，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弗·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370页，第33卷第206—207、210—211页，第18卷第104—105页，第19卷第7—8、30—32页）。——编者注］以及无产阶级需要**哪种**国家来，要容易得多。

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先生，大概不愿意再想起马克思主义了吧。

罗莎·卢森堡 1914 年 8 月 4 日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叫作“一具发臭的死尸”，我引用了她的话。而普列汉诺夫先生们、戈尔登贝格先生们等等却“叫起屈来了”……为了谁呢？为了那些被叫作沙文主义者的**德国**沙文主义者！

可怜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已经头脑发昏了。

注释：

[1]《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最初发表于 1917 年 4 月 7 日（20 日）《真理报》第 26 号，署名尼·列宁，随后为俄国各地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所转载。著名的《四月提纲》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发表的。4 月 4 日（17 日），列宁在塔夫利达宫的两个会（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和布尔什维克代表与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提纲。列宁当时把提纲交给了《真理报》的一个编委，叮嘱他于次日全文发表。但是由于印刷厂机器出了故障，提纲未能在 5 日刊登出来。——113。

[2]《统一报》(《Единство》)是俄国孟什维克护国派极右翼集团统一派的报纸，在彼得格勒出版。1914 年 5—6 月出了 4 号。1917 年 3—11 月为日刊。1917 年 12 月—1918 年 1 月用《我们的统一报》的名称出版。编辑部成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尼·瓦·瓦西里耶夫、列·格·捷依奇和尼·伊·约尔丹斯基。该报持极端沙文主义立场，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用下流报刊的手法攻击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116。

[3]《俄罗斯意志报》（《Русская Воля》）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由沙皇政府内务大臣亚·德·普罗托波波夫创办，1916 年 12 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该报靠大银行出钱维持。1917 年二月革命后，该报大肆诽谤布尔什维克。列宁称它是最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1917 年 10 月 25 日被查封。——117。

论策略书[1]

列宁（1917 年 4 月 8 日和 13 日〔21 日和 26 日〕之间）

说明

1917 年 4 月 4 日，我在彼得格勒就标题所点出的问题先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当时到会的都是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代表，他们就要回到各地去，因此不容我有任何拖延。会议结束后，主席格·季诺维也夫同志代表全体到会同志向我提议，要我随即在准备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2]上再作一次报告。

不管立刻再作一次报告对我来说有多么困难，既然**我自己的同志**和孟什维克都有这种要求，而他们又因归期在即，确实不容我拖延，我也就没有权利推辞了。

在报告会上，我把我那篇发表在 1917 年 4 月 7 日《真理报》第 26 号上的提纲［注：我把登在这一号《真理报》上的提纲连同简要注释附在这封信的后面。（见本卷第 113—118 页。——编者注）］念了一遍。

无论提纲或是我的报告，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和《真理报》编辑部都引起了一些分歧。经过多次商谈，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把这些分歧拿出来公开讨论，这样，可以给将在 1917 年 4 月 20 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我党（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供材料。

为了执行这个展开讨论的决定，我把下面这几封**信**刊印出来，在这些信里，我并不想对问题作**全面的**研究，而只想提出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实际**任务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几个主要论据。

第一封信 对形势的估计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566 页。——编者注]，他们公正地讥笑了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做法，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样的任务必然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有所改变。

现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根据哪些确切肯定的客观**事实**来确定自己的任务和活动方式呢？

在登载于 1917 年 3 月 21 日和 22 日《真理报》第 14 号和第 15 号上的我的第一封《远方来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中，以及在我的提纲里，我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因此我认为，**这一时期的基本口号或“当前任务”就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第二阶段的胜利作好准备。”(《真理报》第 15 号）[注：见本卷第 20 页。——编者注]

第一阶段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中。

1917 年二、三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是掌握在一个旧阶级即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农奴主－贵族－地主阶级的手里。

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另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这个新阶级手里。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这里，我们会听到喜欢把自己称作“老布尔什维克”的那些反对者的喧嚷声：难道我们不是向来都说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难道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事实不正相反，土地革命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主张**总的说来**已得到历史充分的证实；但是**具体**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忽略或忘记这一事实，就会重蹈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起过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覆辙，他们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注：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使它变了样。

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任务，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公社派的”即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革命护国派，即反对走向公社，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实行分裂。

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作“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得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变异。关于这些变异，我将在以后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注：见约·沃·歌德《浮士德》第 1 部第 4 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

按照旧方式，结论是：**继**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才可能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因为不要忘记，彼得格勒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新政府**没有**而且也无法对他们施加暴力，——无论警察、脱离人民的军队或是权势极大的**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都**不存在**。这是事实。这正是反映了巴黎公社类型国家的特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旧公式包括不了的。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实际生活，而不是重复一些已经失去意义的关于**一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词句。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以便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现在执政的是资产阶级。而农民群众难道不**也是**另一阶层、另一类型、另一性质的资产阶级吗？怎么能得

出结论说**这一**阶层**不能**取得政权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呢？

老布尔什维克往往是这样议论的。

我的回答是：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形势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士兵和农民的代表，自由地进入了第二个政府即附属政府，自由地补充、发展和完善着这个政府。同时，他们又同样自由地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这是一种丝毫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现象，因为我们向来知道，并曾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维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还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

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太可笑了。

农民取得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权，这是可能的。我不仅没有忘记这种可能，没有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今天，而且我在直接地确切地表述土地纲领时还估计到一种**新**现象，即贫雇农和农民业主之间发生着更深刻的分裂。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农民会听从社会革命党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劝告；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受了资产者的影响，转向护国主义，劝告人们等待立宪会议，虽然这个会议直到现在连召开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注：为了使我的话不被人误解，我马上要预先声明：我绝对赞成雇农和农民**苏维埃立刻**夺取**全部**土地，但是，它们**自己**要严格遵守秩序和纪律，丝毫不能毁坏机器、建筑物和牲畜，万万不能破坏经济和粮食生产，而要**加强**生产，因为士兵需要**加倍**的粮食，人民也不应当再挨饿。]

可能，农民会继续**保持**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协议，保持他们目前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忘记土地运动和土地纲领，将是极大的错误。但是忘记**现实**，同样会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现实向我们表明了资产阶级同农民已达成**协议的事实**，或者用更确切的、少带法律含义而多带经济和阶级含义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同农民已实行**阶级合作**的事实。

只有这一事实不再成为事实，只有农民离开资产阶级，夺取土地、夺取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只有那时，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而这一点要留待以后专门去谈了。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想到将来可能有这样的阶段，而忘记在农民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现在**自己所负的责任，他就会变成一个小资产者。因为他在实际上会鼓动无产阶级去**信任**小资产阶级（“它，这个小资产阶级，这些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就一定会同资产阶级分开”）。他只想到“可能”有一个愉快而甜蜜的未来，那时农民**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他只想到“可能”有这样一个愉快的未来而忘记了**不愉快的现在**，忘记了农民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目前还在充当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充当李沃夫“陛下”的反对派[3]。

我们上面所假设的这种人，很象甜蜜蜜的路易·勃朗和媚人的考茨基分子，决不象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

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4]，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目前俄国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

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么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

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一点也没有布朗基主义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也正象马克思在 1871 年、恩格斯在 1891 年所详细论述过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355—370 页和第 22 卷第 216—229 页。——编者注］，这种经验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充分保证**大多数人**实行直接的、绝对的统治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我在提纲中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要在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为了避免对这一点产生任何怀疑，我在提纲中**两次**着重指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持不懈的、“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的“说明”工作。

愚昧无知的人或普列汉诺夫先生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可以叫喊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谁只要肯思索和学习，谁就不能不知道，布朗基主义是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而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却**明明**是**大多数**人民的公开的直接的组织。在这样的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自然不会而且绝对不会陷入布朗基主义的泥潭。这样做，也不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因为无政府主义就是否认在从资产阶级统治向无产阶级统治**过渡**的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而我则用丝毫不会引起误会的明确态度，**坚决主张**在这个时期必须有国家，不过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和巴黎公社的经验，这种国家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而是**没有**常备军、**没有**同人民对立的警察、**没有**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的国家。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统一报》上拚命地叫喊无政府主义，这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我在《真理报》（第 26 号）上曾向普列汉诺夫挑战，要他谈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71、1872、1875 年在国家问题上是怎样教导的，

［注：本卷第 118 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质只能是默不作答，只能象被激怒了的资产阶级那样咆哮一通。

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先生，**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顺便提一下，在他那本论无政府主义的德文小册子[5]里，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不懂的迹象了。

※　※　※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尤·加米涅夫同志在《真理报》第 27 号上的一篇短评中是怎样表述他同我的提纲和上述意见的“分歧”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更确切地了解我的提纲和上述意见。

*加米涅夫同志写道：“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里有两大错误：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问题**提得**不正确。这种抽象的、简单的、单色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提法，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谁**这样**提问题，谁**现在只是**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已经完成”，谁就无法了解极其复杂的至少是“两色”的现实。这是从理论上说。而在实践上，他就是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举手投降。

确实是这样。现实告诉我们，**一方面**是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除了现实的政府外，还存在着一个附属政府，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后一个“也是政府”，它**自己**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自己**使自己依附于资产阶级政府。

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

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

第二，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不知道，现在在俄国是否还能建立一个**脱离**资产阶级政府的**单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不能建筑在情况不明的基础上。

如果这样的专政还有可能，那么，走向这种专政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立刻坚决地、彻底地使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离。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小资产阶级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转向了沙文主义（＝护国主义），“支持”资产阶级，依赖资产阶级，**害怕**撇开资产阶级等等。

这个小资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取得政权，但是它**不愿意**，那怎么才能“推动”它去执掌政权呢？

只有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分离出来，**摆脱**这些小资产者的畏缩心理，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团结起来，才能使小资产阶级觉得脚下发“烫”，在一定条件下**不得不**把政权拿过来；甚至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也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也会赞成齐赫泽、策列铁里、社会革命党人和斯切克洛夫掌握无限权力，建立单一政权，因为这些人毕竟都是“**护国派**”！

谁立即迅速而彻底地使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离，谁就是在下述两种可能情况下正确地反映运动的利益，**一种情况**是俄国还会出现一个单独的、自主的、不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一种情况**是小资产阶级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永远（也就是一直到社会主义来临）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我们之间。

谁只是根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个简单的公式行事，谁就象是在保证小资产阶级一定能够不依赖资产阶级。这样做他也就是在目前乖乖地向小资产阶级投降。

附带说一下，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公式”，不妨回忆一下我在《两种策略》（1905 年 7 月）中特别强调的一段话（《十二年来》第 435 页）：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1 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 10 章《“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编者注］

加米涅夫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到了 1917 年，还只看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过去**。而**实际上**，这个专政的**未来**已经开始，因为雇佣工人和小业主这两者的利益和政策**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分歧，并且是在“护国主义”、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这样的极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这里我要涉及加米涅夫同志上述议论中的第二个错误。他责备我，说我的公式“指望”“这个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不对的。我不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直接提醒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在提纲的第 8 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注：见本卷第 116 页。——编者注］

一个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是不可能反对把实施社会主义当作直接任务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俄国建立“公社国家”（即按照巴黎公社类型建立起来的国家），也**不能**“立刻”办到，因为这需要所有（或大多数）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代表都清楚地认识到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等人的策略和

政策的全部错误和全部危害。而我十分明确地声明过，我在这方面只“指望”“耐心的”说明（如果要实现“立刻”就能实行的转变，还用得着耐心吗？）！

加米涅夫同志有点“不耐心地”说过了头，他重复了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偏见，似乎巴黎公社想“立刻”实施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可惜的是公社迟迟没有实施社会主义。公社的真实本质并不在资产者通常寻找的那些地方，而在于它创立了一种特殊的**国家**类型。这样的国家在俄国**已经**诞生，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

加米涅夫同志没有深入思考**事实**，思考**目前存在的**苏维埃的意义，思考苏维埃在类型上、在社会政治性质上同巴黎公社国家的一致，他不去研究**事实**，却开始谈论我似乎“指望”“立刻”会发生的事情。很遗憾，他是在重演许多资产者的故伎：不让人们注意迫切的、现实的、实际生活提出来的问题，如**什么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按类型来说是否**高于**议会制共和国，它是否**更有益**于人民，是否**更民主**，是否**更有利**于斗争（例如同缺粮作斗争）等等，而引导人们去注意“指望立刻转变”这种空洞的、貌似科学而实际毫无内容的、教授们感兴趣的毫无生气的问题。

这是一个空洞的虚构的问题。我所“指望”的**仅仅是**，**无非**是：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处理增加粮食生产、改善粮食分配、改善士兵给养等等**实际**困难问题上，会比官吏和警察高明。

我深信，工兵代表苏维埃会比议会制共和国更快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关于这两种国家类型的比较，在另一封信里再详谈）。它们会更好地、更实际地、更正确地决定怎样才能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以及究竟能够采取哪些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对银行实行监督，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今天，德国的容克和资产者正采取这种

步骤来对付人民。明天，只要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它就会更好得多地采取这种步骤来为人民谋福利。

是什么东西**迫使**我们采取这种步骤的呢？

是饥荒，经济失调，即将临头的崩溃，战争的惨祸，以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惨痛的创伤。

加米涅夫同志在他的短评的结尾说："在广泛的讨论中，他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被接受，这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唯一可能接受的观点，因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希望继续成为而且应该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党，而不至于变成共产党员宣传员的小团体。"

我认为，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形势的估计是非常错误的。加米涅夫同志把"群众的党"和"宣传员的小团体"对立起来。但是要知道，"群众"现在正好感染上"革命"护国主义的狂热。在这种时候，一个国际主义者能够抵制"群众的"狂热，不是比"希望继续"同群众"在一起"，即一起感染上流行病要更体面些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在欧洲各交战国里，沙文主义者不也是借口希望"继续同群众在一起"来为自己辩护吗？难道不应该在一定时期内站在少数地位来反对"群众的"狂热吗？为了把无产阶级的路线从"群众的"护国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中**解脱**出来，宣传员的工作不正好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吗？？把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搅在一起，不分析群众内部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护国主义得以流行的条件之一。轻蔑地谈论**无产阶级**路线的"宣传员的小团体"，恐怕不太妥当吧。

注释：

[1]《论策略书。第一封信》这本小册子在 1917 年内由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波涛出版社出了 3 版，每一版都附有列宁的《四月提纲》。小册子的第 1 版是在 4

月 27 日（5 月 10 日）前，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 4 月 29 日（5 月 12 日）表决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案的前几天出版的。——135。

[2]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于 1917 年 4 月 4 日（17 日）举行。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还有：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真理报》、《统一报》、《工人报》、《消息报》的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历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各民族社会党的代表和地方代表。在会议上，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在弗·萨·沃伊京斯基、尼·谢·齐赫泽和伊·格·策列铁里的支持下，发言呼吁各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接着列宁作了报告，反对在当时情况下统一的主张。他的报告遭到孟什维克策列铁里、戈尔登贝格、费·伊·唐恩等人的攻击。亚·米·柯伦泰发言维护列宁的纲领。为了表示抗议，布尔什维克退出了会议，同时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项声明，表示布尔什维克将不参加任何统一的尝试。——135。

[3]陛下的反对派一语出自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帕·尼·米留可夫的一次讲话。1909 年 6 月 19 日（7 月 2 日），米留可夫在伦敦市长举行的早餐会上说："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院的时候，俄国反对派始终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见 1909 年 6 月 21 日（7 月 4 日）《言语报》第 167 号）——142。

[4]"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是亚·李·帕尔乌斯在 1905 年提出的，后来成了俄国托洛茨基分子的一个论点。——142。

[5]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该书最初于 1894 年用德文在柏林出版。——143。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

列宁（1917 年 4 月 10 日〔23 日〕）

俄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关头有下列基本特征：

这次革命的阶级性

1．仅仅代表一小撮操纵全部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官吏）的农奴主－地主的旧沙皇政权已经被打碎和废除，但还没有被彻底摧毁。君主制还没有正式废除。罗曼诺夫匪帮还在策划保留君主制的阴谋。农奴主－地主的大土地占有制还没有消灭。

2．俄国的国家政权已经转到一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就这一点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同那些在 1906—1914 年间异常热心地拥护血腥的尼古拉和绞刑手斯托雷平的公开君主派（如古契柯夫和其他一些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右的政治家）缔结了同盟。李沃夫之流的资产阶级新政府，企图而且已经开始同罗曼诺夫家族就在俄国恢复君主制问题进行谈判。这个政府在革命词句的掩护下，任命旧制度的拥护者担任国家要职。这个政府把国家机器的全部机构（军队、警察、官吏）交给资产阶级，力求使整个机构的改革愈少愈好。新政府已开始竭力阻挠群众的革命创举，不让人民**从下面**夺取政权（这是革命真正胜利的**唯一**保障）。

直到现在，这个政府连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它并不触动地主土地占有制这一农奴主沙皇制度的物质基础。对金融垄断组织、大银行、资本家的辛迪加和卡特尔等等的活动，它根本不想去调查、公布和监督。

新政府中有决定意义的最主要的部长职位（内务部、陆军部，即指挥军队、警察、官吏，指挥压迫群众的全部机构的司令部），都属于明显的君主派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这些昨天的共和派，违背自己意愿的共和派，只得到一些不能直接**指挥**人民、同国家政权机构没有直接关系的次要职位。劳动派代表和“也是社会党人”的亚·克伦斯基，除了用响亮的词句麻痹人民的警惕性，转移人民的注意力，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由于这一切原因，即使在对内政策上，资产阶级新政府也不配享有无产阶级的丝毫信任，而无产阶级也不应当予以任何支持。

新政府的对外政策

3．由于客观条件，现在对外政策提到了首要地位；新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是为了瓜分资本主义赃物，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同英法等帝国主义强国勾结起来进行战争的政府。

新政府屈从于俄国资本及其强有力的保护者和主子即世界上最富有的英法帝国主义资本的利益，违反由兵工代表苏维埃代表俄国绝大多数民族十分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愿望，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去制止各民族为资本家的利益而互相残杀。它甚至不公布那些明明具有掠夺内容（瓜分波斯，抢劫中国，抢劫土耳其，瓜分奥地利，夺取东普鲁士，夺取德国殖民地等等）、明明把俄国和英法帝国主义强盗资本联结在一起的秘密条约。它**承**认沙皇政府缔结的这些条约；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其他专制魔王掠夺和压迫了更多的民族，它不仅压迫大俄罗斯民族，而且玷污和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它变成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

新政府在承认这些可耻的掠夺性条约以后，违反由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俄国大多数民族明白提出的要求，不向交战的各国人民建议立刻停战。它只是用一些

冠冕堂皇、有声有色、但毫无内容的宣言和词句来敷衍搪塞，这样的宣言和词句在资产阶级的外交家口里，一向是用来欺骗被压迫人民中轻信而幼稚的群众的。

4．因此，新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不配享有丝毫信任，不仅如此，向它继续提出要求，要它表达俄国各族人民的和平意志，要它放弃兼并等等，实际上也只是欺骗人民，让人民空抱不能实现的希望，阻碍人民觉醒，间接使人民容忍战争继续打下去，而这一战争的真正社会性质，则不是由善良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进行战争的政府的阶级性质，由这个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同俄、英、法等等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联系，以及由这个阶级所实行的**真正的实际政策**决定的。

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和它的阶级意义

5．我国革命最主要的特点，最需要慎重对待的特点，就是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天内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所谓两个政权并存，就是说有**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掌握全部政权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补充的、附加的、“监督性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但是它直接依靠显然是绝大多数的人民，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 年 3 月的俄国革命不仅推翻了整个沙皇君主制，不仅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经到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武装的居民群众的直接力量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6．俄国革命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显然得到大多数地方苏维埃信任的彼得格勒兵工代表苏维埃，竟**自愿**把国家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

自愿把首位**让给**临时政府，同它达成支持它的协议，而自己则只是充当监视和监督立宪会议的召开（召开的日期，临时政府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宣布）的角色。

这种史无前例的异常独特的情况，使**两种**专政**交织在一起**：一种是资产阶级专政（因为李沃夫之流的政府是一种专政，就是说，是既不依靠法律，也不依靠预先表示出来的民意，而是依靠暴力夺取的一种政权，而且这种夺取是由一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来实现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工兵代表苏维埃）。

毫无疑问，这种“交织”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一国之内**决不能有**两个政权。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现在，俄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在各处拚命用各种办法排除、削弱和消灭兵工代表苏维埃，以求建立资产阶级的单一政权。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只是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时刻，这时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还没有到达**“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这种过渡的不稳定的局面的阶级意义（以及阶级原因）在于：我国革命也同其他一切革命一样，要求群众有高度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同时一下子就把数量空前的普通人**卷进了运动**。

一切真正的革命，其科学的和实际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积极、自动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生活，参加**国家制度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剧地增加起来。

俄国就是这样。俄国正在沸腾。在政治上沉睡了 10 年、因受沙皇制度残酷压迫和替地主工厂主做苦工而在政治上受压抑的千百万群众，现在**已经觉醒过来并渴望干预**政治了。这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小业主，小资产者，即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那些人。在欧洲各国中，俄国是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

汹涌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吞没了一切，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思想上压倒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是说，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感染了和俘虏了非常广大的工人群众。

小资产阶级过的生活是业主式的，不是无产阶级式的（就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言），所以它在生活上依赖资产阶级，在思想方式上也跟着资产阶级走。

对资本家即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就是俄国**群众**的政治现状的特点，这就是在欧洲一个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以革命速度**产生出来的**现象。这就是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之间达成**“协议”**的**阶级**根源（我要强调说：我所指的，不是形式上的协议，而是**事实上的**支持，默默达成的协议，轻信地不觉悟地让出政权）；这种协议给了古契柯夫之流一块肥肉，给了他们真正的政权，而苏维埃所得到的只是克伦斯基之流的许诺、尊敬（暂时的）、恭维、空话、保证和奉承。

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较少，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

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一直到社会革命党人，都始终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组织委员会的党（齐赫泽、策列铁里等等）也是一样；非党的革命者（斯切克洛夫等）同样随波逐流，或者没有抵挡住、没有来得及抵挡住这种浪潮。

从上述情况中产生的策略特点

7.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注重客观事实，注重群众和阶级，而不是注重个别人物等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上述实际情况的特点必然造成**当前**策略的特点。

这种特点提出了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酸醋和苦汁掺入到革命民主词句的甜水中去”（这是我们党中央委员泰奥多罗维奇同志昨天在彼得格勒全俄铁路职工代表会议[2]上说的，这句话说得非常中肯）。要进行批评，**说明**小资产阶级

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训练和团结**觉悟的**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成员，使无产阶级从“普遍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中**解脱**出来。

这**好象**“只是”一种宣传工作。其实这是最**实际的革命**工作，不如此就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因为目前革命所以停顿，所以被空话阻塞而在“原地踏步”，并**不是由于**外界的阻碍，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使用暴力**（古契柯夫暂时还只是威胁说要使用暴力来对付士兵群众），而是**由于**群众的轻信的不觉悟。

只有同这种轻信的不觉悟作斗争（斗争的方法只能是并且应当是用同志的态度在思想上进行说服，指出**实际生活的经验**等），我们才能从**猖獗一时的革命空话**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扬群众**在地方上**大胆坚决的首创精神，促使他们自动地去实现、发展并巩固自由、民主和全部土地归全民所有的原则。

8．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的经验创造了**两种**保持对人民压迫的方法。第一种是使用暴力。尼古拉·罗曼诺夫一世（刑棍尼古拉）和尼古拉二世（血腥的尼古拉）已把这种屠杀方法淋漓尽致地表演给俄国人民看了。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已被受过多次大革命和群众革命运动“教训的”英法资产阶级修饰得非常精巧。这种方法就是欺骗，恭维，说空话，无数的许诺，小恩小惠，小处让步，大处不放等等。

俄国当前的特点就是从第一种方法极其迅速地转到第二种方法，从用暴力压迫人民转到**恭维**人民，用诺言欺骗人民。猫儿瓦西卡边听边吃。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把持着政权，维护资本的利润，为了俄国资本和英法资本的利益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时用空洞的诺言、堂皇的宣言、娓娓动听的声明来敷衍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这类“厨子”的高谈阔论，尽管这些“厨子”在那里不断地威胁、劝告、央求、恳请、要求、慷慨陈词……猫儿瓦西卡边听边吃[3]。

这种轻信的不觉悟和不觉悟的轻信，必然会日益消失，特别是对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更是这样，因为实际生活（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教他们不要信任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应该”教导人民信任资产阶级。无产者应该教导人民不信任资产阶级。

革命护国主义和它的阶级意义

9．“几乎把一切”都吞没了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它的最大最鲜明的表现要算是**革命护国主义**了。正是革命护国主义是俄国革命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死敌。

谁在这一点上失足而不能自拔，谁就谈不上革命。不过群众的失足和领袖不同，因此，他们的解脱方法也**不一样**，他们是经过另一条发展道路、经过另一种方法求得解脱的。

革命护国主义一方面是群众受资产阶级欺骗的结果，是农民和一部分工人轻信的不觉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小业主的利益和观点的反映，因为小业主从兼并和银行利润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他们“神圣地”保卫着以残害其他民族来腐蚀大俄罗斯人的沙皇制度的传统。

资产阶级欺骗人民，利用了高尚的革命自豪感，把事情说成似乎由于革命的这一阶段，由于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准共和国代替了沙皇君主国，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在俄国方面就发生了变化。人民也就相信了（暂时地相信了）这种谎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的偏见，即认为除了大俄罗斯民族以外俄国的其他民族都是大俄罗斯人的某种私有财产或世袭领地。沙皇制度卑鄙地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大俄罗斯人习惯于把其他民族都看成一种下等人，“理应”受大俄罗斯支配，这种腐蚀作用是不能**一下子**就消除的。

我们要**善于**向群众说明，决定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的，不是某些个人、集团以至某些民族的“善良愿望”，而是进行战争的那个**阶级**的地位，那个阶级的**政治**

（战争是这一政治的继续），资本这一在现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的**种种联系**，国际资本的**帝国主义性质**，俄国在财政、银行、外交上对英法等国的依赖等等。要巧妙地用群众易懂的话说明这个道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谁也不能不出差错地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宣传的方向，确切些说，我们宣传的内容，应该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不管用多么漂亮的话，用怎样的"实际"理由来辩护，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都是**背叛社会主义**，都是彻底背弃**国际主义**。

"打倒战争"的口号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估计到当前任务的特点，没有估计到必须用**另一种方法去对待**广大群众。我看，这个口号就同"打倒沙皇"的口号一样，"想当年"笨拙的鼓动家带着"打倒沙皇"的口号贸然闯到农村，结果挨了一顿打。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拥护者**是真心诚意的**——不是指个人，而是指阶级来说，也就是说，他们所属的**阶级**（工人和贫苦农民），在兼并和扼杀别的民族方面**确实**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与资产者和"知识分子"先生们的情况不同，这些人明明知道不放弃资本的统治就**不能**放弃兼并，却还要用漂亮的词句、无边无际的许诺、多不胜数的担保来无耻地欺骗群众。

护国主义广大拥护者把问题看得非常简单平常，他们说："我并不愿意兼并，但是德国人向**我**'闯过来了'，因此我维护的是正义的事业，而完全不是什么帝国主义的利益。"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向他再三解释，告诉他问题不在于他个人的愿望，而在于群众的、**阶级的**、政治的关系和条件，在于战争同资本利益、同国际银行网的联系等等。只有这样反对护国主义，才是严肃的，才有希望取得成效——也许不会很快取得，但这种成效会是牢固而可靠的。

怎样才能结束战争？

10．战争不是“凭愿望”就能结束的。靠单方面的决定是结束不了战争的。象一个护国派士兵所说的“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结束不了战争的。

靠各国社会党人的“协议”、全世界无产者发起的“行动”、各国人民的“意志”等等，是结束不了战争的。所有这类充满在护国派、半护国派、半国际主义派报纸的文章中的词句，所有这类充满在无数的决议、号召书、宣言以及兵工代表苏维埃的决议中的词句，无非是小资产者的空洞的、天真的、善良的愿望而已。关于“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关于无产阶级**轮番**发起革命行动（继俄国无产阶级之后，按“顺序”该是德国无产阶级）等等词句，是最有害不过的了。这一切都是路易·勃朗主义，都是甜蜜的幻想，都是玩“政治运动”游戏，实际上是再现关于猫儿瓦西卡的寓言。

虽然战争确实**只**有利于资本家强盗，只会使他们发财，但战争并不是由资本家强盗的恶念造成的。战争是由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资本的发展、全世界资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的。不推翻资本的权力，不把国家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跳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争得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

1917 年二、三月的俄国革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开端。这次革命迈出了停止战争的**第一步**。但是只有迈出**第二步**，即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保证**停止战争。这将是在全世界“突破战线”——突破资本利益的战线的开始；无产阶级只有突破**这条**战线，**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的惨祸，给人类带来持久和平的幸福。

俄国革命既然创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也就**把俄国无产阶级推上了这种“突破”资本“战线”的阵地。

在我国革命中兴起的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11．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目前还没有为人们所理解，这不仅表现在大多数人还不明白苏维埃的阶级意义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而且表现在他们还不明白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确切些说，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最完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类型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权力属于议会；国家机器，管理的机构和机关，和往常一样，有常备军、警察以及实际上从不撤换、拥有特权、**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

但是从 19 世纪末开始的革命时代，产生了一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国家；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这种国家从某些方面来看已经不成其为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7 页。——编者注]。这就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它以人民自己的直接武装**代替了**脱离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巴黎公社的实质**就在于此**。资产阶级的著作家们曾谩骂和诽谤巴黎公社，错误地认为巴黎公社打算立刻“实施”社会主义。

1905 年和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开始**建立的正是这种国家类型。由全俄人民代表立宪会议或由苏维埃会议统一起来的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在我国**已经出现了**。它的出现是由于千百万人民的主动，是由于人民**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动地创立民主制度，既不等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教授先生们拟定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法律草案，也不等待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中的老学究和老顽固（如普列汉诺夫先生或考茨基）放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承认在任何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

与普列汉诺夫先生和考茨基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上述时期需要的，**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

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和旧类型的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

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回到君主国是非常容易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整个压迫机器——军队、警察、官吏仍然原封不动。而公社和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则**打碎**并铲除这个机器。

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限制并压抑**群众**自主的政治生活，不让群众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全部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工兵代表苏维埃则与此相反。

工兵代表苏维埃再现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马克思曾把这种国家类型叫作“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361 页。——编者注］。

通常有人反驳说：俄国人民还没有条件“实施”公社。这是农奴主的论调，他们也曾经说过：农民还没有条件享受自由。**凡是**在经济现实中和在绝大多数人民的意识中还没有绝对成熟的改革，公社即工农代表苏维埃都没有“实施”，也不打算“实施”，而且也不应当实施。经济破坏和战争造成的危机愈深，就愈需要最完善的政治形式，以便**更容易地**医治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可怕的创伤。俄国人民的组织经验愈少，就愈应当坚决**着手人民自己**的组织建设，而不是专靠一批资产阶级政客和占据“肥缺”的官吏去做。

我们愈迅速抛弃普列汉诺夫先生和考茨基之流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的旧偏见，愈热心帮助人民立刻在各地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使其支配**全部**生活，李沃夫之流先生们愈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人民就会愈容易选中（通过立宪会议，如果李沃夫迟迟不召开立宪会议，那就不通过它）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人民自己进行新的组织建设，起初难免不犯错误［注：应该是“起初难免**会**犯错误”。疑为译者笔误。——上传者注］，但是犯错误而不断前进，总比**等待**李沃夫先生召集法学教授来草拟关于召开立宪会议、关于永远保存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和扼杀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法律要好。

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并做好宣传，那么，不仅无产者而且十分之九的农民也会起来反对恢复警察，反对从不撤换的、拥有特权的官吏，反对脱离人民的军队。新的国家类型的实质就在这里。

12．用民兵代替警察，这是在整个革命进程中产生出来并正在俄国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改革。我们应该向群众说明，在大多数通常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这种改革往往只是昙花一现；资产阶级，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阶级，也总是恢复专制制度下的那种脱离人民、受资产者指挥、惯于多方压迫人民的旧式警察。

不让警察恢复，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全民的民兵，把它和军队融合起来（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从 15 岁到 65 岁（可以大体上以此为少年和老人参加的年龄标准）的男女公民，人人应当参加民兵。资本家应当按照雇佣工人和仆人等等在民兵中执行公务的天数付给他们报酬。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至于护理病人、照料流离失所的孩子、注意饮食卫生等等的“警察”职能，除非妇女享有实际上的而不是纸上的平等，是根本不能完满实现的。

不让警察恢复；发动全体人民的组织力量来建立人人参加的民兵，——这就是无产阶级为捍卫、巩固和发展革命而应当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任务。

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

13．现在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俄国农村在最近是否会展开强大的土地革命。我们无法知道，农民中近年来确已加深的阶级分化，即一部分人成为雇农、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另一部分人成为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这样的问题，要靠实际经验，也只能靠实际经验来解决。

但是，**为了**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不仅绝对必须立即提出土地纲领，而且绝对必须宣传那些立刻可以实现的实际措施。

我们应当要求**全部**土地国有化，就是说，把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家中央政权所有。这个政权应该规定移民用地的数量等等，定出保护森林、改良土壤等等的法律，严禁土地所有者（国家）和租地者（农户）之间有任何中介行为（严禁土地转租）。但是**支配**土地的权力以及规定**地方上**占用土地的**条件**，都应完全由各区域和各地方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而绝不应操在官僚、官吏的手里。

为了提高粮食生产的技术和增加产量，为了发展合理化的大农场和对它们实行社会监督，我们应当在农民委员会内部争取把没收来的地主田庄都改建成大规模的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苏维埃**负责监督。

社会革命党人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词藻和政策，特别是什么“消费”土地份额、“劳动”土地份额以及“土地社会化”等等空谈；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说明，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小经济制度**决不能**使人类摆脱群众生活贫困和遭受压迫的状况。

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一定要立刻把农民代表苏维埃拆散，但它应当说明，必须组织单独的雇农代表苏维埃和单独的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代表苏维埃，或者至少要组织**这种阶级地位**的代表，作为总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单独的党派，举行单独的定期会议。否则，民粹主义者说到农民时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甜言蜜语，就会成为富裕农民欺骗贫苦群众的护身符，而富裕农民只不过是**资本家**的一个变种而已。

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按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或完全是官吏的腔调进行宣传，劝告农民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不要夺取地主土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号召农民立刻自动地实行土地改革，并根据当地农民代表的决定立刻没收地主土地。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坚持必须**增加**食品生产，以供应前方士兵和城市，严禁任何损坏牲畜、工具、机器和建筑物等现象发生。

14．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应当坚持宣布并坚持立刻实行的，就是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被强迫并入或被强迫留在俄国疆界内的各大小民族，即被兼并的民族，都享有同俄国分离的充分自由。

没有真正实现分离的自由，任何放弃兼并的声明和宣言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或是小资产阶级的天真愿望。

无产阶级政党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因为这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它力求各民族彼此**接近以至进一步融合**，但是它不想通过暴力，而只想通过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兄弟般的自由联合来达到这个目的。

俄罗斯共和国愈民主，它组建成为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愈顺利，**各**民族劳动群众**自愿**趋向这种共和国的力量就愈大。

分离的完全自由，最广泛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详尽规定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办法，——这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

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的国有化

15．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

但是，只有躲在“准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诡辩家，才会以这个真理为借口，替那种不执行实际上业已成熟的迫切革命措施的拖延政策进行辩护，而这类措施**在战时已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了**，因为这是同日益逼近的经济的彻底崩溃和饥荒作斗争所绝对必要的。

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决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应当绝对坚持实现这

些措施，并尽量用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实现；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医治战争的创伤，不可能防止即将临头的破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会不去侵犯那些正是靠“战争”大发横财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空前的高额利润。

社会党国际的状况

16．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义务正是在现时特别突出地提到了首要地位。

现在，只有懒汉才不拿国际主义发愿起誓，连沙文主义护国派，连普列汉诺夫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连克伦斯基也都自称为国际主义者。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更有责任把真正的国际主义和口头上的国际主义作一个鲜明、确切、清晰的对照。

只向各国工人发表宣言，空口担保自己忠于国际主义，企图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各交战国革命无产阶级发起行动的“顺序”，硬要在各交战国社会党人之间订立**关于**革命斗争的“协议”，忙于召开社会党代表大会**以开展**和平运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主张、企图或计划，无论它们的炮制者怎样真诚，但从**客观**意义来看，都只是空话，**至多**不过是天真的善良愿望，只能为沙文主义者**欺骗**群众打掩护。在玩弄议会欺诈手段方面最圆滑、最老练的**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早就打破了纪录，他们一方面高喊空前响亮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词句，**同时**又极其可耻地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加入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内阁，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或公债**（象齐赫泽、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近来在俄国所做的那样），反对**本国的**革命斗争等等。

好心肠的人常常忘记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严峻而又险恶的环境。这种环境容不得空谈，而且会嘲弄天真甜美的愿望。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

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欺人之谈和马尼洛夫精神[4]。

战争爆发两年多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所有国家都造成了三种派别；谁要是离开**现实的**基础，不承认这三种派别的存在，不对它们进行分析，不为真正的国际主义派进行彻底斗争，他一定会软弱无力，束手无策，陷入错误。

三种派别如下：

（1）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这些人同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首先是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

这些人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各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大多数都是这样。这就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先生之流，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法国的列诺得尔、盖得、桑巴等，意大利的比索拉蒂之流，英国的海德门、费边社分子和“拉布分子”（指“工党”的领袖们），瑞典的布兰亭之流，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和他的党，丹麦的斯陶宁格和他的党，美国的维克多·伯杰及其他“保卫祖国派”等等。

（2）第二派即所谓“中派”，这些人摇摆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之间。

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对政府多方施加“压力”，从多方面“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赞成各种各样有利于和平的运动，赞成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同时也赞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和平**。“中派”赞成“团结一致”，反对分裂。

“中派”是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的王国，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派”不相信用革命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必要性，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象是绝顶“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来躲避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者**。他们是那些**客观上**被资产阶级收买（用优厚的工资、荣耀的职位等等）的工人阶层和集团，他们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帮助他们**为**瓜分资本主义的赃物而进行争斗。

“中派”是一些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的环境等等败坏了的守旧派，是习惯于待遇优厚的职位和“安稳的”工作的官吏。从历史上和经济上来讲，他们并不代表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只是代表工人运动从过去的阶段即从1871—1914 年的阶段**向**新**阶段的过渡**；过去的阶段给了无产阶级许多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一门艺术方面，这门艺术就是广泛而又广泛地进行缓慢的、坚持不懈的、有系统的组织工作；从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创了**社会革命的纪元**那时起，新**阶段**的到来**在客观上**就成为必然的了。

“中派”的主要领袖和代表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 年）最有威望的人物，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 1914 年 8 月起就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中派”就是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和帝国国会中的所谓“工作小组”，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和整个所谓“米诺利特”（少数派）[5]，英国的菲力浦·斯诺登、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6]的其他许多领袖以及一部分英国社会党[7]的领袖，美国的莫里斯·希尔奎特以及其他许多人，意大利的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扬尼等，瑞士的罗伯特·格里姆等，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之流，俄国的组织委员会的党——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策列铁里等等。

自然，个别人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从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转到“中派”立场，或者从后者转到前者。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随意转到另一个阶级，但阶级是各不相同的；同样，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派别随意转到另一派别，虽然有人力求**融合**各个派别，但政治生活中的**派别**是各不相同的。

（3）第三派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我们把他们 1915 年 9 月发表的宣言作为附录转载于后，使读者能够就原件了解这一派别的产生）。

这一派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既同社会沙文主义也同“中派”彻底决裂。他们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和**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的原则是“主要的敌人在本国”。他们坚决反对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甜言蜜语（社会和平主义者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梦想**不**打破资本的枷锁和统治而获得永久的和平），反对利用种种**借口**来否认**因**这次战争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适当的和及时的。

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国是“斯巴达克派”即“国际派”，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它的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一派别和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的最有名望的代表。

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德国工人和士兵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卡尔·李卜克内西曾在国会（帝国国会）的讲台上公开发出这一号召。随后他又到柏林一个最大的广场——波茨坦广场上，向示威群众散发秘密印成的传单，号召“打倒政府”。他被逮捕并被判处**苦役**。他现在被关在德国的苦役监狱里，在德国少说也有**几百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的演说和信件中，不仅**同他本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谢德曼之流、列金之流、大卫之流，等等）作无情的斗争，**而**

且同他本国的中派即同他们的齐赫泽、策列铁里（即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之流）作无情的斗争。

在 110 个议员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奥托·吕勒两个人破坏了纪律，破坏了同“中派”和沙文主义者的“团结一致”，**反对全体议员**。**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除他以外，**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正象罗莎·卢森堡（她也是“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和领袖之一）所正确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一具**发臭的死尸**。

德国另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团体是不来梅的《工人政治》。

堪称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在法国有洛里欧和他的朋友们（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已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以及在日内瓦出版《明日》杂志[8]的法国人昂利·吉尔波；在英国，有《工联主义者报》[9]及英国社会党和独立工党的**部分**党员（如罗素·威廉斯，他曾公开号召同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分裂），有苏格兰的国民教师社会党人**马克林**，他因从事反战的革命斗争而被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判处**苦役**，因同一罪名而入狱的还有几百个英国社会党人。他们，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美国，有“社会主义工人党”[10]以及机会主义“社会党”[11]内那些从 1917 年 1 月开始出版《国际主义者周报》[12]的人；在荷兰，有出版《论坛报》的“论坛派”（潘涅库克、赫尔曼·哥尔特、怀恩科普、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后者曾是齐美尔瓦尔德的中派，现在已转向我们）[13]；在瑞典，有青年党或左派党[14]，党的领袖有林德哈根、图雷·涅尔曼、卡尔松、斯特勒姆、塞·霍格伦，霍格伦曾在齐美尔瓦尔德亲自参加建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工作，现因进行反战的革命斗争而被判罪入狱；在丹麦，有特里尔和他的朋友们，他们退出了以斯陶宁格**部长**为首的完全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丹麦“社会民主党”[15]；在保加利亚，有“紧密派”[16]；在意大利，最接近国际主义的是党的书记康斯坦丁诺·拉查理和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塞拉蒂；在波兰，有拉狄克、加涅茨基和其他由“边

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此外还有罗莎·卢森堡、梯什卡和其他由“总执行委员会”[17]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瑞士，有一些左派，他们草拟了举行“全民投票”的理由书（1917 年 1 月）同**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作斗争，1917 年 2 月 11 日，他们在特斯举行的社会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原则上革命的反战决议；在奥地利，有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左派青年朋友，其中一部分人常在维也纳的“卡尔·马克思”俱乐部内活动，极其反动的奥地利政府现已查封了这个俱乐部，这个政府还因弗·阿德勒英勇地——但欠考虑地——枪击首相而对他进行迫害；以及其他等人。

问题不在于细微差别，就是在左派中也有不同的细微差别。问题在于**派别**。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要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人很少，但是**只有**他们才代表社会主义的整个未来，**只有**他们才是**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在社会民主党人以至所有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在帝国主义战争这种环境中客观上必然要起变化。谁如果只限于向资产阶级政府“要求”缔结和约或“要求”它“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等等，他**在实际上**就是堕落到改良派的立场。**因为战争问题**在客观上只能用**革命手段**来解决。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摆脱战争而缔结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可以使各国人民从发“战争”财的资本家老爷们**亿万**利息的盘剥下解放出来。

可以而且应当要求资产阶级政府实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但是不能陷入马尼洛夫精神和改良主义去要求那些与帝国主义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和阶级**斩断**这些联系；而不斩断这些联系，用战争反对战争的一切议论都只是空洞的骗人的词句。

“考茨基派”即“中派”是口头上的革命家，实际上的改良主义者，是口头上的国际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帮凶。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破产——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17．齐美尔瓦尔德国际一开始就站到动摇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立场上，这就使**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不得不立刻划清界限，分离出来，发表**自己的**宣言（在瑞士用俄文、德文、法文刊印）。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主要缺点，它**破产**（因为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了）的原因，就是在同社会沙文主义、同以在海牙（荷兰）的王德威尔得、胡斯曼等等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旧国际彻底决裂的问题上，在这样一个实际**决定一切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动摇不定。

在我国还有人不知道，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考茨基派**。而这正是一个不能不考虑到的基本事实，现在西欧已经都知道这个事实。就连沙文主义者，德国的极端沙文主义者海尔曼，即极端沙文主义的《开姆尼茨报》的编辑兼由帕尔乌斯出版的极端沙文主义的《钟声》[18]的撰稿人海尔曼（自然也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是热烈主张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的人），也不得不在报刊上承认，中派或“考茨基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一个东西。

到 1916 年底和 1917 年初，这个事实被完全确认了。虽然昆塔尔宣言[19]斥责了社会和平主义，但**整个**齐美尔瓦尔德右派，**整个**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方面去了，如：考茨基之流在 1917 年 1 月和 2 月的一系列演说；法国的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致**投票赞成社会党的和平主义决议（1916 年 12 月通过）和“劳动总联合会”的和平主义决议[20]（劳动总联合会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该决议也是在 1916 年 12 月通过的）；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也是这样，他们全党采取了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而屠拉梯本人在 1916 年 12 月 17 日的演说中，甚至“滑到了”（当然不是偶然的）用**民族主义**词句掩饰帝国主义战争的地步。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主席罗伯特·格里姆，在 1917 年 1 月，同**他**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格雷利希、普弗吕格尔、古斯塔夫·弥勒等）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在 1917 年 1 月和 2 月举行的各国**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两次会议上，有一些国家的左派国际主义者，如国际青年组织书记和出色的国际主义报纸《青年国际》[21]的编辑明岑贝格，我党中央的代表季诺维也夫，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代表卡·拉狄克，“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哈特施坦等，曾正式痛斥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行为。

俄国无产阶级得到的很多；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还没有机会象在俄国那样发挥出那么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多得者应当多予。

再不能容忍齐美尔瓦尔德的泥坑了。再不能为了齐美尔瓦尔德的“考茨基派”而同普列汉诺夫之流、谢德曼之流的沙文主义国际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了。应该立刻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

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已经建立**并且在活动了。

这就是我在上面一一提到的那些“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他们，只有他们，才是革命国际主义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如果说**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为数尚少，那么就请每个俄国工人问一问自己：在 1917 年二、三月革命的**前夜**，俄国的觉悟的革命者多不多呢？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主张和政策。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宣布”国际主义，而在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不要对订立协议和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抱希望。只要帝国主义战争继续打下去，国际间的往来就会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事专政的铁钳钳

住。不得不容忍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附加的政府的“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在1917年4月也**没有准许**瑞士社会党人、瑞士社会党书记、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国际主义者**弗里茨·普拉滕**进入俄国（虽然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是来探望妻子的亲属的，又因他在里加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为此坐过俄国的监狱，并为获准出狱曾向沙皇政府缴纳过保释金，他来是想取回这笔保释金的。），既然“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竟能够在1917年4月的俄国**做出**这种事来，那么现在资产阶级关于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的诺言、词句和宣言究竟有什么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英国政府拘留托洛茨基应当怎样解释呢？不让马尔托夫离开瑞士，想把他骗到英国，使他遭到同托洛茨基一样的命运，这又应当怎样解释呢？

我们不要陷入幻想，不要自己骗自己。

既然事实证明，一些忠于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连从斯德哥尔摩进入我国都得不到许可，**连他们的信件都不准寄来**（尽管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完全可以用最严密的手续来审查这些信件的），那么，“等待”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或会议就无异是**背叛**国际主义。

我们党不应当“等待”，应当立刻**建立**第三国际，这样一来，在德国和英国监狱中的千百个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成千上万正在举行罢工和示威而使威廉这个恶棍和强盗畏惧的德国工人，就可以在**秘密**传单上看到我们的决定，看到我们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并且只是对他）的兄弟般的信任，看到**我们现在**也决心同“革命护国主义”作斗争；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革命国际主义信念了。

多得者应当多予。**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俄国这样的自由。我们利用这种自由，不是为了鼓吹支持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革命护国主义”，而是要勇敢

地、忠实地、本着无产阶级的和李卜克内西的精神去**建立第三国际**，建立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叛徒以及“中派”这些动摇分子势不两立的国际。

18．根据上述情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绝对谈不到统一的问题，就不必多费唇舌了。

宁可象李卜克内西那样只剩下两个人——**这就是说和革命无产阶级在一起**——也丝毫不能有同组织委员会的党，同齐赫泽和策列铁里统一的想法，因为这些人甘愿同《工人报》的波特列索夫结成联盟，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公债[22]，他们已经堕落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了。

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23]

谁想**帮助**动摇分子，首先要自己不动摇。

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 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19．现在谈一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名称问题，我们应该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

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社会民主党在下面主要两点上歪曲和背叛了这个宣言：(1)工人没有祖国，因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2)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被第二国际歪曲了。

“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经屡次——例如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一点，恩格斯在1894年又更通俗地重复谈过这一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1—35页和第22卷第489—490页。——编者注]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

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是我的第一个论据。

第二个论据：我们党（社会**民主党人**）的名称的后半部，在科学上也是不正确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任何**国家的。

第二国际（1889—1914 年）的领袖们，象普列汉诺夫先生、考茨基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歪曲了。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是**必需的**，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考茨基之流不同）这种国家**并不是指**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而是指 1871 年巴黎公社以及 1905 年和 1917 年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

我的第三个论据是：**现实生活**，革命，**实际上已经**在我国创立了这种新“国家”，虽然它还处在幼弱的萌芽状态，可是这种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这**已经**是群众的实践问题而不只是领袖们的理论了。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由脱离人民的武装队伍来控制群众。

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也是国家，因为我们需要武装队伍，需要**最严格的**秩序，需要用暴力来**无情地**镇压君主派和古契柯夫－资产阶级的一切反革命尝试。

但是，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在俄国许多地方，这种武装队伍就是**群众自己**，就是全体人民，而不是那些居于人民之上、脱离人民、拥有特权、实际上从不撤换的人。

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看通常是资产阶级的那种民主，这种民主通过旧的**君主制的**管理机关即警察、军队和官吏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要向前看正在诞生的新的民主，这种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武装的人民是不能自己统治自己的。

民主这个词用于共产党，不仅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这个词在目前，在 1917 年 3 月以后，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东西——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即“国家”的**唯一政权**，**一切**国家“消亡”的前驱。

我的第四个论据，就是应当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

现在的形势已和 1871—1914 年不同，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意识地容忍了“社会民主”这个不正确的、机会主义的用语。因为当时，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历史把缓慢的组织教育工作提上了日程。此外别无他法。无政府主义者当时（现在还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错误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时局作了错误的估计，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形势：英国工人被帝国主义的利润所腐蚀，巴黎公社遭到失败，德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刚刚（1871 年）胜利，半农奴制的俄国仍然沉睡不醒。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估计了时局，了解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了解了要**慢慢**开始社会革命的任务。

我们也应该了解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我们决不要重蹈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覆辙，马克思在谈到这些人时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604 页。——编者注］

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在客观上就必然产生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使全人类**濒临深渊**，使全部文化濒于毁灭，并且不知还会使多少百万人走向粗野和死亡。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

当这个革命开始的时候，当这个革命怯懦地、不坚决地、不自觉地、对资产阶级过分信任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大多数的（这是真情，这是事实）“社会民

主党”领袖、“社会民主党”议员、“社会民主党”报纸——要知道影响群众的正是这种**工具——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社会主义，跑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群众惶惑不安，糊里糊涂，受了**这些**领袖的欺骗。

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了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

就让“许多”工人去真诚地**理解**社会民主党吧。现在是学习区别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时候了。

主观上，这些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忠实的领袖。

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却是这样：我们党的旧名称**便于**人们欺骗群众，**阻碍**运动前进，因为群众在每种报纸上，在每个议会党团中处处见到那些说话最响亮、行动最引人注目的**领袖**，而这些人“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主张”同社会主义的叛徒，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他们都拿着“社会民主党”所开的旧期票要求兑现……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会把我们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混淆起来……”

为什么我们不怕同社会民族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混淆起来，不怕同法兰西共和国激进社会党人[24]这个用资产阶级手段欺骗群众最高明最狡猾的资产阶级政党混淆起来呢？“……群众已经习惯了，工人已经‘爱上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正是这个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把明天的革命任务，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把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把包围着无产者的那帮“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家伙对实际事业的破坏都丢开不管了。

这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守旧的理由。

而我们是要改造世界。我们要结束这场有数万万人卷进去、有千百亿资本利益纠缠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而这场战争除了进行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的。

可是我们又自己怕自己。我们还舍不得脱掉那件“穿惯了的”、“可爱的”脏衬衫……

现在已经是丢掉脏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

后记

由于经济破坏和彼得堡各印刷厂窝工，我这本小册子已经过时了。小册子是在 1917 年 4 月 10 日写成的，今天已经是 5 月 28 日了，可是还没有出版！

小册子是作为一个行动纲领**草案**来写的，准备在我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以**前，用来宣传我的一些观点。小册子曾经用打字机打了若干份，在会前和会上发给一些党员，也总算起了它的一部分作用。现在，1917 年 4 月 24—29 日的代表会议已经开过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也早已公布（见《士兵真理报》[25]第 13 号增刊），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我的小册子有不少地方成了这些决议的初稿。

现在我只希望在涉及这些决议的场合，小册子对阐明这些决议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我还想谈两个问题。

在第 27 页上我建议，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注：见本卷第 175—176 页。——编者注］。代表会议没有同意我这个意见，因此我不得不对关于国际的决议案投反对票。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代表会议犯了错误，事变的进程会很快地纠正这个错误。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也是在推迟第三国际的建立（虽然这违反我们的意愿）；我们不摆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死亡的齐美尔瓦尔德这个沉重的包袱，就是间接地阻碍第三国际的建立。

现在我们党的处境（在全世界所有工人党的面前）正是要求我们**必须**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现在**除了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一点，而拖延是有害的。如果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就能立刻放手去建立第三国际（同时，只要情况允许，还可以**利用一下**齐美尔瓦尔德）。

可是现在，由于代表会议的错误，我们只好消极地等待，至少要等到 1917 年 7 月 5 日（即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的日子；只要它不**再来**一次延期，就是万幸！它已经延期一次了……）[26]

不过，代表会议闭幕后我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登在 5 月 12 日《真理报》第 55 号上的一项决议把错误纠正了一半。决议说，如果齐美尔瓦尔德去同部长们商量问题，我们就退出齐美尔瓦尔德。［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0 卷《关于召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的所谓的社会党人国际代表会议》。——编者注］我愿表达如下希望：一旦我们召开“左派”（即“第三派”，“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见上面，第 23—25 页［注：见本卷第 170—173 页。——编者注］）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另一半错误将会很快得到纠正。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 1917 年 5 月 6 日成立的“联合内阁”[27]。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好象**更是过时了。

其实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一点也没有过时。它的**一切**论述都是以**阶级**分析为依据的，这种分析对交出 6 个部长给 10 个资本家部长做人质的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来说，象火一样可怕。既然小册子的一切论述是以阶级分析为依据的，它就没有过时，因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加入内阁，只不过**稍微**改变了一下彼得格勒苏维埃同资本家政府协议的**形式**，而我在小册子第 8 页上曾有意强调，“我所指的，不是形式上的协议，而是事实上的支持”［注：见本卷第 155 页。——编者注］。

事情愈来愈清楚：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不过是资本家的人质，“革新了的”政府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根本不想而且也不会履行自己的任何漂亮诺言。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在政治上已经自杀，他们已经成了资本家实际扼杀革命的帮手。而克伦斯基则已堕落到对群众使用暴力的地步（参看小册子第9页：“古契柯夫还只是威胁说要使用暴力来对付群众”［注：同上，第156页。——编者注］，而克伦斯基竟**已经来**实现这种威胁了……）[28]。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已经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在政治上自杀。这一切，人民是会看得愈来愈清楚的。

联合内阁只是我的小册子简要分析过的我国革命根本阶级矛盾发展中的过渡现象。这种现象不会长久存在。不是后退到全面的反革命，就是前进到使政权转到另外的阶级手中。在革命时期，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中，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

注释：

[1] 有关《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一著作写作和出版情况，见《后记》（本卷第183—185页）。——150。

[2] 全俄铁路职工代表会议于1917年4月6—20日（4月19日—5月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会议在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下，采取了护国主义立场，声明完全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代表会议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并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和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实际问题的委托书。布尔什维克伊·阿·泰奥多罗维奇是在4月8日（21日）的会议上发言的。《统一报》说他的发言给代表会议带来一些不协调的空气。——156。

[3] 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猫和厨子》。厨子看见猫儿瓦西卡在偷鸡吃，便唠唠叨叨地开导它，责骂它，而瓦西卡却边听边吃，全不理会，直到整只鸡被吃完。——157。

[4] 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168。

[5] 米诺利特（法文 Minorité 的音译，意为少数派）即龙格派，是 1915 年形成的法国社会党内的少数派，社会改良主义者让·龙格的拥护者。该派持中派观点，对社会沙文主义者采取妥协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后，该派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继续奉行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合作的政策，支持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1920 年 12 月在图尔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龙格派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拒绝服从，另行成立一个党，仍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70。

[6]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 年 1 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 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170。

[7] 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 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 年 2 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 年 4 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

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 1916 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 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170。

[8] 《明日》杂志（《Demain》）是法国国际主义者、作家昂·吉尔波创办的文艺评论性和政治性刊物（月刊），1916 年 1 月—1919 年先后在日内瓦和莫斯科出版（1917 年 1—4 月休刊）。为它撰稿的有作家罗曼·罗兰、斯·茨威格等。该杂志反对沙文主义，宣传齐美尔瓦尔德的纲领，刊载过列宁的一些文章和讲话。从 1919 年 9 月起，成为法国共产主义者莫斯科小组的刊物。——172。

[9] 《工联主义者报》（《The Trade-Unionist》）是英国带国际主义倾向的工会报纸；1915 年 11 月至 1916 年 11 月在伦敦出版。——172。

[10]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合并而成的，1876 年 7 月在费拉德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当时称美国工人党，1877 年起改用现名。绝大多数党员是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同本地工人联系很少。19 世纪 70 年代末，党内领导职务由拉萨尔派掌握，他们执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工人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一部分领导人热衷于议会选举活动，轻视群众的经济斗争，另一些领导人则转向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党的领导在思想上和策略上的摇摆削弱了党。90 年代初，以丹·德莱昂为首的左派领导该党，党的工作有一些活跃。从 90 年代末起，宗派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又在党内占了上风，表现在放弃争取实现工人局部要求的斗争，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致使该党更加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倾向于国际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最革命的分子退出了党，积极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此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一个人数很少、主要和知识分子有联系的集团。——172。

[11] 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金·维·德布兹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172。

[12] 《国际主义者周报》（《The Internationalist》）是美国左翼社会党人的报纸，1917年初由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在波士顿出版。——172。

[13] 论坛派是1907—1918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持、安·潘涅库克、罕·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年2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3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年11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

《论坛报》(《De　Tribune》)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 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刊。从 1909 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从 1918 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1940 年停刊。——172。

[14] 瑞典青年党或左派党是列宁对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称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年党人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加入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 年 5 月，他们组成了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921 年，该党在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接受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改名为瑞典共产党。——172。

[15] 丹麦社会民主党原为第一国际的支部，1871 年创立，1872 年被政府解散。1876 年该党重建，称为社会民主同盟，1884 年起定名为丹麦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丹麦工人运动中影响很大，但是改良派在党的领导中处于优势。1884 年起是国会党。1889 年参加第二国际。20 世纪初，以弗·伯格比尔、E．安森、托·斯陶宁格为首的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势力有了加强。1913 年该党代表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站在维护“国内和平”的立场上。1918—1919 年，在丹麦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党内左派退出，于 1920 年参与创建丹麦共产党。——172。

[16] 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密团结的党而得名，1903 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和它对立的派别叫宽广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宽广社会党人）。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和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 年，该派加入共产国际并创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172。

[17] 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和总执行委员会都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 1893 年 7 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 年 8 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 年 4 月，该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由于党的领导成员扬·梯什卡等人在策略问题上发生动摇，1911 年 12 月该党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在国外的总执行委员会，称为总执委会派；另一派拥护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称为分裂派。分裂派主要包括华沙和洛兹的党组织，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赞同 1912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1916 年该党两派合并。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 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 年 12 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172。

[18] 这里说的《开姆尼茨报》指《人民呼声报》。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91 年 1 月—1933 年 2 月在开姆尼茨出版。1907—1917 年担任该报主编的是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恩·海尔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钟声》杂志（《Die　Clock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办的刊物（双周刊），1915—1925 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出版。——174。

[19] 指《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这个宣言号召工人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没有兼并的和约的斗争，要求社会党议员拒绝支持帝国主义政府的军事政策。宣言发展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的思想，指出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制止战争的唯一手段，但是对列宁的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和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明确的口号避而未提。——174。

[20] 列宁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的第三篇《法国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的和平主义》里专门批判了法国社会党和劳动总联合会的这些决议（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8 卷）。这两项决议都欢迎美国总统伍·威尔逊以调解人身分敦请各国“公开说明自己关于结束战争条件的意见”，即敦请各国缔结帝国主义的和约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

法国社会党是由 1902 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 1901 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合并而成的，1905 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

劳动总联合会（工会总同盟）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成立于 1895 年。总联合会长期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其领袖们仅承认经济斗争，不接受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联合会的领导核心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实行阶级合作，鼓吹“保卫祖国”。——175。

[21] 《青年国际》杂志（《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1915 年 9 月—1918 年 5 月在苏黎世出版，威·明岑贝格任编辑。列宁对它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8 卷《青年国际》一文。

1919—1941 年，该杂志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75。

[22] 俄国临时政府为了抵补不断增加的战争支出和支付外国贷款的利息，发行了数达 60 亿卢布的战争公债，即所谓“自由公债”。1917 年 4 月 7 日（20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 21 票对 14 票通过了积极支持发行“自由公债”的

决议案。执行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反对发行公债，提出了详细阐明自己立场的决议案。有一些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执委会成员也投了反对票。问题提交苏维埃全会讨论，结果 2000 名代表赞成发行公债，123 名代表反对。在苏维埃全会讨论前，各个党团内预先进行了讨论。——177。

[23] 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一个信徒请求耶稣准许他回家埋葬了父亲再跟随耶稣外出行道，耶稣就用这句话回答了他。意思是：要专注于自己的信仰，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177。

[24] 指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激进社会党（全称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该党于 1901 年 6 月成立，作为派别则于 1869 年形成。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181。

[25]《士兵真理报》(《Солдатская 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 年 4 月 15 日（28 日）在彼得格勒创刊。它起初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军事组织的机关报，从 1917 年 5 月 19 日（6 月 1 日）第 26 号起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的机关报。发行 50000—75000 份，其中一半送往前线。1917 年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亚·费·伊林－热涅夫斯基、弗·伊·涅夫斯基、尼·伊·波德沃伊斯基等。该报刊载过列宁的 60 多篇文章，其中有些是特地为该报写的。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弗·沃洛达尔斯基、费·埃·捷尔任斯基、米·伊·加里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尼·瓦·克雷连柯、德·扎·曼努伊尔斯基、维·鲁·明仁斯基等。1917 年七月事变后被临时政府查封。1917 年 7—10 月改用《工人和士兵报》和《士兵报》的名称出版，并一度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9 日）起恢复原名。1918 年 3

月，根据俄共（布）中央决定，《士兵真理报》以及《农村贫民报》、《农村真理报》停刊，由《贫苦农民报》代替。——183。

[26] 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原定于 1917 年 5 月 31 日召开，后一再延期，最终于 1917 年 9 月 5—12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国社会党左派（瑞典左派、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奥地利左派、斯巴达克派、丹麦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中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瑞士社会民主党、芬兰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党、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保加利亚独立工会）和社会沙文主义派（以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俄国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派代表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投了反对票，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应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断绝关系，立即着手组织第三国际。他只同意为了解情况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会议的是瓦·瓦·沃罗夫斯基和尼·亚·谢马什柯。代表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主要议程有：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罗·格里姆事件（指原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格里姆充当瑞士部长阿·霍夫曼的密使，在俄国进行有利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单独媾和的试探一事）；对斯德哥尔摩和平代表会议的态度；为在各国争取和平和开展齐美尔瓦尔德运动而斗争。由于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非常复杂，会议的决议和宣言也就具有模棱两可的妥协性质。

沃罗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波兰社会民主党，要求代表会议表明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态度。他指出，孟什维克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成员，派代表参加了俄国卡芬雅克式的人物亚·费·克伦斯基的政府，应对这个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罪行负完全责任。一些代表对与会的布尔什维克表示支持，但以胡·哈阿兹为首的多数派借口对俄国情况不熟悉，拒绝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

代表会议的宣言号召各国工人举行反对战争和保卫俄国革命的国际总罢工，但是没有写进革命社会民主党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各交战国政府遭到失败等口号。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声援被捕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弗·阿德勒以及囚禁在克伦斯基监狱中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亚·米·柯伦泰等。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可参看《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184。

[27] 联合内阁即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5日（18日）成立。这届内阁是四月危机的产物。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于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照会盟国政府，声称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同它们签订的一切条约。消息传出后，群众自发地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4月20日和21日（5月3日和4日），游行示威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士兵运动。临时政府为了给人以改弦更张的假象，免去了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和陆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的职务，并建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违背了它3月1日（14日）通过的关于苏维埃不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于5月1日（1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以44票赞成、19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苏维埃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为了谈判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为：尼·谢·齐赫泽、伊·格·策列铁里、费·伊·唐恩、波·奥·波格丹诺夫（以上为孟什维克）、弗·别·斯坦凯维奇、列·莫·勃拉姆桑（以上为劳动派）、阿·拉·郭茨、维·米·切尔诺夫（以上为社会革命党人）、列·波·加米涅夫（布尔什维克）、康·康·尤列涅夫（区联派）和尼·苏汉诺夫（无派别社会党人）。5月2日（15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以多数票批准了执行委员会的决定。5月5日（18日）达成了关于新政府席位分配的协议，有5名社会党人参加联合内阁。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司法部长

帕·尼·佩列韦尔泽夫（劳动派）、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财政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人）、邮电部长伊·格·策列铁里（孟什维克）、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人）、国家救济部长德·伊·沙霍夫斯科伊（立宪民主党人）、国家监察长И．В．戈德涅夫（十月党人）和正教院总监В．Н．李沃夫。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联合内阁，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关于联合内阁，可参看列宁的《革命的教训》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184。

[28] 指陆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1917年5月11日（24日）发布命令，颁发《士兵权利宣言》一事。这个宣言实际上取消了士兵群众在二月革命中争得的权利。为了对付拒绝进攻的士兵和军官，宣言规定：长官在战时可以对不执行命令的下属使用武力。在发布命令的同时，克伦斯基动手解散一些团队，并把“煽动抗命”的军官和士兵送交法庭审判。——185。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

列宁（1917 年 9 月 10—14 日〔23—27 日〕）

饥荒逼近

不可避免的灾难威胁着俄国。铁路运输已经十分混乱，而且愈来愈混乱，不久就会全部停顿。工厂需要的原料和煤的运送将要停止。粮食的运送也要中断。资本家一直故意在暗中破坏（危害、停止、破坏和阻挠）生产，指望空前的灾难能使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破产，使苏维埃和所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团体瓦解，这样就便于恢复君主制和恢复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无限权力。

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报纸都无数次地谈到这一点。各政党、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通过的无数决议也都承认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同它作殊死的斗争，人民必须“英勇努力”以防止毁灭，等等。

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都公认这是事实，都决定这样去做。

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做。

革命已经半年了，灾难更加逼近，大批人员失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内有足够的粮食和原料，但是却不见商品，国家因食品不足、劳动力缺乏而面临灭亡的危险，就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却又有大批人员失业！革命（有人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可是，暂时称之为腐朽的革命也许更公道些）半年来，既有民主共和制，又有许许多多傲然自命为“革命民主的”团体、组织和机关，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来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我们正愈来愈快地接近崩溃，因为战争是不等人的，它在人民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混乱正在不断加剧。

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和思索一下，就会相信，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切实可行，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没有**采取这些办法，**只是**因为，**纯粹是**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将触动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闻所未闻的利润。

情况确实如此。可以保证，任何一次演说，任何派别的报纸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会议或机关的任何一个决议，都十分明确地承认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基本的主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正确调配劳动力，爱惜人民的力量，杜绝力量的任何浪费，节约力量。监督，监察，计算，——这就是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首要办法。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公认的。然而这也正是人们**所不敢做的**，他们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靠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服务”）而得来的空前的惊人的巨额利润，这种利润谁都知道，谁都看到，谁都为之惊叹不已。

可是国家方面丝毫没有实行稍微认真的监督、计算和监察。

政府不起任何作用

国家的任何监督、监察、计算以及要调整好这项工作的任何尝试，在各地不断遭到暗中破坏。只有幼稚到了极点的人才不懂得，只有虚伪透顶的人才假装不知道，这种暗中破坏是从哪里来的，是用什么手段进行的。因为银行家和资本家的这种暗中破坏，这种对任何监督、监察、计算的**破坏**，都是同民主共和的国家形式相适应的，同“革命民主”机关的存在相适应的。资本家老爷们很好地领悟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一切赞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在口头上都承认的，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的朋友占据了部长、副部长等职位之后，就立刻把它忘掉了。这个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的管理形式代替君主制的管理形式，丝

毫也不会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经济本质，相反地，只要把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利润的斗争方式改变一下，在民主共和制下照样可以顺利地保持这种利润，如同在专制君主制下一样。

当前有一种最新的、适应民主共和制的暗中破坏监督、计算、监察的手段，就是资本家在口头上“热烈”拥护监督“原则”，承认它的必要性（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坚持要“逐渐地”有计划地“由国家正规地”实施这种监督。其实，这种好听的词句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对监督的**破坏**，把监督化为乌有，使之有名无实，成为儿戏，把任何切实认真的步骤都搁置起来，建立各种非常复杂庞大、毫无生气的官僚监督机关，而这些机关完全依赖资本家，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也不可能做。

为了不致空口无凭，我们可以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找出一些证人。正是他们在革命头半年内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参加了“联合政府”，因此，他们在俄国工农面前，要对纵容资本家、对资本家破坏任何监督负政治责任。

在“革命”民主派的所谓“全权”（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机关中的最高机关（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7 年 9 月 7 日第 164 号上，登载了一个处理监督问题的专门机关的**决议**，这个专门机关也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的，并且是由他们把持的。这个专门机关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济部”。它的决议正式承认，“**政府所设调节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是事实。

难道还有什么证据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亲手签字的这个文件更能证明他们政策的破产吗？

早在沙皇制度下人们就认为有调节经济生活的必要，并且为此也建立了一些机关。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经济破坏不断加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革命共和政府的任务，本来是要立刻采取重大的坚决的措施来消除这种经济破坏现象。

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刚一成立，就在 5 月 6 日的告全国人民的郑重宣言中，答应并保证实行国家监督和调节。那时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以及所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都赌咒发誓说，他们不仅对政府的行动负责，而且他们所掌握的“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正在实际监视和检查政府的工作。

从 5 月 6 日到现在已经 4 个月了，在这漫长的 4 个月中，俄国因实行帝国主义的荒谬“进攻”而葬送了几十万士兵，在这期间经济破坏和灾难飞速逼来，夏季无论在水运方面，还是在农业和矿山勘探等等方面本来完全有可能做出许多事情，但是 4 个月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认政府所设的监督机关“不起任何作用”!!

而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正好是在 9 月 12 日民主会议[2]召开的前夕），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俨然以政界大人物的姿态侈谈什么只要同工商界的基特·基特奇[3]之流，即同里亚布申斯基、布勃利科夫、捷列先科之流搞联合，以代替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事情还能补救！

试问，怎样来解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种惊人的盲目呢？是否应该把他们看作政界的黄口小儿？他们是由于极端鲁莽幼稚，才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是真心诚意而犯了错误，还是由于占据了部长、副部长、总督、委员等等许多职位，就必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政治”盲目症？

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

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也许监督的办法和措施是一种极端复杂困难、没有经过试验、甚至人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吧？也许监督之所以迟迟没有实行，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工商业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国家要人虽然已经累得满

头大汗，用了半年的时间来探求、研究、发现监督的措施和办法，但这个任务过于困难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吧？

唉！的确有人竭力想“蒙蔽”那些不识字的闭塞无知的农民以及那些不动脑筋而轻信别人的庸人，就把事情说成这样。其实，甚至沙皇政府，甚至“旧统治当局”在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时就**已经知道**监督的基本措施、主要办法和途径：把居民按各种职业、工作目的、劳动部门等等联合起来。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联合起来，所以极力限制和故意排斥这种众所周知、轻而易举、完全可行的监督办法和途径。

各交战国在遭到极端严重的战争灾难和不同程度的经济破坏和饥荒时，早已拟出、决定、采用并试行过**一系列的**监督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总不外是把居民联合起来，建立或鼓励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派代表参加，受国家的监察等等。所有这些监督办法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讲过许多，写过许多。各个参战的先进国家所颁布的有关监督的法律已经译成俄文，或者在俄国报刊上已作详细介绍。

假如我们的国家真正**想**切实认真地实行监督，假如它的机关不是甘当资本家奴才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国家只要从大量可供选用的监督办法中把已经知道、已经采用过的办法随手拿来就行了。这里的唯一障碍，也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人民所隐瞒的障碍，始终在于：实行监督就会暴露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就会损害这些利润。

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任何一个**愿意把俄国从战争和饥荒中拯救出来的真正革命政府的纲领问题）解释得更加明白，我们把这些最主要的监督办法列举出来，逐一加以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政府不是为了开玩笑才叫作革命民主政府，那它只要在成立的头一星期中，颁布法令（作出决定、发布命令）来实施最主要的监督

办法，规定认真的而不是儿戏的惩罚办法，来处分那些用欺骗手段逃避监督的资本家，并号召居民自己来监视资本家，监视他们是否诚实执行有关监督的各项命令，只要这样，监督早就在俄国实现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

（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取消商业秘密；

（4）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5）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且对此实行监督。

现在我们把这些办法逐一地加以考察，看看它们在用革命民主手段来实行的条件下究竟具有什么意义。

银行国有化

大家都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词句和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准备履行的漂亮诺言来欺骗“老百姓”。

要监督和调节粮食的运送以至食品的生产和分配，而不监督和调节银行的业务，那是荒谬可笑的。这就象只抓偶然碰到的“几个戈比”，而闭眼不看成百万的卢布。现代银行同商业（粮食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长合在一

起，以致不“插手”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然而，国家“插手”银行也许是一种非常困难复杂的事情吧？有人常常就是竭力拿这一点来吓唬庸人，而这样做的当然是资本家及其辩护人，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

其实，银行国有化决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绝对没有任何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困难，障碍**完全**来自一小撮富人谋求卑鄙的私利。人们常常把银行国有化同没收私有财产混为一谈，这应当归咎于散布这种混乱概念的资产阶级报刊，因为它们一心想欺骗公众。

银行所支配和银行所汇集的那些资本的所有权，是有印制和书写的凭据为证的，这些凭据就叫作股票、债券、期票、收据等等。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即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时，这些凭据一个也不会作废，一个也不会改变。谁的存折上有 15 个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旧是 15 卢布的所有者，谁有 1500 万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然握有 1500 万卢布的股票、债券、期票、货单等等。

那么，银行国有化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在于对各单个银行及其业务不可能实行任何真正的监督（即使取消了商业秘密等等），因为无法查出它们在编制资产负债表、虚设企业、成立分行、冒名顶替等等时所采取的种种极复杂、极纷繁、极狡猾的手段。只有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这种合并本身丝毫也不改变财产关系，再说一遍，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监督，当然，同时还要采取上述其他各种措施。只有实行银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流动的来去方向、流动的方式和时间。只有监督银行，监督这个资本主义周转过程的中枢、轴心和基本机构，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经济生活的监督，做好对

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才能做到“调节经济生活”，否则这必将仍然是欺骗老百姓的一句部长式的空话。只有把各个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对它的业务进行监督，再采取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征收到所得税，才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而现在的所得税在极大程度上都落空了。

银行国有化只需颁布一项法令，银行经理和职员自己就会付诸实施。不需要国家设立任何特别机构和采取任何特别的准备步骤，这项措施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一举”实现。因为资本主义既然发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债券等等的程度，那它也就恰好在经济上造成了实行这种措施的可能性。这里剩下的事情**只是合并帐务**。如果革命民主国家作出决定：立刻用电报通知在每个城市中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会议，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代表大会，以便立刻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那么这一改革在几星期内就可以完成。当然，那些经理和高级职员会进行抗拒，竭力欺骗国家，故意拖延等等，因为这班老爷将会失去他们收入特别多的职位，再不能施展他们获利特别大的欺诈手段，**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可是，合并银行并不会有丝毫技术上的困难，如果国家政权不只在口头上是革命的（即不怕破除一切因循守旧的积习），不只在口头上是民主的（即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一小撮富人的利益），那么，只要颁布一项法令，用没收财产和监禁的办法来惩治那些对事情稍有拖延和企图隐瞒文据报表的银行经理、董事和大股东；只要——比如说——把那些穷职员**单独**组织起来，并给他们中揭发富人的欺骗和拖延行为的人发奖金，银行国有化就可以极顺利极迅速地实行。

银行国有化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众，而**不是**对于工人（因为工人很少同银行有来往），好处是非常大的。劳动将大大节省，假定国家仍保持银行原有职员的数量，那就是说，在使银行得到普遍利用方面，即在增加分行数目，银行业务便利公众等等方面会有极大的进步。正是对**小**业主，对农

民来说，信贷将变得非常方便和容易。国家也就第一次有可能首先是**考察**一切主要的金融业务，不准加以隐瞒，接着**监督**这种业务，然后**调节**经济生活，最后是**获得**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巨款，用于国家经办的大规模的业务，而不必再向资本家老爷们支付巨额“佣金”，作为他们的“酬劳”。正因为这样，而且只因为这样，一切资本家、一切资产阶级教授、整个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为它效劳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怒火万丈地叫嚣反对银行国有化，臆造出几千个借口来反对这个极简单而又极必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即使**从国家“防御”的观点，即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有极大的好处，它可以大大地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这里也许会有人反驳说：象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却没有想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一个是君主国，一个是共和国，可是**二者**都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既然是这样的国家，在实行它们所必需的改革时就要采用反动官僚的手段，而我们在这里说的则是革命民主的手段。

这个“小小的差别”有极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个差别，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一语在我国（特别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就象“感谢上帝”这句话一样，即使不是愚昧到相信上帝的人也常常会说的，或者象“可敬的公民”这个称呼，有时甚至也用来称呼那些《日报》或《统一报》的撰稿人，虽然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报纸是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创办和出钱维持的，因而所谓的社会党人参加这些报纸本身是很少有“可敬”之处的。

如果不是把“革命民主”当作公式化的装饰门面的词句，当作口头禅来用，而**考虑到**它的意义，那么要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就要真正重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而不是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最坚决最无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

无论在美国或德国，无论是政府或统治阶级，就我们所知，根本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追求这个称号（其实是玷污这个称号）。

在德国一共只有**四个**全国性的私人大银行，在美国只有**两个**。对于这些银行的金融大王来说，用私下的、秘密的、反动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手段，用官僚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来实行联合，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比较有利；他们收买国家的官吏（这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成了通例），保持银行的私有性质，这正是为了保守业务秘密，正是为了从国家那里赚取亿万“超额利润”，正是为了确保金融诈骗勾当。

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都是给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农民）建立了**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了**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就是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就是保证（在私下用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

这种办法在共和制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也完全可能实行，而且正在实行，不仅米留可夫之流和盛加略夫之流在实行，克伦斯基同捷列先科、涅克拉索夫、别尔纳茨基、普罗柯波维奇等等也在实行，他们**也是**用反动官僚手段来**掩护**银行的“不可侵犯”，**掩护**它们获取暴利的神圣权利。最好还是说**真话**吧：有人想在共和制的俄国用反动官僚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可是，由于“苏维埃”的存在，“常常”难以实行，第一个科尔尼洛夫曾想驱散“苏维埃”，没有成功，第二个科尔尼洛夫又会竭力设法来驱散它的……

这就是真话。这句朴实的真话虽然很辛辣，但对人民的启发却比说什么“我们的”、“伟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动听的谎话要有益得多。

※　※　※

银行国有化将会大大有助于保险事业的一并国有化，也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把它们的活动集中起来，受国家的监督。只要革命民主国家颁布一项有关法令，责令各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各自认真负责地毫不迟延地实行这种合并，那么，通过保险公司职员代表大会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实现这种合并。保险事业方面的几亿资金是资本家投入的，全部工作是由职员进行的。把这一事业统一起来，就可以减低保险金，使所有投保者能够获得许多便利，并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原有人力和资金的条件下可以增加投保者的数目。除占据肥缺的一小撮人的因循守旧和自私自利以外，决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阻碍这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又能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节省国民劳动，为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调节经济生活”又开辟一些极为重要的途径。

辛迪加国有化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的旧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它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顺便说一句，要是没有这一点，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技术上都是不能实现的。由银行统治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了最高峰。银行和各大工商业部门不可分割地长合在一起。一方面就是说，不采取步骤对工商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

就举糖业辛迪加这个例子来说吧。这个辛迪加在沙皇制度下就已经建立起来，那时已把许多设备好的工厂合并为一个极大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自然，这个联合组织充满了最反动的、官僚的气息，它保证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润，

使职员和工人处于绝对无权的、卑贱的、受压制的、奴隶的地位。国家在那时就已经对生产实行监督和调节——有利于资本巨头和富人的监督和调节。

这里要做的事情，**只是**发布一些简单的法令，规定召开职员、工程师、经理、股东的代表大会，采用统一的报表，由工会实行监督等等，从而把反动官僚方式的调节变为革命民主方式的调节。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做!! **事实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制糖业方面仍旧用反动官僚方式进行调节，一切都是老样子，浪费国民劳动，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让鲍勃凌斯基之流和捷列先科之流大发其财。应当号召发挥独立主动精神，向民主派而不是向官僚号召，向工人和职员而不是向“糖业大王”号召，要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联合”这些糖业大王的计划来模糊人民的意识，这本来是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几天之内一举做到的。然而正因为同富人实行联合，政府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也就完全不可避免了。[注：写到这里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克伦斯基政府正在实行糖业垄断，实行的方式自然是反动官僚的方式，不召开职员和工人的代表大会，不明文公布，也不制裁资本家!!]

再拿石油业来说吧。资本主义先前的发展已经使石油业在极大程度上“社会化”了。两三个石油大王——就是他们操纵着几百万以至几亿资金，靠剪息票为生，从那个在事实上、技术上、社会意义上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且**已经**由数百数千个职员、工程师等经营着的“事业”中获取惊人的利润。石油工业国有化是可以**立即**实行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国家必须做的事情，在国家经受极大的危机，必须千方百计节省国民劳动和增加燃料生产的时候，尤其如此。当然，官僚式的监督在这里不会有丝毫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情况，因为“石油大王”无论对付捷列先科之流、克伦斯基之流、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或斯柯别列夫之流，都象对付沙皇的大臣一样容易，对付的办法就是拖延、推托、许诺，以至直接和间接地收买资产阶级报刊（这就是所谓“舆论”，而这种“舆论”是为克伦斯基之

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所“重视的”），收买官吏（那些在原封未动的旧国家机构中被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留任原职的官吏）。

要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就必须从官僚制度转到民主制度，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来实行这种转变，就是说，要向石油大王和股东宣战，用法令规定，如果他们拖延石油业国有化，隐瞒收入或报表，暗中破坏生产，不采取增产措施，就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处以监禁。应当唤起工人和职员的主动性，立刻召集**他们**开会和举行代表大会，只要建立起全面的监督并增加了生产，就分出一部分利润给**他们**。如果能在 1917 年 4 月立刻就采取这种革命民主的步骤，那么作为世界上液体燃料储量最丰富国家之一的俄国，就能够在夏季利用水运在供给人民必需数量的燃料方面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

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都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玩弄了一套官僚主义的改良把戏，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不敢采取。仍然是那些石油大王，仍然是那种停滞，仍然是工人和职员对剥削者的憎恨，仍然是这一基础上的瓦解，仍然是对国民劳动的侵占，一切都和沙皇制度下一样，改变的只是“共和国”各办公厅发文和收文上的**名称**！

至于煤炭工业，它在技术上和文化上同样“具备”了实现国有化的“条件”；掠夺人民的煤业大王在管理上也同样卑鄙无耻，工业家公然怠工、公然**破坏**和停止生产的桩桩**事实**有目共睹。甚至孟什维克部长的报纸《工人报》也承认了这些事实。那又怎么样呢？除了举行几次工人代表和煤业辛迪加强盗的代表各占“半数”的旧的反动官僚式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没有采取，丝毫也没有想到要建立唯一切实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那些危害国家、停止生产的煤炭工业家！怎么可以这样呢？要知道，我们“大家”都主张“联合”，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就是同工商界“联合”，而联合就意味着把政权留在资本家手里，让他们横行无

忌，让他们阻碍事业，把一切都归罪于工人，使经济破坏加剧，**从而**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

取消商业秘密

如果不取消商业秘密，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要么仍旧是空洞的诺言——立宪民主党人用它来愚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用它来愚弄劳动阶级；要么可能完全用反动官僚的办法和措施来实现。尽管这一点对任何不抱成见的人来说十分明显，尽管《真理报》一直坚持取消商业秘密[注：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0 卷第 171—172、285、286—288、364—366、367—369、370—372 页。——编者注]（为资本效劳的克伦斯基政府封闭《真理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但无论是我们的共和政府或是"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对真正监督的这一**首要条件**连想也没有想过。

这正是实行任何监督的关键。这一点正是那些掠夺人民并暗中破坏生产的资本家的最敏感之处。正因为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就害怕触及这一点。

资本家通常提出的、小资产阶级不加思索一再重复的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不容许取消商业秘密，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企业对市场的依赖，使商业帐目和商业周转（当然银行周转也在内）必须保持"神圣不可侵犯"。

凡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种理由或类似理由的人，都是自己甘愿受骗，又在欺骗人民，他们闭眼不看现代经济生活中两个众所周知的极其重大的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大资本主义，这是银行、辛迪加、大工厂等等的经济特点。第二个事实就是战争。

现代大资本主义到处都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正是它消除了商业秘密的任何合理性，使商业秘密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只是掩盖大资本的金融诈骗行为和惊人利润的手段。大资本主义经济，就其技术本性来说，是社会化的经济，就是

说，它为千百万人工作，它通过自己的各种业务把成百、成千、成万个家庭直接或间接地连在一起。这并不是小手工业者或一般农民的经济，他们根本不记商业帐，所以取消商业秘密同他们没有关系！

在大经济中，它的业务反正有几百人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在这里并不是为生产或交换的需要服务的，而是为投机买卖和用极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暴利，以及真正的诈骗行为服务的。大家知道，在股份企业中这种诈骗行为特别流行，而且用伪造得足以欺骗公众的报表和资产负债表非常巧妙地掩盖起来。

如果说在那些生产本身还没有社会化、还是分散零星的小商品经济中，即在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中，保持商业秘密是必不可免的，那么在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护这种秘密，便是保护真正一小撮人的特权和利润而**损害**全体人民。既然规定股份公司必须公布报表，那就是说，法律也已经肯定了这一点，不过**这种**监督（这在一切先进国家以及俄国都可以实行）正是反动官僚式的监督，这种监督不是擦亮**人民**的眼睛，而是**不让**人民知道股份公司业务的**全部真相**。

按革命民主方式行事，就应该立刻颁布另一种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要求大企业和富人有最完备的报表，让任何一个公民团体（在民主的意义上说已达到相当人数的团体，譬如 1000 或 10000 选民）有权审查任何一个大企业的**一切**文据。这样的办法只要有一项法令就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联合会，通过各政党来调动**人民**对监督的主动性；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

此外还要考虑到战争。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不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是**为国家**、为战争服务。所以我已经在《真理报》上说过，用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这一理由来反驳我们的人是撒谎，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

要现在立刻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是要**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注：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0 卷第 286—288 页。——编者注］。

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军事订货有关的经济）在法律保护下一直在**盗窃国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反对取消商业秘密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盗窃国库的帮手和庇护者**。

为了战争俄国现在**每天**耗费 5000 万卢布。每天 5000 万，这个数目大部分是付给军火商的。在这 5000 万中**每天**至少有 500 万，也许有 1000 万以至更大的数目成了资本家和同他们有某种勾结的官吏们的“正当收入”。特别是那些为军事订货提供贷款的大公司和大银行，在这里赚取了闻所未闻的利润，它们大发横财就是靠盗窃国库，因为这种乘战争灾难的“机会”，乘几十万、几百万人死亡的“机会”来欺诈和掠夺人民的行为，决不能叫作别的。

关于这种从军事订货中获得的可耻的利润，关于银行隐匿的各种“保证书”，关于靠物价飞涨发财的是些什么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上”也用嘲笑态度谈论着这些事，**甚至**那些通常避而不谈“不愉快的”事实、绕开“棘手”问题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点也明确无误地多次提到。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说，都忍气吞声，都听任政府冠冕堂皇地谈论“监督”和“调节”！！

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们真是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那他们就应该立刻颁布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责成军火商和商人公布报表，未经当局允许不得擅自丢弃他们所经营的业务，用没收财产和枪毙［注：我有一次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指出过，只有在剥削者为了维护剥削而用死刑来对付劳动**群众**的时候，才能认为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正当的。（参看本卷第 90—93 页。——编者注）不用死刑来对付**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这是任何革命政府都未必能做到的。］来惩治那些隐瞒实情和欺骗人民的人，组织**来自下面的**、民主的检查和监督，即由人民自己，由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以及消费者团体等等实行检查和监督。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完全称得上是被吓倒的民主派，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重复所有被吓倒的市侩的话，说什么采用“过严的”办法，资本家就会“逃走一空”，说没有资本家“我们”就不行，说也许英法百万富翁也会因此“见怪”，而他们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如此等等。使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从未试行过的东西，是“乌托邦”。其实早在 125 年以前，在法国就有过真正的“革命民主派”，他们真正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他们真正依靠同样有这种真诚信念的人民群众，——这些人能够建立起对富人的**革命**监督，并且获得了举世钦佩的结果。而在这 125 年中，资本主义发展了，建立起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等，这就使工人和农民对剥削者，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真正民主监督的措施要容易和简单百倍。

就实质来说，监督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谁监督谁，就是说哪一个阶级是监督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监督阶级。直到现在，在我们共和制的俄国，在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参与下，仍旧承认地主和资本家是监督者，仍旧让他们当监督者。结果，资本家激起人民公愤的掠夺行为就必然出现，资本家故意维持的经济破坏现象也就必不可免。应当不怕打破旧的，不怕大胆建设新的，坚决彻底地实行**由**工人和农民**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监督。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最害怕的事情。

强迫参加联合组织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联合组织，例如强迫工业家参加联合组织，在德国已经这样做了。这里丝毫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过错，共和制的俄国在这方面也是完全陷于停滞状态，这两个不那么可敬的政党还在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和布勃利科夫之流，或者和捷列先科及克伦斯基跳起卡德里尔舞[4]供俄国“消遣”。

强迫辛迪加化，一方面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推动，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地使阶级斗争成为有组织的斗争，使联合组织的数量增加，名目繁多，作用增大。另一方面，强迫“联合化”又是任何一种稍微认真的监督办法和任何一种节省国民劳动的办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例如，德国的法律责成当地或全国的制革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种法律丝毫没有直接（指法律本身）触动财产关系，没有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没有预先决定，这种监督是用反动官僚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还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

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哪怕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也不要失掉，让**社会环境本身**去规定实施法律的更具体的方式、速度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办法等等。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国家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的考察以及事先的调查，只要有决心同那些“不习惯”这种干预、不愿意丧失超额利润（按老规矩经营又不受监督而得来的）的资本家的某些私人利益断绝关系就行。

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并不需要任何机构，任何“统计”（切尔诺夫曾想用“统计”来代替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这种法律应当由工厂主或工业家本身，由现有的社会力量来实施，并由**现有的**社会（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加以监督，不过这种社会力量一定要来自所谓“下层等级”，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比剥削者**高出**无数倍。

假定我国有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它规定每个生产部门中凡是雇用工人两个以上的工厂主和工业家都必须立刻参加县和省的联合组织。首先要责成工厂主、经理、董事、大股东始终如一地执行法律（因为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真正的领袖、真正的主人）。如果他们规避立刻执行法律的工作，就把他们当作逃避兵役者加

以惩办，并实行连环保，各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大家对一人负责，一人对大家负责。其次，所有职员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他们也必须成立**一个**团体，所有工人和工会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联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备、最严格和最详细的报表制度，而主要是把购买原料、销售产品、**节省**国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业务联合起来**。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应当再重复一遍，联合成一个辛迪加，这本身丝毫不改变财产关系，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这一点必须再三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在"吓唬"中小业主，说社会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骗人的，因为社会党人**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我们说的始终**只是**最紧迫最必要的办法，这些办法在西欧已经实现了，凡是稍微彻底一点的民主派都应当立刻在我国采取这些办法，以便同日益逼近的不可避免的灾难进行斗争。

如果要小的和极小的业主都参加各种联合组织，那无论在技术上或者文化上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企业非常分散，技术简陋，业主本人又不识字或无知识。然而正是这些企业可以不包括在这项法律之内（我们在上面假设的例子中已经指出了），即使不把它们联合起来，更不用说联合得晚一些，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障碍，因为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依赖大企业的。

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大企业，这种企业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已经具备了**"联合化"所必需的手段和人力，所缺少的只是**革命**政权调动这些人力和手段所必需的严厉无情地对待剥削者的那种坚决果断的主动精神。

国家愈缺乏受过技术教育的人才和一般知识分子，就愈**迫切**需要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坚决地下令实行强迫联合，而且要从大的和最大的企业开始，因为正是联

合才能**节省**知识分子，才能**充分**使用和更合理地调配这些力量。既然沙皇政府统治下的穷乡僻壤的俄国农民，努力排除政府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也能在 1905 年以后，在成立各种联合组织方面大大跨进一步，那么现在大工商业和中等工商业的联合自然就能够在几个月内实现，或者还要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能强制执行，能依靠“下层”即民主派、职员、工人的支持和参加，使他们从中得利受益，并且号召**他们**起来实行监督。

调节消费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了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然而，正好用这个例子，我们也许可以把对付灾难的反动官僚办法同革命民主办法作一个最鲜明的对比，前一种办法力求局限于最微小的改革，而后一种办法要名副其实，首要任务就是强制地同过时的老一套决裂，尽可能加快事情的进展。

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让大家够吃。规定最高消费量的远不是一切食品，而只是几种主要的“大众”食品。如此而已。别的就再也不管了。官僚式地统计现有存粮，按人口分配，规定定量，付诸实施，这样就算完事。奢侈品是不涉及的，因为这些东西“反正”很少，“反正”很贵，“人民大众”是买不起的。所以在无一例外的**所有**交战国中，**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模范国家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富人一直**不受**任何消费“定量”的**限制**。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大家”谈起来都是加以嘲笑的。德国社会党的报刊（有时甚至是资产

阶级的报刊），不管德国军营般森严的书报检查机关如何横暴，经常登载一些短评和消息，报道富人的“菜单”，披露富人在某某疗养地（凡是……有钱的，都可以托病到那里疗养）可以无限制得到白面包，富人吃的是难以见到的珍馐佳肴，而不是大众食品。

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害怕**损坏资本主义的基石，雇佣奴隶制的基石，富人经济统治的基石，**害怕**发挥工人以及所有劳动者的主动性，**害怕**“煽起”他们的要求；**这样的**国家除了面包配给证，其他什么也不需要。这样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一个步骤，都不会忽略自己的**反动**目的：巩固资本主义，不使它受到损害，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尤其在调节消费方面，仅仅采取一些使人民不致挨饿所绝对必需的办法，而决**不打算**真正调节消费，就是说，并不想**监督富人**，并不想把战时**更多的**负担加到那些在和平时期养尊处优、享有特权、饱食终日的富人身上。

用反动官僚办法解决战争向人民提出的任务，就只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平均分配那些生活绝对必需的“大众”食品，一点也不放弃官僚主义和反动性，就是说，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不**调动穷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平民”）的主动性，**不**容许**他们**监督富人，**更多地**为富人留下享受奢侈品的漏洞。在**所有**国家中，重复一句，甚至在德国，更不消说俄国了，这样的漏洞是留得很多的，“老百姓”在挨饿，而富人却到疗养地去，除官方规定的很少一点定量外，还得到各种“补贴”，而且**不**许别人对**自己**监督。

在刚刚完成了反对沙皇制度、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的俄国，在按实际政治制度来说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国的俄国，**大家**看到富人可以轻易躲过“面包配给制”的限制，这特别使人民感到刺眼，特别引起群众的不满、恼怒、痛恨和愤慨。他们这样做非常容易。他们“暗地里”用特别高的价格，尤其是“**依靠交情**”（这种交情只有富人才有），就能得到一切，而且数量很大。人民却在挨饿。调节消费

受到最狭窄的官僚反动的框框的限制。政府方面丝毫没有想到，丝毫没有设法根据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则来进行这种调节。

“大家”都吃到排队买东西的苦头，可是……可是富人却派仆人去排队，甚至雇用专门的仆人来做这件事！这也叫作“民主制度”！

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充分贯彻对消费的监督；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要他们无报酬地在这些消费合作社中从事文书之类的劳动；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要使富人的消费受到居民中贫苦阶级的监督。

在这方面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在组织人民中最贫苦阶级实行监督方面表现真正的革命性，就能大大推动现有的每个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就能发挥全体人民真正的革命干劲。然而现在，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俄国的部长们，和他们在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同行一样，说些“为人民利益共同劳动”、“调动一切力量”这样的漂亮话，可是人民到底还是看到了、感受到了、觉察到了这些话的虚伪性。

结果是踏步不前，瓦解现象日趋严重而无法控制，灾难日益逼近，其原因在于：按照科尔尼洛夫方式，按照兴登堡方式，按照一般帝国主义方式来让工人服军事苦役吧，我国政府无法做到，因为**革命**的传统、记忆、痕迹、习惯和制度还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真正认真地沿着革命民主的道路前进几步吧，我国政府又不愿意，因为它完全依赖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搞“联合”，生怕触犯资产阶级事实上的特权，这样就把它浑身上下都束缚住了。

政府破坏民主组织的工作

我们探讨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各种办法和方法。我们处处都看到了，以民主派为一方，以政府以及支持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为另一方，彼此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证明这些矛盾不仅我们说存在，而且在实际上存在，为了证明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已为具有全民意义的冲突所**实际**证实，只要提一下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历史中两个特别典型的“总结”和教训就够了。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历史是一个教训。彼舍霍诺夫“当权”和垮台的历史又是一个教训。

上述各种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实质上就是要从各方面鼓励（直到强迫）居民，首先是民主派即大多数居民“联合化”，也就是说首先鼓励被压迫阶级，鼓励工人和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联合化”。为了克服战争所带来的空前的困难、重担和灾难，居民自己已经自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沙皇政府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居民自动地和自由地“联合化”。但在沙皇君主制崩溃后，民主组织便在俄国各地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自发的民主组织，即各种供给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燃料会议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进行了克服灾难的工作。

在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全部历史中，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自称为共和的革命的**政府**，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革命民主派全权机关”的名义**支持的**政府，竟**反对**民主组织，并且**搞垮了这些组织**！！

帕尔钦斯基由于进行这个斗争，臭名传遍了俄国。他藏在政府背后进行活动，而不在大庭广众公开出面（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也喜欢以这种方式活动，乐意推出策列铁里来“对付人民”，自己却在暗中包办一切重要事情）。帕尔钦斯基阻挠和破坏了自发民主组织的一切重大措施，因为任何一项重大措施都不能不“损害”基特·基特奇之流的无限利润和专横气焰。而帕尔钦斯基正是基特·基特奇之流的

忠实卫士和奴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这是报上公布过的事实——帕尔钦斯基竟公然**撤销**自发民主组织的指令!!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全部历史（他“当权了”好几个月，而且正是在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当“部长”的时候），完全是一部**讨好**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卑鄙私利而践踏民意、破坏民主派决定的见不得人的丑史。自然，报纸上能够发表的只是帕尔钦斯基“功绩”的极小一部分，要把他**阻挠**克服饥荒的罪行彻底查清，只有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政府才能做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会把帕尔钦斯基及其同类人物的案件毫不隐匿地提交人民**审判**。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帕尔钦斯基只是一种例外，他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可是问题正在于：帕尔钦斯基不是例外，而是**通例**；赶走了帕尔钦斯基，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善；代替他的只是一些名字不同的帕尔钦斯基罢了；资本家的全部“**影响**”，**为讨好资本家而破坏克服饥荒**的全部政策，仍丝毫没有触动。因为克伦斯基之流不过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屏风而已。

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明，就是粮食部长彼舍霍诺夫退出内阁。大家知道，彼舍霍诺夫是个最最温和的民粹派。可是他在组织粮食工作方面很想老老实实地做些事情，同民主组织取得联系，把它们作为依靠。彼舍霍诺夫的工作**经历**和**退出**内阁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极温和的民粹派分子，这个“人民社会”党党员，虽然决心同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还是不得不退出内阁！原因是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讨好资本家、地主和富农而**提高了**粮食的固定价格!!

请看玛·斯米特在9月2日《自由生活报》[5]第1号上对这个“步骤”及其意义的描写吧：

“在政府决定提高固定价格的前几天，全国粮食委员会里曾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右派代表罗洛维奇这个顽固维护私人商业利益、激烈反对粮食垄断和国家

干预经济生活的人，洋洋得意地当众宣布，据他所知，粮食的固定价格很快就要提高了。

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回答说，他丝毫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只要革命还在俄国进行，决不会有这种事，不同民主派的全权机关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粮食委员会商量，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也同意这个声明。

但是，可惜！事实对这个反声明作了非常严酷的修正：言中的不是民主派的代表，而是有产者的代表。关于准备侵犯民主派权利这件事，他消息很灵通，而民主派的代表连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也愤慨地加以否认。”

总之，无论工人代表或农民代表，都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名义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见，而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却反其道而行之！

罗洛维奇这个资本家的代表对于民主派不知道的那些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这正象我们常常看到而且现在还能看到的情形一样：资产阶级报纸《言语报》和《交易所小报》对于克伦斯基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

这种消息灵通说明什么呢？显然说明资本家有自己的“门路”，并且**在事实上**掌握着政权。克伦斯基是一个傀儡，他们要怎样使用他，就怎样使用他，要什么时候使用他，就什么时候使用他。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成了一小撮富人利润的牺牲品。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怎样回答这种令人愤慨的嘲弄人民的行为呢？也许他们已经发表了告工人和农民书，宣告干这种事情的克伦斯基及其同僚只配进监狱吧？

根本没有这回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仅仅以他们所把持的“经济部”的名义通过了一项我们已经提到的虚声恫吓的决议！他们在这个决议中声称，克

伦斯基政府提高粮食价格是一种“**有害的**办法，使粮食工作以及全国经济生活遭受**莫大的打击**”，说实施这些有害的办法是公然“**违反**”法律的！！

这就是妥协政策的结果，这就是向克伦斯基讨好并想对他“宽恕”的政策的结果！

政府讨好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富人，采取这种对整个监督工作、粮食工作和整顿摇摇欲坠的财政的工作**有害**的办法，就是违反法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继续谈论同工商界达成协议，继续同捷列先科磋商，继续宽恕克伦斯基，只是通过了一纸决议表示抗议，但就是这个决议也被政府若无其事地束之高阁了！！

这里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一个真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人民和革命，而布尔什维克才是群众（**甚至**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群众）的真正领袖。

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才能肃清克伦斯基之流所造成的混乱现象，才能**恢复**被克伦斯基及其政府所**破坏**的粮食、供给等等的民主组织的工作。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出，布尔什维克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即做好粮食和供给工作、满足工人**和农民**的追切需要这样的利益，这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动摇的、不坚决的、真正叛卖性的政策正好相反，他们的政策竟使国家干出了提高粮价这种可耻的事情！

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

提高粮食固定价格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价格的提高意味着更多地滥发纸币，物价更加高涨，财政紊乱加剧，财政破产逼近。大家都认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制性借款，它使工人这一部分最贫困的居民境况尤其恶化，它是财政混乱的主要祸害。

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支持的克伦斯基政府恰恰采用了这种办法！

要认真克服财政紊乱和必不可免的财政破产，除用革命手段同资本的利益决裂，组织真正民主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对**资本家的监督之外，也就是除前面我们所说的办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大发横财，并且给亟需扩大的生产造成莫大困难，因为材料、机器等等的价格日益昂贵，不停地飞涨。富人把投机得来的财富隐瞒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可以对数额很大和极大的收入征收税率很高的累进所得税。继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后，我国政府也实行了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多半是落空的，是一纸空文，因为第一，货币贬值愈来愈快，第二，收入来源愈是靠投机，商业秘密保守得愈严，隐瞒收入也就愈厉害。

要使税收实际可靠，不致落空，就必须实行实际的而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监督。如果监督仍然是官僚式的，那就不可能对资本家实行监督，因为官僚本身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管是君主国也好，共和国也好，整顿财政完全靠实行“劳动义务制”，而实行的办法就是让工人服**军事苦役**或者说沦为**军事奴隶**。

反动官僚式的监督是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美国这两个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把战争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唯一手段。

我国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闹翻，不破坏同它的“联合”，就不得不实行反动官僚式的监督，同时为了不断欺骗人民，又把这种监督叫作“革命民主的”监督，这样就激起了刚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众的愤怒和痛恨。

其实，只有采取革命民主的办法，把工农被压迫阶级，把群众联合在各种团体中，才能**对富人**实行真正的监督，才能最有效地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

现在正在大力鼓励用支票流通的办法来防止滥发纸币。这种办法对穷人没有意义，因为穷人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一星期就完成一次“经济周转”，把挣来的很少几个钱又还给资本家。对于富人，支票流通则有巨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取消商业秘密之后，支票流通就能够使国家**真正监督**资本家的收入，真正抽他们的税，真正把财政体系“民主化”（同时加以整顿）。

但是这里的障碍正是那种害怕侵犯资产阶级特权、害怕破坏同它的“联合”的心理。因为不采取真正革命的办法，不使用极严厉的强制手段，资本家就不会服从任何监督，不会公开自己的收支情况，不会向民主国家“申报”储藏的纸币。

联合在各种团体中的工人和农民，只要把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一切富人都必须依法执行的支票流通的办法，取消商业秘密，规定没收隐瞒收入者的财产，等等，就能非常容易地使监督成为真正的和普遍的监督，正是这种对富人的监督，能使国库发行的纸币**从那些**拥有和隐藏纸币的人手中**回交国库**。

为此就必须有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派的革命专政，就是说，为此民主派就必须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关键。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愿意做的事，他们打着“革命民主”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实际上支持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政策，而资产阶级总是遵循下列原则：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éluge”）[6]！

我们平常甚至没有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心灵。某个工程师或银行家公布工人的收支情况，公布关于工人工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材料，被认为是非常合理合法的事情。谁也不认为这是侵犯工人的“私生活”，是工程师在“侦探或告密”。资产阶级社会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工资看作**自己的**公开帐簿，任何一个资产者都有权随时查看，随时揭露工人如何“奢侈”、如何“懒惰”等等。

可是，如果反过来进行监督呢？如果职员、办事员和**仆役**的团体应**民主**国家的邀请来检查资本家的收支情况，公布这方面的材料，协助政府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那又会怎样呢？

那资产阶级就会大嚷大叫地反对“侦探”，反对“告密”了！“老爷”监督仆役，资本家监督工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被剥削劳动者的私生活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帐，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而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查清**他的**收支情况，要揭露**他的**奢侈生活——哪怕在战争期间，在这种奢侈生活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的时候——啊，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侦探”和“告密”的！

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的制度是**不可调和的**。在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害怕**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

以上所说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想侵蚀的读者的反驳，说这里描述的实质上多半不是民主的措施，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了！

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125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

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为，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

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

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这个糖业辛迪加又使我们亲眼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怎样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什么是国家呢？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谢德曼、伦施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

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

——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或者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或者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象普列汉诺夫、唐恩、切尔诺夫那样，借口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施"社会主义等等来非难这些步骤，那就必然会滚到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那边去，即用**反动官僚手段**来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民主的"要求。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这里。

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 20 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些步骤为技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 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进。

害怕前进，**那就意味着**后退，而克伦斯基之流先生们在米留可夫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欣然赞赏下，在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愚蠢帮助下，正是这样做的。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

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　※　※

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

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什么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呢？

这就是在最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是朝着按照某一总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方向，朝着节省国民劳动、防止资本主义加以滥用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对工人来说必然成为军事苦役。

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么请想一想，它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步骤**，在保持充分民主的条件下，除非对群众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决不可能从这样的步骤退到资本主义去。

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

既然谈到战胜日益逼近的灾难的办法问题，我们就得说明一下另外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之间、罪恶的掠夺战争和正义的民主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上面已经指出，我们所描述的一切战胜灾难的办法，会大大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换句话说，会大大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侵略战争变为正义战争，不把资本家为了本身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那么这些办法就不能实施。

情况确实如此。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同时取消商业秘密和实行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不仅可以大大节省国民劳动，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而且会使居民中的劳动**群众**即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大家知道，在现代战争中，经济组织是有决定意义的。在俄国，粮食、煤、石油、铁都很充足，在这方面，我国的状况比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都好。如果在用上述办法消除经济破坏时，发挥群众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俄国就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水平大大提高。

假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那些阻挠一切监督办法、暗中破坏生产的资产阶级搞“联合”，而在 4 月间就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并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玩弄“更换阁员的把戏”，用在争取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分享部长、副部长等等官位，而是把力量用来领导工农实行**他们对**资本家的监督，领导工农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战争**，那么俄国现在就会成为一个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造的国家，成为一个土地归农民、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而这是现代生活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会**超过**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它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超过**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由农民委员会掌握的农民国家，它的军事实力**超过**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人们常常拿法国人在 1792—1793 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奋勇作战的奇迹作例证。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即历史经济条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那种迅猛、果敢、坚韧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用“神奇的”速度挽救了法国，把它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加以**革新**的物质经济条件。

法国的例子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要使俄国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要使俄国也出现群众英勇奋斗的“奇迹”，就必须用“雅各宾式的”无情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在经济上**革新俄国，改造俄国。这在 20 世纪不是光靠推翻沙皇制度（法国在 125 年前就已经不限于此了）就能办到的。这甚至也不是光靠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农民！），光靠把土地转归农民就能办到的。因为现在是在 20 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造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

18 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融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势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了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 1792—1793 年，而是过了很多年，**在**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战争由防御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

俄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继续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是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遵照**沙皇**同英国等国的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进行的，这些条约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利沃夫、亚美尼亚等等。

只要俄国还没有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还没有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仍然是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社会性质和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敌军盘踞在什么地方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堕落到了无知农夫的庸俗水平）。决定战争社会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引导群众去参加履行秘密条约的掠夺战争，还指望群众表现热情，这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国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罪恶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打消群众的这种信念，群众对战争的罪恶性质的认识反而日益提高了。俄国**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了！

这里怎么谈得上群众拥护战争的热情呢！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没有人民在果敢地实现伟大的经济改造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就不能使国家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而不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不向各国人民提出缔结民主的和约，不用这种办法把侵略的、掠夺的、罪恶的战争变为正义的、防御的、革命的战争，就不能激发群众的英勇精神。

只有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完全彻底地同资本家断绝关系，才能挽救我们的革命，挽救我们这个被帝国主义的铁钳钳制着的国家。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

目前俄国的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就应当同无产阶级结成最紧密的联盟，一起前进，支持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

分析了同规模空前的不可避免的灾难作斗争的办法问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战争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机，使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达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使整个现代社会组织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此人类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是灭亡，要么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最激进地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

由于许多历史原因（俄国比其他国家落后得多，战争带给它的困难特别大，沙皇制度腐朽透顶，1905 年的传统还充满活力），俄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了革命。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

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先进国家的现成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欧洲日益高涨的反战浪潮，全世界工人革命日益发展的气氛，给我们以精神上的支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极为罕见的革命民主的自由正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这样的时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证明布尔什维克的老提法（只要形式上相应地作些改变）是正确的，即必须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

而农民在整个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是人数最多的。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担任了反动的角色：他们让农民继续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引导农民去同资产阶级联合，而不是去同无产阶级联合。

革命的经验迅速地教育了群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反动政策正在破产：他们已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遭到失败[7]。在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内部都有“左的”反对派在成长。1917 年 9 月 10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社会革命党市代表会议上，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联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三分之二的多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重复资产阶级所喜爱的对比方法，即拿资产阶级与民主派作对比。但是，这种对比实质上就象拿尺与斗作对比那样荒谬。

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只有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都十分无知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要作这种不正确的对比，是为了**掩盖**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们整个“联合”的实质、整个联合内阁的实质、克伦斯基这个典型的半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策的实质就在这里。在这半年的革命中，这个政策已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说革命遭到了破产，革命既**没有**消除战争，也**没有**消除经济破坏。

这话不对。遭到破产的是**立宪民主党人**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半年来是这个联盟在统治俄国，而且在这半年中使经济破坏加剧了，使战争局势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困难了。

资产阶级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破产愈彻底，人民**受到教育**也就愈快。人民也就会更容易地找到**正确的**出路，那就是：贫苦农民即大多数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注释：

[1]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篇著作是1917年9月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写的，1917年10月由波涛出版社印成了小册子。在此以前，它的最后两章《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曾发表于1917年10月1日（14日）《工人之路报》第25号。——[181]。

[2]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个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民主会议，目的是利用会议的讲坛来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9月18日（10月1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民主会议上宣读了党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给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的妥协政策以尖锐批评。9月19日（10月2日），会议就政权问题进行表决，结果是赞成同资产阶级联合而把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四分之三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反对联合）。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决议案，由于妥协派内部的分歧只得到了183张赞成票。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决定，由组成会议各集团分别派出名额为其人数15％的代表组成常设机关—

—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的职能。成立预备议会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但是 9 月 25 日（10 月 8 日）组成的新的联合临时政府把一大批立宪民主党人及其他资产阶级地主组织的代表补充进预备议会，并且限制了它的权利和职能。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于 9 月 21 日（10 月 4 日）决定从民主会议主席团召回布尔什维克，但不退出会议，同时以 9 票对 8 票决定不参加预备议会。由于双方票数大体相等，问题又交给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讨论，结果却以 77 票对 50 票作出了参加预备议会的决议，并经中央批准。列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在对待民主会议问题上策略错误，坚决要求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集中力量准备起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讨论了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10 月 7 日（20 日），在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宣读声明后退出。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预备议会被赤卫队解散。——[187]。

[3] 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这里用作工商界大亨的代称。——[187]。

[4] 卡德里尔舞是一种有四人参加、分为两对的民间舞蹈，在欧洲颇为流行。——[202]。

[5] 《自由生活报》（《Свободая Жизнь》）即《新生活报》。1917 年 9 月 2—8 日（15—21 日）《新生活报》被临时政府封闭期间，曾用这个名称继续出版。——[210]。

[6] “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215]。

[7] 指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政治决议案首次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通过。1917 年 8 月 31 日（9 月 13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以 279 票赞成、115 票反对、50 票弃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案。决议案坚决否定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号召将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并提出了在国内进行革命改造的纲领。几天后，9 月 5 日（18 日），莫斯科苏维埃也以 355 票的多数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9 月 25 日（10 月 8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进行改选，苏维埃选出的主席团基本上由布尔什维克组成。列·达·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同时，维·巴·诺根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列·米·欣丘克。——[224]。